
金 日 成
回 忆 录
与世纪同行
（续编）7

金日成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

7

（续 编）

外 文 出 版 社

朝 鲜 · 平 壤

1996

第一部

抗 日 革 命

（7）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以民为天，无限热爱人民，无比信赖人民，一生饱经风霜，全心全意为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金 正 日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回忆录
《与世纪同行》续编出版说明

人类的太阳、卓绝的伟人、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晚年构想出版一部总结自己一生的鸿篇巨著回忆录。他不顾年事已高，不分昼夜，付出辛勤的劳动，生前写完了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的前六卷。

回忆录《与世纪同行》前六卷问世后，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成为启迪人们领会革命的原理、原则和方法，将热爱祖国与民族、热爱人民与同志的精神播撒在人们心田里的宝贵的生活与斗争的教材。

慈父领袖金日成同志未及写完回忆录，便溘然长逝，这是令人肝肠寸断的莫大损失；回忆录的编撰工作因而来能完成，令人感到无限惋惜。

幸亏他生前亲自拟定了回忆录的总体结构和详细纲要，留下了大量的遗稿、有关重要历史事实与人物的丰富的回忆资料。

党中央委员会受权根据慈父领袖生前亲自拟定的纲要、遗稿和党的文库所珍藏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与回忆资料，编纂出版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的续编。

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的续编，对进一步发扬光大八十多年

来全心全意为祖国与民族的繁荣、为人类的幸福献出了一切的伟大革命家、伟大政治家、伟人金日成同志的崇高品质和不朽的业绩，对广大人民永远保持伟大领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信念和无比的自豪感，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1996年4月15日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大部队回旋战

第十九章

力挽狂澜

时期：1937．11～1938．11

一　马塘沟密营

中国东北靖宇县过去叫濛江县。县境内有一片叫牌子的原始森林，广阔无边，如茫茫大海。密林的东部叫东牌子，这里有个地方叫马塘沟。

从1937年11月下旬到第二年3月下旬，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冬季军政学习。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生前谈论青少年学生、干部和人民军官兵的学习问题时，常常谈及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学习经验。

本节收录了金日成同志给抗日革命斗争史研究人员讲述的部分回忆。

1937年冬，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在濛江县马塘沟密营集中进行军政学习，大约有四五个月时间。

你们也许觉得奇怪，这年春天已在东岗密营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学习，怎么现在又进行学习呢？其实，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

朝鲜人民革命军不是单纯的军事集体，而是政治和军事并重的革命军队。只有文武双全，才能搞好武装斗争及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等政治工作。我们之所以下这么大的力量教育军人，就是这个缘故。培养和教育军人的有效办法，就是搞好学习。

大家知道，我们从很早以前就抱定这样一种观点：人是一切的主人、人决定一切；认为革命成败的决定因素是人的思想意识。

所谓人决定一切，就是说人的思想意识和智力决定一切。而人的思想意识和智力，是必须通过学习才能不断提高和增进的。

我们在一年里集中地进行了两次军政学习，也和当时的急迫情况有关。那时，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就要吞并整个东亚，开始出现了灰心丧气的现象。日军挑起侵华战争以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吞噬了中国关内的广大地区。这样一来，人们就发生了动摇。就是曾为救国进行过斗争的人，也蜷缩在旮旯里沦为空谈的“忧国志士”，或逃匿乡间，只求一己之活命。我们革命军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动摇分子，虽然是个别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集中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我们就不可能加强主体的革命力量，也不可能满怀信心地坚决执行我国革命的自主路线。

其次，打着共产国际招牌的种种错误路线所引起的混乱，也是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

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左倾冒险主义者，强令我们执行不切实际的热河远征路线，给朝中两国的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

那时，在一些憧憬共产主义的人们中间，流传着所谓朝鲜共产党发起人集团拟出的《朝鲜共产党行动纲领》和一个姓金的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的讲话，颇受重视。党被解散以后，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们到处寻找正确的指导路线。当他们看到这个《朝鲜共产党行动纲领》和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时，便想从中得到某种启迪。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共产国际大会讲坛上或机关刊物上，能够听到或看到朝鲜人的呼声和讲话，当然是值得高

兴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个《行动纲领》和讲话里却有很多不切合朝鲜实际的论调。

我们早在卡伦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朝鲜革命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我们还有在游击区贯彻人民革命政府路线的经验。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想到，必须首先在人民革命军部队里进行教育，使我们的指战员对朝鲜革命的自主路线有个正确的认识。为此，我写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这篇论文，并以此为教材，集中进行政治学习。我在这篇论文中，重新阐述了朝鲜革命的性质和当前任务，提出了朝鲜共产主义者旨在自主地进行朝鲜革命的任务。

我们还想到，为了从政治、军事上培养和锻炼新战士，也必须再组织一次军政学习。

马塘沟离敌人的据点较远，是适于革命军搞一冬军政学习的好地方。我还记得我们在到达马塘沟的那天，在先遣队搭好的火炉上烤土豆吃的情景。濛江也和抚松、安图一样，盛产土豆，有的像木枕头那么大，一个大水瓢只能盛一个土豆，而且味道也很好。

我们先召开了军政干部会议，给每个指战员指定了这一冬里要达到的学习目标；然后让各部队、各革命组织和学习班分别开会表明努力搞好学习的决心。“学习也是战斗！”“学习是革命者的首要义务！”这些口号，就是我们在军政学习开始时提出的。我让每个营房都贴上这两幅大标语。

在我们游击队里，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没有几个。马东熙、崔

景和、金永国、姜燉这些人还有点文化，因而得了“大学生”的称号。但他们的学历，也不过是小学或中学毕业。因为都是穷人家的子弟，想上学也上不起。论学历，徐哲算是最高的，是从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不过他并不是因为家里有钱才念专科学校的，而是因为有恒心，坚韧不拔，通过工读念完了专科学校。我们部队里，像朴素心、车光秀、“烟斗老头”那样多闻博识的人很少。

在马塘沟开始军政学习的时候，有些新队员只参加军事训练，不愿参加政治学习。朴昌顺就是个典型。他是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睁眼瞎，却一点也不觉得害臊，反而夸海口说，虽然不识字，打仗可比别人打得好。他常常旷课。如果问他为什么老旷课，他就说，脑子里一团漆黑，任什么都装不进去，还是多练练打靶，好多打死几个日本鬼子，这才是上策。

有一天，我找他来谈话，指着面前的一棵色树，问他这种树做什么用才好。他回答说做斧头把儿最好。我又问他，把小牛犊喂大了，要当耕牛使唤，应当怎么办？他说，要给它穿鼻环。

他本是个庄稼人，拿这些问题考他，他是能对答如流的。

我对他说，你回答得很好。你种过地，才熟悉这些事，不然，你能懂这些道理吗？革命工作也有它的道理。什么东西哪里需要，什么事情该怎么做，懂得这些的人才能做好革命工作。不懂的人，眼前放着色树，也不会知道那是做斧头把的好料；打仗也一样，心中没谱的人打不死多少敌人；光拿枪是打不败敌人的。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学习，那我们就送你回家去吧。连学文化

都怕吃苦的人，还能做艰苦的革命工作吗？只好让你把枪交出来，回家种地了。你说，你要走哪条道？这一下，他愣住了，显得十分难过。

他是自愿来找我们参加革命的，自然不会因为不愿意学习而离开我们。从此以后，他就咬紧牙关开始学文化了。

新入伍的战士中，还有一个借口脑子不灵不肯学文化的人。他姓权。如果有人劝他要努力学文化，他不但不听，反而说："谁说不识字就不能干革命？人家洪范图将军也跟我一样，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可他当独立军队长干得多漂亮！"他比朴昌顺还要顽固。他犟头犟脑，不听劝告，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拿他没办法，只好来向我求援。

我给那个新战士写了一封信，叫传令兵给他送去了。事先，我让传令兵告诉各连队，不许任何人代他看信。

那个新战士收到我的信，立地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才好。一个普通的新战士收到司令官的信却看不懂，不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这不是大事吗？他东跑西颠到处求人给他看信，可是同志们都以种种口实不给他看。他心急火燎，又跑到别的排别的连去求助，可就是没有人帮助他，他该多么着急呀！

他无可奈何，最后来找我，央求我把信的内容告诉他。

我给他念了信。这封信是个紧急指令，命他在几点钟以前办完什么事，然后赶回司令部汇报。然而这时指定的时间早已过去了。他因为没能按时执行司令官的命令，急得满头大汗，头都抬不起来了。

我对他说，你看，你不识字，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假定你到敌占区工作接到了我的命令，你该怎么办？

他淌着大滴的眼泪，说自己错了。从此，他开始下苦工夫努力学习，后来成为一个很有水平的军政干部。

再讲一个不识字的人怎样学好文化，成为一个好战士的例子。

在汪清的时候，我们部队里有个叫金万益的战士。他有一个奇特的绰号叫“姑娘”。他肤色白净，长相俊秀，举止文雅，人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但他的个子却比别人高半头。最初，他加入青年义勇军，参加过小汪清防御战。正式加入游击队之后，被编入崔春国的连队，作战很勇敢。他生在偏僻的山村，长到二十岁还没见过火车。他老实淳朴，心地纯洁，像一张白纸。

有一次他参加袭击敌人军用列车的战斗，把大家都逗乐了。在战斗打响之前，他趴在铁路上用耳朵贴着路轨。战友们问他在干什么。他一面站起来一面说：“唔，火车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玩艺儿，就是像爬犁一样在这个铁杠上滑走的铁爬犁嘛。”他这么一个大老粗，跟着我们学了文化，后来当上了连队青年干事，还教别人识字。解放后，他参加中国东北的解放战争后回到了祖国，在姜健的师里当过营长、团长。

在叙述祖国解放战争的书籍里，不知道有没有介绍他在解放汉城、大田战役中指挥出色的记载。他牺牲的地方可能是洛东江一线。当时他的腹部和颈部都受了重伤，却不下火线，坚持指挥了两天，终于牺牲了。

为了保证有效地进行军政学习，秘书处和出版所的同志付出了很大力量。他们在跟密营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建立起一个出版所，编印出了军政学习必需的教材和参考书。刊物《钟声》[1]的主编崔景和、《曙光》[2]的发行负责人金永国，都是秘书处里响噹噹的大手笔。他们和“烟斗老头”一起，勤勤恳恳地编写出解释教材内容的文章和有助于学习的文学作品，发表在队内出版物上。他们还发动积极热诚的读者写出了能够闻到汗味和火药味、生动感人的文章。这一年冬天，自习班的成员自不待说，就是识字班的队员也都为了给报刊写文章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写文章，自然会增长知识，扩大视野，激发学习热情。

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在革命斗争中坚持自主性、坚定革命信念、发扬自力更生革命精神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反映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我国革命所面临的严重形势及其任务。那时候也和现在一样，坚持自主路线就是朝鲜革命的生命线。《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之所以在马塘沟密营军政学习中成为主要教材，就是因为它清楚地阐明了我们对待革命的自主立场。

在马塘沟，我们还为军事学习付出了很大力量。军事学习的重点，是完全领会游击战法的汇编《游击队动作》和《游击队常识》。指挥员主要学习战术，队员则以射击训练、制式训练为主，磨练作战本领。不仅学了游击战术，而且还学了正规军战术。这固然是为了从战术方面更深入地了解敌人，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使我们自己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因为我们还肩负着祖国解放后建设正规军的重大任务。

我们常常在野外造成实战气氛，进行战术研究。也让一般队员学习战术。新战士都不会看地图，我们就教他们学会看地图，学会用指南针判断方位。

为了让新战士们在实战中巩固在军事课上学到的理论，我们还有计划地组织了实际战斗。清江甸子战斗和靖安屯袭击战，就是在马塘沟军政学习期间组织的。为了解决后勤物资，还组织过一次伏击战。

在袭击靖安屯的战斗中，我们失去了崔景和；姜燉也冻坏了脚，后来阵亡了。他们两个都是在长白县入伍的。他们与众不同，入伍前都曾在长白地区分别领导过几个大的地下革命组织，是大有发展前途的知识分子。

崔景和，是权永壁在王家洞领导西间岛一带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工作时物色和培养的同志。他在王家洞的工作情况，我已讲过多次，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姜燉也是我们到西间岛发现和培养的。他只念过小学高等科，但通过自学，念完了中学课程，学了社会发展史，早年参加群众启蒙工作，对反日爱国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开办和领导的夜校很出名，从这些夜校里培养了许多革命者。我们的部队里就有不少姜燉的学生。李乙雪也是他的学生。现在，培养了一名英雄，就要大力宣传。从这个角度上说，姜燉就应评为大功臣。

姜燉在英化洞参加了祖国光复会的建立，还组织了反日青年会。他建立的组织拥军工作做得很好。他还打着十家长的牌子，

随时搜集我们活动所需的敌军情报。他背着拥军物资来找我们的时候，在黑瞎子沟密营我见过他。

出了“惠山事件”以后，他把革命群众带到安全地区隐蔽，自己则带着一些青年人加入了我们的部队。他虽是新入伍的，但我们分配他当了连队宣传干事。他很称职，连队教育工作做得很出色。全文燮可能也受了他很大的影响。

参加课堂讨论和辩论，给队内刊物投稿，他一向很积极。他登在《钟声》上的文章，我至今还有很深的印象。文章揭露了日本鬼子制造“惠山事件”后在长白一带犯下的滔天大罪，还非常生动地表述了自己的亲身体验。

在马塘沟军政学习期间，我曾派姜燉到桦甸同第四师取得联系。从马塘沟到桦甸有三百多里路，敌人警戒很严。姜燉看到我因不知第四师的消息而焦急，就主动要求去桦甸。他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从桦甸带回了一大包十分重要的情报。我很佩服他的忠实和勇敢。

我们攻打靖安屯的时候，姜燉用手榴弹炸毁敌炮台，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之后，他又去参加打援，脚受了严重的冻伤。回到密营，我们立即想方设法给他治冻伤。而他从不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治伤，总是主动地参加讲课、教文化、给报刊写文章，不休不眠地工作。后来，敌人来攻打密营，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枪投入战斗。不幸，他腹部受重伤，被子弹打穿，久治不愈，牺牲了。他是一个好同志。失去了他太可惜了。

姜燉的一生，是英雄的一生。他的一生说明了这样一条真

理：学习认真塌实的人，就能在革命斗争中做出榜样，就能成为在祖国和人民的记忆中永生的丰功伟绩的创造者。我所认识的游击队英雄，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视学习的人。在懒于学习的人里，没有出现过足为后代效法的英雄。努力积累丰富精神食粮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为革命建树丰功伟绩。据人民武装力量部的干部们说，英雄李寿福在学生时代也非常用功。

我没见过懒于学习却具有坚定信念的人，也没见过信念不坚定而能恪守革命情义的人。凡是人，只有勤勤恳恳地努力学习，才能具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具有干革命的积极性。

金正日同志说，对事物，人是根据自己的水平去观察、听取、感受和吸收的。这是一句富有哲理的名言。

在军政学习期间，我们还积极开展了提高队员文化素质的工作。我们经常举行娱乐晚会，教唱革命歌曲，还组织读书心得交流会，介绍革命的小说、传记等文艺作品，使队员们以乐观主义精神去生活和战斗。在密营里，几乎没有一天不举行娱乐晚会。

拿我的人生体验来说，歌曲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象征，是革命胜利的象征。我常说，人的生活里既要有诗，也要有舞蹈和歌曲。不然，生活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歌声既震响在宿营地和临时舞台上，也震响在战场上。歌声嘹亮，意味着士气高昂；士气高昂的军队，是从不打败仗的。歌声响亮，革命队伍才能不断壮大强盛，哪里的歌声响亮，哪里的革命就必定胜利。

那时候，我们对生活文明也是格外关注的。肉体不洁净，不可能有健康的灵魂；同样，邋邋遢遢、懒懒散散的队伍不可能具有无坚不摧的战斗力。过去，敌人看了我们的宿营地和升过篝火的地方，就停止了追击。因为他们从中看出了我军的纪律、秩序和战斗力。

刚到马塘沟密营的时候，有些连队里出现了松下腰带，麻痹大意，懒惰懈怠的现象。连烧柴都不及时打好，临吃饭的时候才到密营附近随便砍几棵树来烧饭。

我决心树立一个让全队学习的榜样，便叫来了吴仲治。他的第七团第四连是战斗力最强的骨干连队。我对吴仲治指出了密营生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他把我的话当做对自己那个连队的批评接受了。他回到连队后，掀起一股建设生活文明的热风，很快就改变了连队的面貌。三天后，他来找我，说他试着把连队整顿了一番，请我去看看。

第二天，我带着军政干部去看。果然，连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周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无可非议。伙房旁边堆着一大堆劈柴，足够烧好几个月，而且都是烧火不冒烟的朽木。

我叫吴仲治检查一下连队战士的武器。他集合了队伍，先把自己的枪交给一排长检查。检查通过之后，他才开始检查战士们的武器。我让全体军政干部跟他一起去检查连队的武器、服装、营房、伙房和盥洗场。检查完毕，我对大家说，如发现了缺点，就当场指出来。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满分。

从这以后，别的连队也都学习四连的榜样，在部队的管理和

建设生活文明方面，带来了革故鼎新的成果。

提起在马塘沟密营建设生活文明的往事，自然也想起了在那里搞的禁烟运动。这次是我们主力部队搞的第二次禁烟运动。第一次禁烟运动是在白头山麓作战时由李斗洙主动倡议，由我赞助开展起来的；而在马塘沟密营开展的第二次禁烟运动，则是由嗜烟的人们主动发起开展的。

在马塘沟密营组织军政学习时提出的总目标，是将我们的所有指战员都培养成为对朝鲜革命有用的共产主义革命战士。不论在哪一种社会，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培养忠实地为其社会制度服务的人才。日本人侵占我国以后装模作样地也办了一些教育，其目的就是要驯服朝鲜的青少年，好让他们给日本人当奴隶。因此，日本人没有让朝鲜人受高等教育。他们认为，当奴隶，只要稍具起码的活动机能就够了。

虽有科学没有国界之说，但学问本身，随着它为谁服务，是既可以给人类造福，也可以给人类造成灾难的。

要使学问有益于人类，为人民造福，教育工作就要培养思想、道德、文化、技术等各方面都有很高水平的优秀人才。为此，就要搞好思想、道德教育。热爱人、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健康的思想、崇高的信念的产物。我从未见过道德品质恶劣的人还会热爱人、热爱人民、热爱祖国。

我国的社会主义与别国的社会主义，明显的不同之点在于，我们的党和国家并不偏重于以物质为主的经济建设，而是保证以

人为主的思想教育工作先行，造就技术业务上和思想道德品质上完美的优秀人才。我们不是物质第一主义者，而是人第一主义者。所以我们认为，我国优秀人才多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在马塘沟密营的军政学习，也是一个使人们具备共产主义革命者的风格与品质的改造人的过程。

打完靖安屯战斗，在回密营的路上出了个事故——一个新战士丢了枪。那条枪是姜燉的。姜燉打援时受了冻伤，被送回密营时把枪交给了政治指导员朱在日。当队伍撤出战场的时候，一个还没有领到武器的新战士为了减轻指导员的负荷，主动要求把姜燉的枪让给他扛。指导员就把枪交给了他。当队伍离开靖安屯已经很远的时候，指导员偶然发现那个好心的新队员肩上没有了枪。他立地吃了一惊。一问，原来是在半路上休息的时候，那个新队员把枪放在地上，开拔时忘记带了。指导员立即带着他折回去，跑了几十里路，摸黑找了三个钟头，也没找到那条枪。

朱在日回到密营向我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建议处分那个新战士。严重处分丢了武器的人，是我们游击队的纪律。我问他该给那个新战士什么处分，有什么想法就提出来。他说他还没想好。我对他说，那么你回去再好好想想，应该怎么处分他才好。

其实，那个新战士丢了枪的过失固然是严重的，但我觉得更严重的是政治指导员缺乏责任心，处事马虎草率，把枪交给新战士时没有强调注意事项。

朱在日本是斗争经验丰富，处事慎重，责任心强，考虑问题周密细致的人，但这次却出了这样的纰漏，确是令人遗憾的事

情。我给他充分的时间让他好好想想，为的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失。

第二天早晨，朱在日来找我说，应该处分的不是那个新战士，而是他自己。因为自己粗心大意，缺乏责任心，那个新战士才闹出了事故。他到底认识了自己的过错，虚心地做了自我批评。

为了让别的指挥员都能受到教育，我召集指挥员会议，提出了朱在日的问题。会议决定，撤掉朱在日第八团第一连政治指导员职务，调他做秘书处的辅助员。

新战士们听了会议的决定，都大受感动。他们看到不给丢了枪的肇事人处分，反而让指挥员负起责任，撤他的职，都深深地认识到，革命军队上下级关系所依据的道德情义是多么崇高。

那个丢了枪的新战士忍不住心中的痛苦，去找朱在日流着眼泪道歉。而朱在日对着他又做了自我检讨。他说，我被撤职，是因为我自己犯了错误，绝不是你坑害了我。虽然枪是你丢的，但根本责任还在我身上。我是个政治干部，却没有好好帮助你，甚至想把责任推给你。所以对你，我是心里有愧的。

朱在日在秘书处新的岗位上，认真负责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

结束军政学习的那天，我解除了对他的处分，任命他做了警卫连的政治指导员。曾经因为犯了错误而被撤掉了司令部后勤副官职务的金周贤，也因为思想锻炼和学习都搞得很好，在同一天被任命为团长。

马塘沟密营的军政学习，在提高每个指战员的政治军事素

质、培养思想道德品质方面，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六棵松战斗和夹信子战斗后，我们在白石滩也进行了四十天左右的军政学习。安排这次军政学习，主要是因为在六棵松和夹信子有二百多名伐木工人集体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如果不训练他们，就不可能转入下一阶段的工作。

新入伍的战士中文盲很多。他们的革命热情很高，但政治水平大都很低。他们中有不少人不懂得，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为什么由工人阶级做革命的领导阶级。

原先当工人，后来加入我们部队的孙宗俊，当时也是个文盲。他本来是在安图种地的，自从游击队攻打了寒葱沟以后，他开始觉醒。在离安图不远的寒葱沟打的仗，对安图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宗俊虽是伐木工人出身，但在白石滩开始军政学习时，还认为应当由农民做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在总人口中，农民与工人相比占绝对的多数。

新战士大都不会使用武器，也没受过制式训练。人民革命军使用的轻武器有十多种，机枪有日本造、德国造、捷克造，步枪也有好几种，手枪有四五种。要当一个游击队员，就要熟练地使用所有这些武器。

有一次在战斗中，我们缴获了好几挺日军的机枪。日本造的机枪，有的把弹巢安在枪身上头，有的安在枪身一侧。弹巢安在上头的机枪好打，安在一侧的不好打，用法较难。我们活捉了一个日军机枪射手，叫他讲解这种机枪的打法，他不肯说。他是吸

鸦片的，给他吸鸦片，他就会说出全部秘密来。我们就给了他鸦片，套出了机枪射击操典的秘密。

后来，我编了一本机枪射击操典，供战士们学习。

要掌握一种机枪的构造原理、射击要领和装卸方法都需要经过这么多的麻烦，何况是只懂伐木的工人，不经过军政学习，岂能当好一名游击队员!

我们命吴白龙牵着敌人的鼻子到处跑，直到把敌人拖垮，拖到离白石滩有四五百里远的地方就甩掉。同时派小分队到各地去把储存的后勤物资和武器弹药都搬到密营来，然后就钻进密营进行军政学习。崔贤听到我们收了几百名新战士，也送来了几十支枪。

在白石滩的学习，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安排了两期。第一期，用速成法在短期内学完全部课程；第二期，复习已学到的东西，加以消化和巩固。学习目标是：老战士要把知识水平再提高一级，同时帮助新战士搞好学习；新战士要在一个月内摘掉文盲帽子，熟练地掌握各种武器的用法。这一切都安排好之后，组织了团队之间、连队之间、个人之间的竞赛。开始学习时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学习也是战斗！""形势越是艰苦复杂，越要加强学习！"

通过这次学习，新队员都摘掉了文盲帽子。为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叫他们都给家乡的父母兄弟写了信。信中都用我国的文字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还掌握了步枪、手枪、机枪等多种武器的打法和装卸法。有的新战士还写文章登在队内刊物

上。这年冬天，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给队内的报刊写了文章。

总结第一期军政学习的那天，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和娱乐会。对学习成绩优异的人，授予了高级手表、金戒指、自来水笔等奖品。

这年冬天在白石滩吃了很多小豆腐。离密营不远有个叫大蒲柴河的地方，在它的下方有一块没有收割的大豆地。经当地农民交涉，我们买下了那块地，收了大豆。大家建议做小豆腐吃。在白石滩密营里有一户因躲避敌人的讨伐来此居住的人家。我就住在这户人家里，把冻白菜叶切碎搀和在小豆腐里，再捏成拳头大的团团，放到外面冷冻，每当吃饭时拿出一个团团放在锅里煮了吃。一天三顿都吃这个小豆腐，可从未感到腻味。为了节省粮食，玉米面搀得很少，吃起来还是别有风味。

在白石滩进行的军政学习，在此后红旗河战斗、大马鹿沟战斗等大部队回旋战临近结束和小分队活动时期，对我们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起了很大作用。

这以后，我常常对我们的干部强调说，只有博学多闻，才能高瞻远瞩；为了不断提高政治业务水平，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

今天，全国都在努力贯彻金正日同志提出的“全党都要学习”的革命口号，形成了人人边工作边学习、边学习边工作的革命风气。

二　黄鼠狼猎人

我们在马塘沟密营进行军政学习的时候，敌人仍在处心积虑地搜寻我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行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日军参谋机构终于刺探到我军主力从白头山地区转移到了濛江地区，便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妄图消灭朝鲜革命的首脑机关。

现在讲讲当时一件很有教益的事情。

有一天，金周贤出去做小分队的工作，回来后对我说，他这次出去碰见一个猎人，这个老猎人过去在独立军服过务，现在住在濛江专靠打黄鼠狼为生。金周贤跟他交谈，向他做了些宣传，发现他思想倾向还好。

我对这个老猎人发生了兴趣。他是独立军出身这一点就吸引了我。当时日本侵华战争已经爆发，日军大举进犯关内，北平沦陷、上海被占等消息风传，一些丧失信心的人抛弃了革命，躲到无风无浪的僻静处所苟且偷生。正因为这样，我们急切地渴望多找到一个爱国志士，因此一遇到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就高兴得毫无顾忌地想同他携起手来。

尤其在濛江碰到了参加过独立军的老年人，我更产生了一种企望，觉得可以通过他了解到沈龙俊的行迹。沈龙俊是当独立军的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在满洲相互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时，在参议府里活动的巨头之一。我曾听说，他在参议府时曾在辉南、

桦甸、濛江一带活动，三府合并为国民府之后，就住在濛江一带的什么地方。

我认识沈龙俊，因为他是我父亲的亲密知己。我念中学的时候，在吉林尚仪街复兴泰碾米厂和三丰栈曾多次见过他。当时，在满洲地区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独立军的领导人，为了改变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各自为政的分裂状况，正在探索如何将各个政党和派系的力量联合起来的三府合并的途径。吉林就是他们为此而聚会相商的中心。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为合并成一个组织而举行代表会议的时候，沈龙俊是参议府的代表。

我对金周贤说，要进一步了解那个黄鼠狼猎人，看他认不认识沈龙俊，如果认识，就打听一下沈龙俊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

金周贤经了解后回来说，那位黄鼠狼猎人虽然现在放弃了独立运动，但没有失去爱国心，他对沈龙俊的住址和生活也都很了解。

黄鼠狼猎人还告诉金周贤说，沈龙俊退出独立军后，娶了老婆，搬到了濛江居住，但他矢志不渝，仍耿耿于怀。

听了金周贤的汇报，我心里想，沈龙俊虽然年事已高，但早年参加独立军时的初衷未改，是不是可以跟他接上关系，在濛江一带扩大祖国光复会的组织呢？我甚至认为，他的主张虽然和我们不同，但他的爱国心没变，是一定会汇合到我们的统一战线里来的。

我之所以如此重视沈龙俊这个人，而且积极探索同他建立联系的途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鉴于日军在侵华战争这片泥沼里越陷越深，我们一方面加强同中国抗日力量的联合战线，

另一方面为了同“临时政府”系统的反日力量建立统一战线，也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要想同“临时政府”系统的反日力量携手，就需要物色一个能够在两者之间搭桥的人。而沈龙俊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沈龙俊是和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有密切联系的人，他所在的参议府叫做“陆军驻满参议府”，是“临时政府”的直属机构，干部也多数是“临时政府”直接选派的。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说过，同沈龙俊一起参与过独立军活动后来进入中国关内的人，多数都同“临时政府”有一定关系，也同中国国民党有联系。

那个时候，王德林派的李特使已经来到了我们部队。我们给了他不在编制之内的警卫连教官的职务，所以，人们都叫他“李教官”。他喜欢下中国象棋，我常跟他对弈。

侵华战争爆发后，王德林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二路军指挥，同蒋介石有联系，蒋介石又同“临时政府”有瓜葛。因此，只要抓住王德林这条线，就可以打开一条渠道实现同“临时政府”的合作。就在这种时候，王德林从关内给我们派来了“李教官”这位特使，这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个意外的机会。

据李教官说，王德林虽年近花甲，仍无意告老隐退，依然站在第一线上坚持抗日。陈翰章也给我捎来了王德林的消息。据说陈翰章在救国军部队的时候，曾经受吴义成之命，到天津去会过王德林。那时王德林对陈翰章说，他过去所以离开东北进关，是

为了得到蒋介石或张学良的帮助，更大规模地开展抗日斗争。我估计，那时候陈翰章肯定向王德林详细地介绍过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斗争情况。

要同沈龙俊接上关系，就需要进一步考察那个黄鼠狼猎人。为此，我们几次交给他任务，他每次都认真地完成了。经过考察，我们断定他是可以信赖的人。接着，我们转入了对沈龙俊的工作。首先，通过黄鼠狼猎人，给沈龙俊送去了以我的名义写的信以及《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猎人转递了我的信后回来说，沈龙俊看了我的信，一时愣住了，呆若木鸡。再问他还有什么反应，猎人说他表示很快就要写回信答复。

听了金周贤的这些汇报，对沈龙俊这个人我不能不更深入地进行研究了。他看了我的信后发呆，这同我们的预料是有距离的。我原以为，他收到我的信即便不能径直来找我，也会做出十分明显反应的。但出乎我们的预料，他的反应令我觉得有些冷淡。可能，他这个一度为恢复国权曾拿起枪驰骋在第一线的人，如今隐没在小家庭里，突然收到我们呼吁他重返第一线的信，被惊呆了。我想，呼吁他重返抗日前线，意味着要他像过去那样挺身而出献身独立运动，而他这个半路下马解甲归田的人突然接到这样的信，一时心神不定，百感交集，也是很自然的。

尽管这样，他看了《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却没有任何表示，倒是不可思议的。

在革命征途上半路下马的人，当他要重返革命征途时，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不敢当机立断，是情有可原的。我想，沈龙俊

拖延回信答复，可能是有什么苦衷吧。不管怎么样，既然给他送了信，就只好等待他的回信了。只有收到他的回信，才能了解他的精神状态，也才能对症下药。

过了几天，到濛江县去的小分队带来了黄鼠狼猎人转交的沈龙俊的回信。

在信中，沈龙俊首先对我们在山上经受艰难困苦表示了问候，然后写道，获悉金亨稷先生之子如今身负司令官之重任，率众多军士为国家、民族英勇奋战，心中深感欣慰。他还称赞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路线完全正确，并说他为自己中途放弃了独立运动而深受良心的谴责，读了我的信后决心重整旗鼓再次投身独立运动，望我多予协助。

看了他的回信，我说不出有多么高兴。就年岁而言，他是属于我父亲一辈的人。到了1937年，他们那一辈的独立运动者，有不少人已去世，也有的流亡国外或被捕入狱，还有些人退出战斗队伍解甲归田，或入山当樵夫，也有的沦为市井之徒。我认识的独立运动者中就有不少遐迩闻名的大人物，他们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从吉林一带销声匿迹了。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人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了中国的关内。我在开始武装斗争以前于吉林见到的最后一个我父亲的挚友，恐怕就是孙贞道牧师了。

自从转移到间岛开展武装斗争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在抚松和吉林时常见面的“三府”所属独立军的领导人物。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从没有忘记过他们。每当缅怀我去世的父亲时，眼前就浮现出曾经同我父亲一道谈论人生、为陷于涂炭的民

族命运担忧的那些爱国志士的面容。那么多的爱国志士都到哪里去了呢？我无从知道他们的下落。就在这个时候，在濛江找到了沈龙俊，而且同他接上了关系，还收到了他决心重新起步的信，我心里该有多么高兴啊！

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将祖国光复会的组织扩大到广大地区的方针，并认真深入地讨论了贯彻这条方针的途径。讨论通过的某些问题，还登在队内的报刊上。

如能将祖国光复会的组织扩大到濛江地区，就意味着白头山根据地的威力及其影响波及到了这一带，我们就可以以这一带为跳板，将革命力量向各个方面扩展。

我们通过黄鼠狼猎人给沈龙俊送去一些钱，托他给我们买一些《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刊。投过几天，沈龙俊就转来了我们所要的报纸和杂志。此后，我们和沈龙俊之间有过多次书信往来，也有过几次钱和物资的往来。

同他联系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认为应该早日吸收他加入地下组织。司令部党委召开会议讨论了他的问题，大家都建议要更加积极深入地做他的工作，经过他，在濛江一带广泛地组建祖国光复会等革命组织。

我在会上说，看来现在可以交给沈龙俊一项任务了，让他在濛江建立一个祖国光复会组织，另外委托他筹办一些医治伤病员所需的药品。这是对他的最后一次考察，也是他重获政治生命的绝好机会。与会人员都表示赞同。

会议还讨论了派一个政治工作员去给他当顾问的问题。沈龙

俊虽然曾是参议府的一个大头目，但他没有建立地下组织的经验。要说有也不过是参加了“三府”合并。单凭这样的经验，是不可能组建起革命的地下组织的。我们决定给他选派一个能干的政治干部，以便从旁帮助他。最后被选定的是政治工作经验丰富的金一同志。

沈龙俊本人也要求我们派一个人帮助他工作。他表示，遵照金将军的嘱托，愿意马上建立一个祖国光复会组织，但不知应从何着手，希望我能见他一面，当面赐教。

我认为他的这两项要求都是出于好意。

不过，对我去濛江同他会面的问题，司令部的人员都表示反对，说这是冒险。但是，又不好让他这个年岁比我大一倍的长者到密营来见我。要同他会面，需要选定既非濛江也非密营的另一个地方。我们认为这是最稳妥的办法，于是便派一个小分队去选择一处适当的地点。选好了地点之后，我准备派金一去同沈龙俊会面。

这一切安排妥当，我让金周贤的小分队去领来了黄鼠狼猎人。

从头道松花江方向进入我们的密营，需要经过很多地方：首先沿着冰封的江面朝上走，然后翻越一道悬崖，再依次通过第七团、第八团、警卫连的密营，才能进入司令部。这是到司令部来的必经之路。为了确保安全，司令部制定了这样一套制度。

出入密营的人，走冰封的江面可以不留脚印。即使冰上有雪留下了脚印也用不着担心，因为江面上有风很快就把积雪刮跑了。不刮风的时候，则把鞋掌往雪地上蹭几下，然后在冰面上

走，也就没有脚印了。这是我们创造的冬季行军法。在马塘沟密营和白石滩密营，我们都采用了这种办法。

我们从檬江县清江甸子去马塘沟的那天，下了这年的头一场雪。走到靠近密营的悬崖跟前时，看到厚厚的冰面当间有一股水往上喷涌。有些队员据此提出一种假设，说这条头道松花江当间可能有一口温泉。

马塘沟入口处有一个峭壁，十分陡峭险峻，使我们的队伍吃了不少苦头。因无路可走，队员们不得不拉着树枝或枯树根，一步步地往上攀，全都累得出了一身大汗。

在那冷得眼眉上都结冰霜的隆冬季节，看到头道松花江冰面上喷涌出的那股水，都觉得很稀奇。头道松花江确实是一条奇异的江。

那个黄鼠狼猎人到马塘沟密营来，也是走的这条路。他跟着小分队经过七团密营岗哨的时候，偶然听到了哨兵们的几句对话。一个哨兵说，最近带到密营来的人都是敌人的密探，瞧那个老头就很可疑。如果他真的是密探，就让我给他开一枪好啦。这话本来是当玩笑说的。可那个猎户老头听了，却被吓呆了。

这年冬天，密营里没有让老百姓进来。有非见不可的人，我们就到密营外面去见，绝不让外人进来。只有那些已经查明罪行，需要当即处决的人，才带进来。见惯了这一点的哨兵，以为那个猎户老头也是敌人的密探，而且以为他是中国人，所以才毫无顾忌地说了那些话。那天，那个猎户老头穿的不是朝鲜服装，而是中国服装。他为什么要穿中国服装，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偶然，使得哨

兵把他当成了中国人，也说了些不该叫他听见的话。

黄鼠狼猎人要是没做什么亏心事，听了那些话也会毫不在乎的。然而他却显得十分惊慌。他以为游击队员知道他的底细才说了那些话。原来，当我们忙着准备同沈龙俊会面的时候，他却抵不住日本人的威胁恐吓，被迫接受了杀害司令部人员的任务。他随小分队进入密营时，身上还带了用来杀害我们的凶器。这样，他能不心惊胆战吗？

当他出现在司令部时，我正和王德林的特使下象棋。我推开棋盘见了猎人。不知为什么，我觉得他神色很不正常。

黄鼠狼猎人后来坦白说，那天听了哨兵的话，他心里就揣摩："听说金日成将军有未卜先知之明，能预测三个月的天气，岂能不知道我们的密谋！他们本来不能带我到这儿来的，可今天把我带进来了，可见我的命已到末日了。"他被迫接受了任务，心里本来就忐忑不安，在岗哨上又听到了那些话，心里就更加惊恐了。

我看到他神色不好，反而更加同情他。想到他被夺去了祖国，流落到濛江这样的穷乡僻壤，靠打黄鼠狼维持生计，该是多么悲伤！我们待他格外亲切热情。队员们吃的是高粱米饭，我们还特意给他做了黄米饭。还领他参观了部队和营房，请他参加了娱乐晚会、讲演会和学习讨论会。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想给他以积极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他进行必要的训练。过几天之后，我们准备派金一同他前往与沈龙俊会面。

我们用种种方法想多给他一些影响，但没有什么效果。警卫

队员们反映说，给他做黄米饭也不吃，老是唉声叹气，总是问什么时候离开密营。

我们所以没有按预定的时间送金一和猎入走，不是为了别的，只因为当时敌人已经包围了马塘沟密营。那时我们往多处派出了监视小组，在高地或树上用望远镜严密监视四周的动静。负责监视的人发现，密营附近的山上有烟升腾，还有敌人集结的迹象。于是，我们白天不准烧火冒烟，只在夜里烧火做饭。

有一天，我把猎人叫到司令部来。我们正在谈话中，小分队回来向我汇报工作。他们简短地作了汇报，说在回来的路上抓了两个密探。其中一个老实地坦白了自己的真面目和罪过，给他讲了一些道理，当场就放他回去了。但另一个人很顽固，给他拿出确凿的证据也拒不承认，更不供出自己的任务，便当场处决了。

我称赞小分队的领队说，你们处决了拒不坦白的密探很好，释放了老实坦白的人也做得好。

我的话刚讲完，在一旁的猎户老头就“扑通”一声跪下来，双手着地连连磕头，没头没脑地哀求说：“将军，我有罪，求您饶了我吧！”我和小分队领队都不知所以，睖睁地盯着他。我想他这样求饶，必定有什么原由，但到底是什么原由，我无从知道。

我对他说，有什么事情，起来慢慢说吧。

他似乎从我的话里获得了勇气，说了一句“请稍等一下”，就出去从一棵白桦树底下抽出一把斧头回来，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罪过。说他的头一条罪过，是隐瞒了日本鬼子交给他暗杀司令

部人员的任务，而来到密营受到贵宾待遇却仍不悔过自首，反而把凶器藏起来了；第二条罪过，明知沈龙俊早已叛变，却没有向司令部报告。

听到沈龙俊已经叛变，我着实吃了一惊。黄鼠狼猎人被日本人收买，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这种事例，过去在白头山密营时就经历过几次，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昨日的参议府巨头沈龙俊居然叛变投敌，当了日本鬼子的走狗，却是令人吃惊慨叹的事情。

“三府”尚在时，沈龙俊是颇有声望的人，民众对他的企望也很大。他号召抗日，讲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话。这样的人竟然做了日本的走卒，多么令人失望啊！

我问猎户老头，你怎么知道沈龙俊叛变了？

他说他看见了沈龙俊同日本鬼子密谋的情景。我又问他密谋的是什么。他说他们密谋的是诱捕我的计划。其阴谋是这样的：当游击队的代表去找沈龙俊的时候，先把代表扣留下来，逼他写信给我，叫我到某地去跟他会面。等我出现在约好的地点时，他们就包围起来抓我。

据猎户老头的供词，沈龙俊给我们写的信，都是他在密室里同日本鬼子磋商后写成的。每当我们托他办什么事情，他都先去告诉日本人，然后按日本人的指令去做。猎户老头还说，沈龙俊自从投敌以后，经常跑长春，还多次引来了敌人的“讨伐队”。

幸亏这个猎户老头事先做了坦白，不然，金一、我以及我们的全体，差点都呜呼哀哉了。

对人的信赖，也往往伴随着这样的危险。但我没有遭难，也可以说是托了信赖的福。对那个黄鼠狼猎人，我们没有丝毫的怀疑，带他进入了密营，把部队的各个方面全部向他开放，让他随便参观。正是这种信赖，使他的良心战胜了邪心。人类心理的辩证法，真是妙不可言哪。

金正日同志的立论中有这样一句话：信任育忠臣，猜疑出叛逆。这是一句名言。

不信任得不到福，信任则能得洪福。

但这并不是说，不分敌我，都把心肝掏出来交给人家。对人要予以信任，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尽管猎户老头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敌人的密谋都抖搂出来了，我们的人却仍坚持不应宽恕他。可我还是宽恕了他。对一个真诚悔过自新的人，为什么不可以宽容呢！对真心悔过老实坦白的人，是应该既往不咎的。

经过这件事，我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对革命者来说，对人抱幻想，是必须禁绝的。革命越是艰苦，对人就越不能抱幻想。对人表示信任，表示关怀和爱护，这是好的，但对人抱幻想，却是不好的。人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一个样，今天一个样，明天可能又是另一个样，这就是人心。沈龙俊的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

人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既可能起到推动革命的作用，也可能起到破坏革命的作用。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为之奋斗的人，思想就坚定，像金刚石一样永不会变；无视革命的利益和

人民的利益，只求一己之安乐的人，思想就不坚定，随时都有可能变质。艰苦的时候最容易背叛革命的，就是那些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严重的人。

通过沈龙俊的例子，我深刻地认识到，人要是忘了本，囿于独善其身的圈子里，就会堕入背叛祖国的深渊。只顾一己之私利的人，是不惜出卖同志、朋友和邻居，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的。

三　独立军的最后一支队伍

独立军是自从朝鲜被日本侵占，举国上下“是日也放声大哭”以来，高举武装抗战的旗帜走上历史舞台的一支武装力量。朝鲜的爱国志士们为了光复祖国，开展了义兵斗争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等种种合法和非法的、暴力和非暴力的拼死拼活的斗争。独立军就是这些渴望国家独立的爱国志士付出了血迹斑斑、可歌可泣的辛劳所结出的硕果。这支独立军，尽管由于落后于时代和群众基础薄弱而趋于没落，却是民族运动阵营中唯一的抗日武装力量。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重视这支独立军不依靠请愿或乞求，而是要手持武器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宏愿，从高举抗日革命火炬的第一天起，就一直付出很大的力量去做了独立军的工作。他早先曾亲赴南满同独立军司令梁世凤会晤，一直渴望在抗日第一线上同独立军并肩作战。他的这一崇高愿望和坚定的爱国意志，在多年之后终于结出了硕果。

在贯彻金日成同志提出的与独立军合作的路线，给独立军开辟从反共转向联共的道路，引导他们投向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是崔春国和崔允龟。

那么，崔允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975年10月，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来到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停在崔允龟的半身雕像面前，用很长时间回忆了崔允龟。由于有了主席的这一宝贵的回忆，崔允龟的为人，他改变斗争方向的过程，才被更加详细地公诸于世。

本节摘录了这一天主席对党史研究所和革命烈士陵园工作人员的讲话，以及在

其他许多场合对抗日革命斗争史研究人员、作家和革命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讲的话。

崔允龟是平安北道义州人。平安北道的鸭绿江流域，出了许多有名望的独立运动者，如吴东振、梁世凤、张哲镐、李宽麟、金时雨、崔东旿和孔荣等等。

1925年我们到达抚松的时候，陪我父亲赶到大营来接我们的人里，就有崔允龟。独立军后期，他是副司令、司令。但在我到抚松去的时候，他还是个下级人员。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人们都叫他“崔参士”。我的父亲和母亲也这样叫他，他的顶头上司张哲镐、吴东振和梁世凤也都这样叫他。“参士”是他的军事职称。他当了排长，我仍叫他“参士叔叔”。他带着队伍投到我军以后，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照小时候的习惯，叫他“参士叔叔”。我这样叫他，他很高兴。我要是叫他“排长”，他肯定反而觉得生疏。

他话不多，讲话不罗唆，但他心里却有很多话。他口紧，城府很深，有魄力，有主见，有骨气，是个典型的将才。我父亲说，他小时候就把沙子装在裤腿里锻炼身体，自学武艺。这就说明他是个从小就胸怀大志的人。当时义兵和独立军常常出没在鸭绿江两岸，他必然从小就受到了他们很大的影响。

他父亲是个炉匠。他在私塾里念了一点书，刚过十岁就在铁匠铺里帮助父亲干活。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大冷天脱光上身做冷水摩擦，见他全身肌肉发达，像拳击运动员那样壮实。我父亲看了他说，一个男子汉要有所作为，就该有他那样的体格。

崔允龟在不是十七岁就是十八岁时，就跟着独立军上了临江县帽儿山。帽儿山是白山武士团[3]的驻地。

吴东振在和我父亲谈到崔允龟的时候说过，崔允龟是做大将的材料。他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崔允龟的身材、人品和脾气，都能叫人说是一个好将才。他打过很多仗。据曾经跟着崔允龟在独立军干过事的金明俊讲，崔允龟当了副司令以后也一如既往，一到战场就一马当先，带头冲锋。老实说，我还在抚松的时候，就把他看做独立运动的大人物，十分尊敬他。

我父亲非常关怀他，待他像亲兄弟一样。在我父亲卧病不起的时候，崔允龟跟张哲镐一道，几乎天天来探病照料。我父亲去世后，他带领自己的全体部下来吊丧。他戴着麻布做的丧帽，在灵前号啕大哭。当时他对我说了很多鼓劲的话。他对我的安慰，我至今仍感激不已。

他在正义府时持有何种主义与主张，我不清楚。是联共还是反共？如果以此为标尺去衡量他的思想立场的话，我想应该说他更倾向于联共。但是他与孔荣和朴振荣不同，没有很快改变方向投入共产主义运动。

我父亲的身边有过很多追求或信仰新思潮的人，但他们当中调换旗帜转到共产主义阵营来的却没有多少。当时在满洲南部和中部地区追求新思潮的人，都被民族主义者包围着。如果在那一带向往共产主义的人占了多数，我们到旺清门的时候，就不会遭到国民府上层反动人物的暗算了。

东满地区则与此相反，共产主义思想比民族主义思想占优势。

共产主义思想一传播到这一地区，就不给民族主义思想以起而反击的机会，很快地席卷了全区，占有了统治地位。在东满，不像满洲南部和中部地区，没有发生过两种思潮之间的尖锐对立。

这一地区的不少独立军出身的人，如崔贤、尹昌范、朴东根、金日龙和朴斗京等，没有经过特别的波折，就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组织和领导的革命军。新旧两种思潮的交替也没有引起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或思想论战。这个地区的人民群众刚一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就把它认做自己阶级的指导思想，并且认为朝鲜民族的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进程。

1932年夏，我在通化同崔允龟匆匆见了一面。因为正同梁世凤协商合作问题，未能同他长谈。

我们到南满同梁世凤商谈合作问题时，独立军的思想倾向还不是联共的，反共思想仍占着统治地位。由于独立军上层集团的反共思想和敌人的挑拨离间，我们未能实现同独立军的合作，就离开了通化。听说，当时崔允龟为此十分难过。

我们到南满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我们并没有就此放弃争取同独立运动者合作的意愿。同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我弱就搞、我强就可以不搞的，也不是只在执政前搞、执政后就不搞的，而是必须永远坚持贯彻的战略和路线，直到完全实现民族的和解、统一与团结。

同志们想想看，我们国家获得解放已经几十年了，但我们仍然很重视同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开始革命活动的初期起，就认为民族统一战线路线是必须持久、坚决地加以贯彻，直至民族大团结完全实现时为止的战略路线。这样看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

同梁世凤的谈判虽然失败了，但我们深信总有一天会实现同独立军的联合，并为早日实现这一联合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跟中国反日部队的顽固势力都建立了联合战线，难道跟本民族的联合战线就不能实现吗？如果不能实现这一联合战线，老实说，在别国人面前，也是件丢脸的事情。

结束了第二次北满远征之后，我们来到西间岛，就通过多种渠道系统地了解南满地区独立军的情况，并继续促进争取同他们合作的工作。首先，派通信员给他们送去了《祖国光复会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与此同时，委托南满抗联部队的朝鲜同志负责做争取同独立军合作的工作。李东光以祖国光复会南满代表的身分做了独立军的工作。

但是，独立军方面依然如故，毫无变化。梁世凤牺牲以后，一个叫金活石的人当了独立军司令，这是个顽固不化的反共分子。当然，独立军内部也有不少人追求新的思潮，愿意联共。但是，从国民府时代就追随高而虚、玄默观等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的右翼阶层，势力很大，无法促使他们合作。梁世凤在世时，曾同杨靖宇部队进行过联合作战，可是到了金活石当司令的一代，这个好不容易才实现了的联共，却来能很好地继承下来。这都是因为在独立军的上层集团里有反共分子。

争取金活石走联共道路，是关系他手下好几百名官兵命运的

亟待解决的问题。

老实说，我们这样重视同独立军的合作，并不是为了沾他们的光。

1936年那个时候，朝鲜人民革命军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已经很强了，没有独立军的协助也能独立地进行抗战。而独立军却相反，他们正在走下坡路，处境十分困难。队伍不断缩小，武器短缺，有些队员仍拿着扎枪或棍棒。由于势单力薄，他们不敢同敌人激战，总是回避敌人，武器弹药以至粮食和被服自然也就无法补充了。

抗日革命战士金明俊原在金活石手下，后转入朝鲜人民革命军，是崔允龟的同事。他在1960年写的手记中，对他入伍时和以后的时期独立军的境遇，做了如下的叙述：

“1932年秋天，我们……去找驻在烟筒山附近的独立军部队。村里正在准备着欢迎独立军的宴会。我和我的伙伴先走到杀猪的地方，找些活帮他们的忙，好讨军人的欢心。后来又去给站岗的哨兵跑腿儿。可是，独立军的指挥官却说我们是毛孩子，不准我们参军。

“当天夜里，我们下了狠心，当队伍开拔的时候，紧紧跟在后边走。独立军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十分卖力地侍候他们。我们的殷勤侍候和执拗的参军愿望，感动了连长，他终于同意了我们参军。当时那个高兴劲儿，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

“但是，入伍后没过多久，我们失望了，因为看出了这个独立军不是我们所梦想的那种军队。我们那么向往的独立军，还有人连枪都没有，仍带着一个棍

棒。我原以为一入伍就能领到一支枪，可是没有。每当轮到我站岗放哨的时候，就借老队员的老套筒出去站岗。

后来转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金明俊，在小分队活动时期到了远东的训练基地，在金日成同志的身边工作了几年。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通过金明俊，深入了解了金活石司令手下独立军的各方面情况。主席后来说，独立军跟着崔允龟投到朝鲜人民革命军来，是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归结。

独立军是靠征收人民群众的税款来购买武器的，吃穿住也是靠人民群众解决的。他们在管辖区内向居民征税，称为“年租”，叫老百姓务必缴纳。负责征税的人把居民按户一个个叫来，打开账本检查纳税情况。如果有人没有交齐，就厉声责骂甚至痛打屁股。国民府的军队也跟过去正义府的军队一样，盘踞在南满，控制这一带的朝鲜居民，俨然是一个独立国家。

据金明俊讲，从30年代中期开始，独立军就抛弃了自己本来的使命，走上了逐渐土匪化的道路。

独立军的一支小部队断了粮食，居然连鸭绿江上放排工人的口粮都抢走了。他们扮做土匪守在江边等候，当木排一下来，就朝天放几枪，强迫木排靠岸，然后一拥而上，毫无顾忌地把放排工人的口粮抢得精光。这哪里是独立军应有的作为呀！就是到了山穷水尽、束手无策的地步，所作所为也该有个分寸吧。

本应作为人民的保护者、拯救者的独立军，竟然腐败堕落到这种地步，是多么可耻啊！

独立军的军纪日益松弛，逃兵增多，连金明俊的排长也从司令部的柜子里偷了司令的印章、手枪和钱，带着值日兵和哨兵逃跑了。山林队也欺负独立军，碰上独立军就解除他们的武装。独立军简直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

我们并不希望看到独立军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就遭到毁灭。独立军毁灭了，只能让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兴，对我们毫无利益可言。当不少爱国志士退出独立运动，有的甚至沦为敌人走卒的时候，独立军不改初衷，作为一支武装力量继续维持下去，这对我们民族来说，是值得感激的事情。他们只要能维持下去，就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爱护。他们虽然到了后期一败涂地无所作为，但在初期和中期却是英勇善战，战绩卓著的。

为了防止由于日满军警的不断“讨伐”和内部的思想混乱而面临的崩溃，独立军的指挥官们呕尽了心血。独立军的思想蜕化变质，主要表现为失败主义思想。叛变投敌、开小差，置爱国军队的名誉于不顾，像土匪一样为非作歹，便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

独立军的金活石等一些上层人物和部分官兵，还指望蒋介石的军队给予援助。他们对中国国民党抱有幻想，想依靠他们的支援来维持军队。

事大主义不是别的，当自己的力量微弱就仰仗别人，想依靠别人的帮助过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事大主义。事大主义这个弊病，既不是先天就有的，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如果不相信或者低估自己的力量，就是爱国心再强的人，也有可能堕落成为事大主义者。

我过去也说过，独立军在思想上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他们不相信自己和本国人民的力量。这种人所到达的终点站只能是事大主义，而这个事大主义只能把人们引上背叛和出卖祖国的歧途。

凡是事大主义者，没有一个不藐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凡是藐视祖国和本民族的人，没有一个不走上背叛和出卖祖国的歧途。这是为过去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独立军的所有士兵和指挥官都对中国国民党的钞票和武器寄于希望。司令把蒋介石奉若神明，是寄希望于他的，但是不少指战员却不相信蒋介石。他们虽然也希望同中国国民党军队联合，却更关心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联合。对朝鲜人民革命军，他们不仅通过风闻有所了解，而且通过亲身体验有了深刻的认识。

我想起了金明俊在远东训练基地给我讲的一件事。

有一年，金明俊所在独立军的一支小分队，在集安县的一个山村里偶然碰上了人民革命军的一支小分队。他们深更半夜进了村，到一户人家去敲门，想借宿一夜，恰巧那户人家已经住了人民革命军。革命军听到他们正急着找一户借宿的人家，便主动地腾出自己住的屋子让给他们住；听说他们断了粮，还匀出一些口粮接济他们。夜里，独立军的几个士兵出去小解，看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原来，人民革命军战士们围着一堆快要烧尽的篝火，一个紧挨着一个，围成一个圆圈睡在了露天地里，他们既没有毯子也没有被子，只铺着一点玉米秸。看到这种情景，谁不受感动啊！

第二天早晨，人民革命军指战员有的收拾篝火旁的玉米秸、打扫院子，有的劈柴、挑水，忙着帮住家干活。独立军看了更为感动。房东中国老人感动得一一握着游击队员的手，激动地称赞说，像你们这样的好军队，我平生头一次见到，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才是我们的子弟兵啊!

这件事通过金明俊那个小分队的人，传遍了独立军，成了独立军官兵经常谈起的重要话题。听说崔允龟也听到了这件事，大为震动。

独立军士兵的心都飞向了人民革命军，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激流。

独立军的活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同人民革命军联合。联共是他们的活路，合作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我们希望独立军能够强盛起来，或者继续独立作战，或者同人民革命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从独立军方面看，同人民革命军合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关键在于怎样争取鼓吹反共、对蒋介石抱有企望的金活石司令及其追随者转变过来。我们的工作员和南满的同志通报说，崔允龟看了《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和《成立宣言》后，表示十分满意。

我们是在成立了祖国光复会之后，才决心要实现同独立军合作的，并在到了白头山地区和西间岛之后，开始将这个决定付诸实践。在那以前，人民革命军也曾主动地同独立军指挥部接触过几次。对我们提出的关于民族反日力量互相合作的主张，他们并不反对；但是对我们提出的关于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联合的

建议，他们却闭口不谈，不做任何答复。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派崔春国去南满，交给了他一项促进同独立军合作的任务。

崔春国一到南满，就先把我的信交给了崔允龟，接着就同他秘密会谈两军联合的问题。他说明了我们主张共同抗日的立场，崔允龟当场表示拥护两军合并。崔允龟跟我交情很深，他是独立军中抗日意志最坚决、最锲而不舍的人。

当时崔允龟对崔春国说：

“我们的部队只有个外壳，是一口掏空吃光了的泡菜缸。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我是恨不得立刻带着队伍投奔金成柱(金日成同志的本名—译注)队长的。要是司令老头子执意不肯，就是我一个人也要投到革命军那边去。”

崔春国对他说，我们不希望独立军闹分裂。副司令要是带着支持您的人投到白头山来固然好，但我们还是劝您耐心说服司令老头子，要他同意实现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联合。

崔允龟说，他虽然没有信心说服司令，但愿意为共同抗日竭尽全部力量。只有建立联合战线才有活路，这是他多年来在独立军中目睹民族主义运动蜕化变质的过程后得出的结论。

为减少独立军的损失，金活石将部队分成三路分散活动。但这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没有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中的独立军，是没有后备可以补充兵员的。

崔允龟陷入了苦闷，他冥思苦想：为什么独立军日趋衰退没落，人民革命军却越来越壮大和强盛？为什么独立军军纪紊乱不

可救药，人民革命军却军纪越来越严明，连敌人都惊叹不已？为什么独立军不掠夺老百姓就活不下去，人民革命军不侵犯人民财产却有吃有穿有住？为什么独立军与日军遭遇就连吃败仗，人民革命军却屡战屡胜？为什么独立军敌视革命军，而革命军却把独立军当友军对待？

他终于找出了原因，关键在于有无群众基础。独立军之所以孤军奋斗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就是因为它的群众基础太薄弱；它之所以无法阻止蜕化变质，也是因为群众基础不坚实。他认为，脱离群众并骑在群众头上的独立军是没有前途的，而来自人民群众并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人民革命军，则是前途无量的。

独立军的群众基础薄弱，是无法改变的必然现象。独立军的志向和活动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它是同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思想毫无共同之处的。这种思想的特点是不把劳动群众当作革命的主人，因而不愿同广泛的各阶层反日爱国力量联合，并且反对共产主义。

崔允龟从中找出了独立军衰退、孤立和趋于崩溃的根本原因，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实现同人民革命军的联合，然后在共产主义者奠定的群众基础上开展斗争，才能忠实地完成自己为民族所承担的崇高使命。

然而金活石却拒不接受合作建议。他认为，要是同人民革命军联合，得利的是共产主义者，而独立军则会咎由自取，不复存在。独立军即使短命夭折，也绝不同共产主义者吃一锅饭。这就

是他的立场。他坚持反共立场，绝不做任何让步。他说：不要上共产主义者宣传的当，他们只知道阶级斗争；他们要搞统一战线，那是一时的，是欺骗；他们是表里不一致的人，背对着他们才是上策。

在司令和副司令的谈判直打空转的时候，独立军的情况越来越恶化了。他们要粮没粮，要衣没衣，又陷于敌人的包围，真是一筹莫展。开小差的、投敌归顺的和饿死的，正与日俱增，更是雪上加霜。因而士气极端低落，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

崔允龟决心作最后的抉择，同金活石司令举行了最后谈判。他对司令说，你要是不同意我的建议，那就别无他法，我只好不顾队伍的分裂，带着拥护联合的人离你而去了。如果我们再不做出抉择，依然踟蹰不前，拖延时日，必遭全军覆没。去投蒋介石也罢，去投金日成也罢，你应该允许各人自由选择。

陷于绝境的金活石，终于表示同意各人自由选择。他把独立军全体官兵召集在一起，悲切地说明了部队的艰难处境，然后说道："你们谁愿意投奔金日成部队？愿者站到队前来！"

起初，他的部下都一动不动，因为都不知道司令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谁知道他是不是要把联共分子诱出来加以处置呢？

第一个站到队前去的是金明俊。紧接着好多人都站到队前去了。

不管是多么困难而危险的事情，只要有人带头，都是可以解决的。金明俊确实是急先锋。所以，他转入人民革命军后，我一直特别爱护他。

多年以后，金明俊回忆同金活石分手时的情景说：

“当时，鼓励我按决心去做的，是崔允龟副司令。他没说一句话，只是用眼色鼓励我照自己的决心采取行动。”

就这样，独立军分裂成了两支队伍。大家都哭了，金活石司令和崔允龟副司令也哭了，没有一个不哭的。一个肌体被支解了嘛，该多么痛苦啊！

分成两拨的人，互相许下了朝鲜独立后再见的诺言，就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了。一支队伍由崔允龟带领，投向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另一支只有几十个人的队伍，由金活石带领，朝凤凰城一带开走了。南满唯一的一支抗击日军的国民府军队，就这样解体了。

崔允龟来到南牌子对我说：

“我是绕了一条很长的弯路，才来到了成柱队长的身边。本来是可以径直来的嘛，怨我们太犹豫不决了。”

我衷心欢迎他投到革命军中来。他的壮举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史和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惊人大事。这是我们从抗日武装斗争的初期以来一贯坚持的统战政策的胜利，是共产主义者们在贯彻《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的斗争中所建树的又一座丰碑。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的联合，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必须效法和借鉴的先驱的榜样。

创造了这一榜样的功臣崔春国和崔允龟的业绩，在我国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史和民族大团结史上，是应当占有一页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念念不忘崔允龟。他是当之无愧的联共的先驱和实践

者，是个胸怀宽广的人。鉴于这种事实，专门研究抗日武装斗争史的历史学家们在写民族统一战线运动史的时候，必须突出地记述崔允龟的业绩。

可以说，由于崔允龟的壮举，在我国革命运动中实现了父辈和子辈的联盟。从思想观点方面看，崔允龟是属于我父亲一辈的人物。父亲一辈的人，大都追随民族主义思想；而我们一辈的人，大都向往共产主义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代爱国者，到头来终于超越了不同的思想观点，走上了共同抗日的道路。

崔允龟的壮举说明，即使是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不同的人，只要具有真正热爱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是完全可以团结和合作的。

崔允龟投入人民革命军后，还成了共产党员。他在参谋工作的重要岗位上，一直为抗日革命的胜利英勇奋斗，1938年底在桦甸县阵亡。他是我父亲的战友，同时又是我的革命同志，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追悼了他。他开辟了联共的道路，却来能看到祖国的解放，这使我最感到痛心。

与崔允龟不同，金活石在投奔蒋介石的路上被敌人逮捕，来能完成独立军司令的使命。日本帝国主义者探悉到金活石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准备向他靠拢，便策划了一套诡计。他们让一个特务伪装成蒋介石的特使，派他去见了金活石。那个特务把伪造的蒋介石的介绍信交给金活石，告诉他蒋总统在期待着同金活石司令会晤，希望他尽快动身前往。金活石被他对蒋介石的企望蒙住了

眼睛，也不仔细查明那个人的身分，就轻率地跟着他上了路。那个特务把他径直带到了宪兵司令部。

毁了金活石的，一句话，就是反共病和事大主义。

正如我们民族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大主义者和反共分子，都无一例外地必然走上背信弃义和出卖祖国的道路。

中国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但他是联共的，因此得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继续进行革命。金九由于晚年在从反共转向联共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才能在民族的史册上占有引以自豪的一页。金活石如果也像他们一样走联共的道路，就不至于陷入日本人设的陷阱，而会作为受人民爱戴的爱国者结束一生。

正因为这样，每当见到有反共病的人，我就强调说，反共不仅会毁了自己，而且还会走上背叛祖国和人民的道路。反对站在人民一边的共产主义者，就等于背弃人民。这就是联共就会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反共就会背弃祖国、背弃民族、背弃人民的道理。

跟着崔允龟转到人民革命军来的金明俊，也忠心耿耿地为革命献身奋斗。他耿直，淳朴憨厚。解放后，他长期作为我的副官在我身边工作，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金正日同志说他是独立军的最后一个人，十分器重他，关怀他。

洪春洙也是从独立军过来加入人民革命军的。

在光复祖国的年代里，独立军部队汇合到朝鲜人民革命军里

来，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战的历史经验雄辩地说明，今天，北方、南方和海外的所有朝鲜民族爱国力量必须而且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理想和政见的差别，团结成一个整体，共同对外来势力进行斗争。

四　王村长和王署长

30年代后期，在物质和精神上积极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中国朋友中，有两个是在敌伪机关做事的人。这两人都姓王，一个是临江县大荒沟的村长；一个是临江县贾家营伪满警察支署的署长，当地人都叫他王署长。

这两个在基层单位为日本帝国主义做事的人，是怎样同朝鲜人民革命军建立了联系，以致变成了抗日革命的帮助者和支持者的呢？做他们的工作，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亲自布置的一项政治工作。

金日成同志同他们只有一面之交，但事过几十年仍对他们念念不忘。

头一个向我谈起王村长的人，是第八团第一连的政治指导员朱在日。他到临江县大荒沟做敌占区的工作，回来后对我说，要想在大荒沟一带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首先就要争取王村长。他接着详细地介绍了王村长的为人。

给朱在日介绍王村长来历的人，是朱在日在和龙县三道沟牛心山做党支部书记时吸收入党的一个同志。后来这个同志暴露了，无法继续在和龙工作，党组织就把他转移到了临江县。临江县有他的亲戚，他就在大荒沟附近弄到一个小窝棚，勉强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艰难，但他没有停止工作，继续努力争取可靠的人。后来见到过去的党支部书记、连队政治指导员朱在日，就要求帮他重新接上组织关系。

我叫朱在日马上到大荒沟去见他，帮他接上组织关系，并吸收他所保证的人建立一个组织。朱在日赶回大荒沟找到他，告诉他司令部将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要他放手扩大祖国光复会组织。这样，大荒沟也开始有了我们的组织。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在临江县建立的头一个祖国光复会组织。

我还给朱在日交代了争取王村长的任务。王村长就是这样成了我们的争取对象的。我们又通过大荒沟的地下组织，—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深入了解了王村长这个人。

到了1938年的春天，我们做王村长的工作有了成果。

1938年春天是我们结束马塘沟的军政学习后向长白一带进发的时候。部队的行军路线上有大荒沟，我决定到了临江就一定抽空同王村长见一面。我们南下开往长白，路上吃了很多苦。走到离大荒沟有三十来里地的地方，口粮断了，战士们也都筋疲力尽，再不能继续行军了。

这种时候，只有让队员们吃上饭，才能继续行军打仗。可是一点儿粮食也没有，什么事都做不成了。最好是打一仗缴获敌人的粮食。可是队员们都又饿又累，别说打仗，就连身子都动弹不了。这时候，我决计做王村长的工作，对前一段的工作做一个小结。我想，只要做好王村长的工作，不仅可以解决粮食问题，而且还可以为我们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大荒沟邻近有小荒沟。这个村子的地下组织面临着危险。这个组织也是朱在日吸收入党的那个同志领导的。他们工作很有成绩，把组织扩大到了小荒沟和邻近的村子，可是后来被敌人发

党，地下组织的成员多数被枪杀，村子被烧毁，连老弱妇孺都遭到了屠杀。

几个幸免于难的组织成员和老百姓逃到了大荒沟。他们的命运就操在王村长的手里。当时王村长还兼着自卫团团长。随着他的处置，小荒沟组织的成员和难民既可能得到保护，也可能遭到祸殃。因此我决定尽快同他取得联系，把他争取为我们的支持者和帮助者。

我们派出几个工作员到大荒沟去做王村长的工作。这些工作员都表示一定要把王村长争取过来，但也不无顾虑。因为王村长兼着自卫团团长，做他的工作说不定会碰上什么暗礁。

我却没有怀疑，深信做王村长的工作一定会成功。我之所以深信不疑，是因为我认定他是个有良心的人。说他有良心，有什么根据呢？据说他当了村长和自卫团团长以后，没有伤害过一个管辖区的居民。我很重视这一点，认为这是他有良心的重要表现。实际上，在那个年代，沉迷于追求荣华富贵的人，一旦当上自卫团团长或村长，就会为了多立功博得更大信任，任意陷害一两个爱国者，是司空见惯的事。

但是王村长这个人，既没有告发，也没有陷害过一个人。对小荒沟来的遗属等难民，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今没动他们一根毫毛，听任他们住下去。他如果是个坏人，肯定不会这样做，而会去告发他们，或者直接叫自卫团员去把他们当成共产党赤色分子全部杀掉，然后去领赏。

收容从日本军警屠刀下逃生的人，还照料他们安心过日子，这

在那个年代，除非是有志气、有胆量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因为事情一旦泄露，村长自身就要遭到灭顶之灾。可以肯定，王村长是明明知道这一点，却甘冒风险，急人之难。看来是条好汉。

我对前往大荒沟的工作员说，我看王村长是个多少还有点良心的人，你们要大胆接近他，告诉他我们游击队打日本鬼子的目的。这样，他一定会站到我们这边来。

工作员到了大荒沟，通过窝棚主人的帮助见到了王村长，并向他提出了和我们合作的建议。他欣然同意，还要求同我见面。他说，革命军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只求同我见一面。

他的要求引起了我军指挥员们的争执。有的主张答应他，有的说不能答应。当时，敌人企图暗算我们司令部的活动很频繁，我们的指战员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我听到他们争执不休，便去说服了他们，并派人去把王村长带到密营来。

王村长听说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便秘密发动村里人筹集大量的粮食、鞋等物资，来到了司令部。我一看，他是个三十四五岁的美男子，温文尔雅，很有礼貌，又豁达大度，头一眼就叫人喜欢。

我首先问他家里的情况和健康状况，然后对他过去保持民族良心，无愧为文墨人，给了很高的评价，并要他今后仍利用村长头衔，尽力帮助我们。

我对他说：

“日本和满洲国的末日不远了。你当的村长，虽是满洲国给

的官，但你不要为日本和满洲国效劳，而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做好事。要想这样做，就要组织和发动村民，积极支援革命军。我相信，你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我的信任，使他非常感动。他说：

“金将军如此信任我，我没有可说的了。我一定遵命，尽绵薄之力!”

他来时还带了酒和几样菜。不难看出，他是个重感情会交际的人。

我们坐在帐篷里一起喝白酒，为了证明酒里无异物，他自己先干了一杯，才给我斟了一杯。喝到三分醉意时，他开怀谈起了自己的隐私，还说这是从来对别人讲过的。他讲的隐私，宛如一部小说，结构严紧，情节生动，令人垂泪。

王村长的父亲，是在东宁县长大的满族人，家境贫寒，年近四十仍未成亲。他四处流浪，在颠沛流离中偶遇一如意女子，才成了家。不久，他们生了个可爱的小宝宝，也就是后来的王村长。孩子一年年长大，愈发英俊聪颖。然而他们家徒四壁，一文不名，不能像人家那样把孩子养得有出息。王村长的父亲总想着世上还有没有比满洲好的地方，只要有，他就想带着孩子去闯荡。有一天，他们村里来了一群朝鲜青年，是为了挣钱谋生前去江东，半路上到这里打短工挣盘缠的。他听这些人说，俄罗斯是能过上好日子的好地方。于是当这些朝鲜青年重新上路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跟他们去了江东(我祖父和父亲那一辈的人，大都把俄罗斯叫做江东)。

到了俄罗斯，青年们跑了一些金矿，但大都来能如愿以偿，便合伙种起地来。从此，那里就形成了一个以种地为生的朝鲜人村庄。王村长的父亲虽是中国人，可也跟这些朝鲜人一起过，而且处得像亲兄弟一样亲密无间。孩子就在这个村子里上学，自然熟悉了朝鲜人的风俗习惯，朝鲜话也说得很流利。后来，俄罗斯发生了新旧两党的斗争。所谓新党就是布尔什维克，旧党就是白党。随之，这个朝鲜人的村庄也经历了好多磨难。布尔什维克得势，赶跑了白党势力，就成布尔什维克的天下；一旦白党得势，就又变成白党的天下。村里的乡亲也随之发生分化，出现了拥护共产党的势力和拥护白党的势力。甚至一个家庭也发生分裂，老大是新党，而老二、老三是白党，互相争执，各不相让。争吵发展成殴斗，造成了流血。王村长的父亲，就是那时被白党的铁叉刺死的。孩子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乡亲们都很可怜他，可谁也不敢去照顾他。因为谁要是照顾了这个孩子，谁就要遭白党的毒手。白党说要把共产党斩草除根，要杀掉这个孩子。情况十分危急。一个从东宁县来到俄罗斯谋生的朝鲜青年，在一个寒冷的秋天，带着这个孩子偷越国境逃回了东宁县。他想在这里找这孩子的母亲，不料却被一帮马贼捉住了。马贼想把这孩子扣下来当绑票，好索取钱财。但当他们知道这是个举目无亲的孤儿时，就想杀掉他。这时，二头领说，一个可怜的孩子，杀他做什么，把他送到我房里去，叫那个朝鲜人滚蛋。那个朝鲜人就这样被抢光了盘缠，也被夺去了孩子，茫无目标地走了。孩子则被留在贼窝里，受着二头领的保护。二头领之所以不让杀他，是因为喜欢

他。后来，那个二头领带着这个孩子逃出贼窝，跑到了临江县。他逃到大荒沟的山里，买了房子和地，成了一个富翁，并且把那个孩子认了干儿子抚养起来。他所以能成为富翁，是因为他逃出贼窝时把他负责保管的巨额“公款”都带了出来。

他是山东人，姓王。他给干儿子也冠上了王姓。有钱有势才能过好日子，是他的人生观。为了让干儿子长大了当官有钱有势，供他念了书，最后又给他谋了个村长的头衔。

王村长接着说，养父恩重如山，固然不能忘；但更令他永远不忘的是那个朝鲜青年。当年他父亲被害后，一直保护他，还带他回到满洲来的就是那个朝鲜青年。

他说：“现在我有了钱，有了财富，可就是没法报恩，实在叫我心焦。我只好怀着报恩的心意，同情朝鲜人的不幸，为他们感到难过。从小荒沟来的难民，大都是朝鲜人。我甘愿豁出生命照顾他们，就当是向恩人鞠躬谢恩了。”

他说着禁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是个重情义的人。当他说怀着报恩的心意照顾朝鲜人的时候，我深受感动。

“你同情朝鲜人的不幸，援救他们摆脱险境，我很感谢你。重情义的人，不但能够为恩人做好事，而且能够为人民做好事。从今以后，你就不要把自己看做为满洲国效劳的村长，而要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村长。”

他一再发誓，决不辜负我们的信任。

他回去的时候，我给他派了两个警卫员。

从这以后，王村长就成了我们的好朋友，给了我们很大的帮

助。要是他还活着，我很想再看看他，可是一直不知他的去向，更不知他是否还活着，心里很难过。

争取王署长的经过，也跟争取王村长差不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最先给我们介绍王署长的是第七团政委金平。他曾带着崔一贤的连队到长白、临江县界领导过小分队的工作。他一面领导派到各地去的小分队，一面自己也做地方工作。他派出去的一个小组在临江县五道沟和三道沟活动。

有一天，一个队员来找小组长说，因为有贾家营的伪满警察支署，小组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问组长该怎么处置这个支署。看来他是很想狠狠地揍它一下的。贾家营是去临江、濛江、抚松的必经之地，而这个警察支署是个大障碍，确实是个大问题。七团政委金平听了他的汇报，就立即给我打了报告。

我叫金平设法把贾家营警察支署争取过来。我说，攻打这个警察支署，是随时都可以办到的，但会有后患，会给我们造成麻烦。因此要大胆地去接近它，把它争取到我们这边来。

几天后，金平对我说，贾家营树林里有个窝棚，住着一个人，是他在延吉县当区委书记时认识的，如果让他做中间人，似乎可以接近那个署长。他还说这个人曾在延吉县当过赤卫队排长，是个可靠的人。这个人姓金，曾被误判为与“民生团’有牵连的人，险些被处死，幸亏区委的一些朝鲜人把他秘密地送到敌占区去了。

他来到贾家营打猎谋生。那个王署长喜欢打猎，经常碰见那

个姓金的，自然就成了猎友。

我对金平说，认识那个姓金的人，只有你一个，你要直接去找那个姓金的，通过他的关系，再去接近那个王署长。此前一段的经过，可以说跟争取王村长的经过相似。一个入过地下组织的人同日伪警察过往密切，是少有的，但也不足为奇。不过，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他是怎样同王署长结识并成了至交的。这一点搞清楚了，才能找出一条接近王署长的捷径。

金平去见了那个姓金的人以后回来说，他离开游击区虽已多年，但心依然是红的。当金平穿着便服去找他的时候，他还怀疑这个从前的区委书记是否已经叛变，作了敌人的密探，露出了戒心。穿军装的突然换上便衣，是常常会引起这种误会的。当金平说出自己是金日成将军派来的，那个姓金的才放下心来跟过去一样毫无隔阂地说出了心里话。他说自己没有摘掉“民生团”的臭名就来到了敌占区，心里十分痛苦。他要求把自己带到金日成将军那里去，他要对我说明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请金平在我面前替他作保。只要金将军信任他，他就加入人民革命军。

金平对他说，托金将军的福，“民生团”问题已经澄清，你要丢开一切顾虑，重返革命战线，响噹噹地干出一番成绩来。姓金的听了十分激动，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姓金的跟王署长结交，是从一年前开始的。在他狩猎的地方，王署长也不时地来打猎。王署长每次看到，自己一天只打到一两只猎物，而那个姓金的猎人却能猎到四五只野味。有一天，他为了弄清其中的奥妙，特意拜访那个姓金的猎人。在交谈中，

他发现这个猎人狩猎很有办法，心中佩服不已。他对姓金的猎人说，不知是哪一点，使我总觉得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猎人，而是一个思想家或是一个学者。

姓金的猎人对他说，要想了解我到底是不是猎人，明天我们两个比一比高低，你看如何？王署长表示同意。

在第二天的狩猎比赛中，窝棚主人姓金的猎人得胜，王署长认输拿酒请客，在窝棚里摆了一桌酒席。席间，王署长说他愿意跟金猎人结拜把兄弟。金猎人说，我要是入了你们的家礼，就得当你的哥哥，这可不是小事，得容我好好想想。接着，他毫不在意似地问署长，你是个身负警察支署署长重任的人，怎么会有空常常进山打猎？

王署长说，不是有空才来打猎，是心里不舒服才来解闷。那些东洋鬼子确实是孬种。凡是有危险的地方，都叫我们满洲警察打前锋；虽是同一级的官儿，他们对我们总是随便发号施令，动不动就破口大骂。真是叫人气得活不下去了。

金平听了那个姓金的猎人讲的这些情况，给他交代了一项任务：在贾家营一带组建祖国光复会的基层组织，并设法叫王署长跟我们的人会一面。

第二天，金猎人带着王署长来到了金平指定的接头地点。跟王村长一样，王署长也带来了酒和几样菜。酒是满洲国官员的重要交际品。

与王村长相比，王署长身材魁梧，性格粗犷果断。不管什么事情，他绝不犹豫，当机立断，表态明确。

金平同王署长会面，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身分，说自己是金日成部队的一个政委，是奉金司令之命来见面的。然后直截了当地问他有没有同我们携手共同抗日的意向。

王署长起初有些发愣，直勾勾地瞧着金平。很快，他恢复了常态，端正了坐势，说道，干吗刚一见面就这样，来，先喝杯酒，边喝边谈。

他喝了几杯之后，啪地一声拍着金平的大腿，惊叹不已地说："游击队政委，个子虽小，胆子可大，合我的脾气。你在我这个佩着刀的人面前，眉不皱，心不跳，直言自己的身分。令人惊佩！"

金平回答说："金日成司令手下的人，都这样。"

王署长把嘴凑到金平耳边，说："让我去见见金司令吧。见了金司令，我就说出我的心里话。还有一条，你定要入我们的家礼，这样，我才能完全相信你。"

经过第一次会面，王署长明白了金猎人也是和政治委员一样的共产主义者。他表示佩服说，金猎人入了家礼，拜了把兄弟，可从没有说过自己是共产党员。我原以为家礼的保密最保险，现在看来，共产主义者的保密才是最保险的。

我对金平说，入了家礼，也改变不了我们的姓，你就加入，跟他拜个把兄弟，然后带他到司令部来。

在贾家营附近，我见了王署长。他和王村长一样，也称我的心。记得他还给我带来了礼物——三根人参。

他欣然同意我提出的共同抗日建议。他性格豁达，说话爽

快。他说："我当警察，是为了挣碗饭吃，不是为了反共。一看那些日本人的所作所为，就恨不得马上扔掉枪不当这个警察了。金司令要我携手共同抗日，我赞成。金司令要我仍戴着这顶署长帽子抗日，我遵命。可是，我要是仍穿着这身警察制服，那些游击队员能像金司令一样待我吗？我会不会挨两头来的枪子儿啊？"他直言不讳，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我对他说："这个你放心。只要你主持正义做好事，世人都会理解你。即使是入了敌伪机关的人，只要他抗日，我们革命军绝不加害。这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要你为我们做的事，不是别的，就是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不妨碍我们，也是抗日。要时常给我们送些情报来，要多接近那个姓金的猎人，好好协助他。"

从此以后，王署长一直很好地帮助了我们。那个姓金的猎人，在他的保护伞下，在贾家营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基层组织。

在王村长和王署长帮助下，我们弄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大荒沟的自卫团一碰上我们的队伍，还挥着手帕表示欢迎。

对王村长和王署长的工作，为我们改造人的工作创造了又一个经验。

世上万物皆可改造，这是我的立论。在大自然、社会和人的改造中，最难的是人的改造。但是只要下功夫，人是完全可以改造的。人的本性，是热爱美好、热爱高尚、热爱正义的。因此，只要做好思想教育，任何人都能改造好。人的改造，就其本质来说，就是思想改造。

必须注意的是，不要凭人的头衔、衣着等外表轻易地评定他

的思想。换句话说，不要凭人的身分和官衔评定他的思想。当然，地主、资本家有剥削阶级的思想，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有工人阶级的革命思想，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要知道，像洪钟宇[4]那样穿着伪警察服装的人，多少也会有一点良心和进步的思想。所谓进步的思想不是别的，就是热爱人、热爱人民、热爱民族、热爱祖国的思想。人的良心，归根结底，也表现为这样的热爱。

我们改造人，不仅不重头衔，也不重国籍。只要是有良心、有爱国心的人，即便是中国人，甚至是在敌伪机关里做事的中国人，我们也毫无顾忌地大胆争取他，同他携手合作。我们有能力教育和改造为敌伪机关效劳的朝鲜人，并且有这个经验，这意味着对在敌伪机关服务的中国人也能进行改造。教育和改造人的原理，是不受国籍限制的。我们既然能够把朝鲜人警察争取到革命一边来，难道就不能把中国人警察和村长争取到革命一边来吗？

抗日革命时期，同我们携手合作的中国朋友中，也有伪满军的高级将校和中下层军官。他们也同王村长和王署长一样，为我们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现在，我们的民族面前摆着统一祖国的大业。南朝鲜有许多与我们思想观点不同的人。地主、资本家等属于剥削阶级的人，官僚、企业家和商人也不少。国家统一后，不管怎么样，都得跟这些不同阶层的人在同一块国土上共同生活下去。总不能把持有不同思想的人都排斥掉，光由我们共产主义者生活下去吧？

即便对方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也应当找出与他们的共同点，和他们携手共同建设统一的祖国。我认为这个共同点就是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同具有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思想的人，是完全可以同呼吸共命运的。

五　热河远征

热河远征是一个留下了深刻历史教训的事件，它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前后时期给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政治活动和国内革命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整个抗日运动蒙受了莫大的损失。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历史事件。这个生动的实例从反面证明，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方略为“国际路线”所指导的情况下，各国的革命遇到了何种困难，它也具体地说明了朝鲜革命的自主路线是通过多么艰难的斗争才得到维护和贯彻的。

对共产国际首次下达热河远征计划时的情况，金日成同志做了如下的追述。

史称热河远征的向辽西热河地区挺进的计划，我们第一次收到是在1936年春天。魏拯民向与会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挥员和王德泰等东北抗日联军各部指挥员，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远征热河方面的计划。扼要地说，这个计划要求东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向辽西热河方面挺进，配合在“东征抗日、收复失地”的口号下挺进热河方面的工农红军，以协同作战制止日本侵略军进攻中国关内。共产国际提出的这一远征的战略目的，是北上东征的工农红军(后为八路军)和西征的抗日联军部队在热河会合，实现中国关内关外抗日斗争的一体化，掀起整个抗日运动的新高潮。

当时，南满的第一军、吉东地区的第四军与第五军、北满的第三军与第六军等东北的抗日联军部队，以半圆弧形分布在长春

的东部、东南部和东北部。共产国际的战略意图，是将这个半圆弧向西推进，对长春形成半月形包围，再挺进到热河一线，与北上的工农红军会合，打击进攻关内的日军。

共产国际似乎要通过热河远征，打开一个使关内关外的革命力量在统一联系中开展活动的新局面。

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东北三省，炮制伪满洲国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斗争主要是在东北进行。

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粉碎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新的领导体系。从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关内抗日运动的急剧高涨，大大鼓舞了东北人民。

热河远征计划下达后，热河地区就成了再度引起世界注目的中日决战之焦点。

濒临渤海湾的热河，曾是清朝热河省所在地，是与满清历史有密切关系的都城。

热河之所以与中国清朝历史有密切关系，是因为这里有康熙皇帝的离宫，据传清朝有名的皇帝乾隆就在这又名广寒宫的离宫出生。

热河又以军事要冲著称。热河西南面的山脉筑有万里长城，可见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军事上十分重视的要塞。

正因为它是如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所以19世纪我国实学派思想家之一朴趾源作为李朝封建政府使臣的随员去中国访问后，写下了长篇纪行《热河日记》。这篇纪行记述了中国的文物、制度和风俗，还有声有色地叙述了在热河的见闻。

热河首次引起世界注目，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铺平进攻关内的道路，占领锦州和热河的时候。

可以说，接到共产国际下达的热河远征计划时，大家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

对西征计划，王德泰一开始就表示怀疑。他说，游击队充其量只有几千人，用这支力量去包围敌军密集的伪满洲国首都，是有风险的；离开山区的根据地，远征平原，也是犯忌的。这不符合游击战的要求。我们不能因为关内的工农红军东征而随之西征。对大城市的攻坚战已失败了，还叫我们重蹈覆辙，这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3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时期，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李立三片面地夸大革命形势发展的有利一面，作出革命能够首先在一省或几省取得胜利的冒险主义的决议，在一些主要城市举行了政治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根据当时党领导班子的这一错误决议，红军进攻了几个主要城市，但都未成功。鉴于以上教训，一些人对共产国际的作战计划表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直到那时，抗日联军的大部分共产主义者认为，共产国际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指挥员对热河远征计划表示怀疑，是值得重视的。

然而，魏拯民却听不进这种意见。他作为指令传达者，为共产国际的计划做了辩解。他说，这次远征，南满、东满和北满的所有抗日联军部队都要参加。目前国内形势一片大好，因此，并

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他轻易地驳斥了异议。其后，他还到金川县，向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军政干部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热河远征计划。

据说，杨靖宇接到这个计划，非常兴奋。他明确地表示要执行这个计划。本来，杨靖宇一直为实现同关内革命力量的联系，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南满游击根据地离关内近，建立这种联系是十分可能的。

当时，关内的工农红军为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已经北上东征。杨靖宇打算同关内东征的抗日先锋军联合起来粉碎敌人的封锁，实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和关内抗日战争的直接联系和协同作战。只看如下事实就可知道他是多么积极支持热河远征计划：他不顾先后两次遭到了失败，再次向热河方面挺进，甚至编出《西征凯歌》来鼓舞队员们。

共产国际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对我们也多次发出指令，要我们参加热河远征。

他们继1936年春天首次要求我们参加热河远征之后，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的1937年夏和1938年春再次要求我们向热河方面挺进。

共产国际先后两次要求我们远征的1936年和1937年，正是朝鲜人民革命军挺进到白头山地区和西间岛一带积极推进建党准备工作和统一战线运动，同时把武装斗争扩大到国内纵深地区去大造声势的时候，也是朝鲜共产主义者比任何时候都牢牢地坚持本国的革命必须由自己负责进行的自主立场，为加强朝鲜革命的主

体做出一切努力的时候。革命的前程是光明的，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

在我们的努力下，革命组织在鸭绿江沿岸和国内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在成长。在朝鲜人民革命军面前摆着用武装保护这些组织和革命者，并以白头山地区和西间岛为据点，把国内革命推向大高潮的重大任务。

在这样的时候叫我们去参加热河远征，我们的心情该是怎样的呢？尽管共产国际强令我们参加远征，但我一开始就认为这是冒险。

我们坚持我们提出的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建立了新的白头山根据地，并同曹国安的第一军第二师联合，在西间岛一带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战斗，同时，积极进行了国内大规模进攻作战。另一方面，我们为弥补由于第一军参加远征而出现的南满部分地区的军事空白，使挺进辽西热河的远征部队没有后顾之忧，从后面给了他们一切可能的支援。也就是说，我们取得了一箭双雕的成果：既坚持贯彻了把武装斗争的烈火扩大到国内去的自主路线，又为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南满的武装部队挺进辽西热河方面的时候，负责传达共产国际指令的魏拯民却没有跟远征的第一军走，而主要是跟我们的部队在一起。

热河远征计划是非常冒险的和不切实际的，这一点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暴露得更加明显。到了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仍然不放弃对“半月形包围”的幻想，继续要求抗日联军进行毫无取

胜希望的西征。他们认为中日战争转为全面战争，抗日运动急剧高涨，这是西征能够实现“半月形包围”的重要时机。

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时，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气势磅礴地向绥远、察哈尔和热河挺进。

这时共产国际又下达新的指令，要求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进一步向从前第一军占据的海龙和吉海线方面深入，直接参加以半月形包围长春的作战，积极支援向热河方面挺进的第一军。如果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我们就要远离朝鲜革命的策源地白头山根据地，转移到西部去。

坦率地说，在中国大部分领土变成为战场的条件下，与八路军热河挺进部队的会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们认为热河远征计划不够现实的另一个根据，是它不符合游击战的要求。游击队离开山区向平原地区出击，这如同鱼儿离开水往陆地上跳一样，是十分危险的行动。东满、南满和北满的山区，是共产主义者很早以前就开辟的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对地理条件也了如指掌。然而，要抗日联军部队离开本来的活动区域，到辽西热河方面去，要经过敌人集中的要冲和南满铁路沿线广阔的平原地区。在这开阔的平原如果遇到用大炮和坦克等重武器武装的敌军，只有轻武器的游击队将会落到什么样的处境？打这种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十分清楚的。

热河，对八路军来说，近在咫尺，越过长城就可到达，但对东北抗日联军来说，却有数千里之遥。

力量相对薄弱的游击队，要穿过在数量上超过自己几百倍的敌人所控制的平原地区，向如此遥远的地方行军，这是不符合起码的军事常识的。

我对魏拯民多次说明，从军事战略上看，热河远征是一种冒险。热河远征是否必要，对这个问题魏拯民也逐渐转变为将信将疑了。

但他仍然没有抛弃这样的希望：在日本侵华战争已大规模爆发的情况下，远征的成功将会在全中国掀起抗日高潮，将会显示始终一贯坚持抗日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反日精神和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热河远征一旦成功，在促使蒋介石积极抗日方面也会出现有利的局面。这就是他当时的想法。

我对魏拯民说：在全中国掀起抗日高潮是必要的，显示一下共产党人的本色也是必要的，引导蒋介石积极抗日，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要以牺牲东北革命的代价来取得这种成果，是不应该的；为了东北的革命，朝中两国人民和共产主义者流了多少鲜血啊！

然而，魏拯民不肯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说：从军事战略上看，热河远征是有一定的缺点，但总不能因为它有缺点而不去尝试一下就回避吧。当然，在远征过程中，会有令人痛心的牺牲，也有可能遭受意想不到的损失。不过，没有牺牲，没有损失，怎么能做成大事呢？

他还说，周保中的第五军和第四军也认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是实现西征的好机会，为执行这个指令，他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

魏拯民说的是事实。在吉东活动的周保中对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关内关外的政治军事形势，表示乐观。他强调说，大事变已经开始了，要乘此大事变扩大发展之机，立即利用一切可能直接同迅速向热河挺进的八路军游击部队取得联系。

但是，他的部下并不是都支持西征。第五军副司令柴世荣就对西征表示怀疑，因为他清楚这个计划的冒险性。

魏拯民明知热河远征计划具有一定的冒险性，但他仍表示支持。我认为这是魏拯民式的对中国革命的忠诚。

魏拯民是华北山西人，30年代初他就到东北参加革命，成为领导人之一。他为东北的党和抗日联军的建设，费尽了心血，在消灭日寇的战斗中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他对东北革命的热忱和关心是无与伦比的。但他并不是仅仅致力于东北革命，他是把东北革命看作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他既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也始终关注着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他的原则是：只要是为了发展全中国的革命，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我对他说，我理解你宁可牺牲也要玉成热河远征的心意，但我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这样的问题：共产国际在制订远征计划时，是否正确地考虑到了东北的现实和中国革命的要求，是否正确地估计到了这个计划在军事上的可能性，尤其是他们要推行的远征是否符合游击战的特点。可以说，共产国际的热河远征计划不仅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正确的了解，而且对朝鲜革命全无考虑；王明是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我看他的主观主义是够严重的。魏拯民也承认王明的主观主义很严重。

热河远征计划，虽然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指令下达的，但其拟定者是王明。

王明驻在莫斯科，连续拟定并下达了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路线。王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以“国际路线”为名硬往下灌的左倾。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他的路线又转向了右倾。他主张一切都要通过同国民党的合作和统一战线加以解决。

金日成同志把朝鲜革命和国际革命密切联系起来，经过周密的考虑，灵活地执行了热河远征指令。对此，他回忆如下。

直到那时，我们还没有完全看穿王明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即使看穿了，也不能正面反对或者公然回避。王明既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又是书记。他所拟定的指令，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下达的。

我认为，热河远征计划不仅对中国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利，而且从朝鲜革命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片面而有害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以慎重的态度加以执行。

我们同魏拯民对第一军属下抗日联军部队和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活动方向，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魏拯民希望我们部队开到第一军的活动地区——海龙、吉海线一带去。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们就不可能巩固在白头山地区取得的军事政治成果。因此，我提出了折中方案：我们暂时在临江、抚松和濛江一带进行游击作战，开展旨在推进朝鲜革命的政治军事活动，到适当的时机再逐步向那一地区移动。

当时，我们部队里有很多在西间岛和国内入伍的新队员。在

没有经过充分训练的情况下，部队离开本来的活动地区转移到生疏的地方去，是不明智的。我坦率地对他讲，为了保存和扩大国内的革命组织，更积极地进行国内进攻作战，我们不能远离西间岛和白头山地区。

魏拯民表示同意。

当时，杨靖宇为了利用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掀起的抗日高潮，成全热河远征，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然而，1938年春第一军刚开始远征就陷入重围，孤军奋战。而第一师师长程斌率部投敌，更是雪上加霜，致使第一军的西征计划乱成一团，无法收拾。

7月中旬，杨靖宇在老岭召开第一军干部紧急会议，正式取消了西征计划，并采取了防止军机泄露的改组措施。

程斌的投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冲击。为支援濒临崩溃的第一军，我们紧急准备了一批军火和军需，派一支部队绕过濛江县，经金川、柳河二县向通化一带移动。这样做是为了分散包围第一军的敌人兵力，给第一军创造突围条件。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在执行远征计划之前，首先营救出第一军战友，保存东北抗日力量，加深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和人民通过多年的共同斗争结成的战斗友谊。

当时我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派我们的一支分队故意大摇大摆，边打边走，直逼通化，以吸引敌人；我则率领一支小分队秘密打入国内腹地，加强国内革命斗争。

另一方面，主力部队转战各地，痛歼敌人。其中，留下了最

深刻印象的战斗之一，是八道江附近的修路工地袭击战。八道江驻有日军、伪满军、武警和自卫团等许多兵力。这些敌人，一方面频频出动“讨伐”活动在临江地区的人民革命军，一方面加紧进行自朝鲜江界和中江经由临江通往满洲内地的军用公路和铁路的铺设工程。

我们袭击通化和临江之间的一个大工地，转瞬间消灭了守卫工程的敌人，捣毁了建筑工程。

战斗结束后，承包工程的几个日本人请求见我。他们被押到我的面前，表示愿意多付出赎命钱，只求饶他们一命。

我对他们说：你们承包这个工程，明明是协助日本的侵略，但我们并不想害你们。你们说要交赎命钱，我们革命军可不要这种钱，土匪才要这种钱。我放你们回去，你们最好从这个工程撒手，要搞承包，就去承包别的工程吧。之后，把他们放走了。

我们攻打这个工地后，到处传开了金日成游击队出现在临江西部地区的消息。显然是那几个日本人回去后对我们做了广泛的宣传。

其后，我们又在八道江、外岔沟和里岔沟一带攻击了敌人，接着进行了抚松县西岗战斗，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这边来了。

我们灵活的战术转移，使敌人蒙头转向，找不到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行踪，被拖来拖去，弄得筋疲力尽。这证明我们旨在营救第一军于困境之中的战术转移和一系列的攻势取得了成功。事后，杨靖宇和魏拯民多次说过，我们在临江、抚松和濛江一带发出的枪声，在扭转第一军困难局面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北满的抗日联军部队也在西征过程中受到不小的损失。北满的几个军开始远征是在1937年7月，大举远征是在1938年。

然而，北满部队的远征也和南满部队一样遭到了失败。几年来进行冒险的战斗招致无谓的牺牲，给东北革命造成严重混乱的热河远征，于1938年和1939年在南满和北满相继告终。

那么，造成精力、人力和物力莫大损失的热河远征，遭到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许多历史研究者认为，日满统治秩序的加强和敌人力量居于优势地位这一客观条件，是热河远征来能成功的重要原因。我看这样的分析是对的。

这一时期，敌人进一步强化的集团部落政策，达到了他们“匪民分离”的罪恶目的，完全切断了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一阴谋强化了日满统治秩序，给抗日武装部队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因此，热河远征是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粮食补给几乎完全被切断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群众被关在集团部落里，无法同远征部队取得联系，提供物资支援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远征部队不得不靠袭击敌人来解决粮食和布匹等后勤物资。他们的枪声，随时把远征部队的行踪通报给了敌人。加上深深的堑壕、高耸的碉堡、森严的封锁线和兵营，步步都阻碍着远征部队的前进。

但是，只从客观上来找远征失败的原因，是不全面的。举世皆知，这次远征的主体是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从广义上讲，把热河远征作为路线强令执行的共产国际也是主体。依我个人的看

法，共产国际在路线的制定和指导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抗日联军则在实际执行中犯了盲从蛮干的错误。归根结底，共产国际的主观主义和冒险主义，就是导致热河远征失败的根本原因。

不为群众所接受，不能打动群众心弦的路线，是不能指望有好结果的。

我们在制定政策和路线时，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就是为了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只凭主观行事的人，终将变成“睁眼瞎子”。现在，有些人自命不凡，固执己见，把下级的意见不当一回事，这是很不对的。诸葛亮是著名的才子，但人民群众比他更有智慧、更英明。

路线和方略，其正确性只有为千百万人民群众所承认，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路线和方略是不起作用的。人民群众只有接受了正确的、科学的、光明磊落的路线，才能发动起来。尤其是不允许有丝毫偏差的军事战略战术，就更不用说了。

连敌人也认为热河远征是冒险的行动。

敌人写道：

“……他们轻率地认为事变以后的客观形势对他们的游击活动有利，采取冒险的行动，自前年(1938)秋至去年春，离开东边道……金川、柳河和临江一带，妄图与华北的热河挺进军会合。但是，由于日满军警迅速实施的讨伐，他们折回北上，企图以桦甸、濛江、敦化、蛟河、抚松和安图等县境即白头山山脚的白色地区为中心，建立赤区。”(《思想月报》第77期，司法省刑事局，昭和15年(1940)11月，第136—137页)

在共产国际下达的指令中，有些是不切合实际的。尽管如此，我们始终慎重对待，将其与我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加以执行，把国际利益和民族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了顾全大局，行动灵活。

革命越面临困难和复杂的形势，就越要坚持主体立场，自主地采取行动，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不但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这样，同周边大国的关系也是一样，始终把自主性和国际主义正确地结合起来。

我们至今之所以不走弯路，引导革命走过了笔直的胜利道路，就是这个缘故。

我今天仍然认为，当年我们对热河远征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是正确的。

1970年秋天，我到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那时，中国方面在北京设宴庆祝我们党成立纪念日。出席宴会的人中有曾经在共产国际和王明共过事的人。

我对中国的干部讲，过去，由于周边的压力，朝鲜革命经历了许多波折，其间，朝鲜共产主义者比谁都更多地体验到了其中的苦恼。在反“民生团”斗争中，数不尽的朝鲜革命者牺牲了。特别是30年代后半期，由于共产国际的某些人强令执行不切合实际的路线，使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建设，以及发展整个抗日革命斗争，受到了莫大损失。

周恩来说，这个责任在王明身上。他说，这么看来，王明不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莫大损失，对朝鲜革命的发展也起了不小的阻碍作用。

斯大林也曾承认，共产国际犯了许多主观主义的错误。

如果共产国际不强令热河远征，我们就不会离开西间岛，如果没有离开西间岛，那么在发生“惠山事件”时，就会及时采取措施，扭转局面，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那时，假如我们的主力部队驻在西间岛，敌人也就不敢破坏我们的革命组织。即使破坏，那些没有被捕的人也会进山入伍，免遭杀害。事实上，起初朴达也没有被捕，他进山找我们，就是因为没能及时接上头，才被捕了。

热河远征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今天我特意回顾这次远征，并不是为了分清是非。即使把是非分清了，也无处起诉。现在，没有共产国际，所谓指挥棒也不存在了。但是，共产主义者有必要从这次由于主观主义和盲从而受到损失的热河远征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历史对那些无视革命真理而犯主观主义的人，是不会给予赏赐的。

六　与杨靖宇会晤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从踏上抗日革命征途的第一天起，就始终重视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和两国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团结，并为同中国各阶层爱国力量结成反帝联合战线，做出了一切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他和中国的许多领导人、革命者以及军事干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东北地区著名的抗日联军指挥员杨靖宇，就是在共同的抗日年代里，和金日成同志生死与共的颇有声望的中国革命战士之一。金日成同志对杨靖宇的回忆，洋溢着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情厚谊。

杨靖宇同李红光和李东光一道，为建立并壮大南满游击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南满游击队发展成为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就是杨靖宇。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们对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斗争赋予了重大意义，为实现同抗日联军各部队的联合和协同作战，做出了真诚的努力。这是完全符合朝中人民共同斗争利益的。所以，我们先后两次进行了北满远征，同曹国安指挥的第一军第二师进行了协同作战，并扩大了同南满部队的联系。

南满各部队曾向我们要了好多人。按照他们的要求，我们给他们派去了许多精心培养的军政干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南满共产主义者的团结得到了加强，

也加深了同南满军政干部的同志友爱。杨靖宇通过各种渠道，对我们给予南满各部队的真诚帮助，表示感谢，我也经常托人向他问好。这样，我和杨靖宇在共同斗争中不断地加深了友谊。

1938年秋天，在南牌子举行朝鲜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军政干部会议时，我初次和杨靖宇见了面。南牌子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地方。

濛江县有一片原始林地带，人们管它叫牌子。

牌子的特点是树木茂盛，泥沼特别多。

抗日游击队员们管树林中的泥沼叫“晃荡裂盘”。这种泥沼地，杂草丛生，可不能漫不经心地踏进去。一踏进去，霎时就会把你吞掉。据说，这种泥沼深不可测。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塔右边的草甸子里，也有相似的泥沼。

牌子树林地带按方向不同分为东牌子、西牌子和南牌子。1937年冬天，我们进行军政学习的地方是东牌子附近。同杨靖宇等东北抗日联军干部一道召开重要会议，讨论清除热河远征后果问题的地方，是南牌子。南牌子这个地方地势险恶，到处都有眨眼间就把人和马吞噬掉的泥沼，部队隐秘地集结起来举行会议，是再好不过的地方。南牌子会议又名濛江会议，是因为南牌子在濛江县境内。

南牌子会议前后时期，我国革命正面临着非常困难而复杂的局面。

一是因为敌人发动了妄图扼杀我国革命的攻势，二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某些人采取了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

当时，日本侵略军一边把攻击矛头指向中国南方，一边为了保持其后方的安全，对东北抗日联军变本加厉地进行“讨伐”。敌人发动的反革命攻势，严重地扼制了我国的武装斗争和整个抗日革命的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招致的热河远征的后果也很严重。这一后果表明，共产国际的指令是不切实际的冒险。由于热河远征，抗日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既然事实是明摆着的，就必须分清是非，清除后果，这是大家公认的迫切问题。

要扭转革命面临的困难局面，就要及时制定对付敌人攻势的新战术，并采取措施清除左倾冒险主义招致的后果。为此，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抗日联军第一军各部队，决定在南牌子搞一次聚会。

那时，我急切地等待着杨靖宇的到来，因为他的部队在热河远征中遭受了最严重的损失，而且他来濛江的路途又非常艰难。杨靖宇也是相逢心切的。

我们先派了一批人去接杨靖宇的部队，还为他们充分准备了食宿条件和供他们换用的衣被。

这是困难时刻的相逢，我和杨靖宇都格外激动。

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人值千金，眼值八百。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

我们烤着篝火交谈。他烤暖了身子，突然谈起第一军里的朝鲜同志。他说，第一军里有许多朝鲜人，都是有名的战将。可是他们没能都来。他一再痛心地说，失去了许多好同志。

他为失去那些朝鲜同志那样难过，使我不得不反过来安慰他了。

共同的抗日斗争，把我和杨靖宇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30年代的前半期，在南满一带，大刀会军的后身辽宁救国义勇军总司令王凤阁和杨靖宇两个人，被称为抗战英雄。他们在东边道一带打了很多仗，也洒下了不少鲜血。

自从我们占据了西间岛一带以后，敌人就把我的名字同杨靖宇和王凤阁的名字并列起来。王凤阁和他的夫人被敌人杀害后，敌人的视线就集中到了我和杨靖宇身上。敌人称为金日成军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和杨靖宇的部队，成了在东南满地区实力压倒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两大武装力量。敌人的绝密文件以及报纸和杂志，常常把我的名字和杨靖宇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日本的一位杨靖宇研究者在谈到吉林时，这样写道：“青年金日成因进行反日活动被监禁过的市区”、“杨靖宇赴游击区时歇过脚的地方”。在另一篇文章中，在所附的抗日运动高涨的满洲地图下面，加了这样的说明：“杨靖宇和金日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南满地区”。

日本报刊在报道杨靖宇牺牲的消息时写道：杨靖宇作为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是仅次于金日成而在日本闻名遐迩的人物。

下面介绍当时的一分资料：

“金日成系坚贞的共产游击队队长，虽然是来满三十的青年……盘据临江、抚松、濛江和长白等所谓非讨伐地带，现在麾下似乎有五百名左右。现时，在东边道是最大的势力。”（《铁心》1937年5月号，第106页）

谈完了话，我就把杨靖宇一行领到宿营地去。第一军战友们看到井然有序的帐篷，都惊叹不已。他们不敢相信这是为他们搭好的帐篷。

当我把杨靖宇领到为第一军干部准备的指挥部帐篷时，他很激动地说，我早就听说金司令的部队好客，但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么个山沟里会受到这样的款待，特别是这个冬天是多么严峻的冬天啊。他这样说着，却不肯跨进去。我劝他快进帐篷，好解解几个月的疲劳，晚上再好好睡一觉。他说，那怎么行，还没有向贵部战友们打招呼，怎么能先想到休息哪。我听了心里想，确是一个不同一般的人。从前，也有许多友邻部队的客人来过，但像杨靖宇这样，还没有卸下行装就先要向我部人员打招呼的人，却是很少见的。

对杨靖宇，最先向我介绍的是童长荣。他好像是在大连做党务工作时听人讲过，抚顺煤矿工人都把杨靖宇当大哥对待，都很喜欢他。第二师师长曹国安率部驻在我部密营时，也极口称赞杨靖宇。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他到抚顺做党特别支部书记工作时，化名张贯一，扮做从山东逃荒来的人，到工人中去入了伙。要想在山东人居多的抚顺站住脚，扮做山东人是很有利的。

有一次，抚顺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日本老板。当初，工人们计划举行罢工时，找不到一个能够维护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的人，后来看到杨靖宇为人耿直，勇于仗义执言，就选他做了他们的领头人。杨靖宇按照自己的主张，大力推动了罢工运动。不

久，他被警察逮捕。被捕后，他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坚持自己的主张和要求，任何威胁和拷问都吓不倒他。后来，地下组织和工人群众终于把他从警察手中夺了回来。

我听了杨靖宇的要求，带他到了我们部队驻的密营。我们的密营和第一军战友们要驻的密营只隔一个山脊。我们部队全体指战员接到了我的通知，在密营前列队迎接了杨靖宇。

杨司令说：我们多次远征热河，各部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贵部毫无损失，保存了力量，这都是因为金司令有主见，领导有方；而我，却几乎失去了所有的部下。在远征热河的路上，他们一直吃不饱，穿不暖，睡不好，都在半路上倒下去了。一想到他们，我就禁不住流泪。今天要是我能把他们都带到这里来该多好。说着，便掉下了眼泪。

我望着他为牺牲的战士流泪，十分感动。他确实是一个爱兵如子的人。

我备一席便宴为杨靖宇洗尘。所谓便宴，不过是几样干菜和几杯水酒而已。他把手枪和挎包解下来放在一边，说他好久没有松过皮带了。同杨靖宇一道来的徐哲，悄悄地对我耳语说："这是破例的。杨司令任何时候都军容严整，注意保持军人的威严，今天却完全打破了常规。"虽然是初次见面，杨靖宇却侃侃而谈，讲了许多话。

我听到他曾经在工业学校学过纺织印染，不禁十分惊讶。如今的抗联司令当年却学纺织印染，这多有意思啊！他说他学纺织印染，是为了给世世代代穿不暖、过着苦日子的中国同胞做漂亮

衣服穿。我认为这是阶级意识的表现。

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闹革命的决心，正是从这种阶级意识出发的。

杨靖宇早在十几岁的学生时代，就对学校当局不公正的措施提出过抗议。只从这一事实，就能说明他是一位刚正不阿、正气凛然的人。

杨靖宇不是东北人，是河南人，他是受党的委派才来到东北，做地下党的工作和进行武装斗争的。起初，他在抚顺做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工作，继而又到哈尔滨做地下党的工作。

满洲事变爆发，在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部队陆续诞生的1932年秋天，中共满洲党组织派他到南满巡视。他被派到南满，是与南满游击队的构成特点有关的。

在南满的居民中，中国人占大多数，而在盘石成立的南满游击队，最初全部是由朝鲜人组成的。南满游击队的组织者李红光和李东光是朝鲜人，队员也都是朝鲜人。这就使南满游击队一开始就碰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游击队是在汉族和满族占大多数的地区纯粹由朝鲜人组建的，所以很难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保护，也难以扩充人员。

在被派到南满游击队的人当中，有曾在哈尔滨做共青组织工作时跟我们有联系的徐哲。他是受命装作中国人被派到南满游击队当军医官的。党组织要求他完全装成中国人，这事只告诉李红光和李东光，对其他人要绝对保密。

徐哲出生在刀耕火种的穷人家里，是靠工读念完了哈尔滨医

专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从小就跟中国人一起生活，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知中国人的风俗习惯。

徐哲参加革命，有不少有趣的故事。

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到野外放牛，回家的路上却无缘无故地挨了警察一顿毒打。那几个警察见他骑着牛回家，就平白无故地把他拉下来，拳打脚踢，破口大骂：这小子太放肆，见了警察大人，还不下来行礼！

徐哲如今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局委员，可那时候他一筹莫展，只有挨打的份儿。他伤口淤血，吃了几个月的冤枉苦。从此，他恨死了警察，恨那些同警察一个鼻孔出气的地主和官僚。

徐哲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适合装成中国人，是帮助南满游击队摆脱困境的合适人选。他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出色地扮演了中国人军医的角色。他在提高盘石游击队的声望和改善军民关系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杨靖宇来到南牌子时，他的部队已经所剩无几。他说，一想起在热河远征中受到的损失，就心痛欲裂。

杨靖宇的部队不但在远征中遭受了惨重损失，而且在从集安向濛江转移的路上，也经历了千辛万苦。敌人甚至出动飞机和大炮等重武器，不停地追击他们，不让他们有一刻喘息的机会。有时，整个部队被包围，只有孤军苦战。天上是飞机轰炸扫射，前面是程斌喊话劝降，四面八方的敌人都在猛烈地炮击，不断地压缩包围圈，真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杨靖宇说，第一军里的朝鲜人指战员特别英勇善战，他一再赞扬在最激烈的外岔沟战斗中

英勇奋战的朴先锋团和朴成哲的连队。他说，在外岔沟战斗时，他甚至下过殉国的决心。

在外岔沟突围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朴成哲的连队。朴成哲连队的敢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打开了突破口。朴成哲解救了杨靖宇的部队，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杨靖宇说，要是没有朝鲜人，他的部队就难以突破重围，就难免全军覆没。要是中朝两国共产主义者没有组成抗日联军，而是各自行动，他也就不会来南牌子见我了。他对我们把培养的大批朝鲜人干部派到他的部队去，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我记得，我们在南牌子开了十几天的会。

南牌子会议对热河远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实质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真研究了清除其后果的措施。

会议还就朝鲜人民革命军针对敌人的大规模攻势，挺进以白头山为中心的国境一带积极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问题，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祖国光复会组织，更加积极地开展群众政治工作的问题和在革命斗争中坚持自主立场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

会议把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各部编为方面军，任命了各部的指挥员，划分了各部队的活动区域。

历史学者要正确地阐述南牌子会议的政治军事意义，这很重要。可以说，南牌子会议和南湖头会议，在加强朝鲜革命和中国东北革命的主体性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所谓革命的主体性是什么呢？它意味着以独立的判断和决心，根据本国的特点和实际自主地进行革命。

以南牌子会议为转机，朝鲜革命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人民革命军全体指战员从这个会议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们的队员能够经得住“艰难的行军”这样的考验，并不是单靠意志和毅力的。他们从南牌子会议的精神中，获得了巨大力量。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个力量始终推动着我和我的战友们不停地前进再前进。

1939年春天，我们在北大顶子会议上重新确认了南牌子会议的方针，决定向国内挺进。如果南牌子会议没有提出重要的路线问题，我们是不可能在敌人重重包围的险恶形势下，冲破长白的冰天雪地，挺进到祖国并发出了枪声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茂山地区发出的枪声，就是南牌子会议和北大顶子会议结出的硕果。

在南牌子，我们用我们的队员给杨靖宇和魏拯民组编了新的警卫团，补充了许多人员，任命了指挥员，还给杨靖宇配备了一个传令兵。

通过警卫团的改编，朝中两国共产主义者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了。

南牌子会议结束后，各部队向所分担的作战地区开拔了。与杨靖宇的离别，跟相逢时一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他以两国革命者的名义约定：一定要转祸为福，成为胜者时再会。

可惜，此后我没能再见到杨靖宇。

同我们分手以后，杨靖宇在桦甸、敦化、濛江、辉南、抚松和金川等地积极开展军事活动。由于敌人打着“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招牌进行了“大讨伐”，他的部队遇到了重重困难。

最困难的是过冬准备。要做过冬准备，就要打几仗。杨靖宇

打算以分散活动来对付“大讨伐”。他的这一抉择，当然不能说是违背游击战原则的。然而，军事情况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即使是符合原理的战术，也要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不然就反而会坏事。

以小部队分散活动，能比较容易躲避敌人。杨靖宇也许考虑到了这一点，打算灵活地采取“以整化零”和“聚零为整”相配合的战术打败敌人，扭转部队面临的困难局面。然而，看样子在需要根据新的情况把分散的小部队重新集结成大部队的时候，没能这样做。

如果在被大敌包围的情况下只进行分散活动，那么，当敌人用大部队进攻时就不容易打败敌人；如果不能打败敌人，就势必遭到追击。这样，就会完全陷于被动。在进行分散活动的过程中，碰到敌人大部队不得不进行遭遇战时，不利的当然是分散活动的一方。敌人了解到杨靖宇的部队在分散活动，便投入比从前更多的兵力，疯狂地进行包抄和围歼。加上杨靖宇没有进行流动作战，而是扎营过冬，自然就遭到了敌人的集中“讨伐”。

在杨靖宇手下曾当过师长的叛徒程斌，居然当了这次“讨伐”队的急先锋，这是令人吃惊的。投敌后任通化省警察队队长的程斌，于1940年1月与杨靖宇的主力遭遇，在濛江县西岗激战了六个小时，2月被又同另一支警察队联合，再次与杨靖宇的主力交战。

1940年2月，杨靖宇在濛江县一处树林里同敌人“讨伐队”作战时，不幸壮烈牺牲。在同敌人进行最后决战时，他身边只有

几个警卫队员。敌人包围了他们，连续喊话劝降。杨靖宇两手各握一支手枪，不断地向敌人射击，直打到最后一口气。

护卫杨靖宇到最后一刻的，是我们在南牌子派给他的传令兵李东华。他和杨靖宇一同阵亡。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杨司令阵亡的噩耗，大概是大马鹿沟战斗刚结束的时候。我是在缴获的报纸上，看到他阵亡的消息的。

我和杨司令，民族不同，出身也不同，但我想起同他相逢时的种种情景，仍然久久地暗自流泪，好几天吃不下饭。

敌人砍下杨司令的头，拍成照片，用飞机撒向满洲各地。他们还剖开了杨司令的肚子。大概是想看看他肚子里有些什么，想了解他在完全断粮的山上，到底是什么使他发挥出了那样超人的斗志。杨靖宇的胃里，连一粒米都没有，只有干草叶子、草根和树皮。

我和杨靖宇在南牌子畅叙友情的时候，我失去了最亲爱的金周贤、金泽环和金永国三个指挥员，因此，那里是我十分难忘的地方。

解放后，中国政府把杨靖宇阵亡的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中国人民为纪念杨靖宇烈士，在通化市修建了靖宇陵园。在举行落成仪式时，我送去了花圈。

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在阐述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地位的文章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余年的历史中，最为艰苦的时期有三：第一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是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

十四年苦斗。

在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抗战的旗帜上，凝聚着中国人民的热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靖宇的鲜血。我国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杨靖宇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七　祖母李宝益

李宝益女士的一生，在哺育了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万景台一家的革命斗争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她让许多子孙都参加了革命斗争以后，和金辅铉先生一道饱经风霜，顶住了不断侵袭革命之家柴门的狂风暴雨，在满洲的林海雪原上也留下了她苦难的足迹。

她一辈子为参加革命的子孙做后盾，默默无闻地辞别了人世。金日成同志在悲痛地缅怀祖母时，作了如下的追述。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变本加厉地策划阴谋，妄图使我们“归顺”。他们动员我学生时代的同窗、教师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5]时期的同事、被捕转向的人与亲友，搞诱降勾当。最后，还把我年迈的祖母强押到白头山一带，使她受尽了折磨。把亲人当作诱饵进行“诱降工作”，是他们抛出的最后一招。

我国自古就以“东方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朝鲜民族很有礼貌，富于人情，崇尚忠孝。对此，曾访问过我国的西方人士也一致肯定。旧韩国末期，有一批沙俄学者来我国考察。他们回国后，在呈递沙皇的考察报告中强调指出，朝鲜在礼仪道德上首屈一指。

敌人逼迫我的祖母参加“诱降工作”，恶毒地妄图利用孙子

对祖父和祖母的孝心，迫使我转向。帝国主义侵略者狼心狗肺，是不讲人情的。为了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他们肆无忌惮地利用了朝鲜民族美好的风俗和传统的伦理道德。19世纪后半期，洋人为了迫使大院君[6]开放我国的门户，竟盗掘大院君父亲南延君的坟墓，也是这种卑鄙的行径。

接到祖母被软禁在长白县佳在水的通报时，我正率领部队在濛江一带活动。

敌人几乎每天都带着我的祖母翻山越岭，逼她喊这样的话：“成柱，我是你的奶奶。你可怜我，快出山呀！”

在佳在水人们送来的纸条上，附有敌人在长白各村张贴的布告内容，大致是这样的：金日成的祖母已来到佳在水。金日成务必尽速出山相见，事不宜迟。

每当走到可能有游击队密营的原始林时，敌人就逼迫我的祖母喊我。然而，她根本不听他们的话。这样一来，他们就露出凶相了。他们像对待刑事犯那样，用枪口捅她脊背，威胁她。这一招不灵，他们又软硬兼施，但都毫无效果。他们看错人了。他们以为一个乡下老太婆，只要跺跺脚瞪瞪眼，威吓一下，她就会乖乖地就范。真是痴心妄想。

佳在水的地下组织看到我祖母受罪，就建议派一支部队搭救她；要是派不出部队，他们也打算动员工作员营救她，要我拿主意。

接到这个汇报，我气得直打哆嗦，简直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叫一个六十高龄的老人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里受苦，这是

人干的事吗？我真想马上出动部队，消灭敌人，救出祖母。但我还是压住了心中的怒火，忍了下来。那时由于发生了“惠山事件”，西间岛和国内的革命组织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数百名革命者还在铁牢里洒着鲜血。置这种事态于不顾，先去救出自己的祖母，我还怎么去领导革命？

打一仗是可以救出祖母的，但也有落入敌人圈套的危险。

金平建议用他带的小分队去救出我祖母，我没有同意，说服他快回去采取措施，营救朴达和其他朝鲜民族解放同盟的成员。他无可奈何，掉着眼泪回去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他离去以后，我也哭了。克制自己不去搭救近在咫尺的祖母，真是谈何容易。过去，为了救出一两名爱国者，甚至只为缴获几麻袋米或者几支枪，常常毫不犹豫地去打一仗。而现在，明知道祖母在不远的地方备受侮辱，却不能去搭救，我心里有多么痛苦啊！搭救祖母心切，又不能不抑制这种感情，这就是我作为司令官忍受的、别人所不能体会的苦衷。一个人克制个人的情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从小就受到祖母的宠爱。自从接到佳在水地下组织的通报后，我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痛苦，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在我的幼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祖母占有不亚于母亲的地位。我在万景台度过童年时代时，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是这样一个情景：卖麦芽糖的挎着装满麦芽糖的木箱，走街串巷地叫卖：“买麦芽糖，买麦芽糖！”有时用麦芽糖换破烂和破胶鞋的推着手推

车，来到我们村里。当他们喀嚓喀嚓地摆弄着又宽又大的剪子叫卖时，全村的小孩子都跑出门来把他们团团围住。每当这时，我也馋得直咽唾沫。可是，我家里哪有钱呢？既没有破烂，也没有破胶鞋掌。当时，村里能穿上胶鞋的人家没有多少。我家老少也都穿草鞋，穿胶鞋连想都不敢想。

每当村里的孩子们围住装有麦芽糖的木箱或手推车闹闹嚷嚷时，我总是留在院子里装做喂鸡，或者在酱缸旁装着看爬来爬去的蚂蚁玩。爷爷和奶奶都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有一次，奶奶匀出家里只有那么点儿的大米，出去换回几条麦芽糖来塞在我的手里。那时，小小的心里是多么感激啊。在用楂子粥勉强糊口的日子里，为换几条麦芽糖匀出了大米，该多么不易。那个凝聚着祖母爱意的盛米的葫芦瓢和几条麦芽糖，至今仍历历在目。

小时候，母亲、祖母和姑母亨实常常背我。不知是为什么，在祖母和姑母背上的印象比在母亲背上的更清晰。祖母去娘家时常背着我去。男孩子到六七岁时就开始懂事，大都知道害臊，不愿再让人背。可祖母每当来到烽火里时，总是要看孙子长多大了，把背转向我，根本不管我害臊不害臊。每当在祖母的背上，我就能从她的头发和小袄上，闻到跟草香差不多的清香，我喜欢这种香味。那是只有从一辈子劳动的祖母身上才能闻到的特异的香味儿。我们住在万景台时，祖母几乎把她的爱都倾注在我的身上。小时候，我多半都在祖母身边。她那胖乎乎的胳膊，是我小时的枕头。不知为什么，一枕她的胳膊我就睡得好。每当抱着我睡时，她总给我讲神奇的故事，努力培养我具有美丽的幻想的翅

膀。有时，她还把吃饭时留下来的锅巴或是枣儿，悄悄地塞进我的嘴里，吃起来特别香甜。

父亲去世后，祖母更加疼我。她唯一的乐趣好像就是看到家里长孙的成长。她还能有什么乐趣呢？一没有锦衣玉食的福气，二没能过上游山玩水、养尊处优的好日子。她朴素而殷切的愿望就是朝鲜的独立。她盼望获得独立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为投身于争取祖国独立斗争的子孙诚心诚意地做后盾，并以此为乐。

祖母的爱意，还常常表现在对我的期望和信任上。1926年，也就是我父亲去世的那年夏天，她到了抚松阳地村，在我父亲的墓前悲伤地痛哭后，对我说：

“孙儿，你爹肩负的重担，落在了你的肩上。你一定要继承爹的遗业，光复祖国。我和你娘并不希望你对我们尽孝，你要一心扑在实现朝鲜独立的大业上。”

祖母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如果那时祖母不是让我投身于争取朝鲜独立的斗争，而是叫我将来当富翁或者做官，我是不会那么激动的。她很有志气，对这些她是不放在眼里的。我从她的教诲中获得了极大的力量。

祖母把争取祖国独立这样的大事托付给我，是对我的极大信任。

祖母没有很快返回万景台，她在抚松待了一个时期。我们迁居安图时，她也跟到那里去，安慰我的母亲和叔母。

要说我祖母的特点，一句话，祖母是个性格刚毅的老人。在她那一辈女子中，她是个罕见的强者。她爱憎分明，对受苦受难

的善良人是那样和霭可亲，而对人类的渣滓则凛若冰霜，痛心疾首。她气冲霄汉，不畏强暴。

祖母要是一个谨小慎微、懦弱怕死的老人，接到佳在水地下组织的通报时，我是难以抑制内心震动的。但我相信祖母会理解我的心情，她无愧为革命者的祖母，会经得住作为人质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和考验。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时我相信她是完全正确的。

华成义塾[7]的同学朴且石曾来南牌子密营找过我。那时我们正和杨靖宇等第一军、第二军的干部一起开重要会议。他来找我是为了让我“归顺”。继他之后，李钟洛又来找我。那时，朴且石坦白自己的罪行说，他曾押着我的祖母踏遍了西间岛。据他讲，我的祖母正像我相信的那样，在敌人的威胁下，宁死不屈。

把我的祖母绑架折磨的，是“诱降工作班”的特务。李钟洛和朴且石就是这个工作班的成员。日本特务机构的策划者要求他们胁迫我的祖母做“诱降工作”。李钟洛和朴且石到了万景台，对我的祖父和祖母说：你们想看看孙子吧？要看孙子，好说。你们的孙子干的是徒劳无益的事，反而害了自己。要想救他，就得听我们的话。

祖母呵叱道：人只能死一次，报上报道我孙子已经死了，你们又说他还活着，你们这是什么鬼话？我不愿听这种弥天大谎。

李钟洛十分狼狈，说：那个报道是捏造的，成柱没死，还活着；他在险恶的山里进行毫无希望的独立运动，是徒劳的；如今整个东亚都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他还蒙在鼓里。他们在白头山

里，由于断了食盐，净吃些生米和松针，浑身都长毛了，脚丫子磨得光秃秃的，不像个人样。可成柱会缩地术，神出鬼没地打游击，没法叫他出山。日本政府说，只要成柱投降，关东军大将也好，朝鲜军司令官也好，要什么官给什么官；家里人也能住宫殿般的房子，享尽荣华富贵；关键是要让他尽快转向。这事，最好还是老大娘出面。他把几百元钞票放到我祖母的跟前说，这是日本人送的初礼，先用这笔钱买些生活需要的紧要东西，雇一名老妈子。

我祖父勃然大怒，把那打钞票往院子里一扔，厉声呵斥道："你们这些天地不容的败类，叫我们拿钱去换孙子的命吗？卑鄙无耻，马上给我滚!"

祖母也大声斥责道："别说让我们成柱当日本军大将，就是当他们的老祖宗，我也不劝他出山。我儿子亨稷和亨权都死在你们手里，我的心都要气炸了。还不快给我滚出去！"

李钟洛和朴且石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敌人知道甜言蜜语和金钱都引诱不了我家里的人，就用刀枪强制把我的祖母押往满洲。她大义凛然，心里有谱：好，你们强拉着我走，那就走吧。你们以为来硬的，我就听你们的话啦？趁这个机会，我正好把孙子打日本鬼子的白头山和满洲山河看个够！谁赢谁输，咱们等着瞧！

特务们带着我祖母到西间岛的山区，转了将近一年。年逾六旬的老人遭了多大的罪，可想而知了。

有一次，朴且石看到我祖母的脚起了泡，说：让您受委屈

了，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其实，我们也不乐意做这种事，感到很痛苦，何况您呢？朴且石虽然投敌了，似乎还有点同情心。

祖母说：虽然吃力，但看到我孙子转战的地方，反倒浑身是劲了。

每当敌人用枪口捅着她的脊背，逼她喊我的名字时，她就警告敌人说："我不是疯子，我才不喊他呢。你们以为杀了我，你们就没事了吗？不怕吃我孙子的枪子儿，你们就随便好了！"

实际上，特务们不是不知道他们所干的勾当是毫无效果的。他们胆战心惊，害怕随时可能遭到游击队的袭击。他们明白，把革命军司令官的祖母绑来到处劝降，会遭到什么样的报复。他们怕被游击队打死，就向我祖母央求道：我们在离你远一点的地方保护你，你带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去寻找孙子。

我祖母知道敌人怕死，就吓唬他们说：何必带着可怜的孩子去呢？我一定要跟你们这一帮脑满肠肥的家伙一起去。你们要是怕革命军才出这样的主意，那我只好对你们的上司照实说了。这样一来，那帮特务反而被我祖母牵着鼻子走，对她唯命是从了。

祖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时向他们发号施令。天气冷，她就说不能出去，累了就说要休息。要是澡塘的水不热不宜洗澡，或是发现有日本人先用过的痕迹，她就斥责敌人：我是金将军的祖母，你们敢这样怠慢？开饭时，特务端来日本饭或是中餐，她就不吃，叫他们端朝鲜饭食来。每当这种时候，他们为了迎合她的心意，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

大年初一，管辖"诱降工作班"的日本督察官把李钟洛和朴

且石叫到跟前，说：“我很想见到金将军祖母来拜年。你们去叫她过来给我拜年。”李钟洛和朴且石向我祖母转达了日本人的话。她听了冷冷一笑，大声呵叱道：“岂有此理！不懂规矩的坏种！回去叫那个小子过来，向金将军的祖母拜年！”日本督察官听了大吃一惊，吓得手中的酒杯掉在了地上。这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一不顺心，就拔出军刀为非作歹，直至对方降服。可这天他顿失气焰，不敢行凶，反而感叹道：“金日成的祖母果然不同一般。人们都说金日成是白头山的老虎，那他的奶奶无疑也是老虎：”

后来，朴且石坦率地说，我祖母始终坚强不屈，气宇轩昂，使他这个可耻的叛徒时刻都感到内疚。

“诱降工作班”的特务们徒劳无功，只好让我的祖母回到万景台。

我从朴且石那里听到他目睹和经历的“诱降工作”情况后，更加尊敬祖父和祖母了，心里对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朴且石在离开密营时向我发誓：虽然在日本鬼子的强迫下转向了，但他决不再做对不起祖国、民族和在山里受苦的我的亏心事。我托他背着敌人把几根山参和一封信捎给我的祖父和祖母。解放后，我回到祖国问祖父和祖母，我在山里送的山参和信收到了没有。他们说，信是收到了，山参没有收到。大概是被那个派朴且石到我们军营的日本督察官给截走了。

金日成同志的祖父和祖母把金日成同志叫朴且石捎给他们的那封信，一直

保存到金日成同志光复祖国后凯旋回国。这封信被登在1946年5月29日的《正路》上，公之于世。《正路》是《劳动新闻》的前身。

对革命的叛徒没有给予处罚，反而托他捎密函，这是空前绝后的轶事。通过这一事实，我们足以看到金日成同志的宽宏大量。朴且石若是还有一点良心，在这种宽容面前，是会暗自流泪的。他没有把那封信交给上司，原封不动地捎去了，也算是守了约。

这封言简意赅的书信，凝聚着以光复祖国为己任，并对这一伟大事业充满信心和乐观精神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将军的气魄。它能够公之于世，传给后代，是个幸事。

书信全文如下：

“祖母的殷切心意我已详悉。男儿既已献身社稷，此身当属国家和民族。我荣归祖母身边之日，不久必有之。务请放心。”

住在万景台的金日成同志的一家收到这封信，上上下下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后来，李宝益女士又被林水山所属的另一个“诱降工作班”押到北间岛，再次备受折磨。

祖国解放战争后，李宝益女士去世。家属和亲友在向遗体告别时，金日成同志曾回忆了这样一段历史。当时，金日成同志神色很沉痛。

……我听到祖母再次被押到满洲受罪的消息，是在安图县车厂子附近的时候。这次押我祖母的“诱降工作班”特务，多半是日本人。这个工作班里有曾当过我军主力部队参谋长的林水山。

他投敌时向日本上司发誓，一定要想方设法诱捕我。

起初，这个工作班曾计划绑架我的亨禄叔叔。大概是因为他们知道，再把我的祖母绑去也是枉费心机，毫无收获。

在祖父和祖母膝下，只剩下亨禄叔叔这一个儿子了。当敌人到万景台要强制拉走他时，祖父用拳头捶着炕头提出了抗议；祖母也厉声呵叱道：不行，我家只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你们要把他绑走去抓我的长孙，是人能干出这种勾当吗？天诛地灭，真是作孽！我叔叔也说，宁愿被杀头，也不去干抓侄子的勾当。结果，在敌人的强迫下，祖母就又被押到满洲去了。而她却满不在乎，心里想：尽管你们肆虐，不能拿金将军的祖母怎么样。她甚至决计替亨禄叔叔牺牲。她又被押到北间岛山区受了好几个月的折磨，这次依然毫不动摇，坚持了气节。每当林水山骂她不听他们的话时，她就说：你背叛了我的孙子，你这个可耻的叛徒！我活着要站在孙子一边，死了也要站在孙子的一边，永远做朝鲜人。等着瞧吧，看你这个狗命还能活多久。

当时，我听到祖母再次被绑架押来的消息，曾组织了多次战斗。这是让她知道我仍在坚持斗争的最好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向她致以用语言难以表达的感慨万端的问候。

每当听到我军的捷报时，她也不怕有人在旁边听，就高声欢呼道："我的孙子真英雄！愿你早日把日本鬼子消灭干净，叫他们在我们朝鲜绝种吧!"

这回敌人也只好放她回万景台了。此后，他们不再干这种勾当了。

这意味着我的祖母赤手空拳地打败了敌人。

然而，敌人对我们万景台一家的歧视和迫害却变本加厉了。由于家庭里爱国者多，我又是革命军的司令官，几十年来家里人吃的苦头是难以言状的。日寇殖民统治末期，亨禄叔叔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到南浦打鱼为生。

在我家里吃苦头最多的还是祖母。解放后，我首次回到万景台旧居那天，对祖母说："奶奶，你为我吃了不少苦啊。"她却满面春风地说："我吃的苦，哪里比得上你受的苦，你为光复祖国而战，受了多大的苦。……论苦头，日本鬼子比我吃得多，他们为了侍候我，才吃了不少苦头呢。我吃的算什么苦啊。我托你的福，游览了好多地方。那是享福，哪里是受苦。"

我对祖母说：阔别二十年后回来，我空着两手来见祖父和祖母，心里实在过意不去。祖母反而开导我说："怎么说是空手啊？你带来了独立，这是多大的礼物啊！你安然无恙，又带来了解放，我就再也没有别的祈求了。还有比你更大、比解放更大的吗？世上还有什么能与这些相比呢！"

出自一个年近古稀的乡下老人之口的这席话，有多么豪迈！我听了，心里很佩服：祖母真了不起！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达到顶点的那个时期，我的祖母不为敌人的利诱和威胁所屈服，坚守了革命者的母亲和祖母的尊严和气节，可以说这是个巨大的胜利。在我国，像我祖母这样的爱国妇女，不是有很多吗？

我常常琢磨：我的祖母不是共产主义者，更不是职业革命

者，又没读过书，没有受过组织的革命教育。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太太，她怎么能如此堂堂正正地面对凶恶的敌人，遇事如此机智勇敢，理直气壮？依我想，是我家的家风和革命把她造就成了女杰。我家的家风是什么呢？世上最宝贵的是祖国和人民，我们把为之奋斗捐躯视为己任。一句话，爱祖国、爱人民、爱民族，这就是我家的家风。她受了子孙的很大影响。儿子和孙子都是革命者，她自然会受到影响。

革命者的父母总是要参加革命的，即使不直接参加，也会成为同情者和帮助者。人们都说，有出色的父母，子女在其熏陶下总会成为得力的人才。这话是对的。同样，有了有出息的子女，其父母也总是会受到影响，而与子女采取一致的步调。正因为这样，我常常强调在实现家庭革命化方面，新一代的作用非常重要。

当然，并不因为先辈是革命者，其后辈也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者。

一个人要成为革命者，父母的熏陶固然重要，但更要有本人的主观努力。想托祖先的福，是不行的，就是在梦里也不应该这样想。我希望我家的新一代继承为实现祖国独立而战斗牺牲的先辈的遗志，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站到前面，献身奋斗。我的祖母专心种地直至逝世，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的。

我的祖母之所以敢于面对敌人进行斗争，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力量强大。敌人对我们进行“诱降工作”时，朝鲜人

民革命军正处在全盛时期。革命军的威力和声势，给她带来了力量和勇气。假若我们建立革命武装力量之后，没能在抗战中连战连捷，或者没能把广大群众团结到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而只是维持现状，蹲在山里不动，那么，她是不可能如此大义凛然地压倒敌人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道理也是一样。只有年轻一代努力多做工作，具有雄厚的实力，祖国才能繁荣富强，人民才能保持尊严和自豪感。尊严并不是自然而然地从天而降的。只有党伟大，领袖伟大，国家富强，才会有尊严，才能怀有自豪感。年轻一代要成为当之无愧的主力，拥护党和领袖，奋发图强，建设富强的祖国。

1946年6月9日，万景台村民、抗日游击队队员、平壤市党委和行政机关联合设宴，庆祝李宝益女士七十寿辰。宴会是在万景台小学举行的。驻在平壤的苏军少将罗马年科也应邀参加了宴会，并继抗日革命战士和来宾之后致了贺词。

这天，金日成同志也来到了万景台，但他根本不知道社会各界庆祝他祖母七十寿辰。看到各界代表致真挚的贺词，他就作为长孙代表家属致了答词。

他的答词简单扼要地概述了祖母的平生经历。答词大意如下：

我的祖母是个目不识丁的乡下老太太。然而，当儿子、侄子和孙子们陆续走上革命道路时，她没有阻拦，反而给予鼓励；当他们为进行革命活动，离开她的膝下，有的被敌人杀害，有的被关进牢狱，有的下落不明时，她毫不悲观。最后，她两次被押到

满洲，备受折磨，但她仍不改初衷。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祖母虽然不识字，但她满怀信心地坚持了斗争。她展望未来，抱定了希望。如今，她的希望终于得到了实现。去年8月15日朝鲜解放了，这就是她所希望的。

我的祖母为了看到这一天才活到了今天，她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因此，我希望像今天这样的宴会不仅今天，而且将来也能够多次举行，祝愿祖母健康长寿。

李宝益女士于1959年10月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除了光复后的十四年，将近七十年的漫长时间，是她同贫困搏斗、同不义搏斗和同侵略者斗争的苦难重重的岁月。在枪刺逼迫下的两次满洲之行，是她经历的最严酷的考验。令人高兴的是，她以大无畏的精神赤手空拳地战胜了数十年的黑暗时代，迎接了孙子带来的祖国光复，看到了在朝鲜建起的社会主义乐园。

熬过了吃人的黑暗年代的李宝益女士，能够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回味一下对她八十余年坎坷生涯最熟悉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追忆吧。

我的祖母长寿的秘诀之一是劳动。祖母和祖父一道一辈子劳动。她为养活子孙而不间断地操劳，这锻炼了她的体魄和意志。凡是勤勤恳恳地劳作，不断地造福于民的人，大都是长寿的。

在我祖母的心灵深处，始终珍藏着美好的梦。换句话说，她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每天都过得有意义。她的一生似乎岁月蹉跎，其实不是这样，她迈出的每一步都有目标，有意义。

我已讲过，她总是盼望着什么。解放前，她盼望祖国独立的

日子早日到来；解放后，她盼望我早日归家相逢；见到我之后，她又盼望万民过好日子的那一天早日到来，盼望祖国统一的日子早日到来。凡是平生在希望中生活的人，大多长寿。这种人是不怕任何考验的。

根据我的体会，革命是由爱抱美好的幻想和抱有远大理想的人搞的。只有抱有美好幻想和远大理想，才能有伟大的发现和发明。我的祖母正是怀有美好幻想的人。她之所以能够长寿，正是因为她有美好的幻想。这样说并不言过其实。思想明确，意志坚强，幻想美好，勤勤恳恳，这就是我祖母能够长寿的秘诀。

我的祖母虽然是一国元首的祖母，但她一生朴素，清廉。我回国后，打算建党和建国工作告一段落，就让祖父和祖母到平壤和我一起住。然而，他们不同意。说老实话，像他们这样的年纪，受孙子的赡养，安度晚年，是不会有人非议的。何况，我国还有优待革命烈属的规定，他们就是只受到这种优待，也是可以安度晚年的。但他们不愿意享受这种优待，也不愿意托孙子的福，过享乐生活。他们仍要做普普通通的百姓，晚年也一直种庄稼，直到去世。

“没有活儿干的人，才是最可怜的人。”这是我祖母朴素的人生哲学。

我很想让受了一辈子劳累的祖父和祖母休息休息，有时请他们到我家住些天。每当这时候，他们总是闲不住，要活儿干。有一次，我实在没办法，找了一个破葫芦瓢给祖母，让她补一补。她每次都待不到一个星期，就回万景台老家去。她说孙媳妇做的

饭很好吃，抱着曾孙子曾孙女玩也别有乐趣，可是没有活儿干闷得慌，脚踩不到泥土，心里火烧火燎的。

有时，我们要给他们购置点什么，祖母总是不同意。她说：不要为我这个奶奶操心，要多为老百姓操心。首相也是人，怎能不想让自己祖母过好日子呢？何况她还是被押到凶险之地受尽了种种折磨，九死一生返回来的祖母呢。

我很想给一辈子穿单袄的祖母做一身厚厚的棉衣穿；每逢她的生辰，就带着两瓶烧酒去拜寿。然而，她连这种微不足道的情都不领。

老实说，如果我不是首相，而是普通公民，就能为祖母多做点事了。我会自己砍些原木给她盖瓦房，陪她到剧院观看《沈清传》[8]，让她安度晚年。

然而，我一直忙于国事，没能给祖母做一身棉衣，让她仍旧住在曾祖父留下的简陋草房里。我给全国各地农村都盖了瓦房，使之旧貌换新颜，却没能给祖母盖一幢新房子。我记不得为祖母做了些什么事，只记得给她买了一副花镜，只有这次她没有拒绝。

我为国事东奔西走，忙来忙去，不觉岁月流逝，祖母也走了。让她这样走，我后悔的事情不止一两样。我对母亲没能尽孝。同样，对祖母也没能尽孝。

要是在祖母生前给她做一身棉衣穿了，我也许就不会这样难过了。

八　在南牌子树林里

在抗日武装斗争处于高潮的30年代后期，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强化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事攻势，一面进行毒辣的阴谋活动，妄图用怀柔政策取得他们用枪炮无法得到的东西。敌人认为只要把革命的叛徒派到游击队去搞好“诱降工作”，就能从内部瓦解革命军。敌人驱使革命的蜕化分子和叛徒充当“诱降工作”的急先锋。其中就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老同学和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相识。

金日成同志在谈到南牌子会议的时候，回忆过华成义塾时的同学、“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的同志李钟洛和朴且石按照敌人的指令，到密营来进行“诱降工作”的往事。

作为一次闲聊，谈谈在南牌子开会时见过李钟洛和朴且石的事吧。朴且石和李钟洛是和我一起念过华成义塾，一起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建设同志社[9]，建立朝鲜革命军时也共过事的人。一起干了几年革命，自然结成兄弟般的亲密关系。他们两人跟我一起干革命约有四五年的时间。

朴且石和李钟洛比金赫和车光秀等吉林一伙人先一步与我结缘。我们在桦甸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金赫和车光秀还没有参加，而朴且石和李钟洛那时是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从这种关系来看，朴且石和李钟洛可以说是我开始从事革命斗争的时候，最先结交的同志，也可以说是第一批同行人。

曾一起搞过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的人，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各奔东西，有的进山搞武装斗争，有的被捕坐牢，相互不知死活，过了好几年后重逢，那自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很遗憾，我们的重逢却不是愉快的。因为李钟洛和朴且石是为了执行日本特务机关交给的“诱降工作”任务来密营的。他们不是作为革命同志，而是作为受日本人操纵的木偶前来劝降的。坐过牢的人出面进行这种勾当，意味着他们既背叛了我，也背叛了革命。所以，他们就不是贵宾了。

我不能不体验一次跟背叛了革命的老同学坐在一起交谈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了。

敌人对人民革命军变本加厉地、毒辣地进行诱降工作，是在30年代后期。

最初，日本侵略者在同抗日武装部队的作战中，没有把“诱降工作”定为基本策略，而是集中一切力量想从军事上消灭年轻的抗日游击队和反日部队。除了军事方法而外，他们不承认有其它任何方法，不使用也不允许使用其它方法。他们推行的是名副其实的“讨伐第一主义”。日军统帅部把“讨伐”当作唯一的手段，不准进行诱降勾当。也许他们认为这是违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极为幼稚的做法。他们甚至定出了所谓“严禁诱导归顺”的戒律。

由此可见，日本军部藐视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认为只用军事方法即可对付。显然，他们在九一八事变时看到张学良的三十万大军一朝之间被打垮，气焰就更加嚣张了。

然而，他们只靠军事打击阻止不了抗日游击队的壮大和抗日

武装斗争的发展。于是，就抛出了称之为“文化讨伐”的新货色。所谓“文化讨伐”，是指“治本工作”、“思想工作”和“诱降工作”而言的。

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在对抗日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讨伐”的同时，还要乞灵于“拔本塞原”的“文化讨伐”战术呢？对这个问题，看看他们自己的表白，是饶有风趣的。

日本司法省刑事局发行的《思想月报》第77期(1940年11月，第139～141页)指出：

“对共匪的讨伐为何如此艰难？共军具有基于共产主义的顽强的斗争意识，又运用巧妙的宣传战术；加之，在地理上依靠深山老林中的游击区，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法；在民众政治工作上，用特殊的秘密宣传工作争取民众。因此，只靠武力讨伐，绝对不能取胜。这是可想而知的。

……

只靠武力，虽然有一时的效果，但不可能成为拔本塞原的方略，其效果只如赶苍蝇或斩草不除根。过去尽管进行了许多次讨伐，但今天他们仍肆意妄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只依靠武力，忽视了治本工作即思想工作，国家各机关又不去协助，只让军部去做。”

敌人在“文化讨伐”的美名下，一面大规模地进行“诱降工作”，一面按照“以匪整匪”的策略，搜罗脱离抗日武装队伍投敌的叛徒和归顺者组织“讨伐队”，驱使他们“讨伐”过去的战友、上级和部下。

到30年代后期，敌人更加疯狂地运用“文化讨伐”这种非军事手段，这意味着他们一直视为万能之策的“军事讨伐”遭到了破产。他们用军事攻势达不到目的，就开始搞出了“诱降工作”这种卑鄙的勾当。

1937～1938年是我们的抗日武装斗争达到了全盛的时期，我们的力量强大，战果卓著，攻打一两个大城市是没有问题的。在武装斗争的影响下，群众斗争也高涨起来了。然而，好不容易高涨起来的抗日革命，因热河远征蒙受了莫大的损失。杨靖宇的第一军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不少部队，在远征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在抗日武装部队里，出现了逃兵和投敌分子，甚至一些指挥员也抛弃武装斗争投到了敌人的怀抱里。

鉴于这种情况，敌人认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已经濒临崩溃，是一伙只剩下空架子的乌合之众了，内部早已四分五裂，乱成一团，不管怎么打，都会一触即溃。

我想，敌人重视“文化讨伐”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通过“诱降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尝到了甜头。主要指挥员的投降，使敌人认为共产主义者的信念和意志也有限度，并从这种认识出发，加紧了对人民革命军的瓦解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朝鲜人民革命军定为“文化讨伐”的主要目标，一方面加强军事攻势，另一方面变本加厉地疯狂进行“诱降工作”。

那么，敌人为什么把朝鲜人民革命军定为“讨伐”的主要目标呢？其理由很简单。这是因为从30年代初起，朝鲜人民革命军

就是严重威胁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在东北的抗日武装部队中战斗力最强、最难以对付的对手。

因此，各种报刊广泛报道了我们部队的活动。我们的斗争消息也传到了美国。

下面介绍当时在美国的朝侨发行的报纸《新韩民报》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摘录：

“最近天津通讯报道了振奋人心的新闻。其内容如下：在韩中义勇军中最英勇善战的军队是金日成将军(据内地报纸报道和韩国其他方面的消息，金日成部队以间岛为根据地活动，在今年6月越境袭击甲山普天堡，使日本军警吓破了胆。其后，该部队的行动常由《东亚日报》和其他报纸报道。)率领的由韩人编成的师。……“他们基于生死与共的精神团结在一起，又受到一种家族式支配和侠义忠勇等传统的精神教育，其团结更为牢不可破。正因为这样，领袖一声令下，其部下不怕赴汤蹈火，勇往直前。……他们的目的是为民族报仇雪恨，策略主要是神出鬼没的游击方式，日寇为之晕头转向，无所措手足。

“苏联军事评论家指出，‘如果有朝一日中日两国宣战，日本要对付满洲一角的义勇军，就需要二十万兵力。’如若这个估计可信，义勇军的实力肯定是极为伟大的。”(《新韩民报》1937年9月30日)

为了完全消灭朝鲜人民革命军，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行军事“讨伐”，又极尽造谣之能事，大肆进行欺骗宣传，什么鬼蜮伎俩都用尽了，但都无济于事。真是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

敌人越强化攻势，我们的队伍就越巩固，我们的斗争消息不胫而走，传扬得越广泛。

日本帝国主义看到他们的军事“讨伐”、欺骗宣传都无效，就抛出了“诱降工作”。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招。他们绑架我的祖母，足见他们对这个勾当寄予何等期望。

敌人“文化讨伐”的目标是重要人物。他们的部署非同一般。对杨靖宇的“诱降工作”由“省诱降工作班”负责，对我的“诱降工作”则由满洲治安部警务司所属“中央特别诱降工作班”负责。

据日本官方保存的一分资料说，日本军警计划动员我读抚松小学时的教师参加“诱降工作”，但他未来找过我，也未曾用间接的方法联络过。

朴且石和李钟洛来到南牌子密营，正是敌人对我们大肆进行“诱降工作”的时候。通过亲属进行劝降工作碰了钉子，他们又驱使我过去的同学进行这项工作。

看来，日本特务机关的阴谋集团为了解我们对“诱降工作”的反应，把朴且石当作试探性人物，把李钟洛当作关键时刻利用的主要人物。

朴且石来到我们密营，是我们部队驻在南牌子的时候。

有一天，哨兵长在岗哨派传令兵通知我，说有一个名叫朴且石的人来找我。我接到这个通知，不禁感到惊诧。朴且石是在1930年夏到国内执行任务时，被警察逮捕的。真奇怪，被捕囚禁的人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南牌子？即使刑满释放，也肯定要作为“黑名单上的人”受到监视，他用什么方法甩开监视，来到被敌人重重包围的密营呢？

如果他是为了继续革命，不远千里而来，我们自然是热烈欢迎的。

但敌人是决不会给他这种自由的。不管怎么样，这不是寻常的事。然而，我还是决定见他。见他就能知道坐牢的亨权叔叔和崔孝一的情况，除此而外，我想知道的还很多。

朴且石的外貌依然如故，但是人已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他好像见到生离死别的亲人似地高兴，但不知为什么情绪却很沮丧。

我对他说：血性汉子怎么变成缩手缩脚的人啦？经住了缧绁之苦，应该昂首挺胸，鼓起勇气才是。

可谁想到，朴且石流着眼泪坦白了他在狱中转向变为敌人的走狗来南牌子的经过。他在被判处徒刑，受了几年囹圄之苦的过程中，对革命胜利渐渐失去信心，开始动摇起来。尤其是亲眼看到敌人把亨权叔叔绑在十字刑架上，施加笞刑的情景以后，就泄了气，不敢再反抗了。敌人看到他开始动摇，就把他移到别的监狱，在期满前释放并使他转向，让他参加了“诱降工作”。

敌人策划对我进行“诱降工作”时，吸收朴且石参加这个工作的人是张小峰。张小峰在我们开拓中部满洲地方的时候，跟金赫、金园宇在一起，为实现卡伦的革命化做出了贡献。但是，在1931年初他和李钟洛一起去筹措武器时，在长春车站被捕后转向投敌了。敌人给他配了一个妓女，让他们在长春同居。后来他变成了职业特务。日本特务机关物色我的友好时，张小峰把李钟洛介绍给他们，又通过李钟洛吸收了朴且石。

朴且石还算坦白，他照实承认被敌人抓去受审时供出了在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同我的关系，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和组织共青以后以吉林为中心进行的活动，以及作为武装小组成员被派到国内的经过，等等。

我问他，他来进行“诱降”这个勾当，是他自己干的，还是有人叫他干的。

朴且石说，他没做一官半职，只是被日本鬼子逼来的；他虽然知道这种把戏对我根本行不通，但他还是来了，因为他很想借这个机会见我一面。他说着流下了眼泪。他很想见我才前来，这话看样子是真的。

朴且石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情报。他连为了让我的祖母参加“诱降工作”去万景台找她的事也都照实说了。他是平壤人，从小与亨权叔叔很要好。他常到万景台看望亨权叔叔。在这过程中，也成了我祖父、祖母的熟人。

据他说，把这种底细告诉敌人，推荐他对我进行“诱降工作”会起很大作用的人，就是李钟洛。他说，他让我祖母受苦，罪该万死，但他始终保护了我的祖母。他还说，他和李钟洛是狗彘不如的败类，像他们这样的人罪不容诛。

朴且石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义感强，反日情绪很高的青年革命者，他怀着远大的抱负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建立朝鲜革命军以后，他也忠于职守。

但是，被敌人逮捕身陷囹圄之后，他思想变了，人格也垮了。如果说他还保留一点往日的东西，那就是对我的一点情谊。

朴且石虽然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雇佣，但他并不主动协助，也不以此去享受荣华富贵。他认为日本强大，革命没有希望，能活命就很庆幸。要活命，就不能不转向，转向了，就不能不乖乖地听从日本人的摆布。他虽然参加了“诱降工作”，但他是迫不得已的。

虽然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但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意志和指示，这就是像朴且石那样抛弃革命信念的人的悲剧。

我接见了朴且石后，对人的真正价值进行了一番深刻的思索。朴且石只是上了些年纪，长相跟往日一样，人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人，看上去显得只剩下外壳，腔里空空如也。由此可见，人的真正价值在于理想。一个人没有了理想，还能有什么呢？一个抛弃了理想的人，他的人格也变得低劣了。朴且石因为抛弃了理想，变成一个软弱无力的人。抛弃了理想的人就如同没有灵魂的人。

我明知朴且石变节了，但仍出于救人之心，从各方面开导他。我这样做，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敌人夺走了我的同志，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夺回来？即使不能把他完全改造成“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朴且石，也要使他重新具有爱国精神，这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仍保持着对朴且石的情谊。

我对他说，一个人做了对不起民族的事，他就不可能活得光彩，也不会死得其所。朴且石听了我的话后说：“你说得对。自从转向投敌后，我百无聊赖，一天天过的日子简直是苦役。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我想寻死，但因为没有勇气，自杀不了；今天

跟你见了面，谈了话，我心里轻松了一点。我再也不想活了。你杀了我吧。死也要死在你的手里!”

我对他说，杀了你我心里能轻松吗？为了赎罪，也为了过去一起搞革命的同志们的情义，从今天起，你应该凭着良心重新做人。

他说，一定把我的话铭刻在心。

老实说，当时我们的同志都要求处决朴且石，但我没有同意。因为他坦白并诚恳悔罪，我们也应以义相待。

那天队员们猎获一只野猪做了荤菜。我同他吃了一顿饭，还和他一起喝了几杯酒。我让他在司令部的帐篷里住了一宿，和他谈了半宿话，劝他重新做人，然后让他回去了。

朴且石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他按照我的委托，把我给祖父母的信也捎去了。

敌人看到朴且石从南牌子密营平安无事地回去了，没过多久，又把李钟洛派到密营来了。带李钟洛来密营的是我们去临江的小组。

那年冬天，我们为了解决队员们的冬装，派了一个小组到临江去。

该小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善于交际的商人。这个商人是既为日本人服务，也为我们游击队提供物资的两面光。他在同我们小组谈生意时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为我们小组筹措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我们小组则把一个隶属日本军部的人带到司令部去。小组负责人同意他的要求，但提出了这样一个附加条件：运输

这样大宗物资，为避免麻烦，你要那人同上级打个招呼，叫他们停止对革命军的挑衅活动。这样，部署在从临江经佳在水直到南牌子的广大地区的敌人“讨伐队”，一时停止了作战。

我们的小组将计就计，利用敌人的这个图谋，把大批的后勤物资安全运到了南牌子。他们带来的所谓隶属军部的人，就是李钟洛。

李钟洛装腔作势，态度傲慢，队员们都对他怒目而视。他不像是来到革命军军营的人，毫不畏怯，说话放肆，惺惺作态。他在密营入口见到负责步哨队的吴仲洽就说，在寒冷的山中受苦。说着要把一只怀表送给他。吴仲洽把自己的怀表掏出来给他看，推辞不接受。李钟洛说，不要客气，请收下，有两只表不更好吗？吴仲洽挖苦他说，表应该以一个为准，今天带革命表，明天又带反动表，那怎么行。这是对叛徒李钟洛的严厉谴责。

尽管李钟洛到密营很放肆，但我不好一见面就问他的罪。我想，人情这个东西很怪，既不能一刀两断，又不能付之一炬。我和他过去的交情太深了。

李钟洛是过去和我最要好的人之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李钟洛是一个有主见的出色的革命者。在我们当中，他比谁都精于军事，对新思潮也很敏感。他早在十六岁时，就涉足统义府，参加了独立军。他是个爱国心强、行动果决、又富有感情的人。

我们推荐他任朝鲜革命军的要职，是对他寄予极大期望和信任的表示。当时他很有声望。当我们听到如此受到器重的人竟忘

恩负义，转向投敌的消息时，该是多么失望啊！

李钟洛没有隐瞒他隶属日本军军部，参加“诱降工作班”的事实。他说，像“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纲领所指出的，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朝鲜的光复，进而实现全世界的共产主义，是再好不过了；但那不过是不可能实现的痴心妄想。他说，参加“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建立朝鲜革命军时自不用说，当被捕囚禁时我仍相信这个理想一定会实现，但是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我改变了看法；朝鲜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遭到破产，“内鲜一体”已变为现实，日本成了东亚的主人。自古说，占据中原者能治东洋天下，让我们看看中日战争的形势，日军已攻克北平、上海和南京，目前正胜利进行徐州战役、武汉战役和广东攻坚战，大日本帝国一下子吞掉东北三省，如今又占领了广大的东亚大陆的大半，用什么力量来对付无敌的大日本帝国呢？你老在山里活动，可能不知道大势所趋；我来到这里的目的，是帮助你结束在山里受无谓之苦的倥偬生涯。

李钟洛说得好像是为我行善似的。他的话语和举止，说明他已经反动透顶，不可救药了。

为了不让包围的敌人妨碍我们正在举行的会议，我要李钟洛写一封信给敌人。信是我口授他写的，信中说：我已经到了金日成部队的密营；他们的司令部已转移到白头山方向去了，那个地方离此地有好几百里，要取得联系需要一定的时间；我现在与金日成麾下另一支部队就跟司令部取得联系的事宜进行交涉；故望此后通报以前，暂按兵不动。

我们把李钟洛写的信送给敌人之后，就更加放心地继续开会了。

一天，我对他说，看你发胖，手也有肉，好像过得很不错。他说，他能过上好日子，是靠日本人给的钱，其实也是托了你金日成的福；你是个大人物，所以，日本人为了使金日成转向，优待金日成昔日的至交好友。

他说，像他这样的人都能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如果你转向，日本人一定会给你相当高的待遇。他还说，日本人说了，如果金日成将军投降，就给大官做，朝鲜军司令官也好，别的大官也好，要什么官给什么官；要么当朝鲜军司令官，管辖朝鲜，要么在这里当官管辖满洲，可以随便选择；条件只有一个，与日本合作。他还宣传说，将来美国势力必定要伸展到太平洋西部沿岸，吞并日本、朝鲜和满洲，在这种形势下，只有亚洲人携手牵制并击退美国，才能有亚洲人的活路。

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知道无法使我“归顺”，便指示李钟洛拿所谓“合作”的妥协方案跟我协商。

亚洲人要为牵制美国的势力而合作，这是当时日本人大肆宣扬的大亚洲主义。日本人煞有介事地宣称，大亚洲主义的宗旨是在日本主导下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然而，头脑清醒的人谁会听信这种鬼话呢？大亚洲主义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掩盖其称霸亚洲野心的烟幕。

帝国主义者每当侵略别国的时候，总是要制造冠冕堂皇的借口，加以合理化。他们大肆宣扬大和民族的优越性，鼓吹所谓世

界乃以日本为中心的一个家园的“八纮一宇”思想。他们侵略朝鲜的时候，说什么“日本引导并保护没有能力独立的民族”；侵略满洲的时候，以“自卫权的发动”为借口；炮制伪满洲国时，又宣称保障“五族协和”和建设“王道乐土”；在发动侵华战争时，借口所谓“惩罚暴徒化”的中国，提出了“暴支应惩”、“更生新支那建设”、“日、满、支三国的结合”等口号。

李钟洛竭力宣传大亚洲主义。我就问他：假如我们侵略日本，用铁拳去镇压日本人，宣布从今天开始实行朝鲜主导下的大亚洲主义，那么，他们还会说大亚洲主义是正确的并欣然接受吗？

我还问他：你说日本是无敌必胜的强者，那他们为什么几年来没能用军事方法消灭我们而为此大伤脑筋？如果日本是无敌必胜的强者，为什么不用堂堂正正的方法征服我们，而指使像你这样的人来进行可笑的“诱降工作”呢？

对这些质问，李钟洛无法回答。他只是搪塞说，那肯定是因为日本人器重金日成，没有其它的理由。他还说：强胜弱败是天经地义的至理，你应该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抗战，接受日本人提出的方案；现在三个师的大军重重包围着南牌子，如果你们不放弃抗战，他们可能要用毒气或新式毁灭性火炮歼灭你们。

我对李钟洛说，别说叫我当朝鲜军司令官，就是叫我当总理大臣，我们也不会放弃斗争；要使用毒气或毁灭性火炮，就让他们用吧，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是绝不会屈服的。

那时候，我通过李钟洛知道了韩英爱的消息。据他说，日本

人策划对我的“诱降工作”时，也在韩英爱的身上打了主意，因为她坚决反对，没能成功。

李钟洛说，他和韩英爱同囚在新义州监狱里，她对我的情义非同一般。在日本人的指令下，他做韩英爱的工作，企图动员她参加“诱降工作”，但碰了一鼻子灰。韩英爱厉声斥责说：我绝不干那种卑鄙的勾当，你也不要干，难道金成柱是会“归顺”的人吗？

听了这番话，我对韩英爱十分感激，而对李钟洛不禁感到厌恶。我对他说：你看，像韩英爱那样一个女子都能坚守气节，可你抛弃了革命还嫌不够，还要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岂不是变得太无耻了吗！

李钟洛知道要说服我是枉费心机，便去引诱队员上钩。他对一个警卫队员说：家里有爹娘吗？想家吧？从前日本人活捉到游击队员就杀了，可现在不仅不杀，反而让他享福；如果你想要回老家，娶一个漂亮的媳妇，过甜蜜的生活，就跟我一起走吧。

我接到这个通报，断定李钟洛是和迫不得已为日本人跑腿的朴且石不同。他是个不把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放在眼里，主动为敌人效劳的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和心腹。

司令部根据全体队员的一致要求，判决李钟洛为民族的叛徒，并处以死刑。在李钟洛的尸体上，盖上了一张警告状：不论是同学，还是什么人，只要是叛逆一律处决！

不少人听了我对在南牌子和李钟洛、朴且石见面的史实的追述，都说这个故事情节像小说一样惊心动魄。如果把这段历

史如实写出来，就能成为一部出色的小说。曾经发誓要为革命生死与共的人，现在变成了叛徒，居然宣传日本的强大，把我们的抗战说成是无谓的事情，还妄图使革命军司令官“归顺”，给人的印象何等深刻！这在我所经历的各种体验中，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体验。

说老实话，我见到那两个人以后，很不愉快。若是素不相识的人扮这种角色，我是不会这样伤心的。

在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他们都很积极、坚决。他们和我一起发誓：活要活在一起，死要死在一起。那时候，我坚信他们绝不会变节。可就在我最爱护、最信任的人当中，却出现了背信弃义的人。

在革命乘胜前进的时候，参加革命斗争的人很多，在革命队伍里也很少出现动摇分子和蜕变分子。但是，当形势一旦不利，革命遇到重重困难时，就会出现动摇分子、脱逃分子和叛徒。因此，形势越严重、国家情况越困难，我们的干部就越要搞好思想工作。当然，人的思想是看不见的。人们不会把自己的思想标在自己的额头上，让你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在革命队伍里找出失去革命信念的动摇分子和失败主义者，是很困难的。但是，人的思想总是要通过他的工作和生活的某一方面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干部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和思想状况，做好思想工作，使他们坚定革命信念。

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人的思想一定要化为信念，只停留于纯粹知识是没有用的。没有化为信念的思想容易变质。如果思想

上蜕化变质了，势必成为像李钟洛、朴且石那样的人。因此，一旦接受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就要把它彻底化为信念。渊博的知识只有加上革命的信念，才能成为破旧创新的真正的创造力。眼睛只能看见现实，信念却能展望未来。

如果信念垮了，灵魂也就死了；灵魂死了，人也就成为行尸走肉了。人的道德情义和良心也都基于信念。没有信念的人，就谈不上什么良心，也不会恪守道德情义，更不会讲什么人格了。人只有具有坚定的信念，才能出色地开拓自己的人生，也能搞好同志关系，为党和革命、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卓著的贡献。

忠诚必须信念化、良心化、道德化、生活化，这就是金正日同志的立论。我认为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我完全同意金正日同志的这个立论。

第二十章

新的革命高潮

一　艰难的行军

二　青峰的教训

三　食盐事件

四　大红丹战斗

五　玉石沟的端阳节

六　女战士的革命气节

时期：1938．12～1939．6

一　艰难的行军

1938年12月初到1939年3月底，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从濛江县南牌子到长白县北大顶子的行军，称之为“艰难的行军”。这次行军虽已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我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这次行军中建树的伟大业绩以及抗日游击队员们那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是我国人民千秋万代永远学习的宝贵遗产。

这一节收录了伟大领袖向历史学者和作家们谈的关于“艰难的行军”的回忆。

你们为了宣传我们党树立的革命传统并使之体系化做了很多工作，作家们也创作出许多以革命传统为题材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

你们要我谈谈“艰难的行军”的历史已有较长时间了。这次我准备花些工夫给你们谈谈。

1938年末到1939年初进行“艰难的行军”这段时间，是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史上经受最艰苦的考验的时期。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我们是不可能率领大部队挺进到国内去的。时局对我们非常不利，严光浩那样的人甚至公然说什么革命已进入低潮。

在这种时候大部队向国内挺进，确实是一场很大的冒险。

尽管如此，为了挺进到国内，我们还是大胆地开始了向鸭绿

江沿岸的行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将我国革命面临的逆境转变为顺境。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是坐在那里发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当然，到密营去藏起来，也许能安全地度过一个冬天，也能保存力量。但是，用这种办法维持现状，怎么能扭转革命的困难局面呢？所以我们决定，尽管困难重重还是要进行“艰难的行军”，挺进到国内去。

为了推动革命继续高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1938年正是西间岛和国内人民士气低落的时候。由于“惠山事件”，许多地下组织成员被捕，国内革命运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加之，敌人大肆宣扬什么人民革命军已完全溃灭了。虽然这种宣传是骗人的，但也确实迷惑了不少人。传入人民耳中的全是些骇人听闻的风声，以致那些本来不相信敌人宣传的人也开始有些半信半疑了。连一些有名气的革命者也失去信心，只是仰望着白头山方向。

搞宣传，敌人的条件比我们有利得多。他们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大的宣传工具进行宣传。报纸上煞有介事地登一条革命军哪一天在什么地方被全歼的耸人听闻的报道，发行几万份，就能使几千几万人看到。广播也与之相配合。

我们的宣传工具顶多不过是向队内发行几种报纸、杂志及一些传单和檄文。此外就是各地的地下组织印发的若干宣传品。就是这些也只能用隐蔽的办法费力地传递。有些爱国者，就是因为撒了张传单丧了命的。地下工作员要想背一袋传单到国内去，就得冒生命的危险。

当敌人大肆宣传革命军已经溃灭的时候，揭露其虚假，证明革命军还存在的最好办法，就是挺进到国内去发出枪声。只要发出枪声，还能组建起许多地下组织。

据来自西间岛的联络员说，长白地区的地下组织大部分被破坏了。

在国内，也有许多人被捕。幸免于难的组织成员也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无法取得联系。

我听了这些汇报后说，组织破坏得再严重，总会有些茬子留着吧。

只要留有茬子，就能把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不管怎么样，要到长白去把组织恢复起来，然后再挺进到国内去。

当时有些人说，像在马塘沟时那样在密营里进行一个冬天的军政学习，等天气转暖了再开展新的作战，不是也可以吗，何必在数九寒天自讨苦吃。

我们不能赞同这种意见。当国内的反日斗争经受严峻考验时，怎么能坐视不救呢。吃苦嘛，从开始革命就已经吃惯了，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吃史无前例的苦，也不是一两次了。国内的反日斗争正经受着考验，国内人民一心仰望着白头山方向。在这种时候，自愿肩负起解放祖国使命的革命军怎么能隔岸观火，袖手不管呢。

就是啃树皮也要挺进到国内去。这会有牺牲，也会有迂回曲折。冒着枪林弹雨走的路，怎么会没有艰难困苦呢。即使这样，也要迈开大步，劈里啪啦地撞撞看——这就是我当时的心境。

上面所谈的，可以说是进行“艰难的行军”的动机吧。简单地说，“艰难的行军”，其目的就是要把国内大大地震动一下。

你们也知道，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有过多次艰苦的行军。1932年秋我们率领部队从安图开往汪清的行军、第一次远征北满后回间岛的行军，都是艰苦的行军。1937年初春远征抚松，也是一次艰苦的行军。

可是，这次从濛江县南牌子到长白县北大顶子的行军，无论从行军持续的时间上看，还是从艰苦性上看，都是以往的几次行军无法相比的。行军时间有一百多天，所以也称作“百日行军”。实际上这次行军有一百一十多天。因为这次行军太艰苦了，所以人们称之为“艰难的行军”。

我看了许多过去描写行军的书。《铁流》这部作品，我看了电影，也看了小说。可是从没有看到描述“艰难的行军”这样艰苦曲折的行军的作品。我在中学时代读了《铁流》这部长篇小说，当时想，世界上竟有这样艰苦的行军。《铁流》中，郭如鹤克服重重困难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经过了“艰难的行军”，我体验到，这同我们经历的苦难相比，是不足道的。

“艰难的行军”，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同严酷的自然的斗争、同严重的饥饿和疲劳的斗争、同可怕的病魔的斗争、同凶恶的敌人的斗争凝成一体的斗争。这里还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斗争，那就是为克服困难而进行的自我的斗争。起码是为生存而斗争，进而是为战胜敌人而斗争。这就是“艰难的行军”的基本含义。的确，“艰难的行军”从头至尾都贯穿着严酷的考验和难以克服的困难。

那年，中秋前就下了初霜，中秋后就下了大雪。从初冬就流传着檀木都冻裂了的风闻。

加上缺粮和伤寒病，既不能休息，也不能睡觉。每天还要同敌人打好多次仗。那个艰苦劲儿是难以形容的。

从南牌子到北大顶子，若步行也只有五六天的路程。可是我们要一面打仗，一面行军，竟走了一百多天。

你们大概看过“艰难的行军”路线图。怎么样，那个行军路线十分复杂，难以辨认吧。

“艰难的行军”，就其人体承受的负担和经受的痛苦来说，也是以前的远征所无法比拟的苦难的行军。

“艰难的行军”为什么成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斗争史上空前艰苦的行军呢？因为这是在敌人的不断追击和包围中的行军。敌人的追击和包围有多么顽强，这可能是你们想象不到的。

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全部“讨伐”力量，向我们的主力部队攻击。他们大肆叫嚷，第一军已溃灭，所剩无几，剩下的只有金日成部队，要把全部力量集中起来“讨伐”金日成部队，甚至动用了信鸽，大造声势。

敌人使用的战术是：使革命军得不到休息，吃不到东西，睡不成觉。他们用这种战术，几百人一群不断地扑过来，有时一天就要打二十多次仗。

如果我们当时像先前的远征行军那样悄悄地离开南牌子，也许不会遭到那么深重的苦难。可当时我们无法瞒着敌人悄悄地开始行军。

我们一开始行军就不得不发出枪声。因为要筹备行军的口粮，就得打仗。所以我们一离开密营就攻打了一个集团部落。敌人听到枪声，就紧跟着我们不放。敌人已知道二方面军要开往哪个方向，怎么会放过我们呢。

包围着南牌子密营的敌人立即出动追击了。敌人的行动非常快。我们强行军刚走出五十来里地正准备做饭吃，敌人就扑上来了。这么一来，怎么能做饭呢，只好把湿米装进背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不止一两次。如果不打仗，只是行军，就不会那么心焦了。敌人不断地追击和包围，我们要不断地同敌人打仗，这就加倍地吃力了。这就是这次行军最艰苦的原因。

那个时期，缺粮是我们的一个严重困难。“艰难的行军”时，我们严重缺粮，有各种原因。本来1938年秋我们已准备了足够吃一个冬天的粮食。可是在南牌子开会期间消耗了许多，各部队向各自负责的地区开拔时，又把所剩不多的粮食都分给了他们。已经是寒冷的冬天，又无法采摘野菜或草叶充饥。如果敌人追得不太紧，还可以猎野兽吃生肉，但不能发出枪声，也不可能打猎。只有一次，我允许队员猎熊。吴白龙在一棵大空心树里发现了睡觉的黑熊，他恳求我允许他开一枪。我叫他了解好敌情后，如有把握一枪打死就打吧。他一枪就打死了那只像一头公牛那么大的黑熊。行军初期我们的队员一天喝两顿稀粥，可是口粮储备越来越少，很快就改成一天喝一顿粥了。后来连一顿也喝不上了，只好吃雪。吃不到东西，眼睛都发黑了。开始行军，一站起来，就头晕眼花，迈不开步。

解放后我每次同干部见面，都对他们说，只有受过饥饿苦的人，才知道米的可贵，农民的可贵；没有饿过肚子的人，就不能说是懂得了革命。

有一天，吴白龙得到我的允许，到七道沟去攻打一个木材所，拉来了好几匹马。当时已断了粮，我决定杀马充饥。因处在敌人的包围中，不好升火烤，又没有盐，只好吃生马肉，第二顿就恶心，咽不下去了。吃了生肉，又腹泻，比饿更难受。

队员们尽管泻肚子，还得再吃生马肉。有什么办法呢，除了马肉就没有可吃的嘛。过了四五天连冻马肉也吃光了。

抗日革命战士中，个子小的人多，是因为正该多吃的年纪，没能摄取足够的营养，苦又受得多，所以未能正常发育。

我们在山里打仗的时候，就没有吃过像样的饭食。常常用野菜、草根、树皮、酒曲、米糠、酒糟来充饥。粗食吃得多，生活又不规律，肠胃自然要受损伤。

卡斯特罗来我国访问的时候，曾向我问过，你们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口粮、被服、住处是怎么解决的，还有那零下40度的严寒是怎么克服的？我就给他讲了“艰难的行军”中因缺粮挨饿和受严寒折磨的情景。

卡斯特罗听了非常叹服。他打游击战的时候，可能没有受过我们那样的苦。古巴跟中国东北地区和我国不同，是个气候非常热的国家，可吃的东西很多。

在山里打仗的时候，使我最痛心的是：不能让战友们吃饱，到了娶亲年龄，又不能让他们结婚，只是叫他们受苦。

现在我在这里对“艰难的行军”谈得再多，你们这些来曾经历过的人，也是很难体会到那种艰苦劲儿的。关于行军的艰苦，随着行进的路程再谈谈吧。

敌人一开始就采取“猛攻长追”战术。意思是猛烈攻击，顽强追击。也就是猛烈的攻击配合顽强的追击的战术。敌人的攻击和追踪是那么顽强，那么紧，以致我们连做饭吃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嚼着生米行军。

“猛攻长追”的战术，就是像牛虻那样执拗地扑上来折磨对方的“达尼战术”。日本人管牛虻叫“达尼”。“达尼”战术就是这样一种战术：预先把“讨伐队”部署在各重要关口，一出现游击队就打，而且只要发现了游击队就穷追不舍加以消灭。敌人想出这种战术，是为了使游击队得不到休息、睡不成觉、吃不到东西，一直被追赶、挨打，最后精疲力竭垮掉。敌人可以轮流休息，游击队却没时间休息，没时间吃饭，又无休止地打仗。所以那个艰苦劲儿就难提了。

古代兵书中写道，遇到优势敌人的轮番长追，就必败。所以不陷入这种窘境的将帅才是善战的将帅。也就是说，陷入了这种困境就没有办法。而我们就是陷入了这种困境。敌人从四面八方像牛虻一样扑过来穷追不舍，真叫人左右为难。我们必须摸索出从这种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妙计。

我们想出来的妙计就是“之”字战法。

我把团长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从现在起我们的行军路线要取“之”字形，在每个拐弯处掉过头埋伏起来，敌人一出现就

用机枪扫射，这样才能甩掉日本“达尼”。

“之字战法”是在积雪有几人深的满洲山地打击跟踪的敌人的最好战法。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多，只有前面的人开出路来才能行军。雪积得那么深，再壮的队员走出五六十米也都精疲力竭蹲了下来。有的地方积雪太深，只有打滚压实才能开出路来。有的地方只好打洞通过。在积雪太深的地方，就叫队员们把绑腿解下来，接成一条绳把着行军。这样才能防止出现掉队的。

敌人只能乖乖地顺着我们开出的“之”字路跟上来。

吴仲洽走在行军纵队的后尾，每到拐弯处就把带着机枪的两三人战斗小组埋伏下来，打击追来的敌人。当敌人处理他们尸体的时候，我们的埋伏组又转移了。我们用这样的办法消灭敌人。敌人顺着我们开出的独路追来，每次都挨打，一直处于被动，伤亡惨重。而我们却掌握着主动权，连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部队继续在雪中行军，1939年正月初到达了长白县七道沟。途中，进行了临江县腰沟集团部落袭击战、蚂蚁河附近战斗、王家店袭击战等多次战斗。这些，我想你们都是清楚的。

敌人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进行“讨伐”。敌人不断地追击，伤亡也不断增加。可他们还是轮换着部队顽强地扑过来。敌人有的是预备兵力，死几百也不当回事。

我们的队员一面行军，一面睡，还做梦，可见有多么疲劳啦。敌人的飞机为了寻找我们的行踪，常来骚扰。我们连篝火也不敢烧。当时的敌机就像现在我们五号农场撒农药的那种飞机。

不过飞机还是飞机。那个讨厌的飞机每天都来侦察我们的行踪，然后通知给他们的地面部队。

有一天，敌人探出我军的行踪，像蜂群一般朝我行军纵队猛扑过来。前后左右都是敌人，连天上都是敌人。情况十分紧迫，我命令：机枪排消灭前面的敌人，七团牵制从后面扑来的敌人，其余的从侧面突围。

用这种办法侥幸脱了险。可这种办法只能用一两次，总不能老是这样冒险地玩走绳啊。参加行军的方面军大兵力集体行军，从各方面来说都很不方便。首先是很难泯灭踪迹，再就是很难解决口粮问题。几十个人可劲儿背来的粮食，也只够吃两三天的。吃不到东西，睡不成觉，又要不断地打仗，行军时队员们常常无力地倒了下去。

怎样才能让大家都活着到达长白呢。我想来想去，决定改集体行动为分散行动。但也不能说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分散行动，又有分散活动的负担和苦衷。

当时我打算把二方面军分几路行动，我自己和七团一道行动。可是参加干部会议的指挥员们一致反对我和七团一起行动。他们主张，司令部应该驻在七道沟密营中最安全的青峰密营。他们这样主张，是为我的安全着想的。他们说，我们的部队中仗打得最多的就是七团，你同他们一起行动，就有危险。

可是，我不能同意指挥员们的主张。我对他们说，只让伤病员到青峰密营去，我国人民需要的是打仗的金日成，而不需要袖手隐蔽着的金日成。我这么一说，指挥员们就不好再反对了。

最后，我们决定把方面军分散到三个方向去：司令部带领警卫连和机枪排，经过青峰密营向佳在水方向挺进；吴仲洽的七团挺进到长白县上岗区一带去进行活动；八团和独立营则到抚松县东岗一带去进行活动。

可以说，方面军开始分散活动后，“艰难的行军”就进入了第二阶段。

现在已成了旧话，可我们当时实在感到痛心。和司令部分手的同志们都依依不舍地流下了眼泪。他们握着警卫连战士们的手恳切地托付说，要好好保卫司令官。他们那种誓死保卫领袖的热诚精神，使我流下了眼泪。队员中有的衣服破得露出了肉；鞋也破了，只好用绑腿裹着脚走路，有的还用牛皮裹着脚走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为司令官的安全担心，怎能不叫人流泪呢。

后来才知道，吴仲洽在离开司令部时嘱咐吴白龙说，我们七团将引诱敌人到处转，警卫连要避开敌人，决不要打仗，要想方设法让我呆在青峰密营里。

“艰难的行军”时吴仲洽为司令部的安全所发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忠诚精神，我至今难以忘怀。

他为了使司令部不遭到危险，从离开七道沟时就把敌人引诱到自己一边，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他们假装成司令部，从而把一切重担都担了起来。当敌人疯狂地企图追捕我的时候，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保卫金日成的司令部集体。敌人自然就更疯狂地向他们扑过去了。

听说，吴仲洽的七团一个星期没吃到一粒米，一直拖着敌人不断地打仗。红头山战斗时，他听到远处的枪声，就立即迅速赶来保卫了司令部。

多亏他们，我们才少受了敌人的缠扰。这是因为敌人集中追击司令部的力量分散了。可是缺粮的问题实在没办法解决。我们只好饿着肚子朝青峰方向行军。青峰有我们过去派去的后勤人员种的马铃薯。如果马铃薯还在地里，就能挖出来吃几天，让队员们得到休息。那时，我们真的险些没饿死。

没想到在青峰附近发现了谷子地。我观察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地物，发现这是春天我们开往新台子密营路过这里时播下种子的谷子地。原来，这块地可能是到山沟里来种鸦片的人耕种的。当时那人正在播种，看到我们的队员就急忙逃跑了。他可能以为我们的队员是土匪或日本军队才逃跑的。

队员们看到那块地的主人逃跑了，觉着很不好意思。他们说，那人吓跑了，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播种呢。那人是被我们吓跑的，不能让这块地荒了，要替他种上，让他秋天来收谷子吧。便播了谷种。

那块地的谷子还没有收，仍留在地里。队员们看到压在雪下的谷穗，高兴得不得了。有的队员开玩笑说，看来好像真的有“老天爷”，我们都快要饿死了，要不有谁能来救我们呢。另一个队员说：“将军，现在‘老天爷’也站到革命军一边来啦。”

其实，我们并不是托了“老天爷”的福，而是托了自己的

福。如果春天我们眼看着那块地的主人逃跑，却不替他播种，怎么能得到这份横财呢。

本来，我们有这样一种习惯：每到新的宿营地，就发动队员开荒种谷子、马铃薯或南瓜等作物。在离宿营地稍远的平地，翻地播下种子，然后做好标记，便于日后寻找。每当这种时候，传令兵们就问我，将军，以后还到这里来吗？言外之意是：不会再到这里来了，播上种子有什么用？我对他们说，可能来，也可能不来，十之八九是不能再来了。可是即使我们不再来，也可能有通信员或小分队来，他们路过这无人之境，饿的时候挖马铃薯、摘南瓜吃，该多高兴啊。凡是部队走过一次的每条道路，我们都标上了号码，如一号道路、二号道路、三号道路、十五号道路等等。通信员或小分队的同志到某地去开展工作，回来时问他们经过了哪条道路，他们就回答说，三号道路或十五号道路等。问他们有没有因断粮受了苦。他们说，到从前将军叫队员们开的地里去摘南瓜吃了，或者说挖马铃薯吃了。

抗日革命时期，口粮实在太困难了，我们甚至吃过桦木胶。桦木胶不仅可以入药，还能充作口粮。

我们费力地从雪堆中一穗两穗地找出谷穗，捣去皮熬稀粥喝。脚踏碓，当然也是我们临时制造的。

喝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稀粥，恢复了点体力。可是那点小米很快就吃光了。弄口粮的唯一办法是到青峰密营去，每人背一袋马铃薯。

我们在开往青峰密营的途中遇到了一条河，必须马上过去。

可是河还没有结冰，没法过。本来冬天山沟的深水中部就不易结冰。过桥吧，那里也许有敌人岗哨，没能马上下决心。可是要过河，只有通过那座桥。所以我们都豁出命来一个一个地爬过了那座桥。

我们一行刚过完桥，敌人马上就追上来了，并交上了火。我们带着后面的敌人，迅速登上了山。因为那山顶上有马铃薯地。我的打算是一面牵制追击的敌人，一面派部分队员去每人背一袋马铃薯。可是到山顶上一看，房子和马铃薯都没了。大概是被密营的后勤人员挖去吃了。“讨伐队”已跟了上来，乱打机枪。情况十分紧迫。我向队员们说，现在要经过山沟到那面的平地去。到了那儿，天会黑下来，也会有路。积雪深，又没有吃的，加上敌人在穷追，只好到大路上去进行强行军，到远处去。

我们在强行军的途中遇到了山林队的兵营。听到枪声，山林队的官兵不知都逃到哪儿去了，兵营里空无一人。那兵营里有排骨等许多吃的东西。有几个同志说，这是不是日本鬼子放了毒的食物。可看着又不像。火炕上乱七八糟地散放着纸牌。可见确实是山林队的兵营。显然他们连饭也没吃完就逃跑了。炕还热乎乎的。兵营非常幽静。只要敌人不追来，很想在这儿美美地睡一觉，解解乏再走。可是我们连吃桌上东西的时间都没有。一眼就能估出，这些食品足够司令部成员吃两天的。我叫队员们把这些食物都带上。

我们一走出山林队兵营，敌人就又追上来了。的确是狠毒的追击。

我们连盘腿坐着吃一个馒头或饼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司令部之所以很难摆脱敌人的追击，是因为有一个在佳在水做地下工作的人被敌人逮捕了。这个叫金某的人是我们到西间岛后在长白入伍的。他入伍前在地下组织工作过，入伍后仗也打得不错。他跟着我们打了几年仗，后来又派他去做地下工作。看来他被捕后没能坚持节操。大概是他把我们的去向告诉了敌人。

敌人这才觉察到，在长白一带枪声最响的吴仲洽团是个假司令部，便把全部“讨伐”力量集中起来向我们这边扑来。敌人的飞机也每天飞到我们这边来。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司令部拥来。看来我们是无法冲出包围了。队员们个个面如土色，连从汪清时期一直跟着我，受尽了苦的吴白龙，都脸色煞白了。指挥员们也以为这下没办法了，只好等死了。他们都望着我的脸色。

所谓鼓动演说，是这种时候最需要的。

休息时我把司令部成员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树林里的针，一万双眼睛也很难找到；只要我们施好计，就能在大密林和敌群中像针一样把自己藏起来。李舜臣将军在鸣梁海战中，以寡敌众，用少数兵舰打败了倭寇大舰队，从而扭转了壬辰倭乱的局势，这是值得在世界海战史册上大书特书的奇迹。李舜臣是用什么法子战胜了敌人的？当然是用智慧、策略和勇气。但比这更重要的是爱国之心。不打败倭寇，国家就要沦亡。国家沦亡了，就要做倭寇的奴隶。就是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战胜了敌人。因为有很强的爱国之心，所以智慧和勇气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了。

只要不失去爱国精神，我们就能克服面前的困难。虽然现在我们的形势是险恶的，但只要坚持革命必胜的信心，不向困难低头，我们就能扭转局势。同志们，抱着信心继续行军吧……

我这么一讲，队员们就都说：将军，下命令吧，我们跟将军跟到底了。大家都精神焕发地走上了行军路。他们的这些话，也给我增添了力量。

当时我们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战法和战术。“艰难的行军”，可以说是游击战争所创造的一切战法和战术的综合试验场。

当时我们用了哪些妙计呢，现在谈谈其中的一两种。

行军中隐蔽去向，有填平或抹掉脚印，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踪的方法；也有利用枯木或倒朽木悄悄地躲到侧面去的方法。最叫人痛快的整治敌人的方法是，让出现在前后的敌人自相厮杀，然后我们悄悄地离开。这叫做望远战术。意思是让敌人自相厮杀，我们在远处观望。我们在长白县红土山子和富厚水台地整治敌人就是用的这个招儿。

红土山子是座名副其实的大秃山。当时，我们绕着那山转。追击的敌人跟在后面。我们转第二圈的时候前面也出现了敌人。于是我们就顺着倒朽木悄悄地向侧面转移了。从前后攻击我们的两支敌军在一条独路上遭遇，都以为对方是人民革命军，便展开了猛烈的枪战。他们并不知道对面来的是自己人，拼命地打起来了。

我们在富厚水台地也打过类似的仗。大群敌人在追击，我们又没法把他们甩掉。因此我命令队伍像红土山子时那样绕着

富厚水台地转。转了两圈的时候，又来了另一支“讨伐队”，插到了追击我们的敌人的前头。转一圈富厚水台地足有一天的路程，所以有时会出现互无联系的两支敌军一前一后同时追击的奇异现象。

我叫我们的同志继续转，并叫每个人砍一根雪橇辕那么粗的木头扛上，到了适当的地方，再叫他们把木头搭在树桩之间，从上面过去悄悄地向侧面转移。

当我们披着白布藏在树林里嚼着生大麦休息的时候，两支敌军交上火了。我们在远处观望着敌人自相厮杀，没放一枪就消灭了许多敌人。敌人在富厚水台地遭到那么惨重的损失，以致发出悲鸣说，因为人民革命军用神出鬼没、升天入地的妙计，所以根本捉不到。

我们几乎每天都多次使用这种妙计，消灭了敌人许多有生力量。但是日本的兵员后备多。他们扬言人浮于国土，要向海外扩张。所以“讨伐军”消灭得再多，他们也能很快补充上。与此相反，我们在山里打仗，牺牲一个少一个，很难马上补充上。

富厚水台地战斗后，我带领部队连夜强行军朝佳在水方向挺进。

队员们看到我老是将行军方向引往小山岗地带，都担心地向我说：将军，朝那边去是平地呀，弄不好会走到集团部落去。

我对队员们说，在目前情况下，走出树林到小山岗地带是上策。老是这样被敌人追击，我们就会陷入被动，什么也干不了。敌人兵力多，几乎每天都换“讨伐队”，可我们哪有调换的力量

呀，只会遭人员损失。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后天牺牲一个，这样一点一点地损失力量，最后还能剩几个人呢。七团和八团的同志们不会知道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又不能派联络员去叫他们支援司令部，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必须把敌人甩在树林地带，到小山岗那边去。敌人对小山岗地带很少注意，只有到了那样的地方，我们才能暂时喘口气，保存力量。

俗话说，灯下暗。只有离村落不远的地方，才是我们最安全的地方。

我们把住处定在一眼望得见佳在水村的小山岗上。在这里可以听到村里的犬吠声。这是座长满了一人半高的松树和柞树，茂密得讨人喜爱的山岗。向下看是峭壁，峭壁下有条小河。佳在水，也叫水碓房村。

天黑下来，我们就搭帐篷，天亮了就收起帐篷，打好行李。做好了战斗准备，就休息和学习。离开南牌子以后，搭起帐篷过日子，这还是头一次。

我们在这里解除了一些疲劳。我同司令部成员坐在一起讨论了往后的活动方向和战术问题。我们的计划是过了阴历年，等天气暖和起来，就将分散在四处的部队集中起来，到处打击敌人，恢复被破坏的组织，挺进到国境江岸和祖国去。

可问题是断了粮，连一升米都没有，我们都快要饿死了。

我把警卫连政治指导员李凤禄派到佳在水村子去了。那个村子里有金一同志建立的地下组织仍在活动着。叫安某的地下组织员也住在那个村子里，是个跟我们关系格外密切的农民。

他父亲被山林队绑架的时候，我曾亲自给山林队头领写信，把他领回来了。那头领过去得到过我们的很大帮助，所以一接到我的信，就马上把那个农民的父亲放回家了。本来，那个农民就在金一的影响下支援过革命工作，经过这件事后，很快成了地下组织员。

我吩咐李凤禄，到了佳在水先找水碓房主人，并设法同叫安某的农民取得联系。

李凤禄一下山就去了水碓房。他向水碓房主人含糊其辞地自我介绍说，在山上打仗，敌人的“讨伐”紧，又断了粮，所以下山来了。接着又说，我是夜客，请不要见怪，咱们谈谈吧。

主人听了冷冷地问李凤禄，这么说，你是下山来归顺的了。李凤禄为试探他的真心，故意说，是这样。水碓房主人听了，十分遗憾地对他说，在山里打仗当然非常苦，可也不能归顺呀。既然为光复祖国拿起了枪，就要干到底，怎能半途而废呢。即使受苦也不能归顺。然后又问，金日成将军身体好吗？

李凤禄说，不大清楚将军现在哪里，只知将军仍在率领革命军到处打击敌人。水碓房主人听后责备他说，你看，金将军身体健康，仍率领着革命军，可你背弃自己的队长，想归顺，这像话吗。

李凤禄完全相信这个人是可靠的了，便照实说，我不是下山来归顺的，是来弄口粮的，山上有我们的战友，我出钱，请你帮助买些粮食。

房主人说，拿钱买是危险的，我先把替人舂米挣的米藏在糠

里，等没人来的时候，你们悄悄地来背去吧。那水碓房主人真是个好人。

李凤禄在弄粮食的过程中了解到，水碓房主人是祖国光复会会员，并同叫安某的农民有密切交往。

“惠山事件”以后，佳在水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到破坏，就是因为我们的组织员保住了组织关系的秘密。

听了李凤禄的汇报，我想，妥了。人民对我们的支持没有变。只要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就必胜，现在有出路了。那个水碓房主人也等于扛着粮食和我们一起参加了“艰难的行军”。如果没有他送来的口粮，我们十之八九都得饿死，哪还能从容不迫地下着棋设计往后的行动方向？

不仅水碓房主人，连全佳在水的乡亲都支援了我们。

有一天李凤禄说，佳在水的乡亲为我们准备了些粮食和过年食物，请我允许他去拿来。

自开始“艰难的行军”，几十天来队员们一直靠吃生米、生肉、喝生水才活下来。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我没有勇气谢绝乡亲们的心意，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心里也有了一种慰藉感：多亏佳在水乡亲们的好意，1939年的阴历年是可以过得去的了；一路上没能让队员们吃饱的遗憾也缓解了些。

没想到，佳在水乡亲们的好意我们领受不到了。因为和李凤禄一起到村子去的李虎林逃跑了。李凤禄空手回来向我汇报说，李虎林逃跑了，只好丢下粮食、食物跑回来了。司令部警卫连出现逃兵，这还是头一次。

以前行军再艰苦也没出现过背弃我们逃跑的叛徒，可是在“艰难的行军”路上却出了四个逃兵。他们为什么逃跑了呢？因为再也忍受不了这可怕的苦难。

李虎林过游击队生活时间不长，可是我很爱护他。因为他是从国内来的，日本话又说得好。每当需要了解敌情时，就派他去。他带上一两个队员爬上电线杆，偷听敌人的电话。他身体健壮，又有文化，已准备提升为指挥员。可现在他以为革命完蛋了，逃跑了。

由于李虎林的叛变，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火速转移，脱离险境。

我们决定，离开佳在水村的后山，以白日行军突破广阔的平地。我命令部队，不管有没有敌人追来，径直挺进。

当敌人调动大部队进攻时，我们就采取分散活动。这是游击战术的普遍原则。在“艰难的行军”中，我们遵循了这一原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分散了敌人的“讨伐”力量。但在分散活动的过程中，兵力不多的司令部多次陷于生死存亡的险境。

什么原因呢？因为敌人知道我们是司令部，便集中全部力量向我们扑来。

因为有了这种教训，我们在北大顶子总结“艰难的行军’时，就战术问题讨论了很久。我强调说，分散活动虽然是对付敌人大部队进攻的一种游击战术，但不能千篇一律地运用。其他指挥员们都坚持说，在没有大部队支援的情况下，司令部单独行动太危险了，再不能冒这个险了。

在总结“艰难的行军”时，我切身体会到：即便是符合原则的战术，在运用时也不能犯教条主义。

我们刚开始白日行军时就出了逃兵。王德林派来的北京大学毕业生李教官和一个中国人逃跑了。到了这个时候队伍里已有不少伤员，能战斗的人员已经不多了，如果再减员，那就连换岗都成问题了。

行军命令刚下达，吴白龙就问我，将军，我们一开始行军，子弹就会从炮楼雨点似地飞过来，怎么能冲过那片田野呢。我说，这有什么怎么不怎么的，队伍前后各配一挺机枪，敌人从前边来就向前打，从后面来就向后边打。进行强行军，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佳在水的敌人从炮楼上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却没敢开枪。看来敌人主力都到山里“讨伐”去了，村子里剩下不多了，显然是被我们的气势压倒了，没敢扑过来。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大白天从从容容地走过田野，到了树林地带。我们在那里做饭吃，又稍事休息。

大概这种情况属于万幸吧。我们安全地通过了田野，自己也觉着莫名其妙。原以为敌人一定会开枪，可是敌人却没有开枪，只是从炮楼上一声不响地望着我们。这怎么不叫人莫名其妙呢。其实，打游击战，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安全通过田野后，队员们高兴地说：“老天爷”又帮助了革命军。我的体会是，人到了最后关头，只要下定决心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抱着死也只能死一次的勇气，大胆地往前冲，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我们刚穿过树林地区继续行军，队员报告说，后边出现了敌

人。大概是逃兵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了敌人："金日成撇开大部队，只率领着几十个人，现在可以干掉了。"

稍后，侦察员又报告说，前面也出现了敌人。前后都出现了敌人，这就糟了。吴白龙望着我的脸色说："将军，看来敌人知道我们是司令部了，怎么办？"

我对吴白龙说，除了决一死战，还有什么办法。前面的敌人对我们的情况根本不清楚，而且不知道会和我们遭遇，没有戒心；后面的敌人对我们却很清楚，跟他们正面对战是不利的。只有这么办了，分出一个班来牵制后面的敌人，集中力量消灭前面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突围。

从后面追来的是日军"讨伐队"，而在前面威胁我们的是伪满军。伪满军害怕和我们部队打仗，看来薄弱环节在前面。

我命令吴白龙：率领部队从前面突破！打敌人的薄弱环节。敌人稍有踌躇，就发起冲锋，一鼓作气追到敌人兵营，狠狠地揍他们。

吴白龙在队伍前头架起机枪，打了一阵后，吹号发起了冲锋。伪满军伤亡了几十个人，以为我们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部队，丢下背囊、辎重逃跑了。

我们从敌人扔下的背囊里收起可吃的东西，连鞋也换上了新的，一直把敌人追上了大路。这样，我们不仅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而且站到了追击敌人的主动地位。

从这时起，我们改变了战术。也就是说，变甩掉敌人的被动战术为主动打击敌人的攻击战术。因为只靠妙计躲避敌人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队伍的。

兵书里也说，对强敌，要避其锋芒，予以扰乱，使其疲劳；敌人发生动摇，就进行强大的攻击；敌人退却，就猛追，变强敌为弱敌，变我军的逆境为顺境，这是上等用兵法。我们就是运用了这种战术，在“艰难的行军”中克服重重困难，摆脱了被动，掌握了主动。

我决心攻打一座集团部落，陷敌于被动，同时解决口粮问题。那正是阴历年前夕，我急切地想让饿了几个月的队员们吃个饱。为此组织了十三道湾集团部落袭击战。

战斗开始前，我们偷听了十二道沟的伪满军官打给临江县长官的电话。电话中说：“我们偶然和金日成部队遭遇，他们攻势太猛，我们支持不住，退到了十二道沟，请指示如何行动。”这个伪满军官也给邻近的集团部落打了电话，警告说游击队可能来袭击，要注意。

我们根据这个情报，打击了邻近的敌军，接着又攻打了另一个集团部落，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其他食品。那些食品中还有敌人包好了的饺子。缴获的东西太多了，有些只好埋在雪里做上记号。我们用在十三道湾战斗中缴获的粮食和食品过了个丰盛的阴历年。

游击斗争并不总是苦的。虽然挨饿受冻是家常便饭，但有时也能吃得饱，穿得暖。

十三道湾战斗后，敌人向我们司令部集中了比以前更多的“讨伐”力量。东西南北到处都是“讨伐队”。敌人紧迫不舍，我们有时只好在零下40度左右的高地上过几夜。

我们司令部虽然处于这种困境，却也没有陷于被动，又攻打

了一个集团部落。意图是向分散活动的大部队指明我们的位置。那个部落叫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在长白县上岗区活动的吴仲洽七团，听到这场战斗的消息后，断定司令部处在危险中。为了分散向司令部集中的敌人兵力，他们攻打了一些集团部落。意图也是让我们知道他们的位置。

七团找来司令部之后，在抚松方面活动的八团和独立营也找我们来了。在青峰密营的后勤人员也来到了北大顶子。清点一下队伍，和前一年离开南牌子时的人数差不多。队员们几乎都还活着。

当时那种激动的心情，真不知怎样表达才好。抗日战争期间，有过多少次的离别和重逢啊。可从来有过这次这样激动人心的重逢。整个北大顶子像联欢节那样热闹起来了。队员们出生入死，一百多天后重逢，高兴得互相拥抱，又是笑，又是滚，各述心怀，别提多高兴了。

越是历尽艰辛的重逢，就越高兴。要想体会同志是多么宝贵，就要经历过离别。骨肉相亲的同志们，在反复离别和重逢的过程中，同志友爱就更加深厚、炽烈。这种友爱，是在任何风浪面前都不易破坏的。

“艰难的行军”不是单纯的部队转移，等于是一场整个战役的大规模的军事作战，也可以说是整个抗日武装斗争的缩影。在这次行军中，我们尝尽了作为军人所能尝到的一切痛苦，经受了人所能经受的种种考验。

我们通过“艰难的行军”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了，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共产主义者是祖国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儿子，是对本民族

和民族解放事业最忠实的革命战士。抗日游击队员们在“艰难的行军”中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这次行军中展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美好形象，是子孙万代学习的优秀典范。这次行军铸就了在任何逆境中都不失去信念，紧密团结在领导者周围，战胜一切敌人的共产主义者典范。这就是“艰难的行军”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抗日革命斗争建树的最大业绩之一。

参加过“艰难的行军”的人都是英雄。无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都是英雄。

所有队员克服万难，不死神般地活了下来，成为胜利者。我认为这里有多种因素，现在谈谈其中的几个因素。

我首先要谈的是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可以说，是这种精神使我们排除了万难。我们尽管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但从没有悲观失望。我们展望着胜利的明天战胜了那一切困难。也就是说，对革命胜利有着坚定的信念。如果我们当时看到眼前的困难泄气了，或把胜利的前途看得暗淡了，那么，我们就经不起那么严峻的考验，而瘫在雪坑里了。

我们之所以能够胜利结束“艰难的行军”，还可以归结为革命的同志友爱。行军快要结束时同吴仲洽他们重逢的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

他抱住我哭了起来，我也流了泪。真比见了亲骨肉还高兴，血直往上涌。我当时就下定决心，即使整个世界都给了我，我也决不跟这些可爱的战友们分离了。

那年冬天，我分派战友们分散活动后，心情万分焦急不安。的确，我未曾像那年冬天那样如饥似渴地等待着战友们。你们当中也有不少复员军人，都知道战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世上再没有比战友爱更炽热、更有生命力的爱；也没有比战友之间的道德情义更崇高的道德情义了。

革命的同志友爱贯穿着整个抗日革命时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艰难的行军”中，队员们的道德情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地发扬出来了。“一合炒面”这个故事，不过是那时无数美举中的一个例子。本来，这一合炒面是传令兵为司令官积攒下来藏在背囊里的。可我能一个人吃吗？便跟队员们分着吃了。这件事神话般地传到了后代。其实，像这样的事情，那时多得很。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战友需要自己的肉，我们的同志是会把自己的肉割给他的。为了革命同志，情愿把自身全部献出来，这就是革命的同志友爱。

我曾讲过，有个新队员在篝火旁睡着了，不慎烧了衣服，冻得直打哆嗦。李乙雪看到后，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自己却在酷寒中穿着单衣。可他也没有冻死。因为别的同志们又给了他比火还热的同志友爱。在一百多天的行军中，我们大家都以分吃一合炒面的精神生活和战斗，所以才没有饿死。穿着破衣在酷寒中奔波，可心里总是热乎乎的。我们的同志一个也没有饿死、冻死，都不死神般地活下来了，其秘诀就在这里。是爱的力量战胜了死神。

以同志友爱团结起来的集体，在同志友爱的基础上紧密团结的队伍，是无往而不胜的。当时我们再一次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们能够胜利结束“艰难的行军”的又一个因素，是得到了人民的爱护和支援。

在“艰难的行军”中，像佳在水水碓房主人那样帮助我们的好人是很多的。如果以为参加“艰难的行军”的只有我们军队，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人民群众也参加了这次行军。二道花园和腰沟的人们背着粮食、盐、鞋、布匹等物资，出生入死地来找我们。应当说，这些人也和我们一道参加了“艰难的行军”。

在罗子沟台地和天桥岭也体会过，每当我们陷入困境，挺身而出的援救者、帮助者、同行者，都是人民群众。我就是抱着只要有这样的人民，就一定能胜利结束“艰难的行军”的信心，鼓起了力量。

“艰难的行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还因为我们灵活地运用了符合情况的游击战法。

今天，我们仍在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说，我国革命仍在进行着艰苦的行军。过去是几十万日军包围和追击我们，今天是比它更为强大而残暴的帝国主义势力在企图扼杀我们国家。实际上，我们是在无异于战争时期的环境中生活。

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我们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活下去呢？那就是将抗日革命先烈在“艰难的行军”中发扬的白头山革命精神切实体现到实际生活中去。

我们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在新祖国建设时期、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和战后重建时期，也都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排除万难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对具有“艰难的行军”这样伟大历史的人民来说，是没有什么不可能做到的。有着这种精神遗产的人民，是任何力量也征服不了的。

二　青峰的教训

在讲述抗日革命历史的教科书等书籍中，可以看到同叫“青峰”的两个史迹地。一个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两江道三池渊郡的青峰，那是1939年5月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开往茂山地区时，住过一夜的地方；另一个是中国东北西间岛的青峰，是30年代后期抗日游击队员们建立的后方密营之一。

对三池渊郡的青峰，人们都很熟悉，而去过西间岛青峰的人却很少。这所密营之所以能同艰难的行军一起载入抗日革命史册，是因为在这里曾发生过考验一个革命者的信念和忠诚精神的严重事件，它使人民革命军的所有队员都从中汲取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教训，至今仍给后代提供许多教益。

下面是金日成同志关于青峰密营事件的回忆。

我们开始艰难的行军时，把伤病员都送到青峰密营去了。青峰密营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在白头山周边和西间岛一带，有不少这种后方密营。我们的后勤人员还在青峰密营种了一些马铃薯。对伤病员来说，这个密营是既安全又有足够吃几个月粮食的地方。

1939年十三道湾集团部落袭击战结束后，我拨出了部分战利品送到青峰去了。青峰虽然种了些马铃薯，可是光靠马铃薯怎么能过好春节啊。所以我挑了些稀罕的食品，给青峰的战友们送去了。送这些食品去的，是我们的通信员。

然而出乎意料，他却从青峰带回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说青峰密营发生了“间谍集团事件”。听了这话，司令部的人员大吃一惊，人们都愣住了。如果在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军内部发生了间谍事件，那是再严重不过的事情了。

通信员拿出了李东杰扼要叙述“间谍集团事件”的信和称作证据的“毒药”。李东杰在信中说，金正淑、金惠顺、金善和徐顺玉等女队员都是日寇间谍，她们企图用毒药毒死革命战友的阴谋已被揭露。据通信员说，他到青峰时，女队员们已被用绳子捆绑起来，身上还有被拷打的伤痕。

我听到达一报告时的震惊，比张捕吏和韩凤善等战士被打成“民生团”时的震惊要大得多。你们都知道，“民生团”问题以1936年南湖头会议为终点，早已了结了。从那以后，“民生团”这个字眼儿，我们连提都不愿再提。因为“民生团”骚动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和创伤太大，太严重了。

可是这次又听到在青峰揭发了跟“民生团”差不多的“间谍集团”，我当时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我一听就断定，这个所谓的“间谍集团事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捏造。因为密营指挥员们提出的证据，没有一个是令人信服的。他们作为证据送来的毒药，其实不是毒药，而是牙粉。我不顾同志们的劝阻，用舌头舔了舔，不错，是牙粉。把牙粉当成了毒药，该多么荒唐！

青峰的女队员，都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久经考验的、一心一意为革命献身奋斗的好战士。她们唯一的理想就是光复祖国。没有

这种理想，她们这些身体柔弱的女子，怎么能手持武器，脚穿雪鞋套，吃着草根树皮，而且正当芳年也不结婚，心甘情愿地忍受连男子汉都难以忍受的千辛万苦呢！

给这样的女同志扣上间谍的帽子，完全是臆断、诬蔑，这简直是草菅人命。

金正淑是什么样的人，是毋庸赘言的。我可以用一句话来作保证：从阶级地位和斗争经历来看，她是丝毫没有理由跟敌人串通一气的。一个被日本帝国主义夺去了父母兄弟的人去当敌人的间谍，这是荒诞无稽的。金惠顺、金善和徐顺玉，也都是革命觉悟很高的同志。她们决不是能被敌人的阴谋诡计所愚弄的人。把这样的人打成间谍，真是再荒唐不过了。

如果把这些女队员都当间谍看，那么，这和在间岛把许许多多的人打成“民生团员”加以处决的金成道和曹亚范的胡作非为，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我们的部队里，没有一个女队员会堕落成敌人的间谍。不论是在游击区时期，还是在游击区解散之后，我们的女队员中从来出现过一个叛徒。在艰难的行军时，开小差的人里有女队员吗？一个也没有。林水山叛变投敌时，带走了一个和他相好的女队员。但就是这个女队员，在游击队里的时候也没有过间谍活动。

女队员比男队员更辛苦。想想今天我们的妇女在家庭里的负担，谁都不会否认我的话。妇女和男子一样从事社会工作，她们还把繁重的家务劳动几乎全包了下来。为了减轻妇女的负担，我们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我们的母亲、妻子和姐妹们还是很辛苦的。

抗日革命时期女队员的负担也比男队员重。我们的女队员要跟男队员一样参加战斗，她们还要给全体队员做饭。炊事用具和口粮，也大半由女队员们背着行军。当男队员们疲惫不堪地倒在篝火旁熟睡的时候，女队员却替男队员缝补刮破的衣裳。刮破的衣裳可以用针线补缀，烧破的窟窿却必须用布头打补丁。没有布头的时候，她们就把自己的裙子剪下一块来。

我发现了这一情况后，便规定发制服时给女队员发两条裙子。

在克服困难方面，女队员也不亚于男队员。在某些方面，她们甚至比男队员更坚强。

既然提到了女队员，就再讲一个崔顺山的故事吧。崔顺山是有名的兵器厂干部宋承弼的妻子。她在延吉一带做过地下党的工作，也当过炊事员，还参加过对救国军的统战工作，是个老党员。延吉的革命战士都异口同声地称赞她是责任心强、性格坚忍不拔的好同志。

崔顺山参加游击队之后，也做过很长时间的炊事员工作。有一天，她趁行军休息的间隙，忙着淘米准备做晚饭。不料，一根折断了的针扎进了她的手掌，扎得很深。但她顾不得拔出掌心里的断针，因为部队就要开拔了，必须赶紧做饭给大家吃。从这一天起，她就强忍着钻心的疼痛，默默地做她的工作。如果是普通妇女，就会把这事说出来，暂时请假不做饭，但这个刚强的女队员却一声不吭，也不请人拔掉她手掌里的断针。就是排长责备她做饭晚了的时候，她也不辩解。因为她明白，如果她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又得抽出一个人替她做。直到过了半个来月，当针从她

的手背冒出了尖尖时，她才托战友们替她拔。战友们都拥到她的跟前，用镊子夹出了断针。

半个月来，她强忍着针扎在肌肉中的疼痛，不露声色地坚持给战友们做饭。这就是在抗日战争的烈火中，同我们并肩战斗过来的女战士们的形象。

给这样的女战士扣上间谍这一可耻的帽子，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密营负责人严光浩已有几年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为什么毫无根据地随便怀疑女队员，甚至把她们打成间谍呢？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用绳子绑起来关在原木房里的女队员，都是在革命面前玉洁冰清的爱国者吗？如果像严光浩的证言那样，她们是间谍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可以信赖的到底又是哪些人呢？

光看李东杰捎来的书面报告，无法弄清真相，更难以分清是非。

当天，我就叫金平赶到密营去进行调查弄清真相，并把声称“揭发”了“间谍集团”的密营负责人严光浩和政治负责人李东杰以及被扣押的全部女队员，都带到司令部来。

金平回来之后，我依次召见了与事件有关的人。我从中发现，青峰发生的事件蕴含着一个想象不到的、令人吃惊的问题。

青峰密营的负责人是严光浩。我们派他去做后方密营负责人，是对他的一种同志式的关怀，是为了帮助他克服缺点的。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他都是个有严重毛病的人。他有我们决不能迁就的坏习气。是什么坏习气呢？是宗派习气。闹宗派的人，都有自命不凡、瞧不起别人的坏习气。因为瞧不起别人，所

以老是诋毁别人，对别人做的事吹毛求疵。

沾染宗派习气的人，毫无例外地都贪图名利地位。这种人，如果当不上官，就投靠有权有势的人，施尽种种手腕，力图往上爬。宗派分子之所以被大家斥为野心家，就是因为这种缘故。严光浩正是这种人。他加入革命队伍，一开始就露出了野心家的面目。他是在延吉乘着5·30暴动的飓风投入革命运动的。他曾在独立一师当过连政治指导员。但是，一开始就不得人心。因为他过分抬高自己，无缘无故地诋毁别人。妄自尊大，不尊重革命同志和前辈的人，是没有人喜欢的。

严光浩甚至企图把反“民生团”的斗争当作自己升官的机会。他把很多人都诬为反动分子。在揭发和谴责“民生团员”的集会上，他的极左的发言喊得最响。尽管这样，革命组织并没有抛弃他。虽然他蓄意诬蔑了好多革命同志，组织上还是宽恕了他，给他留了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

我们在马鞍山新编一个师的时候，严光浩来找我，发誓要做好工作，改正过去的错误。我相信他会痛改前非，任命他为连队政治指导员。然而，他辜负了我的信任，对自己的队员动不动就大声斥骂。他不仅不帮助连长的工作，反而骑在连长头上训人。他凭着自己有点资历，就摆起老资格和前辈的架子，做工作却总是避重就轻。在战场上，他不身先士卒，总是在子弹打不到的角落里磨蹭。这种人是不配做应当给群众做榜样和带路人的政治指导员的。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撤了严光浩的职，为了给他改过自新的

机会，派他去后方密营工作。当时我交给他这样的任务：要保障伤病员的治疗和生活条件，还要同后勤人员一起种一些庄稼，储备部队的粮食。可是他没有认真执行这些任务，更没有执行司令部要他建造备用营房的指示。

在七道沟尽头和我们分手后，来到青峰密营的伤病员和缝纫队员，由于缺少住所，受了不少罪。在数九寒天，他们不得不搭起帐篷住。密营里，药品和口粮也很缺。

但是，饱经风霜的游击队员们毫无怨言，也没有计较生活条件。他们思念着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友，默默地克服了一切困难。他们严格遵守密营的作息制度和纪律，还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学习。

就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严光浩暴露了他有害的思想和失败主义者的真面目。

有一天，密营里就南牌子会议的方针进行学习讨论。严光浩以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例，说：不管什么革命，都有高潮和低潮；高潮时应该有符合高潮的战略，低潮时应该有符合低潮的战略。为此，就要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一旦看出低潮到来的征兆，就应当坦率地承认低潮已经到来了。那么，目前我国革命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是在低潮期。你们看，热河远征失败了，又发生了“惠山事件”，革命组织全被破坏了。难道这还不是低潮吗？在这种形势下，必须汲取《进一步，退两步》的教训。也就是说，必须避开攻势和正面交锋，进行退却，直到形成有利的局势，这才是挽救革命的道路。

严光浩企图向密营的所有成员灌输这样的观点。由于热河远征和“惠山事件”的影响，当时革命正处在萎靡不振的状态中。他的这种言论，乍听起来好像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密营里的女队员们却及时地看出了，严光浩的言论与司令部的论点不同。她们当场驳斥了严光浩的言论。她们说，客观形势对革命斗争有巨大影响，这一点我们当然不否认，但不能把它绝对化。形势越不利，革命者就越要奋发起来，努力改变不利形势，变不利为有利，这是司令官同志的意志。朝鲜共产主义者无论形势有利还是不利，都一直坚持了斗争。假如朝鲜共产主义者在形势不利的时候隐蔽起来，而只在形势有利的时候才进行活动，那么，能建立起朝鲜人民革命军这样一支常备武装力量吗？能够突破枪林弹雨，挺进国内进行普天堡战斗这样大胆的作战吗？马列主义是共产主义学说，在革命实践中应当把它当作指针，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正如司令官同志经常强调的，马列主义也应根据朝鲜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而不应该生搬硬套。她们对严光浩说：我看，你对《进一步，退两步》的实质也没有正确的理解，难道你不知道朝鲜革命是闯过了重重难关才发展起来的吗？你说，在目前形势下退却才是上策。难道我们有可以退却的后方？如果我们退却了，谁来掀起革命的高潮呢？正如司令官同志在南牌子会议上所宣布的，我们越是困难，就越要顶着困难前进，把逆境变为顺境。

金正淑同志带头严厉地批评了严光浩的失败主义。对违背司令部的路线和作战方针的错误思想，她一向毫不妥协，展开了严

肃的斗争。她是坚定不移的思想至上主义者。

严光浩遭到女队员们的驳斥，老羞成怒，断章取义地搬出马克思和列宁的一些论断，力图使自己的观点合理化。他越是这样，他的言语就越是错误百出。在争论过程中，严光浩的野心家、机会主义者的真面目被彻底揭露了。女队员们这才明白了严光浩整个夏天蹲在密营里，既没有做好医治伤病员的准备，也没有做好过冬准备的真正原因。

尽管这样，她们并没有给严光浩扣上叛徒或投降主义者的政治帽子。因为这是学习会上的争论，如果严光浩承认自己在理论上的错误，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意见，这场争论本来是可以到此了结的。对在学习和讨论中所流露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思想，我们是从不当问题看待的。每个人的水平和素质不同，对待事物和现象的理解与认识也会有一定的差别。成千上万的人不可能一开始就都成为思想完善的人。

人的思想不够成熟的弱点，是通过学习和革命实践得到克服的；人是通过这样的过程改造自己的思想，使之渐趋完善的。因此，即使有人作了违背革命原理的错误的发言，我们也没有批评或斥责他，而是用争论的方法开导他。

然而，严光浩不仅不接受女队员们的正确意见，不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反而竭力掩饰自己投降主义者的真面目，甚至对争论对方开始进行报复。

严光浩的丑恶面目，在他迫害女队员的行径中昭然若揭了。

他迫害女队员的恶劣行为，不仅同在间岛搞反“民生团”斗

争时那些“肃反工作委员会”的人们的行为毫无两样，而且其动机和目的远比他们更卑鄙更阴险。

严光浩迫害女队员的目的，在于掩盖自己的罪行。他为了堵住女队员们的嘴，硬给她们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他认为，只有把这些女队员打成罪犯，她们才不敢触犯他，才不敢向司令部报告。这种想法是多么卑鄙而危险！

在青峰密营里，有一个少年新队员。有一次，这个小队员没向严光浩说一声，就悄悄地走出了密营。严光浩一听这事，就大吵大嚷地说出了逃兵，立即派出了搜索组。搜索组在密营附近找到了他，只见他生上篝火在烤马铃薯吃。他们回到密营，向严光浩如实作了报告：这个小队员并没有逃跑，他是因为肚子饿，才忍不住离开岗位烤马铃薯吃的。尤其是，这个小队员还从没受过挨饿的锻炼呢。

可是，存心制造惊人事件的严光浩，却把这个小队员打成了逃兵。他还说，这个小队员生火烤马铃薯吃，是给敌人打信号，硬给小队员扣上了间谍的帽子。小队员反复抗辩，拒不承认，但毫无用处。严光浩甚至对他进行逼供，强迫他供出从敌人那里接受了什么任务，都吸收了哪些人当间谍？

对一个同吃一锅饭的部属，不但不表扬他们甘苦与共，反而给扣上“逃兵”、“间谍”的帽子，甚至肆意严刑拷打，这是多么令人惊骇的事啊！

那个被严光浩打成“间谍”的新队员，虽说修养还不够，阶级觉悟还是很高的。他既无理由逃离队伍，更无理由给敌人当间

谍。尽管如此，严光浩却继续拷打他，直到他屈打成招，说吸收了女队员搞“破坏活动”，企图用毒药毒死密营里的革命同志。严光浩听了如获至宝，就以这一供词作根据，把女队员都监禁了起来，并肆无忌惮地对她们施加了暴行。

我当时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做了多年的政治工作，曾高呼过统一团结的严光浩，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后来，在调查他的罪行的过程中，我们才了解到他变成如此丑恶的败类，是因为什么了。

严光浩被派到后方密营去的时候，就认为这是对他的降级处分。他对司令部解除自己政治干部的职务极为不满，因此对后勤工作十分冷淡，不去做他该做的事，甚至蓄意怠工。自从和女队员们发生过争论之后，他为了掩饰自己失败主义者的丑恶嘴脸，接连不断地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来折磨她们。他以加强警戒为借口，动不动就搞紧急集合，有意折腾体弱多病的队员；还以节约粮食为借口，把每天的两顿饭减为一顿，故意叫人挨饿。实际上，青峰密营并不是没有粮食储备，以致需要一天只吃一顿饭。虽说没有米，地窖里却储藏着不少马铃薯。而且就在离密营不远的树林里，有一片不小的耕地也种了马铃薯和白菜。如果严光浩认真执行任务，整个部队在青峰过一冬也不成问题。

自从认为自己发迹的道路已被堵塞的时候起，严光浩就产生了厌恶革命的情绪；当国内外形势愈发复杂困难的时候，就愈发认为革命没有前途了。他的这种错误思想，终于在学习讨论时暴露出来了。

在严光浩恣意妄为的时候，唯一能够制止他的是政治负责人李东杰。李东杰是第七团的政委，论职位是严光浩的上级。因为他受了伤，在部队开始分散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在七道沟派他到青峰密营去，负责做密营的政治工作。然而，他却被严光浩灌了米汤，为其权术所骗，以致不辨真假，来能看清事件的真相和本质。假如我们没有派通信员去，严光浩的阴谋就会得逞，女队员们的生命就会丧失。

在调查案情的过程中，我才了解到严光浩是比李钟洛更卑鄙更狠毒的人。李钟洛的罪行是被敌人逮捕叛变后犯的。而严光浩是身在革命队伍里，却从思想上蜕化变质，并且为了掩盖自己的蜕化变质，干出了诬陷和虐待同志的反动勾当。

除了30年代前期，间岛的游击区因“民生团”的骚动经历了阵痛的一段时期之外，在我们的队伍里从来出现过拷打和刑罚的行为。队伍里的缺点和错误，都是用说服教育和开展批评的方法予以纠正的。指挥员拷打战士的极端行为是根本不允许的。

然而，严光浩意识到自己的真面目暴露了，就把自己同队员的关系看做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肆无忌惮地犯下了谋害队员的罪行。他认为要保住自己的命，就必须杀掉队员。为此，他不惜把犯了点纪律的新队员打成逃兵和间谍，甚至把女队员们用的牙粉说成毒药，把她们也都打成了间谍。

严光浩曾经和金正淑一道，在桃泉里做过几个月的地下工作。这样的人居然给金正淑扣上了间谍的帽子，完全是无赖的行径。金正淑的为人，他是比谁都了解的。

严光浩的事例证明，一个人贪图名利地位，就可能变成一个无视组织和同志、不讲情义的恶棍，甚至可能堕落成为革命的叛徒。严光浩自己就坦白说，如果陷害女队员的阴谋不能得逞，他就打算逃避罪责，开小差远走高飞。

严光浩的事例也使我们体会到，在革命斗争中，那些极左分子、过激派、独善其身的、阳奉阴违的、当面打击背后拉拢的、凭感情办事的、爱发牢骚的、贪图名利地位的，这些人是总爱惹事生非的。对这种人如果不及时采取对策，就可能惹出大祸来。

严光浩的事例还使我们汲取这样的教训：一个人如果平时不努力加强思想修养，就可能丧失革命胜利的信心，变成爱发牢骚、精神颓废的人，碰到一点困难就畏缩不前，最后甚至堕落成失败主义者，给革命斗争带来莫大的危害。

严光浩制造的“间谍集团事件”，是一个差一点儿就破坏了我们队伍思想意志上的统一和道德情义上团结的非常事件。因此，我们在司令部党委会上慎重地审查了严光浩的问题之后，在北大顶子召开的指战员大会上，把这个问题提交给群众进行审判。

大会上详细地报告了在青峰密营发生的事情。指战员们一致赞扬女队员们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坚贞不屈地捍卫了我们的路线；而对严光浩和没有以锐利的政治眼光正确分析事件的本质，默认了严光浩犯罪的李东杰，都要求以人民革命军的名义加以处决。

严光浩起初还百般狡赖，想掩盖自己的罪行。经过群众的严

正谴责，才承认了自己的罪恶，还流着眼泪哀求饶他一命。

与严光浩相反，李东杰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辩解，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而且要求赐他一死。他虚心地接受了群众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深刻的悔悟。

李东杰秉性刚正不阿，富有人情味，是个很随和很快活的人。做政治工作和地下工作，他是个有经验的实干家。我们在南牌子会议上任命吴仲洽为第七团团长时，同时任命他为该团的政委，就是因为我们重视他的素质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这样一个人居然犯了被一个下级指挥员愚弄的错误，是因为他和严光浩住在一起，被严光浩灌了米汤，并且也没有认真做队员的工作。诚然，他身受重伤，不可能常做队员的工作。不过，自己走不动，还可以把队员叫到屋里来，经常同他们交谈嘛。

当严光浩吵嚷说密营里出了“间谍集团”时，李东杰只要找一个队员了解一下，也就能立刻弄清事情的真相。可是他听了严光浩的报告之后，没有找一个队员了解，就听任严光浩恣意妄为。严光浩要审讯那个新队员，要禁锢女队员，他都应允了。

李东杰只听严光浩的话，根本没有听取队员们的意见。因此，未能制止严光浩这个野心家的淫威，保住同志们的政治生命。作为政治工作人员的李东杰，他的过错就在这里。因此，全体指战员对李东杰的看法，也就和对严光浩的看法一样了。政治工作人员如果脱离了群众，就必然会招致这种后果。

掌管人的政治生命的干部，一刻也不应脱离群众，时时刻刻都要同群众共呼吸。所谓同群众共呼吸，就是要做到群众拿起铁

锹自己也拿起铁锹，群众吃小米饭自己也吃小米饭，完全和群众同甘共苦。不和群众共呼吸的人，就不能了解群众的感情和思想，也不能了解他们的要求与愿望。

我们的一些干部有一种毛病：对批评自己的人，明里暗里进行报复甚至迫害；根据批评程度的不同，从政治上欺负或打击好人。还有的干部，只听一两个奸佞的谗言，就草率地处理有关人的命运的问题。一个干部如果滥用职权随意处理人的政治生命，就会引起群众的怨恨，就会为群众所仇视，以致使党脱离群众。

我们党是实行仁德政治的党，我们国家是在仁德政治的关怀下，全体人民在一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的国家。我们的仁德政治，负有不仅保护人的肉体生命，而且还要保护和关心人的政治生命的使命。我们党最珍视的，是人的政治生命。

我们的组织和我们的党是由思想和志向相同的人们聚合而成的，每个人都在这个集体中获得其政治生命。千百万群众的政治生命之所以形成整个组织、整个党的生命，其理由就在这里。

因此，对人的政治生命随便抹黑，随便动刀，是缩短党的寿命的行为。党要想长寿，直到实现自己的最高纲领，就要做好人的工作，认真保护他们的政治生命。这就是从青峰事件汲取的教训。你们要把这一教训永远铭记在心。

说到李东杰，他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人是应该饶恕的。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是政治负责人，受了严光浩的欺骗，默许和助长了严光浩的恶行。他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我们考虑到这一点，给了李东杰降级处分。

李东杰未受严重处分，他来找我，说他受的处分太轻了。

“我愿意接受更严厉的处分。请把我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吧。我的错误，只有流血牺牲才能洗刷干净。只有我流血献出了生命，战友们才会饶恕我，才会和从前一样称呼我同志。”

后来，李东杰在忠实地执行司令部交给的任务时被敌人逮捕，八一五解放前夕在汉城西大门监狱被绞死。

李东杰是他的本名，抗日革命斗争时期他还用过金俊这个化名。

三　食盐事件

1949年6月，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主持共和国内阁一次小型会议，讨论废除食盐配给制、实行敞开销售的问题。

会议结束时，主席说：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经历过吃不到盐的痛苦，那种痛苦是难以忍受的。所以我们在山上作战的时候，宁可断粮，也不让断盐，千方百计保证盐的供应。现在，食盐生产迅速增长，有了储备，应该实行敞开销售了。

在实行食盐敞开销售以后，金日成同志对干部们讲述了“艰难的行军”时，因吃不上盐而受苦的一些往事。其中的一件事，被后人称之为“食盐事件”。对这件事，后来金日成同志又有过多次回忆。现将这些回忆汇集如下：

我要讲的食盐事件，是1939年春在“艰难的行军”即将结束的时候发生的。对这个事件，我至今难忘。

人不吃盐就活不下去。不吃盐，手脚发肿，全身无力，动弹不了。

食草动物，若不摄取盐分，也活不成。山里的池沼，积着有股咸味的水，这种水含有卤水。有卤水的地方，常有不少自然脱落的鹿角。这是因为鹿常到这里来汲取盐分的缘故。

游击队生活有四大物资困难，那就是粮食困难、鞋子困难、火柴困难和食盐困难。如果有人问哪种困难最难忍受，可能大多数抗日战士都回答说是吃不到盐。

在北间岛和西间岛，食盐本来就奇缺，加上满洲国把盐定为官方的专卖品严加控制，食盐就成了稀世之宝。

敌人严格禁止居民区的食盐流入人民革命军。一些走私商人从朝鲜偷运食盐到这里暗中兜售，但也无济于事。间岛的一些山区里，因为没有盐，滤柴灰代盐吃的人家就不少。我在东满的时候，就见过一家人拿一小粒岩盐吃一顿饭。在汪清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崔春国的连队去看看，正遇上炊事员高贤淑。我问她炊事工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她头一句就说没有盐吃是最大的困难。高贤淑是吴白龙的邻居，在敌人的一次“讨伐”中失去了许多亲人。她为了替亲人报仇，参加了游击队，被分配到炊事队当炊事员。每当我到他们连队吃饭的时候，她都十分难为情，说没有什么菜好招待。有时因菜里没有放上盐，她竟愧疚不安，头都不敢抬，不知所措地在灶屋里打转。她说，她家里也常常是拿一粒岩盐吃一顿饭。中国的一粒岩盐，一般有扁豆那么大。

第二次远征北满的时候，因为食盐太缺，有些连队的战士各自带着一个小荷包拴在裤带上，里面装上几粒盐。所谓小荷包，其实只有小拇指那么大，像个图章袋子。里边的盐粒，是在断了盐的时候救急用的。你们没有经受过吃不上盐的苦，可能以为我讲的都是些轶闻传说，其实都是真实的。抗战时期，为了到敌占区去买盐，牺牲的同志就不止一两个。地下组织的成员，也有不少是在采办食盐时牺牲的。当时，搞到食盐的主要渠道是地下组织。地下组织用我们送去的钱，发动群众去购买食盐。当然，送到部队来的食盐中，也有不少是群众主动支援的。

我们通过哪些渠道购买食盐，和我们因缺少食盐受多大的苦，敌人都很清楚。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图谋利用食盐消灭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可乘之机。敌人以为，只要谋划出一条利用食盐的妙计，不放一枪就能一网打尽人民革命军。他们也从实践中认识到光用军事政治手段是消灭不了人民革命军的。为此，他们既搞过“诱降工作”，也搞过“集团部落”和焦土战术。一度还炮制出“民生团”，企图在朝中两国人民中间插根楔子，用民族离间计瓦解我们的革命力量。他们甚至还散布“金日成被杀”的谣言，妄图在群众中消除我们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散布谣言，说金日成已被打死，已经完蛋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也跟着完蛋了。

他们就是妄图用这种手段扑灭朝鲜人民的抗日火焰。当时，朝鲜和满洲的不少报刊，用战地通讯的形式，编造我是在哪场战斗中怎样被打死的。说得绘声绘色，煞有介事。

1937年11月的一期《京城日报》开头写道，满洲国军“讨伐队”经五个钟头的激战，终于将金日成射杀成功。接着写道：“父子两代持续进行抗日反满运动的金日成，被讨伐队赶入绝境。至此，以三十六岁为终年，他那饱经沧桑的生涯，终于掩上了帷幕。”

伪满军的杂志《铁心》，也以《金日成匪讨伐详报》为题，登了声言全歼我军的文章。详报说，我在抚松县杨木顶子附近受到伪满军的突然袭击，苦战多时，最后与八名部下一同丧命。过后叫当地一些老百姓认尸，老百姓都说“是金日成”。

因为立了这么个“大功”，伪满军第七团的一个连长李某，

受到关东军司令官、满洲国治安大臣的特准晋级嘉奖和一万元的赏金。然而不久，金日成又出现了，弄得他们十分尴尬。

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把朝鲜人和中国人抓去进行种种人体试验。其目的何在？毋庸赘言，就是要征服朝中两国人民和革命军队，进而从肉体上消灭一切阻碍它称霸亚洲的力量。

但是，敌人的任何鬼蜮伎俩和锦囊妙计，都没能扑灭抗日革命的烈火，也没能消灭朝鲜人民革命军。

敌人为之老羞成怒，不择手段。他们把毒药撒在井水、面粉、食盐和粮食里，妄图消灭我们。

我们刚到达长白县的时候，就险些上了敌人的当。来到西间岛，第一仗打了大德水，紧接着打了小德水，然后驻在马顺沟准备过中秋节。

有一天，哨兵长跑来对我说，有个老头来到哨所，没头没脑地要求见队长，问我怎么办。我就见了那个老头。他对我说，我们在长白县买来的食盐是敌人放了毒的。为了弄清真假，我们用那盐喂了家畜。果然，家畜立即中毒。要不是那位老头及时来报告，真不知要出什么大事呢。敌人的这种以毒灭我之计愈演愈烈。我们愈是陷于没盐吃的困境，他们就愈挖空心思地施展这种毒计。

1939年春，我们又一次遇到了没有盐吃的困难。当时正是分散活动的各团都汇集到司令部，赶着“艰难的行军”最后一段路程的时候。队员们精神抖擞，士气昂扬。加之隆冬已过，春风和煦，口粮又足，大伙心旷神怡，有些飘飘然。可就在这个时候，

出现了个蹊跷的现象：行进中的队员们都像醉汉似地失去了平衡，身子直打晃。而且脸也都肿了，有的肿得眼睛都被挤成了一条缝。如果只有几个人这个样子，倒也不至于大惊小怪，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这个样子，这就非同小可了。

我断定这是因为没有盐吃的缘故。人不摄取盐分，就会出现全身肿胀、瘫软无力的现象。

当时，我们司令部成员也有十来天没吃上盐了。我问吴仲洽，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断了盐的。他说，我们第七团打从离开司令部，就基本上没有吃到盐。可见，身体缺了盐分，是招致这种现象的原因。

正当即将结束行军，准备再度进入国内痛打敌人的时候，发生了这一意外情况，实在叫人心焦。无论如何，必须解决缺盐问题。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我开始物色能解决这个难题的人。警卫连连长吴白龙推荐了新入伍的金凤禄。他是背着战利品跟着部队来，自愿入伍的青年。他虽然入伍不久，但在生活上和在战斗中，都表现得很好。吴仲洽也说，这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他的父母就住在西岗，派他去一定能办些食盐回来。

我把金凤禄叫来，问他有没有信心弄些食盐来。他说愿意去试一试。还说，这种时候，他父亲经常上山打柴，他只要穿上便衣，就能避开密探见到父亲。只要见了父亲，就能把盐弄来。

我们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还给他派了一个助手。他就带着那个助手走了。

金凤禄的父亲见到儿子，喜出望外地说，你当了金将军的部下，真有出息。我把你交给了金将军，心里就踏实了。可近来日本鬼子说，金将军完了。是真的吗？金凤禄回答说，没那么回事，我是刚见了金将军，奉了他的命令来找父亲的，将军他很健康。听了这话，金凤禄的父亲含着泪水，激动兴奋地说，可不是吗，将军还能出岔子？可是听到风声说，金将军怎么怎么样啦，我们就别提有多么泄气了！现在好啦，金将军健在，就放心啦。这位老人一听儿子的来意，大吃一惊地说，革命军吃不上盐不能打仗，这怎么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弄到盐给金将军送去，好让他少操心。

老人当着儿子的面下了保证。但是要真的买到盐，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一个人买一二斤盐还好办，但要多买，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当时的满洲，官府和警察当局是不准商店卖盐超过定量的。他们随时派人到商店暗中监视卖盐的情况。商贩里也有给敌人报告情况的人。尽管这样，金凤禄的父亲还是要买盐。他一个人也能买到一些盐，但他听儿子说行军中的革命军有好几百人，就想尽量多买些送去。为此，他把这事托付给了平时很要好的邻居老人。那位老人欣然同意助他一臂之力，并把这事告诉了另一个相处甚密的老人，还夸耀说，现在金日成将军从山上派人来买盐了，我已答应要出一份力，你要是也想帮助游击队，就该买些盐送去。这么一来，第三位老人也参与了这件事。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位老人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协和会会员，是敌人的密探，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儿子。当时，日本鬼子组织了什么“宣抚班”、“诱降工作队”等玩意儿，专搞“诱降”工作。协和会会

员也参与了这个阴谋。这个当了密探的儿子听了父亲的话，就如实地报告了自己的头头。

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命令警察机关全部买下西岗一带商店的食盐，然后派飞机从长春运来一批盐分给了这一带的商店。这是放了毒的，吃了并不立即死亡，而是逐渐地头痛脑胀，四肢发软，丧失战斗力。敌人的这个阴谋，金凤禄的父亲等几位老人是不知道的。这个阴谋是那么绝密而狡猾，连那些眼尖、嗅觉灵敏赛过猎犬的商人也都丝毫没有觉察到。

那两位老人买了盐，跟着金凤禄来到了游击队的宿营地。我记得他们是下午一两点钟来的。我谢过他们之后便叫人把盐分给了各部队。

那时候，金正淑同志负责管理司令部的炊事工作。为了保障司令部的安全，她身上经常带着醋。她往司令部领来的盐里放了点醋，就说这盐好像是放了毒的。醋对毒药很灵，只要往食品里放点醋，很快就知道有没有毒。听了金正淑的这话，司令部和警卫连都没有吃那个盐。本来，在司令官拿起筷子之前，他们是绝不先动筷子的。这是他们一贯恪守的礼仪和纪律。那天他们都等着我开会回来，谁也没有吃饭。

我在会议进行中听说老人们送来的盐里有毒，便立即宣布休会，然后叫人把盐拿来往篝火上撒了几把，火堆立刻冒出蓝色火焰。火里撒了有毒的盐，就会冒出蓝色火焰。

我命令军需官马上全部收回分给各队的盐。听到这个命令，大家都慌了。因为队员们已经吃了一点盐。有些部队不相信盐里

有毒，不肯交出来。还有些队员甚至把一点儿盐装到小口袋里藏起来。

尤其严重的是，第七团和第八团已经吃过盐出征了。

我们原来就计划那天夜里偷袭敌人，缴获粮食，然后朝黑瞎子沟方向转移。所以给七、八两个团下达了战斗任务。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天一亮，敌人肯定会扑上来，而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开走了。我心里十分焦急，立即决定尽快把队伍叫回来。我正要派传令兵出发，只见开走的队伍又折回来了。他们个个气喘吁吁，疲惫无力。吴仲洽来打报告时也软绵绵的，我还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别的人也都跟他差不多。有的人实在走不动，还没到宿营地就瘫倒了。

显然，敌人是打算等我们吃了有毒的盐，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就突然扑上来一举全歼或生俘我们。可以断定，狡猾的敌人早算计好了，他们的食盐什么时候运到我们的部队，我们什么时候吃上他们的盐，再过多长时间会全部瘫倒动弹不了。情况万分危急。除了司令部人员，整个部队都中了毒，看来不得不在全军瘫痪的状态中迎敌了。这是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此时此刻，我比1937年春在小汤河陷入几千敌人重围时还要焦急，那时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在小汤河，我们虽然陷入敌人的重围，但我们的指战员并没有丧失战斗力，而且都下定了决心，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就拼个你死我活，突围。而这次却不同，要带领中了毒的队伍与敌交战，这是多么叫人心焦的事啊。

面对着这种情势，我们进行了慎重的讨论。有人气愤地提出要

立即处决送盐的老头，说他们是敌人的走狗，不然怎么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合情理的。如果他们是通敌的，事先知道盐里放了毒，怎么不在西岗把盐交给去接他们的游击队员，而要自己背着送来呢？再说，一个做父亲的岂能忍心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我严厉批评了那些主张处决两个老人的同志。我说："这两位老人，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好好打仗，豁出性命背来了那么重的盐。我们不仅不表示感谢，反倒要杀他们，这是多么荒谬啊！你们吃了毒药，就连理性都没了。很显然，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不知道盐里放了毒。"我接着说："现在，我们中了敌人的奸计。我估计，当毒药发挥最大效力的时候，敌人一定会来打我们。凡能活动的人，要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并尽快想办法解毒。我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天一亮，敌人就会扑上来。能作战的人不多了，今天才真的是非打一场决死的战斗不可了。"

然而，主要战斗部队都不能动弹了。

我对他们说，尽管使不上劲，也要趁敌人还没有来，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只要还活着，就是爬，也要爬到安全的密林里去。否则，敌人的飞机来轰炸扫射，地面部队来包围、炮轰，我们就要被全歼。主力部队在我们的带领下终于爬进了安全的密林。同时，我命令司令部警卫人员和机枪排做好了战斗准备。

正如我们所料，不久敌人就扑上来了。我们同敌人展开了激战，一连打了两天。主力已到安全地带隐蔽，只由人数不多的机枪排和司令部警卫人员抗击敌人。那天，司令部人员打得很顽强，的确是一场拼死拼活的决战。

敌人施用缓慢地麻醉人的毒剂，显然是要生俘我们。只要生俘了我们，他们就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满洲的“共匪讨伐战结束”了。那时候敌人宣称，只要消灭了金日成部队，“讨伐”游击队的作战就告结束。

我们打退敌人之后，撤到主力隐蔽的密林里，搭起了医院，开始全力消毒，熬绿豆汤、煮南瓜给队员们吃。这样折腾了一个星期，大家才恢复了健康。

为了这次食盐事件，我的确耗干了心血。当证明盐里有毒的时候，最受惊吓的是金凤禄。他们父子背来的食盐竟然被查明是有毒的，他们该是多么惊骇难堪啊。他们吓得面色如土，不知所措，直像等待处决的犯人那样发呆。

我对那两位老人说，我们一点儿也不怀疑你们，并且感谢你们真诚的支援。我这么反复安慰他们，才使他们放下心来。然后又派熟悉西间岛一带情况的金一送这两位老人回去。我指示金一，不要直接把他们送回家，要送到别的安全的地方。因为我考虑到，敌人看到自己的毒计破了产，又损失了大量兵力，一定会老羞成怒，归罪于这两位无辜的老人，不知要用多么残忍的手段拿他们出气呢。敌人是只凭老人勾结游击队里的儿子运走了大量食盐这一条，就可以杀害这两位老人的。

金一很好地完成了我交给的任务。他先把两位老人安顿在有安全保障的地方，然后又把他们的家属都秘密地带出来交给了他们。金一还顺便查明了用毒盐害我们的告密者就是第三个老人的儿子。那是个坏人。

在朝鲜战争期间，潜伏在医疗部门的敌特残忍狠毒，肆无忌惮地毒死了我们许多伤病员。这是敌人蓄意挫伤我国军民的战斗意志，在医务人员之间制造不和与不信任的阴谋手段。为了灭绝我国人民，敌人甚至毫无人性地进行了细菌战。

反革命阵营进攻革命阵营，向来是不择手段的。20世纪的历史证明，凡是帝国主义者，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屠戮人类的刽子手。为了消灭不愿被人奴役、渴望自主生活的人民，他们不断地变换着手法，锤炼着反革命伎俩。今天，现代帝国主义者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消灭几百名革命者、几万名革命军队的战争，而是要一举推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因此，对他们的阴谋，我们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因为我在抗日革命时期饱尝过缺盐的痛苦，所以解放后每当会见北部边境的人时，都首先询问他们那里的食盐供应情况。一次我在厚昌同郡消费合作社副委员长交谈，问郡里最缺的商品是什么。他说是食盐。1947年夏天，我在办公室见过一个从金刚山休养回来的昌城地方的少年，他也说昌城最大的困难是缺盐。为此，我们责成商业部门采取措施，为山区人民供应了充分的食盐。两江道跟北间岛和西间岛一样，都是远离海洋的内陆山区，很可能缺盐。祖国解放战争时期我去过高山镇，慈江道也同样缺盐。当时我不顾暂时撤退的艰苦情况，还是设法给他们解决了食盐问题。

负责干部们要经常关心，不要让内陆地区的人民受缺盐之苦。养鹿场也要保证鹿群经常吃到食盐。

四　大红丹战斗

1939年5月，金日成将军率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再一次渡过鸭绿江，在白头高原发出了杀敌的枪声。

朝鲜人民革命军踏上祖国大地，第一夜宿营的地方是青峰的树林，距今天的三池渊郡鲤明水工人区不远。这个宿营地遗址，事过近二十年后才被发现，从此才为世人所知。接着，茂山、延社等地的史迹地也相继发现。

慈父领袖生前多次谈到过茂山地区的战斗。本节将金日成同志有关茂山地区战斗的回忆汇总起来，介绍如下：

从南牌子开始讨论的进军祖国问题，在北大顶子最后确定下来。

指战员们都渴望着早日挺进祖国，打一场超过普天堡战斗和间三峰战斗的大仗，惊天动地，轰动全球。当时正是革命军日渐壮大强盛之时，又经过一百多天“艰难的行军”锻炼成为无敌的力量，指战员们一个个如虎添翼，无所畏惧。

这年春天，我们用这支军队在鸭绿江沿岸连续攻打了许多城镇和村庄，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渡江，开进了祖国。

进军祖国的目的，我已经谈过多次了。

我早说过，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政治军事活动，最重要的目标是进军祖国。无论是战斗在北满还是东满，无论进行多少次大小

战役、战斗，我们始终集中力量要达到的总目标，就是进军祖国、解放祖国。

进军祖国，重要的是选择好适当的时机。1937年6月是进军祖国的好时机，1939年5月也是好时机。为什么呢？因为无论从当时的形势上看，还是从我们自己和祖国人民的愿望上看，朝鲜人民革命军进军祖国，都是适时的刻不容缓的。

我们基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深入分析，决定把武装斗争再度扩大到国内腹地去。

1939年5月，是在地球的东方进行着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西方酝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日本帝国主义力求尽快结束趋于长期化的侵华战争，企图伺机进攻苏联，同时准备大举南下。为此，他们需要巩固后方。为巩固后方，便强化了对朝鲜人民的经济掠夺和法西斯镇压，也强化了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攻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惠山事件”。

以“惠山事件”为始，西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以及朝鲜北部地区的部分革命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虽然也有不少幸存下来，但大部分核心组织都被破坏。幸免于难的革命组织，也大都萎靡不振了。

“惠山事件”发生后，敌人大肆宣扬朝鲜人民革命军已经毁灭了。甚至有些地方举行庆祝大会，演出了庆贺我们的“毁灭”和敌人的“武勋”的闹剧。一些地方革命组织的成员听了敌人的欺骗宣传，垂头丧气，有的说，如果金日成将军真的不在了，朝

鲜革命就没有指望了，何必干这个没有指望的革命呢？也有的专程前来密营，直接了解那些传闻是否属实。

在这种情况下，只靠几个工作员潜入国内游说革命军没有毁灭，金日成将军仍健在，革命仍在前进，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促进抗日革命高涨的最佳途径，就是把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开进国内沉重地打击敌人，向国内外证实自己的存在。

我们进军祖国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恢复和扩大被破坏的革命组织，进一步搞好党的组织建设和统战运动，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全民抗战。

普天堡战斗和间三峰战斗后，国内革命组织有了迅速的壮大。每每响起枪声，人们就会觉醒起来；人们一觉醒，就必然要投入革命组织。在南湖头会议以后，如果我们来到西间岛不打仗，无所事事，只蹲在屋里吃老百姓的饭，长白地区的革命组织是不会那么迅速壮大起来的。

西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像雨后春笋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我们做好了思想工作，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打了很多胜仗，显示了革命军的威力，给人们增强了抗日革命必胜的信心。

当我们把茂山地区指定为进军国内的目的地时，有些指挥员表示惊讶。因为他们知道普天堡战斗后，敌人往这一带增调了比原有兵力多几倍的最凶残的守备兵力。一支大部队要突破它，确实既艰难又很危险。

正因为它艰难而危险，我才决定攻打这个地方。打进这个地方重创敌人，比攻打其他地方效果要大几倍。

当时，茂山地区集结着大批的工人，有铁矿工人、水电站建筑工人和伐木工人。我们在这一带发出枪声，就能给广大工人群众以积极的影响，我们的消息也可以通过他们迅速地传遍全国各地。

我们攻打茂山地区的根本目的，是用枪声唤醒茂山地区的工人和咸镜北道的工农群众，更有力地鼓舞全国人民投入抗日革命斗争。

1939年春，朝鲜人民革命军进军茂山地区。

我们是从五号堰过的江，李五松是我背着过江的。过江时我问他这是什么江，他说不知道。那时候，我们的队员一般对国境没有什么概念。我一说这是鸭绿江，李五松就要求把他放下来，要在祖国的江水里浸一浸。

那个堰附近，开满了金达莱花。队员们一看到金达莱花，就发出了欢呼。在这一天展现在眼前的情景中，我最难忘的是女队员们一群群地围着一簇簇的金达莱花，又哭又笑，欢欣雀跃的情景。有的女队员张开两臂拥抱着金达莱花丛，流下了热泪。脸在笑，眼里却淌着泪水。

我们那时眼中的金达莱，不是单纯的大自然之花，而是被日寇霸占的祖国的一部分，祖国的一块血肉。金达莱花对着我微笑，但在我看来那不是笑，而是像我们的游击队员们对着她流眼泪一样，她也仿佛在对着我们淌眼泪。爱国心确实是一种极强烈的感情。按说金达莱能有什么悲哀和眼泪，过去的金达莱和今天的金达莱能有什么不同？可是在我们充满着亡国之恨的人看来，

仿佛金达莱也在为亡国而痛哭流涕，含泪诉说在被日寇霸占的疆土上开放和凋谢的悲哀。

那天，游击队员们对着金达莱，不是一般地叫金达莱，而是叫祖国的金达莱。祖国的金达莱这个称呼，蕴含着游击队员们无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感情，蕴含着他们盼望早日光复祖国、在解放了的祖国大地上建设起幸福的人民乐园的坚定意志。

每当看到金达莱的时候，我就想起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日日夜夜，情不自禁地想吟诗抒情。祖国的金达莱，白头山的金达莱，浅红色的金达莱，将春天的信息带给祖国的金达莱，是蕴藏着多少含义的美丽鲜花呀!

到达青峰时，云消雾散，碧空如洗，是难得的好天气。我们生起篝火，烘干了被露水打湿的绑腿。那个情景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爬到青峰的顶上察看敌情和地形，发现远处有股烟缭绕上升，还听见斧头砍树的声音。我告诉指挥员们附近可能有敌人，要注意部队行动的隐秘，然后给各部队指定了宿营地，派出了步哨和侦察小组。

做好宿营准备后，大家就在大树干上削掉一层皮，写上了标语。抗日革命时期，我们的指战员每到一地都在树干上写许多标语。写标语的人里有个叫具袁爱的同志。他曾在兴隆村住过。他学习好，字写得很秀丽。延安吉也写一手好字，他入伍前当过中学教师。金正淑同志也写了很多标语。这些好同志都已不在世了。但是他们的字迹还活生生地留在树上。见了这些字迹，觉得

他们也还活着。我们的人民群众发现了极为珍贵的文物。

青峰的标语树，浸透着和我们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的气息。看见这些标语树，就像看见那些战友。抗日革命战士们写在树上的标语，不是单纯的标语，而是宝贵的革命文献。这些标语迸发着抗日战士们的精神。这是我们党和人民必须永远精心保存的万年财富。

在青峰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干沧去了。我们在这里宿营时，敌人派来了两个扮做钓鱼人的特务。这一带本来没有什么适于钓鱼的地方。可是这两个人大白天里鬼头鬼脑地朝我们宿营地走来。因为他们行迹可疑，我们的哨兵正要抓他们讯问，其中一个立刻逃掉了，只抓住一个，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一支手枪。这个特务招供说，敌人知道我们开进了国内，已经调动大批守备队和警察队严密搜索树林。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的兵力显然在向这一带集结。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悄悄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到别的地方去。

为了对付敌人可能施展的诡计，我采取了伪装我军行动方向的战术性措施。派一支小分队到胞胎里方面去打击敌人，给敌人造成朝鲜人民革命军在许多地方活动的假象，以迷惑敌人；另派一支小分队向鸭绿江移动，一路上留下足迹，然后销声匿迹隐蔽起来，让敌人以为我们渡过鸭绿江朝长白方面开走了。

第二天凌晨，我们离开干沧向枕峰移动。这天，云雾缭绕，伸手不见五指。侦察队分辨不出方向，吃了大苦。我赶到侦察

队，拿出军用地图和指南针，给他们指明了行军方向。这一天的行军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如果突然与敌人的搜索队遭遇接上火，那就麻烦了。消灭一个搜索队倒算不了什么，问题是一旦打起来发出枪声，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就要大受影响。因此，我们不得不高度紧张地隐秘行动。

到了枕峰后，布置了宿营地，派出了侦察组。不久，侦察组就带来了情报：在枕峰东部原始林里，发现了一条相当漂亮的新公路。其实，这条甲茂警备公路我们已有了解，它是穿越甲山与茂山之间无人之境的军用公路。其使命是一旦人民革命军越境而入，可以保证将“讨伐”兵力机动迅速地输送到必要的地方去。当时工程刚结束，正等着竣工检查，因此打扫得很干净，严禁一切行人通行，处处立着“禁止通行”的牌子。

日寇统治时期，他们在我们朝鲜处处划定“禁止通行”和“禁止出入”的地区，严禁朝鲜人出入和通行。平壤市中心就有好多只许日本人居住的街道，如有朝鲜人进去，日本警察甚至市井小人也对你吹胡子瞪眼。日本孩子念书的学校，朝鲜孩子连门口都不让靠近。如果不懂这个规矩的朝鲜孩子偶尔走进了日本学校操场，就要被打耳光，像赶叫花子似地被赶出来。然而，日本人的孩子却可以随便到朝鲜人的学校和居住地为所欲为，横行霸道。有一次，平壤城里的一帮日本小流氓闯入彰德学校旁边的瓜田，把瓜都给糟踏了。我和彰德学校的同学们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把他们赶回城里去了。

敌人在国境沿线划定“禁止通行”区，不准朝鲜人通行，这

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为了证明朝鲜人根本不承认日本的统治，我决定想方设法显示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威势，给修筑甲茂警备公路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从敌人在国境一带修筑甲茂警备公路和警备森严的情况来看，他们是在策划伺机报复，挽回他们在普天堡和间三峰遭到的惨败。

我召集军政干部，如实地讲明了我们面临的险恶形势，然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是在敌人的包围之中行军，前后左右都布满了敌人。敌人已经知道我们来到了国内。他们从咸镜南道、咸镜北道各地调来国境守备队、警察队等大量的“讨伐”兵力，准备着大规模包围搜索战。那个跑掉的特务，肯定打了报告，敌人也许已经搜索过青峰，经过干沧，正在追赶我们。我们必须迅速转移到茂山方面，执行在北大顶子制定的作战计划。然而现在遇到了困难。如果稍一不慎，我们就有可能完全陷入敌人的包围。怎样才能一口气开到茂山去呢？

我的话音一落，指挥员们都抢着提建议。有的说，向长白方面派个诱敌小组，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到那边去，然后隐秘地转移到茂山地区去。有的说，如果去茂山的路被堵塞了，干脆在枕峰附近打一场像间三峰战斗那样的大仗。

大家提出的方案，都很吸引人，但都不是能够迅速开往茂山地区的妙计。

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又让他们进行了讨论，然后提出了我的

方案：在敌人刚修好等着竣工检查的甲茂警备公路上，来一个白天大路行军。

听了这个方案，大家都愣住了。这也难怪，一支大部队要在大白天，而且要在普通牛车道所不能相比的，敌人为“讨伐”我们而特别修筑的公路上行进，是不可思议的。我从大家的表情中看出，他们觉得我的方案未免有点悬乎。他们的这种看法，反而增强了我的信心，认为大白天走大道在战术上也是稳妥的。

我对指挥员们说明了这个方案的战术意图和可能性。我说：

你们大家的想法，证明了我们在大白天沿着这条甲茂警备公路行军是可能的。我一提出要在大白天走大道，你们都表示惊异。这说明敌人也根本不敢想象，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会在大白天沿着他们特别修筑的警备公路行军。这就是白日大路行军的可能性。敌人认为我们不敢做的，我们却要大胆地去做，这就是这次行军的战术保证。

指挥员们都满怀着信心开始了行军。路旁盛开的金达莱花一片连一片没有尽头，把队员们的脸都映得红彤彤的。

三池渊的岸边，也有很多金达莱。岸上盛开的金达莱花，和倒映在水面的金达莱花，交相辉映，瑰丽绚烂，十分迷人，真想留在那里搭个草棚子住下来。白头高原那样的高山地带有如此罕见的佳境，确是令人惊异的。

高山地带的风景有它独特的魅力。三池渊的景色与白头山相似，气势轩昂，雄伟壮丽，且又娴雅妩媚，婀娜多姿。三池渊的风光，是山岳美与平川美融为一体的美，是金不换的佳境。

那天我凝望着三池渊的景色，又一次痛切地意识到，我们被夺去的江山是那么美丽!

我望着景色醉人的三池渊，就下决心在赶走日寇解放祖国之后，把这个地方建成为人民的休养地，让世人来领略她的美丽。我的这个愿望，如今已变成了现实。

今天，三池渊这个革命战迹地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争先恐后前来参观的胜地，成为显示高山地带特有风光的著名休养地。

1956年，金正日同志率领我国第一个革命战迹地考察团考察访问了两江道的革命战迹地。那个时候，三池渊湖畔还是一片倾倒的朽木和枯树叶，几乎没有人迹。湖里只有一条小舢板，还有一个当地人在战前为增添景色而修的旧式小亭子。

那年我结束对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正式访问刚回来，金正日同志就向我汇报了革命战迹地考察团的工作情况，并且满怀激情地谈了考察访问的心得和感受。他说，那些革命战迹地浸透着革命先烈的气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建设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搞得马马虎虎，有的地方还依旧是原来那个样子，甚至连给前往访问的人介绍革命战迹地的解说员都没有。对这种状况，他感到很痛心。

1956年，正是在思想战线上刚开始消除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斗争的时候。直到那时，我们党的思想工作还没有切实地树立主体。因此，与我们党的革命历史有关的史料和文物发掘得不多，革命战迹地也没有建设好，革命传统的研究也没有走上正轨。

在这样的时候，金正日同志决定以平壤第一中学的学生组织一个革命战迹地考察团，去白头山地区，进行考察，确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话再说回来，我们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大部队从三池渊出发，沿着甲茂警备公路开始最快速度的强行军，直奔茂山地区。那时候，我们把这种强行军叫做日行千里战术。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们多次运用过这种战术，效果很好。不过，数百人的大部队，在明亮的大白天沿着名曰警备公路的大路进行“日行千里”行军，这还是头一次。可以说，甲茂警备公路的开通仪式，由我们替鬼子举行了。我们沿着这条笔直平坦的警备公路，在光天化日之下雄赳赳气昂昂，大踏步地行军，当天到达豆满江边的茂浦，就地宿营。

日后，敌人听到我们在他们修筑的警备公路上，而且在大白天行进了那么远的路，都吓得魂飞魄散，惊呼这是“未曾有过的怪事”。

在甲茂警备公路上的“日行千里”行军所产生的影响，比消灭几个团几个师的敌人都大。

在茂浦宿营地，我召开了指挥员会议，对这次行军作了总结，然后提出了出击大红丹地区，在新四洞和新开拓一带开展军事政治活动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茂浦宿营地开到大红丹平原，在国师堂附近吃过午饭，就按计划把队伍分成两支派往两个地方。第七团经杜积巴威开赴新开拓一带，我率领警卫连和第八团直奔小芦隐山脚下的新四洞。

我们到新四洞做政治工作。当时我在一条小河边高出平地的地方指定了司令部的位置，然后带几个警卫员和传令兵，走进了村里最大的房子——伐木工人的宿舍。

群众看到我们突然出现在茂山地区，都惊喜交加。他们激动地说，这么多的军队，要的什么魔术，从哪里来到了茂山？鬼子说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去年冬天都冻死了，这全是骗人的鬼话。

伐木工人的宿舍，简直跟牛棚马厩差不多。屋里有一条横穿于中间的长绳子，看上去很特别。我问他们这是干什么用的，工人们说这是睡觉时放腿的。因为屋子太挤，工人们睡觉时只好排成两行，脚对脚地躺下，把腿放在这条横在中间的绳子上。

工人们受到的待遇，甚至连牛马都不如。不管怎么说，牛马总还能得到人的保护吧。

这天晚上，宿舍里来了很多人，屋里挤不下，连院子里都挤满了人。我对他们讲了话，也做了一些组织和政治工作。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夜里我们受到新四洞群众的至诚款待。这个山间僻地，群众靠着刀耕火种过日子，连种子都不够，当时不少人家还没播下种子呢。尽管这样，妇女们说好不容易盼来了金日成将军率领的朝鲜军队，给我们做了黄米饭和土豆面吃。我们的战士都深受感动，临走时把背囊里的备用口粮都倒出来，送给了他们。金正淑同志把仅有的一点白面也拿出来，给主人家做了一顿片儿汤，还给这家女儿裂了口子的手涂了雪花膏。我们走的时候，新四洞老乡们都哭了。

我预计到在新开拓受重创的敌人一定会追赶我们，所以决定

在地形有利的大红丹平原上消灭他们。于是就从新四洞开到大红丹，选择有利的地形设了埋伏，等待吴仲洽的第七团从新开拓赶回来。第七团按照我的命令到新开拓发出枪声痛击敌人之后，立即走上了归途。然而，他们因为全歼了新开拓的敌人，还俘虏了好几个日本工头，心里不免有点飘飘然，以致有敌人隐秘地尾追着他们都没有觉察到。这股敌人，是接到新开拓挨打的告急电后紧急出动的国境守备队和仓坪警察队。

起初，我们的人以为跟在七团后面的敌人是自己人。因为当时有雾，看不清楚，加上敌人也利用浓雾做掩护，紧紧地跟着我们的第七团。所以，我们的人也未能很快认出来。

我一眼就看出了戴钢盔的是敌人。情况照我的预料出现了，但敌人的枪口正瞄准我军的第七团，情况十分严重。因为敌人紧跟着第七团，我们埋伏的第八团和警卫连的战士们要开枪，就必须特别小心，否则就会伤着我们自己的人。但又不能拖长时间等待敌我两队之间的距离拉长。如果我们拖时间，敌人也许会抢先下手打我们的第七团。要是那样，后勤人员和背着战利品跟在队尾的好多伐木工人就会大受损失。

我等走在敌人前面的第七团全部过了我们的埋伏地时，对着队尾的后勤人员和伐木工人发出立即卧倒的信号，同时下达了射击命令。

我们的几百条枪同时开火，那枪声惊天动地，大快人心。指战员都异常兴奋。一想到全国各地人民都能听到这枪声，身上就涌出无尽的力量和激情。我也跟他们一样激动兴奋。我们的齐

射，打倒了大片的敌人。但活着的敌人却凭险顽抗。国境一带的军警，比别的军警更愚顽，更残忍狠毒。他们的反抗也很顽强。看来，日本人是选拔他们的精粹分子派到了国境地区。

夹在我军和敌军当中的第七团后勤人员和背东西的工人，在冰雹般密集的枪弹下，头都抬不起来。工人都不知所措地瞎闯，其中还有几个日本人。

这时，战场上出现了奇异的现象。背东西的工人分成了两拨儿，朝鲜人都带着东西向人民革命军这边靠拢，几个日本人则扔下东西歪斜地朝日军那边爬。朝鲜工人没有一个跑向日军方面的。

我看着这个情景，又一次深切地意识到，民族的血统是隔不断的。

这天在大红丹与我们交火的敌人，基本上被全歼了。

我军有两名受伤，一名牺牲。牺牲的队员叫金世玉，是马东熙的妹妹马国花的爱人。他是跟第七团司务长一道带领随七团来的群众躲避时，被子弹打穿了胸部。看他的伤口，觉得没有救活的希望。背着金世玉走的是金成国。我还记得当时金成国的脊背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

在渡过豆满江的时候，我们叫伐木工人们回去。可是他们继续跟着我们，说他们的救命恩人金世玉生命垂危，不忍心走开。

队伍过了豆满江，金世玉仍然昏迷不醒，处在濒危状态中。他牺牲的时候，我们都哭了。随我们来的群众也都悲痛地流下了眼泪。

我们在长山岭脚下安葬了他。解放后，我们找到了他的遗

骸，迁到大红丹进行了安葬。

在长山岭脚下安葬金世玉的那天，我们把身受重伤的南东洙送到附近的一个密营去了。他在那个密营度过了一百多天像鲁滨孙(英国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译注)那样的生活。他一个身受重伤手脚不灵便的人，在同部队断了联系后孤立无援，又无一粒粮食的情况下，坚持度过了一百多天。听了这话，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但这是事实。

本来有一个负责护理他的人，是从山林队过来的中国人，大家都叫他“老丁头”。他是听了日本鬼子诬蔑人民革命军是“匪徒”的宣传，为了捞钱投到我们队伍来的。他原以为，加入“共匪团”能比当山林队抢劫更多的钱财，可他投到我们这边来以后，看到人民革命军不是以抢劫为业的匪徒，而是文明的军队，就意识到革命军不是他这样的二流子久留之地。于是他打定主意，杀掉南东洙后跑回老家去。他以为，杀一个共军，回到老家才能平安无事。

南东洙识破了“丁老头”的黑主意，在黑夜里悄悄爬出草棚，钻到枯叶下面藏了起来。过了两天，等那个老头走了才钻出来。从此，他挖草根剥树皮吃，还抓松鼠和蛇类充饥，一天天艰难地维持着生命。后来他见到了我们派去的联络员，可这个联络员因遭到敌人的“讨伐”牺牲了。他又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为了归队，四处寻找，但没找到。后经他母亲做地下工作的甲山到达东满，参加了中国革命。后来我们召唤他回到了祖国，记不清那是哪一年了。

他见了我，泣不成声地说：“我连将军送的毛毯都丢了，今天才回来。”

我们的战友在茂山地区留下了很多足迹。外号叫“瓮矮子”的郑日权同志，也和朴成哲同志一道在红岩一带开展过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者听到朝鲜人民革命军出现在茂山地区，在大红丹平原消灭了他们的大批军警，然后又从容不迫地渡过了豆满江，都惊恐万状。朝鲜人民革命军只要在国内露一下面，他们就吓得魂不附体。

南湖头会议以后，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主要活动舞台是白头山西南的西间岛一带。自从我们转移到白头山地区以来，朝鲜和满洲的通讯与报刊都大量报道过我们在西间岛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的消息。自惠山经新坡以至中江镇一带的鸭绿江沿岸的军警，为阻止朝鲜人民革命军“越境侵入”，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强化了警备。

咸镜南道警察部经常搜集我们的活动情况，汇编成情报资料，标以所谓的《对岸匪贼状况》，定期向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和驻朝日军司令部报告，同时通报咸镜北道、平安北道等边境各道警察部和罗南十九师团司令部等。日本军部和警察系统一些有头脑的智囊，甚至打卦问卜，企图预测我们在何时何地做何事。

然而，我们突然出现在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白头山地区，而且打入他们的国境守备兵力严阵以待的茂山地区，一举消灭了调来“讨伐”我们的大批军警，然后像一阵风似地消逝不见了，他们能不大惊失色吗？敌人的失策在于他们做了错误的估计。他们

以为，由于热河远征的严重后果和“艰难的行军”中受到的损失，朝鲜人民革命军可能已落到了无力维持、濒于毁灭的地步。他们还以为，“所剩无几”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可能在长白、临江等鸭绿江沿岸或濛江、抚松那样的北部东边道深山密林里勉强生存。

茂山地区的战斗，同普天堡战斗一样，是我们在国内进行的军事活动中规模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战斗。如果说普天堡战斗宣告了朝鲜没有死，朝鲜仍然活着；那么大红丹战斗则可以说，是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斗。它用活生生的事实证明，敌人大肆宣扬已被全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越战越强，继续不断地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朝鲜人民革命军在茂山地区发出的枪声，让国内一些灰心丧气的人看到了朝鲜革命仍在乘胜前进，增强了他们对胜利的信心；给由于“惠山事件”而一时萎靡不振的国内革命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我们在茂山地区取得的军事上的胜利，彻底戳穿了敌人进行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已经溃灭的欺骗宣传，把他们的阴谋诡计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自从这次战斗以后，即使敌人说黄酱是黄豆做的，我国人民也绝不再听信他们的话了。

经过茂山地区的战斗，工人、农民等国内各阶层的广大人民，都满怀着只要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就必将迎来祖国光复之日的坚定信念，踊跃地投入了抗日革命的洪流。

五　玉石沟的端阳节

大红丹战斗以后，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转移到了白头山东北部，在豆满江沿岸纵横驰骋，积极开展军事政治活动。这个时期的军事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乌口江战斗。在群众政治工作中，最为精彩的是玉石沟的端阳节联欢。

和龙县玉石沟，是茂山郡对面豆满江畔的一个山村。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大红丹一带进行现场指导的日子里，曾在豆满江畔感怀深切地追怀往事，对茂山地区战斗之后，在白头山东北部开展军事政治活动时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史实，作了回忆。

我想起了1939年端阳节那天，在玉石沟赛足球的往事。岁月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说打游击的人还搞过足球赛，有些人可能不相信。但要知道，打游击战也不是一年四季老在劈里啪啦地开枪打仗。那时候我们虽然在打仗，但也根据游击队的特点，安排一些文体活动。30年代前期，在游击区常常举办运动会，汪清游击队还有不少出类拔萃的足球运动员呢。

第二次远征北满的前夕，在罗子沟曾举行过一次足球赛，在玉石沟也举行过足球赛，都是别开生面的球赛。间岛地方的朝鲜人，都爱好足球。在间岛，踢足球最出色的是龙井人。

打过大红丹战斗以后，我们按照预定方案将斗争舞台转移到

了白头山东北部，为的是把这一带变成我国革命的战略基地。这年5月下旬，在安图县大沟召开的军政干部会议上，我提出了在白头山东北部一带加强军事政治活动，建立又一个强大革命堡垒的方针。解散游击区以后新建的我国革命的根据地，大都在西间岛一带和以白头山为中心的国内许多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在白头山东北部和豆满江沿岸北部朝鲜一带再建立一些新的革命根据地，就能把朝鲜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基地、作战基地和后勤基地扩大到全国疆土上去，并依靠这些根据地更有力地推动整个朝鲜革命向前发展。

所谓扩大和发展革命斗争，不是别的，最根本的就是壮大作为革命动力的群众队伍，其次是扩大活动据点，再次是扩充武装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去解决人、地、枪这三个问题，并且不断地扩大这三种力量。可以说，这就是深化和发展革命。只要有人、有领土、有武装，就完全能够保卫革命，扩大和发展革命。

要确保革命根据地，就要以积极的军事活动钳制敌人，创造一个能够在群众中自由开展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工作的有利环境。这样，敌人才阻挡不了革命军的活动。大红丹战斗后，我们一过豆满江就紧接着进行了许多战斗，诸如东京坪战斗、辉枫洞战斗、乌口江战斗、青头村战斗和青山里附近木材所的袭击战，等等。这每一次战斗，都是为了从军事上钳制敌人，给人民革命军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

每当打过一仗，我们就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进行政治工作

和组织建设工作。玉石沟的端阳节军民联欢，就是我们开展的颇有特色的政治工作的一例。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们就根据当地情况，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开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积极促进群众的革命化，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这是我们传统的工作方法和一贯的活动方式。

在玉石沟的端阳节联欢，本来不是我们预先计划的活动。当时敌人控制很严，正是形势险恶的时候，因此，过端阳节之类的事是连想都不敢想的。玉石沟的端阳节联欢，是在茂山地区进攻战斗之后，我们到和龙同人民群众接触过程中才决定举行的。

我们来到间岛地区发现，这里的人民群众和其他地方一样，也失去了胜利的信心，情绪十分消沉。我们在和龙最先碰见的人，是两个种地的兄弟。这兄弟俩都是大烟鬼。那个时候的东北，大烟鬼触目皆是。那是大烟代替钞票的时候嘛，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烟这个东西，是个世道越坏越乱，传布得越快越广的东西。这两个农民兄弟，是在朝鲜过不下去了，乘着移民的风潮来到间岛谋生的。

我见这两个年轻人仪表堂堂，却抽上了大烟，觉得很奇怪。我对他们说，要种地就要有结实的身板儿，你们怎么抽上了大烟？这大烟是损人筋骨、坏人心神的毒药啊。

他们毫无愧色地说，如今这个苦难的世道，不抽大烟怎么活下去啊。我们不是想活才活着，而是死不了才活着，这就是我们的人生。那么多的烦恼和苦难，要把它们抛到九霄云外去，除了

抽大烟，还有啥法子。起初也想用酒解愁的。酒这个玩艺儿，要大伙凑在一块儿，你劝我我劝你，热热闹闹地喝才有意思。可是日本鬼子不让，连节日里几个人聚在一起玩玩，也说是犯法，还能放心喝酒吗？这样，就抽起大烟来了。

他们还说，端阳节快到了，连聚在一起喝碗黄酒都不让，还有啥意思？从前在家乡的时候，端阳节一到，比摔交，比秋千，还用艾蒿笋做糕吃，玩得多快活。如今当了亡国奴，连节日的娱乐都不敢想了。

听了他们的诉说，我心里很难过。人心里要是没有一个梦，活着也等于行尸走肉。人生在世，是因为活着有意思才活着，不是为了吃饭睡觉而活着。所谓活着有意思，意味着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指的就是人要享有人的权利，并且完全行使人的权利，创造和享受人应有的生活。然而这两个抽大烟上瘾的兄弟，却没有这样的意义和价值。被禁锢的人生，算什么人生啊。那是生存而不是生活。没有生活的生存，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可言的。

我本来从小就不正眼看待大烟鬼，但对这两个年轻人，却不禁感到同情。

我劝导他们说：

在这决定民族存亡的严重时刻，一个朝鲜青年只求自己的安逸，抽大烟虚度岁月，这是不能饶恕的罪过。你们看，那些年纪还小的传令兵和女战士都为挽救国家于危亡，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你们不觉得惭愧吗？快把大烟戒了吧。

那个当哥哥的搔着后脑勺说，自己一直无所用心，抽大烟混日子，实在很羞愧。

我看了他们兄弟俩之后心想，我们一定要更加积极地开展军事政治活动，让人民群众都满怀着希望，挺起腰杆儿过日子。不过，只凭政治工作，讲话宣传，还不能提高人民的士气。人民群众是愿意亲眼见到和亲耳听到革命胜利的。而这种胜利就是战斗的胜利。30年代是一声枪响的效果远远超过五斗演说的时候。

因此，我们加强了政治工作和军事活动。我们先消灭了那两个农民兄弟住的辉枫洞及其附近集团部落的敌人。因为打得很猛，敌人还来不及还一枪就被打垮，仓皇逃跑了。辉枫洞群众看了，都拍手称快，欣喜若狂。

我们转移到白头山东北部以后，连续攻打了豆满江沿岸十几个集团部落，消灭了好几百敌人。这样一来，敌人愈加气急败坏，拼命想阻止我们的活动。当时正是日本关东军挑起了哈勒欣河局部战，数万兵力投入前线，敌人称为“非常时局”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人民革命军在敌人的大后方连续发出了枪声，敌人自然是惊恐万状的。

和龙一带的山区布满了敌人。有一天，我们的参谋长用望远镜观察敌人的动静，看到敌人调来了大量的“讨伐”兵力，不免有些紧张。他回来对我说，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了，要是继续打下去，恐怕会有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我们从建军的头一天起，就一直同占几十几百倍优势的敌人作战，从来没有同居于劣势的敌人打过仗。因为敌众

我寡，就放弃作战，是不像话的。我们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要想出神妙莫测的战术，连续打击敌人，叫敌人喘不过气来。

这时候，我们司令部收到了一份敌情报告，说一个在中国华北战场立了突出“战功”，受到日本天皇表彰的日军将校来到百日坪指挥“讨伐队”。这个家伙本来是得了战功奖准备回国休假的，听说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在安图、和龙一带连续攻打集团部落，就大言不惭地说，区区一支游击队都消灭不了，老吃败仗，这是皇军的耻辱，日本国民的耻辱。我一定要全歼金日成的部队，洗雪这个耻辱。看来，这是一个自命不凡、虚荣心很强的家伙。听说，他胸前刺有“阿修罗”的图象，摆出一副无敌骁将的架势。“阿修罗”，是佛教里讲的好战的鬼神。

从百日坪回来的侦察小组，除了有关这个“阿修罗”的情报外，还带来了另一个情报，说和龙县的日本警察正在准备端阳节送给我们的礼物。想想看，一方面是得了天皇表彰的恶魔推迟了回国休假，主动来到百日坪要“讨伐”我们，另一方面是日本警察正在准备送我们的节日礼物，这不是世上罕见的一幅漫画吗！如果准备礼物确是事实，那么这真是古今内外绝无仅有的人间喜剧了。当然，敌人决不是真心实意地为了祝贺我们，才准备节日礼物的。

我断定，敌人如此轻狂，是因为他们挨我们的打还嫌不过瘾。因此我决心狠揍他们，订出了把百日坪的敌人诱到乌口江方面来一举全歼的战术。

我们选择的战场，是离百日坪不远的一片芦苇地。乌口江横

穿其中，江的一边是一条汽车道，江和汽车道两边是芦苇和树林，是个打埋伏的好地方。当晨雾开始消散的时候，敌人出现在乌口江岸的汽车道上。他们全副武装，好几挺机枪打头阵，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当他们的全部人马都进入我们的埋伏圈时，一个腰挎军刀的将校突然停在一条水沟边上，大声说发现了可疑的脚印。他这一喊，全部人马都停止了前进，几个军官跑了过去，对着那条水沟歪着脑袋叽叽咕咕。大概是我们的哪一个人在那里留下了脚印。

当那个人刚从水沟边上抬起头的时候，我下了射击命令。转眼之间战斗就结束了，二百多个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当俘虏的当俘虏。那个挎战刀的家伙，军刀还没抽出半截，就栽倒在水沟旁不动了。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的时候，把那个被打死的日军军官的前胸撕开一看，这个最先发现我们脚印的挎军刀的家伙，正是那个自称阿修罗的“讨伐队”队长。我们的队员都对着他的尸首嘲笑说，乖乖地回去休假还能保住一条狗命，何必要逞能做了黄泉鬼。

这场战斗，就是又称百日坪战斗的著名的乌口江战斗。赵明善曾写过一篇有关这场战斗的回忆录，我也看过。敌人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以后，再也不敢来犯这个山沟了。从这时起，群众就把乌口江流域的村子叫做闭门村，意思是闭门不让敌人进来。乌口江流域的闭门村多了，我们也就能够放心地开展政治工作了。

玉石沟的端阳节联欢，也是一个庆祝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乌口

江战斗和豆满江沿岸的多次战斗中取得光辉胜利的活动。

豆满江沿岸的村子呈现出了一派节日的景象，像迎来了解放似地热闹。青壮年们准备了秋千，修好了摔交场，说今年的端阳节要开怀乐一乐了。

我们在乌口江战斗后撤离战场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庄稼人给我们带来了烟酒等好些食品。我们还以为是群众送来慰劳我们的。可是出乎意料，他却摇着手说，这不是他们准备的礼物，而是和龙县警察头子赠送给金日成将军的节日礼品。这证明了侦察小组带回来的情报是确实的。

敌人送来的礼品里还有一封密封的信，是给吴白龙的。敌人特别写上了他的名字，说明他们了解吴白龙是我所信任的人。信的大意是：你们同日本帝国打仗已快十年了，谅对其实力已有清楚的认识。趁此端阳节之际，收下这礼物，放下武器，按时进岁贡，如何？若无视警告，必遭灭顶之灾。

后来了解到，这封信是一个叫宇波的人受其上级之命写的。这个人是在和龙县一带指挥警察“讨伐队”的，还兼任着和龙县警务科长。他年轻时来到满洲，立下了愿为反共贡献一生的誓言，开始了在领事馆的警察生涯。

我们第一次同他交火，是在1932年秋天。我们从远征南满回来就攻打了软化县城。当时，宇波就在城内的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里拼命顽抗，没有被打死。而且就是为了这个，他还受到了表彰。日军有个制度，不管胜败如何，凡是在战场上死了的，都给晋升一级，还发一大笔赏金，负伤的也发赏金。因为是资本主义

国家的军队，一切都用金钱摆布嘛，只能用这种办法鼓舞士气了。李道善也在死后升了一级。

宇波在东满许多地方当过警察，在警察情报系统里步步高升，1939年居然当上了指挥几百人的警察“讨伐队”的头子。

事后他对一些记者说，他给我们的信是警告书，可是在我们看来，却像个请求信。他们用刀枪奈何不得我们，又不惜使用这种哀求的手法想把我们除掉。

按说，要发警告书就该选好时机，也就是说，当对方陷于被动进退维谷或已精疲力尽无意作战的时候，把警告书发出去，才能奏效。然而，宇波既没有选好时机也没有选准对象。当时我们并不处于被动地位，而是完全掌握着主动权；我们的武装斗争不是走下坡路，而是方兴未艾地蓬勃发展。朝鲜人民革命军无论在力量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居于优势地位。显然，宇波既害怕我们，又低估了我们，他以为我们已经濒于绝境了。

他给我们送警告书时，咸镜北道警察部长筒井按照朝鲜总督南次郎的指令，正带着许多慰问品和一帮记者去慰问在茂山郡三长面一带被我军打得头破血流的军警。在普天堡战斗后，总督也曾派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带领一个视察团，到普天堡战斗现场进行过事后调查。

宇波在所谓警告书中恐吓我们遭“灭顶之灾”，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我叫吴白龙给他回了一封信。

吴白龙虽然不是文人，这封回信却写得蛮不错，很有气势。

信中口气强硬地说：你们“讨伐”了我们七八年，除吃尽了苦头，得到了什么呢？你们除了充当我们的武器供应队和粮食运输队而外，又做了些什么？可笑可怜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适可而止吧，早早卷起铺盖回你们妻子等待的老家去，如何？过几天就是端阳节，你们准备好饼干点心等我，我要到你处去做客，好好教训你们该怎么做。

端阳节这天，我让人把方圆三十里以内的群众都请来参加运动会，辉枫洞等邻村的人，凡是能走动的都请来。

玉石沟有一块台地，有几公顷大。我们就在这里立起了球门，举行足球赛。当时在和龙一带，敌人集结了大批的“讨伐”兵力。我们就在这些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若无其事地从从容容地举行节日联欢，还赛足球。这个消息一传开，那效果要比打几场胜仗和进行洋洋万言的演说大多了。在敌占区搞联欢赛足球，这也是我们独出心裁、别具一格的政治工作方式。

革命军和当地青年的一场足球赛，十分热闹。论技术，当然是谈不上的，战术安排也稀松。可是两队选手互不相让的劲头，和不时踢空了球摔在草地上打滚的样子，常常逗得观众纵声大笑，前仰后合。

老年人说，自从有了这个玉石沟以来，像今天这样人人畅怀大笑，把一切苦恼忧愁都抛到九霄云外，还是头一次。

足球赛踢了个平局，都没有得分，但在政治上，都得了满分。

秋千赛、摔交赛也都很热闹，军民联欢会和文艺演出呈现一片欢乐景象，大家频频要求一唱再唱，因此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

间。群众都十分高兴，感谢革命军为他们组织了端阳节联欢。

这天，在玉石沟有好几十个青年志愿报名入伍。这说明，我们的政治工作深深地打动了群众的心灵。应当说，体育比赛和联欢也是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

今天，我国有几百几千个剧场、电影院和文化会馆。连机关和企业的礼堂都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个聚会场所。这是可以充分地进行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的极好地方。然而，我们的干部却没有好好加以利用。花很多钱盖了房子，却只在举行什么重要活动或开大会时才用那么几次，平时就扔在一边不管。充分利用这些建筑，经常举办科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讲演会和诗歌朗诵会，或者举行同著名的科学家、作家、文艺工作者、体育健将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座谈会，该有多好!抗日游击队时期，我们没有麦克风，更没有剧场和广播电台，但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坚持不懈地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工作。

从那次联欢以后，玉石沟及其附近一带的人民群众一直很好地帮助我们坚持了斗争。我相信，辉枫洞的那两个抽大烟的农民兄弟，也一定都戒掉大烟，加入了革命组织，做好了革命工作。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促进豆满江沿岸一带村庄革命化的工作，并没有只停留在和龙一地。他对国内革命也倾注了很大力量。这年端阳节的前几天，他来到国师峰，召开了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和政治工作员会议。国师峰位于豆满江支流西头水的一边。

在筹备和召开国师峰会议时，承担主要任务的是政治工作组的负责人李东

杰。金日成同志每当提起国师峰会议时，总是以格外亲切的情感回忆李东杰，赞扬他是忠实的指挥员。

大红丹战斗以后，我们回到和龙立即召开了司令部党组织的会议，撤消了李东杰的处分，并交给了他做国内政治工作的重大任务。

当时，国内革命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恢复因“惠山事件”而遭到破坏的地下革命组织。我们派李东杰到茂山地区去，准备在那里组建像过去由李悌淳和朴达所建立的那样强有力的地下革命组织。我告诉李东杰说，我准备到国内去，在茂山一带选择个适当的地方，召开一次国内地下组织负责人和政治工作员的会议，你要预先做好准备。

李东杰真地做好了准备。他先到豆满江沿岸中国人聚居的村庄里，了解和结识了当地的朝鲜人，然后通过他们的关系，频频出入国内，既找到了组织关系，又扎扎实实地做好了开会的准备。

那时候，由金正淑负责司令部与李东杰的联系，积极帮助李东杰的工作。我们派金正淑到豆满江沿岸边境的村镇，经常同李东杰保持联系，把我们的指示和意图及时地通知他。茂山郡三长面一带的农民由于缺少耕地，一到夏天就过江到中国境内开荒种地，秋后再带着打下的粮食回到国内来。茂山人把这种种地方法叫做“到间岛种田”。甲山地方的农民也有不少“到间岛种田”的。金正淑先结识了这些“到间岛种田”的农民，通过他们保障了同国内的联系。

在实现茂山、延社地区革命化方面，李东杰和金正淑起了主要作用。

李东杰接受任务还不到二十天，就做好了会议的准备工作。那天，由李东杰带路，我跨过豆满江的堤坝来到了定为会议地点的国师峰。国师峰会议讨论了扩大地下革命组织，推动朝鲜革命继续高涨的一系列措施。

会后，李东杰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他要按照国师峰会议的方针，把自己在三长地区组建的革命组织扩大到延社地区去，树立党组织的典范和祖国光复会组织的典范；其二，为了把政治工作的方法教给国内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最好让出席国师峰会议的人都参加玉石沟端阳节的联欢活动。

对他的这两个建议，我都同意了。

会后，李东杰跟我们一起在玉石沟度过了端阳节，然后到一个秘密据点去，向祖国光复会组织传达了国师峰会议的方针，并同一个国内组织的人联系好，做了去延社地区的准备工作。不料，他在这个据点突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身受重伤被捕了。

他被捕后，一个地下组织的同志把他寄放的秘密手册，送到了乌口江的密营。这个手册里，有他用密码记下的安图县大沟、和龙县玉石沟以及国内三长、延社一带地下组织的情况和在延社地区的工作计划。李东杰为了防备万一，把他平时的记录材料都寄放在地下组织成员的家里。

据朴达说，李东杰在监狱中的表现也很好。他常用敲打墙壁的方式同隔壁的难友取得联系，鼓励难友们在狱中坚持斗争。在

法庭上也表现得很好。每当被提到法庭上去的时候，他总是最先高呼“朝鲜革命万岁”，显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

李东杰也和金周贤一样，在工作中曾犯过严重错误。但是，他在革命实践中改正了错误，很好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人不是机器，工作中难免犯错误。怎样对待自己的错误，就要看各人的思想水平和修养程度了。李东杰犯了错误后，自我检讨做得很深刻，被解除了团政委的职务后，思想锻炼也搞得很好。所以，他很快就重新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在他受到批评和处分时显现得最清楚。缺乏修养的人，一旦受到组织上的处分，不仅不诚实地反省自己，反而牢骚满腹，什么过分啦、冤枉啦、夸大啦，而且用种种方式对批评他的人进行报复，以致疏远了同志。在同一个革命岗位上共事的同志之间，彼此不交心，关系不融洽，有什么意思啊。不向同志交心的人，就会讨人嫌，就会被集体所唾弃，成为离心离德的人。

有修养的人，不管同志们的批评多么严厉无情，都能够虚心诚恳地接受。这样的人，把同志们的批评当作补药。金周贤和李东杰虽然受到了严重处分，被从指挥员的职位上革了职，却从没有灰心丧气或自暴自弃，他们彻底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把同志们的批评当作补药，虚心接受并完全消化了的缘故。

看一个人接受批评时的度量，就能看出他的人格和修养。李东杰是人格与修养都堪称楷模的共产主义者。

李东杰虽然牺牲了，但他为革命献出的心血，却在豆满江沿岸和国内腹地燃起了无数的火炬。李东杰被捕后，金正淑接替了他的工作，到延社地区去同当地革命组织挂上了钩，并按李东杰的愿望组建了一些党组织和祖国光复会组织。这些组织为全民抗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豆满江漂着革命者的血痕，我们决不能漠然视之。

六　女战士的革命气节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生前常常回忆起那些未能看到祖国的解放，在战场或绞刑架上英勇牺牲的女战士，以及那些直到最后时刻仍忠于革命情义的女队员。

在这一节里介绍的，是慈父领袖回忆在我国革命经受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那些为了维护革命利益，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坚守了共产主义者气节的女战士们时所作的讲话的片段。

我看了新建的革命烈士陵园，感到十分满意，为建设好烈士陵园，你们都很辛苦了。

安放在这里的烈士中，有十多名女战士，这是了不起的。她们是值得立半身像，值得立碑刻上名字的同志。

李顺姬是共青干部，她的工作做得很好。她在汪清地方，一度当过儿童局长。我很熟悉她，是个坚贞不屈的女战士。敌人小看了这个年轻的姑娘，企图逼她供出组织的秘密，但这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的事。她遭到了严刑拷打，始终没有泄露秘密。这样的革命战士，应当向后代进行宣传。

张吉富女士并不是游击队员，但是，她不愧为培育了马东熙的革命家的母亲，一辈子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她还把自己的女儿和儿媳也送到游击队去，自己又做照料革命者的工作。她儿子、

女儿和儿媳都参加了武装斗争，后来都阵亡了。手持武器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是英雄。那时候没有授予英雄称号的制度，如果有这个制度，张吉富女士的儿女们早就是英雄了。张吉富女士是培育了三名英雄的母亲，所以应该安放在革命烈士陵园里。张吉富女士直到晚年，还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除了张吉富女士以外，其他女同志都是手持武器同我们一道走过了抗日革命征途的女队员。

在安放金策和姜健同志的行列里有两名女战士，可以说，这说明了我们的女战士在抗日革命斗争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金一、林春秋、崔贤等革命老战士一再向我恳求说，把金正淑安放在那个行列里是人民群众的一致愿望，也是战友们的一致宿愿。

推荐把崔希淑安放在这个行列的是我。她是有资格排在最前列的革命战士。把金正淑和崔希淑并排在一个行列里，这从她们在抗日革命时期结成的友情来看，也是很自然的。金正淑在桃泉里一带执行艰巨的敌后工作任务时，崔希淑打进叫做腰房子的一个村庄，暗中帮助她开展工作。金正淑之所以能够在新坡自由地开展建设组织的活动，是因为崔希淑蹲在腰房子里积极帮助了她的工作。1939年秋，在乌口江一带缝制大量的军装的时候，崔希淑和金正淑同心协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高度评价崔希淑在缝制军装中的高度责任心和所取得的成果，把金戒指和手表作为礼品赠给了她。

在朝鲜人民革命军女队员中，崔希淑属于老战士。她的入伍

时间，大概是在1932年。1932年，不正是在东满各县大量涌现出反日武装队伍的一年吗？在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里虽然有不少女队员，但在1932年入伍的女同志还是不多的。在1932年扛起枪的女队员，应当受到老战士的待遇。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是1936年春，那年春天，有许多在延吉、和龙地区活动的女同志编入我们的主力部队。金正淑和崔希淑也在那个时候编进主力部队。

女队员们都管崔希淑叫姐姐。男队员当中也有许多人叫她姐姐。论年龄，崔希淑可以说是我们的大姐。她比我大好几岁，在女队员中她的年龄仅次于金明花和张哲九。

战友们把崔希淑叫做姐姐，这不仅因为她年龄大，还因为在日常生活和执行任务中，她一向给人们做出了榜样，对战友们关怀备至。她在地方组织做了几年共青工作、妇女会工作和反日部队的工作，所以政治素质高，组织能力也很强。因此，我经常交给她艰巨的任务。小哈尔巴岭会议之后，继续叫她担任朝鲜人民革命军缝纫队负责人，这是我们对她信任的表示。

主力部队的指挥员和战士，都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崔希淑那坚贞的忠诚精神和高度的革命精神。她的模范行动一向使战士们深受感动。我也不止一次地为她的崇高情义和高尚风格赞叹不已。那是在“艰难的行军”时目睹的事情：夜阑人静了，崔希淑还坐在篝火旁烤着冻僵的手，替战友们缝补刮破了的衣服。她一连几天光喝清汤，但完不成任务绝不罢休。评工作成绩的时候，她每次都推重战友。缝制军装的工作结束之后，在表彰有功人员

的时候，她得了金戒指和手表后惶恐不安地说，“制作军装，大家都很辛苦，可我一个人受到这样特殊的待遇怎么行……”。那时她那难为情的神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小哈尔巴岭会议之后参加小分队工作的崔希淑，带着重要情报回司令部时，遇到了敌人的“漫山讨伐”。所谓“漫山讨伐”，是像用篦子梳头那样漫山搜索的意思。发现小分队的敌人，为了活捉游击队员而疯狂追击。崔希淑在同敌人的战斗中，被子弹打穿了大腿，落入到敌人的手中。

敌人为了逼出秘密，对她进行了不可言状的严刑拷打。最后甚至剜掉了她的两只眼睛。但是，任何拷打和威胁都未能动摇崔希淑那坚定的革命节操。

她在刑场上这样喊道：

“现在，我的眼睛没有了。但是，我看到了革命的胜利！

敌人在女革命战士面前魂飞魄散，甚至把崔希淑的心脏剜出来，要看看共产主义者的心脏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者的心脏岂能有什么不同。心脏上既没有革命者的标志，也没有反动分子的标记。但革命者的心脏是为祖国、民族和革命同志而跳动，而叛徒的心脏却总是为自己而跳动。

敌人抓住崔希淑后，夺去了我奖给她的金戒指，但是敌人夺不走深藏在她内心的对我们的信赖和情义。

敌人虽然剜掉了崔希淑的心脏，但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这种道理。

不热爱祖国的人，既不会了解革命气节是什么，也不能理解

蕴含在共产主义者生命观中那美好高尚的精神境界的高度。

我们听到崔希淑牺牲的噩耗，都感到痛惜，因为她未能看到盼望已久的祖国解放的那一天，就离开了我们。女队员们都哽咽着吃不下饭去。

我久久地沉浸在悲痛之中。可是，我们从她的遗言中也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崔希淑在被敌人五花大绑、夺去了两只眼睛的情况下，仍然高呼“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她的这句话，显示了多么坚贞不屈而自豪的革命气概啊！“看到了革命的胜利”这句话，不是任何人都能说得出的，只有那些坚信自己的革命事业的正确性和真理性的人，只有那些具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气节的战士，才能说出这样的名言。这句名言，也可以说是女战士崔希淑一生的总结。

“看到了革命的胜利”这句话，今天在我国人民和青少年中间，成了象征革命乐观主义的金玉之言。女战士的喊声，至今仍在我国人民的耳畔铮铮响。

我提倡乐观主义，也喜欢乐观的人。天塌下来也有我一条活路，这也是我所重视的座右铭之一。我之所以历经艰难辛苦，能以健康的身体毫无动摇和偏向地领导革命和建设，就是因为坚持了乐观主义。

崔希淑在失去了两只眼睛，看不见一道光线的情况下最后所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这句话，表现了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坚强意志和坚贞不渝的信念。

我再强调一遍，崔希淑是经受了艰苦考验的、不愧为站到我们革命队伍最前列的女革命者。

崔希淑的丈夫朴元春被押到西大门监狱，也经受了狱中的非人生活。

像崔希淑这样英勇牺牲的女战士，不止一两个。

安顺和的牺牲也是如此。一个人这样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不容易的。她是李凤洙的妻子。李凤洙做军医的时候，安顺和在同一个部队里任缝纫队负责人。原来他们有五个子女，但这些子女在游击战争中都与父母生离死别了。老大受了冻伤，把两只脚的脚指头全部割掉，随同重患者去了苏联；老二患麻疹，后来死了；老三被侵入游击区的日军刺死；老四饿死；老五送给了人家，至今还不知死活。李凤洙发表了好几篇回忆录，如果那老五还活着，就一定会找父亲的。可是，我至今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如果那孩子是两周岁以前送给人家的话，就无法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的养父母也可能不告诉他有亲生父母。

1938年春，安顺和被敌人逮捕。有一天密营的游击队员们按照司令部的命令，正准备开往南满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敌“讨伐队”。

当时驻在这个密营的，多半都是医务人员和缝纫队员。安顺和被敌人逮捕之后，遭到了严刑拷打。

敌人对安顺和逼供审讯，让她说出游击队的去向、粮库、弹药和药品仓库。“讨伐队”队长还用一些甜言蜜语引诱她：为着那毫无胜利希望的战争流血、献青春，不感到可惜吗？

那时候如果安顺和慑于敌人的刑讯，老老实实地招供，敌人是不会杀死她的。

当时敌人对归顺者不处以刑罚，而实行“优待”，妄图以此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如果在归顺申请书上写明作保人，盖上手印，就是那些昨日还高喊“打倒日寇”参加武装斗争的人，也是能活命的。

安顺和身为一个柔弱的女子，却战胜了敌人的利诱和拷打，真是了不起的事。敌人对她开头是拳打脚踢，还乱拔头发。当安顺和喝斥敌人是“浑小子！”“坏蛋！”顽强抵抗的时候，敌人说用子弹太可惜，便往她的胸口和肚子上钉柞木桩。

通常人们手掌上扎进个刺，也疼得钻心，何况一条木桩深深刺入她的肌体，该是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

安顺和虽然遭受如此的酷刑，但她没有丧失革命者的气节。想说的话她都说了，该守的她都守住了。当木桩钉进身体的时候，她使出最后的力气高喊：“朝鲜革命万岁！”“妇女解放万岁！”

安顺和牺牲之后，战友们打开她的背囊，整理了她的遗物。其中有20年代末，安顺和的丈夫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码头活儿时挣的钱为她买的哔叽裙子，还有她没织完的桌布。

听说这条裙子她十年来一直装在背囊里来穿过一次。她为什么把这条哔叽裙子一直珍藏在背囊里呢？安顺和一定是要等祖国解放之后穿这条裙子的。我们通过这件遗物也可以看出，她是多么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用拆下破线衣的纱线抽空织的桌布，一定是等祖国解放了好铺在丈夫的书桌上的吧。

据说，李凤洙给妻子的遗体盖上口毕叽裙子的时候，看到十

年前打的裙褶还照样留着，心如刀绞，怆然泪下。

像崔希淑、安顺和这样的女同志，在北满抗日武装部队里也是不少的。

战斗在北满的朝鲜妇女是怎样坚守革命气节的，只举一个韩珠爱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缝纫队负责人韩珠爱，在后方密营缝制游击队员的棉衣时受到“讨伐队”的袭击，连同小女儿一起被敌人抓住。她为了掩护战友们撤退，故意向敌人开枪，终于落到了敌人的手里。

韩珠爱蹲了几个月的监狱。敌人认为让母女俩住在一间牢房里，是太优待她们了，于是便让她们母女俩分开来住。为了诱使韩珠爱屈服，有时把女儿领来跟母亲会面。他们的目的是想利用母爱，迫使她屈服。

但是，敌人的任何奸计都未能使韩珠爱丧失革命气节。

在乌苏里江畔枪杀韩珠爱时，日寇宪兵队的刑吏对她说，你只要说一句悔过的话，就可饶你的命。但她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

北满游击队里的安顺福、李凤善等八名缝纫队员，同压缩包围圈，步步紧逼的敌人打了殊死战，最后到了就要被俘的境地，就一同投进牡丹江，献出了正当芳年的宝贵生命。类似的事情，在东满的女队员中也有。有七名女队员在去奶头山的途中被敌人包围，在无法突围的情况下，毅然投进富尔河，献出了青春。她们的壮烈牺牲，以新的传奇载入了抗日革命史册。

有一年，我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看了描写牡丹江八烈女斗争事迹的电影，深受感动。

不仅是北满的女队员，南满游击队员们亲密的姐姐李顺节，也是坚守了革命气节的坚贞不屈的革命者。

还有金寿福，是在长白县珠家洞做地下工作时，被敌人抓去杀害的。

英雄并不是特殊的人物，就是指崔希淑、安顺和、东满的七烈女等这样的人而说的。

曾经任碧城郡妇女同盟委员长的赵玉姬，在祖国解放战争暂时撤退时期，她在敌占区坚持打游击，后被敌人抓去杀害了。我们授予她共和国英雄称号。她也是像崔希淑、安顺和等那样，始终坚守革命气节的顽强不屈的女战士。敌人拔掉了她的手指甲和脚指甲，剜掉她的两只眼睛和乳房，用烧红的铁棍烙她。但她毫不屈服，反而大声喝斥敌人，高喊“朝鲜劳动党万岁！”英勇牺牲了。她打游击打死的敌人能有几个？但我们并不重视这个，而是珍视她在走上刑场时昂首挺胸、正气凛然地宣告敌人必亡的坚强意志和革命气节，才表彰她的。一个过去种庄稼、后来搞了几年妇女同盟工作的平凡的女同志，如此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事啊！我很想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宣传赵玉姬，于是下指示摄制了描写她的电影，还立了她的雕像，又把她故乡的农场命名为赵玉姬农场。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视察朝鲜革命博物馆时，看到收藏在那里的抗日战士李桂笋的一条发辫，便停在那里好久没动。那是李桂笋在十六岁时为表明她献身革命的坚定决心，剪下头发送给母亲的。

那一天，伟大领袖凝视着李桂笋的发辫好久，嘱咐说，这是宝贵的遗物，要好好保管。后来，金日成同志感怀万千地回顾了李桂笋的英雄事迹。

从这条发辫，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李桂笋是一个很优秀的革命者。看到这条发辫，会不由得联想起我们的母亲、姐姐和我国女革命者冰清玉洁、坚贞不渝的革命气节。

朝鲜妇女，素来就外柔内刚，坚贞不屈。通过抗日革命斗争，我更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李桂笋的发辫，可以说是女革命者气节的象征。

我在满洲搞地下工作时，我的母亲给我的鞋底垫了她的头发。这一绺头发，是母亲从住在朝鲜的时候起一直珍藏下来的。在寒冷的冬天，我走在风雪交加、人迹罕至的山路上，不知怎么回事，无论走多远也不感到脚冷，越走越觉得脚心热呼呼的。到达目的地之后脱下鞋一看，原来鞋底上垫着头发。

当时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什么样的爱，能胜过母爱的爱是没有的。母亲给垫的头发，是母爱的表示。

当中国上海出现了朝鲜人的“临时政府”，东北地区出现了朝鲜人的叫作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的独立军团体，要求让人民群众缴纳捐款的时候，我听说有许多妇女卖了发辫来筹措独立捐款。这些发辫是爱国精神的表示。

在谈及李桂笋的时候，我之所以回顾有关发辫的往事，是因为通过这件事足以了解她的人格。

对李桂笋的人格，曾经和她并肩战斗过的金一和朴永纯二位

同志了解得最清楚。要想搜集有关李桂笋的材料，有必要去采访金一第一副首相和朴永纯同志。有人说，金一第一副首相寡言少语，不好采访。这是不大了解金一的说法。他不愿意夸自己，但乐于赞扬别人。

把李桂笋引向革命道路的，是她的哥哥李芝春。我在毓文中学念书时，李芝春在吉林师范学校在我们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后来，他回到父母所在的和龙领导共青工作时，被敌人逮捕杀害。敌人枪杀他之后，还点火烧掉了他的尸体，这等于杀了他两次。

李桂笋在渔郎村游击区听到这一噩耗之后，第二天清晨就解下自己的辫子，一下子剪了下来。她送给母亲这条发辫时，还寄去如下的信：

“妈妈，我离开了家，哥哥又牺牲了，您该是多么悲伤啊！可是，您不要悲伤。不要让敌人看到您的泪水。……

“现在将我的发辫送给您。如果我长期不能回到您的身边，您就把这条发辫当作我吧。敬祝您身体健康，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等于是李桂笋向母亲的最后告别。看来，她是立志一辈子献身于革命事业的。

据在和龙做了好几年地下工作的朴永纯说，李桂笋从小时候起，就对革命很积极，感受力强，智慧出众，受到群众的爱护。

1933年夏，她从党组织接受了打进龙井市内做地下工作的指示。当时她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被破坏的地下组织和发展新组织。

在敌人的重要统治据点之一龙井地区，到处是军警和密探。盘踞在这个地方的谍报机构，触角都很灵敏。游击区的革命组织，把没有多少地下工作经验的李桂笋派到这样的地方去，这是对她的信任。

当时，龙井市内的党组织和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团体，大部分都被破坏，组织成员几乎都被捕。

李桂笋抱着独当一面的决心，进了有许多人频繁出入的一家面馆，做了勤杂工。对一个满脸烟黑、当面馆厨房丫头的土里土气的女子，没有人会想到她是共产党派来的地下工作员。把这座面馆作为地下工作据点，是很适宜的。

李桂笋打水、洗衣、刷碗筷，什么都干。老板叫干啥就干啥。老板暗自高兴，来了这么一个好宝贝。

可是，要恢复被破坏的组织，还要发展新组织，就必须找个整天在外面跑腿的活儿干。那就是给人家送面的活儿。当时，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吃面，都是订购的。订购人盘腿坐在家里，吆喝面馆送来几碗面，送面的就把分别盛好面条和肉汤的碗放在木托盘上给送去。

李桂笋得到老板娘的信任，终于取得了送面工的位置。每当送面的时候，她就抽空会见组织成员。这样，她首先恢复了少先队组织。然而，头顶着放上面碗的木托盘，一天要跑几十里路，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一天，李桂笋头顶着木托盘朝订购户急忙走去，路上遇到一辆疯狂驶来的日寇警车，她在躲闪的刹那，木托盘掉地砸碎了面碗。

这样一来，李桂笋挨了老板一顿大骂，被夺去了送面工的位置。但她并没有灰心，干完一天的活儿，就不顾疲倦地走到面馆后院子里，顶着装满石头的木托盘练步，直到午夜时分。

李桂笋这种充沛的热情，不能不引起老板的注意。

我记得当时李桂笋的年龄才十七岁左右。

女战士们一般到了十五六岁，就搞政治工作。她们在十多岁的年龄，就作鼓动演说，也做敌后工作和建立组织的工作。她们在这个年龄，就通晓世情。因为她们是失去祖国，在苦水中长大的一代，所以比现在的青年早熟，这是事实。

然而，并不是受过重重苦难的人，都会成为先觉和革命战士的。重要的还是思想。只有从思想上得到锻炼的人，才能早日投入革命斗争，才能出色地完成革命任务。思想不健康的人，是搞不好革命的。李桂笋之所以能够做好革命工作，就是因为她思想坚定。

现在有的人一说二十几岁，就说是乳臭未干的孩子，不听他们的话。

做人事工作的也是如此，一说二十几岁的人，就大都认为是不懂世情的人。这些人以为，只有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人，才能当干部。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即使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只要交给他任务，也能认真负责地去完成。解放初期，建党、建国、建军的时候，我就切身体验到这一点。

在抗日革命时期，二十多岁的青年有的做县委书记或省委书记，有的做了师长或军长。我也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担任

了革命军的司令官。如果不提拔青年，干部队伍就会老化，到头来我们的前进运动就会失去了生机。人事工作一定要做到老中青相结合。

李桂笋成为东满人纷纷谈论的话题，是她那做和龙县委书记的丈夫金日焕被扣上“民生团员”的冤枉罪名，被排外主义者杀害的时候。当时，间岛地区的人一致诅咒和仇恨屠杀了金日焕的主犯，对他的妻子李桂笋都表示极大的同情。

当时，有许多人推测：李桂笋对东满党委领导的行为感到极大的失望，也许会放弃革命离开游击区。当时在间岛地区组织成员和游击队员中，就有不少人因对东满党委领导的左倾盲动主义不满，离开了游击区。由于反“民生团”斗争搞得过左，共产主义者的形象被玷污了，这是事实。

若是一般的女子，可能会厌弃革命而离开游击区，或者灰心丧气地哀叹着虚度岁月。但李桂笋却横下一条心，重新站起来，更出色地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为革命多出一份力量来证明丈夫在革命面前是问心无愧、纯洁无瑕的忠良。

车厂子游击区处于饥饿状态时，李桂笋已是个足月的孕妇，却无法得到充分的营养。但她心里想的不是自己和即将出生的新生命，而是那些饿着肚子不能动弹的游击区人民。为此，她天天上山挖野菜，剥树皮。连这些也没有了，就去捉青蛙，捞蛙卵，给那些营养失调濒于死亡的人吃。

后来，李桂笋分娩了，但她没有奶。正当这个时候游击区要解散了，真是雪上加霜。李桂笋把小女儿托给婆婆，送她们到敌

占区之后，参加了游击队。她托给婆婆的婴儿，是金日焕被杀害之后生下的遗腹子。

同这个遗腹子的别离，是令人悲泣的。还不到两岁的孩子紧贴在母亲的怀里，踢蹬着不肯离开。婆婆也哭，李桂笋也可怜孩子，反复地夺过孩子抱在怀里抽泣……想想，这种场面怎能不使人悲痛！

由于游击区的解散，亲戚朋友和战友们离散的时候，人们都像她们那样难舍难分，在悲泣之中作别的。

听说，李桂笋的婆婆为了喂养孙女，吃了很大的苦。给孩子讨一两次奶倒可以，不能总是讨人家的奶吃。于是，她便把大麦和玉米粒儿嚼烂了喂孩子。

如上所述，李桂笋是忍受着一个女子很难承受的极大不幸和悲痛，扛起枪入伍的革命战士。她是在抚松加入了我们部队的。

过了没多久，我们要把李桂笋送到后方医院去。因为她受了冻伤，不能在战斗部队打仗。但她硬是流着眼泪恳求让她上前线打仗。

可是我为李桂笋着想，没有接受她的恳求。我对她说：你还不知道冻伤有多么厉害，往后打仗的机会有的是，现在你要马上去医院治伤。我还告诉她，我的父亲也是因受冻伤而去世的。要是你脚指头全烂掉了，成了拄拐杖的残废怎么办？我这么一说，她才勉强地去了医院。

给她治伤的游击队后方医院坐落在黑瞎子沟密营。白头山离那儿很近。1937年春节，我到横山地区的各后方密营进行视察。

朴永纯主管的武器修理所的同志们，用罐头盒做压面桶给我压面吃，就是这一年的春节。

我们到了后方医院的时候，李桂笋为我们做饭菜，忙得不可开交。

据宋医生说，她不单单接受治疗，有时自愿当护理员，有时还当炊事员，从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离开医院时，对李桂笋吩咐说，往后其他的事一概不许管，只管一心一意治好你的伤。还吓唬她说，要做不到这一点，就治不好你的伤。

后来，我再没有见到过她。只是通过通信员给医院的同志们捎去几次信和后勤物资。

我们暂时离开白头山的时候，敌人出动“讨伐队”袭击了我部后方密营。宋医生负责的后方医院也遭到了袭击。朴顺一在激战中牺牲，李桂笋被俘，被押送到长白县去，死里逃生的只有李斗洙一个。

我们不了解这一情况，还是派金正弼和韩初男背着粮食到医院去取联系。我还对他们说，住医院的患者一定都治好了，要全部带回来。然而，他们却只带着变得很难认出的遍体鳞伤的李斗洙一个人回来了。这时我们才了解到后方医院所遭受的浩劫。

我派侦察小组去了解李桂笋的下落。后来，所有的侦察小组都带回一则悲痛的消息，说她被敌人抓去十多天后，就惨遭杀害了。有的侦察小组还见到了亲眼目睹李桂笋被枪杀的长白县人。

杀害李桂笋的那天是集日。这天敌人贴出布告，说有个“转

向”的共军女子作反省演说，还逼迫群众集合到学校操场。从惠山方面过江来的生意人，也都被拉到了操场。

那么，李桂笋为什么要求敌人给她提供在群众面前讲话的合法机会呢？我认为，这就是李桂笋所具有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气概的表现。她要求敌人把群众聚集到学校操场，是要向群众作反日革命宣传，同人民群众作最后的诀别。如果她作几句反省演说，敌人是会饶她的命的。可是李桂笋没有选择那种卑鄙无耻的道路。她是决心要死的。一个人立志为革命献出生命，就不怕刀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李桂笋对群众说：我就要死去，但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健在，它的司令官也健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打败朝鲜人民革命军；日本鬼子灭亡、祖国获得解放的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大家不要怕敌人的暴力镇压，都团结起来，奋起投入反日抗战吧！

李桂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努力尽到了作为人民公仆、教育者、宣传者应尽的使命。

原来说是要作反省演说的共军女子，却作了鼓动抗日的革命宣传，敌人该多么惊慌失措啊！

据说，长白地区的群众至今还常常绘声绘色地谈起当时的情景，可见她的讲话对当地群众发生了多大的影响。

李桂笋之所以成为闻名的革命女战士，就是因为她这样英勇牺牲的缘故。她革命生涯的顶点，就是这最后的牺牲。人的一生的顶点，可以说意味着人的精神力量和活动能力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我认为，什么时候能达到这个顶点，是因人而异的。有的

人可能在二十几岁就达到，有的人可能到五十几岁才能达到，有的人可能到六七十岁才能达到。

彪炳历史的，是像李桂笋和崔希淑这样光荣地结束了自己人生的人，而不是那些扬名一时，半途而废的人。

正因为如此，我才总是怀念李桂笋。像李桂笋这样的革命女战士，是我们的巨大骄傲，值得向全世界夸耀。她那充满英雄气概的革命生涯，是创作革命小说或电影的很好的题材。李桂笋是朝鲜民族的好女儿，是女革命者的好榜样。

李桂笋的亲生母亲，因长期不知外孙女的死活，默默无闻地忍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在停战之后她才找到已上了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外孙女，把女儿留下的发辫交给了她。经过三代传下来的这个遗物，不是单纯的发辫，而是李桂笋烈士的高贵人生的象征。在两岁时生离死别，面孔和声音都陌生的母亲，变成一束发辫来找女儿，世上哪里还有这样的相逢啊！女儿把脸埋在发辫里，悲痛地淌下了泪水。

现在，李桂笋的女儿为继承父母献出生命开拓的革命事业，正忠心耿耿地努力奋斗。

那些毫不犹豫地献出生命，坚守了革命者的尊严和气节的女同志，是说不尽写不完的。

我说妇女承担着革命的半边车轮，这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是我作为染满血迹的抗日革命历史和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和见证者，根据亲身体验总结出来的。

第二十一章

大部队回旋战

一　来访密营的女人
二　中国地主刘通事
三　激战“讨伐大军”
四　吴仲洽和第七团
五　平安道人
六　“用武装维护苏联!”
七　“前田讨伐队”的下场

时期：1939．7～1940．3

一　来访密营的女人

1956年秋的某一天，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秘书接到咸镜北道人民委员会秘书长打来的电话。电话中说：鹤浦煤矿托儿所的一位妇女说她解放前参加过朝鲜人民革命军，恳切地要求帮助她拜见慈父领袖。我们这就送她到平壤去。

几天后，那位妇女找到内阁大楼来了。秘书问她来由，她流着眼泪，嗫嚅道："就是老想见见他……"

当时，金日成同志正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十分繁忙，没能接见她。代表团访问结束后，金日成同志听了秘书的报告，自言自语道："是姜兴锡的妻子池顺玉？她还活着……"接着沉浸在深沉的回忆之中。

池顺玉是什么人？

金日成同志在1972年5月视察朝鲜革命博物馆、1976年3月观看音乐舞蹈叙事剧《大部队回旋战》和1985年10月视察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时，都谈到过池顺玉。现将这些材料汇集如下。

那是我们胜利结束茂山地区进攻作战，在白头山东北部开展军事政治活动，指导第八团工作的时候，所以这是1939年夏天的事情。

一天，第七团团长吴仲洽来汇报部队情况，最后附带着说，他们朝司令部来的时候，在乌口江上游遇到姜兴锡的妻子，就把

她领到八团密营来了。她就是池顺玉。

她说她是想丈夫，专程来看丈夫的。我们听了，都为她的一片痴情深深感动。

松花江和乌口江流域的山区是敌人军警特务频繁巡逻的很危险的游击战区。稍一不慎，或许被一颗流弹打死，也许被打成“通匪分子”死于非命。一个女子，而且是单独一人，冒着这样的危险来看丈夫，自然是令人佩服的。

池顺玉的丈夫姜兴锡是有名的神枪手，也是疼老婆出了名的好丈夫。听人说，他的背囊里有好几封写给妻子的信。他十几岁结婚，不久离家参加了革命。此后近十年来，他再也没有见到妻子。妻子也非常想念丈夫。

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军警通过情报网探听到他们夫妻的这种情况，就对池顺玉进行威逼利诱，终于把她拖下水，拉入了间谍活动。

尽管这样，姜兴锡就要和妻子久别重逢了，毕竟是一桩喜事。

当时，姜兴锡正在外地做粮食工作，不在密营。我们立即通知他快回司令部来。

我见了池顺玉。她举止端庄，很有礼貌。我和她一起吃午饭。我们的同志劝她说，这条嘉鱼是将军亲手为你钓来的，请多吃些。她听了这些话，显得非常惊愕。不知为什么，她吃了几口就不吃了，再怎么劝也没有用。

我叫一个女队员陪她，给她做伴儿。那天夜里，她们盖着一

条毯子，聊了个通宵。

队员们都为这一对夫妻的重逢高兴，像办喜事似地笑逐颜开。在近十年来的武装斗争中，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喜事，我也禁不住兴奋，心中祝福他们。大家都盼着姜兴锡快些回来。

不过，见了池顺玉，我觉得有一些蹊跷。她怎么会知道丈夫就在这里，而且又是穿过龙潭虎穴般的危险区到山里来的呢？也就是说，她怎么能径直找到我们部队的驻地呢？跟她交谈过的同志们也反映说，她说话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她来密营后不是第三天就是第四天，吴仲洽和吴白龙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吴仲洽的报告犹如晴天霹雳，他说："我有罪，犯了大错。我被人情所惑，不经了解就把敌人的密探带到司令部来了。"吴白龙也说："那个女人，身为革命军排长的妻子，理应帮助游击队，可她却给鬼子当走狗，哪有这么可恶的！应当马上枪毙她。"

听他们说，同姜兴锡的妻子睡在一个帐篷里的女队员，看到她行动有些蹊跷，话也前后不对茬，觉得可疑，便在深夜里趁她熟睡的时候，把她的夹袄仔细地翻了一遍。果然，在一个针脚稀稀的地方发现了一包毒药。当时，我们常常遇到敌人的毒药攻势，所以这种毒药，我们的人是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我问他们，那个女人知不知道她已露了马脚。他们说她本人还不知道，我们也暂时佯作不知，只在暗中监视她。

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心中的激浪好半天都平静不下来。日本的密探和特务混进我们的队伍，被我们看穿的事例过去

也有过。这些密探和特务当中，也有不少本不应跟我们作对的基本群众。日本鬼子强迫一些淳朴的长工和工人，带着间谍任务到我们部队来，也不是鲜见的。但是，把一个送丈夫参加了革命军的女人，而且是革命军排长的妻子拖下水，给他们当密探，派到我们兵营来，是从未有过的。一个革命军排长的妻子变成敌人的间谍出现在我们队伍里，这确实是个非常事件。日本特务间谍机关的谋士们实在太可恶了。

我听了吴仲洽的报告，心想，如果姜兴锡知道了这件事，该是多么吃惊，也说不定这个家庭会被拆散。

我不顾吴仲洽和吴白龙的反对，再次见了池顺玉。我花了不少时间问了她姜兴锡一家的情况，也问了她来找革命军的路上受的苦和她娘家的情况。随后，话题自然转到了姜兴锡。我便告诉她，姜兴锡明天或后天就能回来。说到这里，池顺玉突然捂着脸哇地哭起来。接着，她从身上的夹袄里拆开一条缝，掏出了一包毒药。她全身抖颤，泣不成声地说："将军，我是该遭天罚的女人，该死的女人。"

我给她喝了一口水，让她镇静下来。然后对她说：你坦白了，这是万幸。对老实坦白自己罪过的人，革命军是宽大的。尤其你，是姜兴锡排长的妻子嘛！所以，你不要害怕，有话都说吧。你是怎样当了间谍，都受了哪些训练，敌人派你来时给了你什么任务，你都慢慢地讲讲。

池顺玉一五一十地供出了被吸收为间谍的经过、受间谍训练的情况、她接受的任务和进山的经过。

当时在场的吴白龙，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当时我吓得差不多减寿十年了。脊梁骨发凉，出了一身冷汗。她竟敢带着毒药来到将军面前。她要是把毒药偷偷撒到饭锅、饭碗里，那该铸成多么大的祸啊！小小的一个女人，差点葬送了整个朝鲜革命。一想起这事，就禁不住心惊肉跳。”

抗日战士们不愿提起池顺玉，理由就在这里。

在驻珲春日本领事编的机密情报资料中，记录了派遣池顺玉的目的等有关事项。其部分记录如下：

“派遣状况：

一指令内容

(一)瓦解内部，笼络姜兴锡。

(二)毒杀干部。

(三)游击队查问时要回答：被父母所逼，前来看望丈夫。

二联络方法

本人情况和本人获得的游击队人物资料，要直接送交特务科片田警佐或南警尉。

三进山时日及地点

先令其父母承诺之后，自8月5日至9日，用五天时间于延吉教给她各种必要的知识，8月10日，令一科员送她进山。目标定为估计游击队潜伏的和龙县孟河洞西南1088高地和西边依兰沟方面(这是根据8月8日下午10时金日成主力部队一百二十名袭击和龙县龙泽村之后逃往西南部密林地区的情况判断的)。

四对回归的估计

具体日期不定，估计需要两三个月。(《珲领情机密第186号，昭和15年

(1940)7月26日珲春领事木内忠雄报告》)

日本特务机关称池顺玉为“生间”。所谓“生间”一词出自孙子兵法，意思是生还的间谍。敌人把池顺玉视为“生间”，说明他们对她寄托着相当大的期望。看来他们是打算把池顺玉培养成一个职业特务的。

敌人对池顺玉说，你的丈夫是游击队机枪手，打死了许多皇军。这个大罪，是灭他三代也抵偿不了的。不过，只要你打入共军部队，让你丈夫归顺，完成我们交给的任务，就给你一大笔赏金，保你们过好日子。敌人威胁要抄灭一家三代，池顺玉无奈，只好顺从了。

听了她的供述，我感到非常痛苦，也觉得她很可怜。日本帝国主义者竟然毫无人性地利用妇女们深藏心间的纯真的爱情来对付我们，他们如此卑鄙无耻，阴险毒辣，这使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帝国主义扼杀革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为了从内部分裂和瓦解革命队伍，竟然无耻地利用父母妻儿之间的爱、兄弟姊妹之间的爱和师生之间的爱，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本性。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消灭我们民族的灵魂，还恶毒地企图彻底毁掉我国人民高尚的人伦道德。就是说，他们要使朝鲜人野兽化。

我们的武装斗争，不仅是收复被外来势力霸占的领土和国家主权的斗争，而且是为维护人、维护人性而对兽性进行的斗争。

使人野兽化、残疾化、畸形化，这是帝国主义者的本性。强迫一个女人接受间谍训练，让她去破坏自己丈夫的事业，毒杀丈

夫的司令官和战友，这不是野兽又是什么呢？

今天，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为环境污染大声疾呼，议论纷纷。

环境污染威胁着人类，固然是令人费心的大事。但比这更危险的是帝国主义者加速推进的道德败坏和对人的污染。这个世界的下水道和垃圾堆，每天都生产着帝国主义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孵育的披着人皮的野兽、畸形儿和精神残废。人的污染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最大制动器。

我安慰伏地而哭的池顺玉说：不要怕，你已经认了罪，我们绝不会另眼看待你。你是被逼得没办法才犯了罪的嘛。别哭，快起来。

这件事一传开，密营里的人都惊呆了。我本是不想公开这件事的，但是吴仲洽和吴白龙为了提高大家的警惕，保障部队的安全，已经把这件事公布了。

姜兴锡回来，从人们私下的议论中得知了这件事，气得七窍生烟，立地拔出手枪要亲手杀掉妻子。我看他怒气冲天，暴跳如雷，非闹出大事不可，便把他叫来，好不容易说服了他，送他到他的团驻地红旗河山沟里去了。这样活活拆散一对久别重逢的夫妻，我心里也实在不舒服。

据说，身为军长的陈翰章这样的大人物，对前来劝他归顺的父亲也大动肝火，发过脾气，何况是姜兴锡呢？他的心境是可以理解的。素称宽宏大量、重感情的安吉，有一次也闹着要亲手处决前来劝他归顺的亲人，经同志们的劝告才被制止。

每当发生这种事情时，我就说："不要随便动枪。你想想看，一个为人民而斗争的军队，借口坚持革命原则，不惜枪杀自己的亲骨肉，那么，有谁会拥护这样的军队呢？敌人正希望我们革命军都有像你们这样的想法，在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互相敌视，同室操戈。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这样瞎胡闹！"

然而这样的批评，对姜兴锡却没有起什么作用。因此，大多数队员也都不相信池顺玉，都忌讳她，有些人甚至主张严惩她。

但我是相信池顺玉的。她是为了保住全家和亲戚的性命，不得已接受了间谍任务的。她是在敌人的威逼下，受了欺骗宣传的蒙蔽，才对革命军产生错误认识的。人如果没有阶级觉悟，是有可能陷进这种泥坑的。况且她又没有在革命组织里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当她对我和我们革命军有了一些认识后，就不顾自身的安危，毅然供出了自己的罪过。如果她仍藏着祸心，那么别说什么坦白，早就会往我们的饭碗里放毒药了。这种机会是很多的。可是池顺玉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动地坦白自首了，虽然拖了些时间。这样的人是一定会投到我们这边来的，决不会再投到敌人那边去。

有一次，我从金策同志那里听到了李启东被害事件的经过。李启东是同金策一起坐过牢，也同他一起创建了珠河游击队的老党员。他毕业于中国云南讲武堂，指挥作战很老练。这样一个优秀的军政干部，却被一个名叫周光亚的特务杀害了。周光亚混进游击队后，一直升到了一支部队秘书长的职位。他乘部队纪律松懈的空子暗杀了李启东。

鉴于这种事例，我们的队员防范池顺玉是很自然的。

但是，我却宽恕了池顺玉。为什么宽恕她呢？因为我看到了她主动坦白自己罪过的良心。在世界上，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良心、道德和情义。人若没有良心，就一钱不值。若玷污了良心，就丧失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价值。

池顺玉虽然一度玷污过自己的良心，但是经过自我斗争终于恢复了良心。她怀着善意抖出了自己的污点。一个人陷入泥坑容易，跳出泥坑却是不容易的。池顺玉在我们的帮助下，经过痛苦的自我斗争，终于跳出了泥坑。这说明她有重新做人的力量。对这样一个痛改前非，决心重新做人的人，为什么不去拯救，而要落井下石呢？

革命是维护人的良心并使之发光的斗争。我很愿意维护池顺玉的良心。

日本帝国主义者只要发现哪家有个革命者，就千方百计地从那家中孤立那个革命者，切断他们之间的骨肉关系。残酷地扼杀我们的爱国力量，瓦解和各个击破我们的爱国力量，这是敌人一贯的策略。为此，他们甚至把我们民族的骨肉关系都用来进行“诱降工作”。敌人的最终目的是使共产主义者和人民群众分离。其中最卑鄙毒辣的方法之一，就是挑唆我们骨肉之间互相猜忌、戒备、仇视甚至互相残杀。

我们明明知道敌人的这种奸计和伎俩，却被卷入他们的圈套，天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吗？所以，即便是接受了敌人间谍任务的人，只要他没有犯下出卖国家民族的大罪，我们就饶恕

他，帮助他改过自新。

有一次，朝鲜总督府派来的密探，扮做耶稣教的信徒来找我们。他带来了几袋子面粉，说这是为在外乡受苦的游击队，特意从朝鲜带来的礼物，要我们包饺子吃。

我叫炊事队把他带来的面粉全都拿去包了饺子。不大一会儿，炊事员端来了一盘饺子。我们就请那个密探吃。他谦让着不肯吃。我们一再叫他吃，他的脸色就变了，变得煞白。这也难怪，因为面里是掺了毒药的。

我对他说，你和我们有什么仇，要来害我们这些为光复祖国而艰苦奋斗的人？你身为朝鲜人，就该做一个真正的朝鲜人，干吗要做这种肮脏的勾当？现在还不晚，你应当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我们在山上待他很亲切，不久就放他走了。后来，听说一家杂志载文记述了这件事。

我不顾吴白龙的反对，决定把池顺玉留在密营，对她进行教育。不久，把她派到缝纫队去了。当时，为了大部队回旋战，缝纫队正在赶制六百套军装，正需要人手。姜渭龙也在缝纫队里工作，他也跟吴白龙一样，不愿接收池顺玉。

我叫崔希淑等几个女党员负责好好照顾和教育池顺玉。从此，她们待她很真诚，照顾和教育做得很得体，使她感到温暖。

过了中秋节，我到花拉子去的时候，叫来了驻在红旗河上游的姜兴锡。这样，在花拉子深山密林里，姜兴锡夫妻就戏剧性地重逢了。

我们在花拉子停留一段时间，进行了军政学习。池顺玉也参

加，认真地学习了我们编写的教材。她念过小学，还有点文化。此后，她一直跟着部队，给队员们做饭。游击队的生活对她来说是生疏和艰苦的，但她表现还不错，脸上一直是笑盈盈的。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悲剧临到了他们的头上——姜兴锡在六棵松战斗中牺牲了。我们没有把这个不幸立即告诉池顺玉，因为怕她受不了这个突然的打击。

从此以后，每当行军的时候，池顺玉总是不时地留心察看金云信肩上的机枪。那正是姜兴锡生前使过的机枪。同志们告诉她，因为姜兴锡做地方工作去了，所以暂时由金云信管这挺机枪。其实这种隐瞒是毫无用处的。

六棵松战斗后，我们在松花江畔的一处密林里举行文艺演出。当时我看到池顺玉愁容满面，显得十分惆怅。后来，想到叫一个失去了丈夫的女子继续留在部队里也不是个办法，便把她送回家去了。不然，她的一家人和亲戚就会遭到敌人的迫害。

临走的时候，我们给了她盘缠，还给她派了一个带路人。她那时走在密林里频频回头望我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停战后，我听说她曾来找过我。那时我太忙，没能抽空见她。她一定是很难过的。那以后，也一直没能挤出时间看她。前来平壤想看我而没能看到就回去的人，何止一两个啊。

我想，池顺玉能够面无愧色地来找我，是因为她同我们分手后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祖国和同胞的事。要是那时候我能抽空见到了她，一定会听到她以后的具体情况的。幸亏有关部门的同志给我送来了一本《现代史资料》。我从这本书中大体地了解了她

后来的情况，知道她回到家以后，在曾逼她当密探的敌人面前表现了什么态度，对革命军的内部情况作了什么样的说明。

驻珲春的日本领事木内，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干部都思想坚定，都为革命的胜利尽心竭力；队员都为之心悦诚服，完全信赖他们，绝对服从他们的命令，因而一切工作都很顺利。《报告》还说，第二方面军士气旺盛，团结一致，这是因为方面军指挥金日成具有强烈的民族共产主义思想，而且性格顽强，身体强壮，领导有方。

我看，敌人能说到这种程度，可以说对我军的情况看得还是比较公正的。这就证明，对我们革命军的生活和我们指战员的精神状态，池顺玉作了不带偏见的比较正确的说明。

池顺玉回到家以后，敌人是怎样对待她的呢？只看木内领事《报告》中的下述几段就完全明白了。

一管见与处理

(一)管见

1鉴于当前各方面形势，可以承认本人的供词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进山伊始，她带的毒药即被发觉，却未受任何惩处，反而与匪团共处一年有余，后又安然获释，此是否系游击队之诡诈，尚须调查。故务须严密观察其今后之行动。

……

(二)处理

1池顺玉已移交安图的片田工作班班长暗中监视，在怀疑她是假回归者的前提下正努力笼络她，促进对她的补充审讯，并另派她做特殊工作。(《珲领情机

密第186号，昭和15年(1940)7月26日，珲春领事木内忠雄报告》)

据说，日本鬼子对池顺玉在游击队未受任何惩罚安然获释，大惑不解，为弄清其原因绞尽了脑汁。凭他们把人只当一个会说话的动物看的思维方式，岂能看出其中的奥妙！

尽管有些人主张应当惩罚池顺玉，但我们还是没问她的罪，饶恕了她。假如我们惩罚了她，会怎么样呢？她的婆家以及亲戚，可能都被扣上了反革命家属的污名。

我们的革命，不是埋葬人的革命，而是爱护人、保护人、维护并最大限度地发扬人性的革命。埋葬一个人，很容易；拯救一个人，却十分费力。但是，不管多么费力，我们必须给犯了错误的人开辟一条改过自新的道路，给他以信任和帮助，使他能够过上真正的人的生活。把人当人看待，让垂死的人复活，这是最有价值的伟大的革命。

帝国主义者把人视如路边石子，弃如敝屣。我们则要把人看做最宝贵的社会存在，加以爱护，救之于危难。并且一旦表示了信任，就不再遗弃他。我常说，金正日同志的品性中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他无限热爱和珍惜人，对一旦表示了信任的人，绝不遗弃。

有一次，金正日同志对他的部属说，拿破伦曾对他手下的人说“你们信任我，我也信任你们”；而我是说“我信任你们，你们也可以信任我”。这是金正日同志的哲学信条。

每当见到一向相信人民群众，热爱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献身的金正日同志，我心里就想，对我们国家和我国人民的将来，

是可以放心了。

在帝国主义者以玷污人类、断送人类的命运为其生存之业的时候，我们的领袖金日成同志以实践证明：共产主义者应当最珍视和保护的就是人的政治生命；人际关系必须建立在贯串着积极的爱护的原理、信任的原理、拯救的原理这种崇高的道德情义基础之上。这是朝鲜革命的神圣的伦理道德。

二　中国地主刘通事

解放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曾会见过彭真。那天，金日成同志感怀深切地回顾了朝中两国人民和共产主义者高举抗日旗帜，开展武装斗争的往事。

彭真高度评价朝鲜人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斗争中所发扬的崇高的阶级友爱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然后，当作闲聊说，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满洲的许多中国地主把有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官金日成签名盖章的证书拿出来给他看，说过去他们为抗日联军做了事。中国解放战争初期，彭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委员。

后来，金日成同志在回答抗日革命斗争史研究人员就这种证书提出的问题时，作了如下的追述。

提起证书，就想起了刘通事。你们听了刘通事的故事，就可以知道援军证书的来历了。

刘通事是我们把活动区域转移到白头山东北部后，在和龙县认识的有名的中国富豪。他和我们关系很深，并不亚于在长白县认识的朝鲜爱国地主金鼎富。

他本名刘依贤，能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话。当中国人和朝鲜人需要交谈的时候，他就主动当翻译。所以人们都叫他刘通事。所谓通事，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翻译。

到白头山东北部进行乌口江战斗后，我们转战和龙、国内三

长地区和安图县一带，然后，驻在乌口江密营，大力开展政治军事活动。

当时，主力部队在别的地方，司令部只带机枪排和警卫连。由于断了粮，我们受了很大的苦。密营附近的朝鲜人都是贫苦农民，想帮助我们，也都无能为力。

和龙县的敌人看到我们的部队出现在自己的管辖区，就说什么革命军要来抢粮食了，要把粮食都集中到指定的几个地点，并规定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让各村每两天派人套车去领粮食。甚至强令县内居民每户准备两瓶汽油，等革命军来要粮食时就往粮食里倒。

那时，我为解决粮食问题费了不少心。一天，为了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到一个村子去同农民交谈，正好遇上一个曾在小汪清游击区住过的人。他是游击区解散后迁到和龙县来的。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对中国富豪刘通事有了具体的了解。

我认为只要争取了刘通事，就既能掌握反日爱国力量，又能解决部队的物资问题。

然而，朱在日和姜渭龙等入伍前在和龙住过的人都说，不能对他寄予希望。有的还说，刘通事这个人过去当过“自卫团”团长，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应当严惩。朱在日和姜渭龙比较熟悉刘通事的底细。

据他们说，刘通事住在离和龙县城约三十里的村子。这个村子坐落在牛心山山脚下，人们管它叫龙潭村。刘通事一家住在深宅大院里，周围是坚固的土城，四角筑有炮楼。

刘通事的哥哥年逾七十，坐享家长之福；刘通事是老二，作为一家支柱，常与衙门打交道，主管家庭外事；老三刘依清带几个帐房主管财务。

据抗日革命战士李凤禄和朴正淑说，刘通事一家光地就有100垧，一垧等于3000坪，100垧等于30万坪，相当于100公顷。刘通事还经营豆油厂、粉条厂、酿造厂和许多商店。抗日革命战士们说，和龙就有他的代理人经营的百货店、饭店和食盐专卖店。

刘通事一家不仅以大亨著称，还以反共驰名。和龙出身的游击队员们说，他们一家都是穷凶极恶的坏人。刘通事的儿子就在和龙当伪满警察，可见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家了。刘通事的儿子倚仗警察的权势，压榨民工和佃农。刘通事本人只要觉得谁有私通共产党的嫌疑，管他是谁，都告到儿子的警察署，抓去过堂，或剥夺其佃权，绝其活路。

有些人建议立即惩罚刘通事三兄弟，没收他们的财产。我没有同意。这是因为从同金鼎富的关系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有些人对刘通事做了相反的评价。所以，对刘通事不深入了解，不好贸然行事。

我考虑到，刘通事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话，待乡亲很随和，不存芥蒂；当衙门处理朝鲜人佃农问题时，他主动给做翻译，还替佃农说话，这都是他好的一面。

我还听人说，他对做了亡国奴来到异国他乡过苦日子的朝鲜

佃农表示同情，给予特别的照顾。牛腹洞有他的姨太太，是朝鲜人。这也是令人感兴趣的。

他同情到中国谋生的朝鲜农民，还娶了朝鲜姨太太，而且喜欢朝鲜话和风俗习惯，可又为什么被一些人视为坏透了的恶霸地主呢？这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为什么把朱在日和姜渭龙告到警察署，叫他们全家活受罪呢？

为了解开这个疑团，我把我们的人派到龙潭村了解了一下。这才查明刘通事同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结下冤仇，就是因为5·30暴动。

大家都知道，5·30暴动时，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行为有多么狂妄。只要有一点儿地，他们就不分你是亲日的还是反日的，都一律打倒。他们煽动群众砸破地主宅院的大门，放火焚烧粮库，无所不为。这种极左的妄动，严重地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

从那时起，刘通事把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谁家有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就毫不留情地进行迫害；而对保护地主利益的军阀则逢迎有加。

九一八事变后，他听到在间岛出现游击根据地，共产党划分红区和白区，敌视白区的居民，就更加倾向反共了。他既仇恨在满洲以主人自居，横行霸道的日本人，也仇恨共产主义者。

刘通事常说“共产党是我的夙敌”。

我心想，他反共是因误会所致，只要做好他的工作，给以好的影响，是可以使他从反共转向联共爱国道路的。日寇霸占

满洲后，解散了他的家兵，没收了他们的武器，对此，他心怀不满。我特别注意他的这种反日情绪。

我们决定不惩罚他，也不没收他的财产，而要改变他的反共思想，鼓励他的反日爱国精神，把他教育改造成革命的支持者和援助者。为此，我们派出以七团的吴日男为负责人的工作小组去做他的工作。

吴日男去找刘通事，开门见山地说，金日成将军希望同你面谈，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刘通事听了冷冷一笑，用流利的朝鲜话说，要抓就抓去好啦，何必拿什么面谈来打掩护！共军队长要跟我这个地主面谈，这话明明是不好直言要抓我才挑好听的说的。自打你们来和龙县横冲直撞，我就知道我刘某势必要为俎上肉，已准备听任你们宰杀了。所以嘛，用不着什么商量不商量的，也别绕弯子，要抓就抓，要抢就抢，要杀就杀，随你们的便。

看来，他以为吴日男他们是来绑架他的，所以才那么发起狠来。

吴日男看他如此冷若冰霜，以为这下工作要泡汤了。但越是这样，吴日男就越发下定决心，非要把这个老头子带到司令部不可。于是他对刘通事说，朝鲜人民革命军与那些发动5·30暴动的人不同。那些人不问亲日还是反日，也不问爱国还是卖国，凡是富豪，都一棍子打死。我们跟他们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把争取朝中人民的民族解放，保护两国人民生命财产当作神圣使命的军队。他接着说，如果你

真的不愿意接受我们司令部的邀请，我们就只好悄悄回去了。

吴日男一说要回去，刘通事反而缄口不语，沉思了一会儿，终于改变了态度，说，急什么，既然来了，就该多坐会儿，谈谈时局再走嘛。要是金司令邀我去面谈是真的，我可以考虑考虑。想必他是怕有后患才这么说的。不过，他看到吴日男为人正派，谈时局头头是道，饶有风趣，就产生了好奇心，怒气也消退了。他说："我也早就听说金司令部队打仗打得特别好。可是，金司令也是共产党，恨富人的本性还能变？不过……我也早有所闻，再说你们的言谈举止也跟别的军队不一样……反正，金将军叫我去嘛，去我还是要去的。"

他接着说，要把我带走，就得五花大绑地押走。不然，一旦日本鬼子知道我是应金司令邀请，欣然跟你们去的，那他们肯定会派"讨伐队"来砍我的头。我家老小也免不了遭殃。所以最好把我绑起来带走。

吴日男认为这是个妙计，但又不能不有所考虑。因为他接受我的命令，是要有礼貌地把刘通事请来，而不是抓来。如果不经司令部同意，五花大绑地把他押来，也许会犯金周贤小组那样的错误。他们在长白县对金鼎富采取无礼行动，招致了严重的后果。吴日男能想到这一层，实在是个幸运。

听了汇报，我觉得刘通事提出的办法是个妙计。所以我准备同意这个办法。可有些指挥员说，要是照这个办法去做，那个当警察官的儿子会闹出事来，守备队也会大举出动。一旦在龙潭村响起枪声，和龙县县城的敌人就会立即开来增援。

要照刘通事的办法去做，就要把活动区域再扩大一些。于是我们决定同时打龙潭村周围三个村子的敌人，把第七团、第八团和警卫连都投入战斗。我就在龙潭村的邻村设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次战斗。

战前我们还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先不动主管全家大小事务的刘通事，只把他的弟弟刘依清带走。这样既可以让刘通事的儿子和军警少动肝火，又可以取得与带走刘通事同样的效果。刘依清没有子女。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在弟兄之间最疼没有子女的。因此，只要把刘依清带走，刘氏一家就可以借口营救刘依清，公开地和我们来往，也不会引起敌人和邻居的怀疑。

战斗按计划打得很顺利，各部同时撤出了三个村子。当革命军撤离龙潭村时，刘通事让哥哥的三儿子跟着刘依清走，嘱咐他好好侍候叔叔。这为的是减轻刘依清的孤独感。

在回密营的路上，刘依清老是往下蹲，走不动，叫人受了不少罪。

他身子肥胖，走路不方便，加上他又是个大烟鬼，抽不上大烟，更使不上劲了。我们的队员只好用担架抬着他走。革命军用担架抬着一个大烟鬼行军几十里路……这不是很可笑吗？这种事恐怕是罕见的。老实说，抗战期间，我们什么事都经验过。

我叫警卫连长吴白龙好好保护刘通事的弟弟和侄儿。警卫连替他们搭好帐篷，给予特别照顾。尽管粮食非常紧张，我们还是顿顿给他们做大米饭，熬肉汤吃。

可是，刘依清吃得很少。我们以为他这个大富翁的子弟吃惯

了山珍海味，自然吃不下我们做的饭。经了解，实际上也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大烟瘾发作，挺不住了。他每天缠着我们的警卫员要大烟。他说他不要饭，只要大烟。只要给他大烟，要多少钱他就给多少钱。

可是，我们的人无法满足他的要求。我们的军医站只有一点代替麻醉剂的备用鸦片。他因为得不到鸦片，简直发疯了，甚至对我们的警卫员骂骂咧咧，大吵大闹。

地主少爷到革命军密营来死气白赖地要大烟抽，这多么荒唐啊！我把两个客人叫到司令部帐篷来。只见，他那副样子实在不像话。大烟鬼抽不上大烟，眼神呆滞，连身子都支撑不住了。

我指示军医站即使把备用的鸦片都用光，也要每天少量地供给刘依清。他抽上了大烟，眼睛立刻发起亮来，喜笑颜开，飘飘然了。

他好像从来没有劳动过，什么活也不会干，连床铺都不会收拾，叫侄儿替他收拾，是个一辈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食的懒鬼。

一天，我同他闲聊时说，人要活动活动筋骨，适当地干点活，才活得有意思，吃饭也香。古时候，一个公主，不管什么事都使唤下人去做，到头成了个连苹果都不会削的废物。光靠别人过日子，早晚要变成这种傻瓜。听了我的话，他说他也是和那个公主一样的傻瓜，但他会做一种活，包饺子很拿手。听他这么说，我很高兴。本来我以为他是废物，可他说有包饺子的本事，总算是万幸了。尽管这是他唯一的本事，而且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我叫司令部炊事员把和好的面和馅儿拿来给了他。他就开始擀皮，擀得又薄又匀，接着夹馅包饺子。他的手艺确是不同一般，包得很快，而且非常好看。

我跟我们的人一起吃着刘依清包的饺子，称赞他手艺好。

打这以后，炊事队要包饺子，他就卷起袖子来帮忙。每当这个时候，他的话就多，滔滔不绝，甚至跟我开起玩笑来。有一天，他包完了饺子回来说，照金司令的话做了点活儿，真的觉着活得有意思了。他这是由衷之言。

可是，包饺子的活儿不是天天有。没有活儿干，他就显得寂寞难受，大烟抽得更厉害。我给他讲了许多有教益的故事。鸦片战争啦，孔子、孟子啦，什么都讲。最后还谈到了中国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爱国人士，自然也谈到了张蔚华、陈翰章等富豪出身的革命者。他听得很专心。过了几天，他要毛笔和纸。他说，他虽然不能像张蔚华那样为革命献身，但愿意出钱出物为金司令助一臂之力。他写好给哥哥的信，还请我过目。

看了他的信，我觉得我们待他诚恳亲切，没有白费工夫。他在信中先写他和侄子都安然无恙，然后特别强调说，他和我同住一个帐篷，一起包饺子吃；革命军队员们待他很好，像亲兄弟一样体贴入微；其间他受到款待，理应有所报答，希望哥哥支援粮食、布匹和鞋一类物资，这样既能为革命军助一臂之力，他们也能早日回家。可见，我们对他的启迪和教育是有成效的。

把弟弟和侄儿送到革命军去以后，一直为他们操心的刘通事，接到弟弟的信，非常高兴。他欣然答应说，保证在某日以前

把所需物资准备好，只求我们届时派人去接。我指示李凤禄带一个排左右的人去接收刘通事的支援物资。他准备的有够做几百套军装的棉布、大量的劳动鞋、大米、面粉和煎饼，还有猪肉和豆油。他先后三次送来了这类物资。

多次和我们的同志接触后，他正式要求和我会面，希望把他带到密营去。他的意思是既然帮助革命军，就该见见司令，拉个交情。我同意见他，派人去接他到密营来。

刘通事来密营的时候，当警察的儿子不让去。对他说，你收到叔叔的信就想到革命军密营去，这可要三思而行。叔叔在信上说，他和堂弟跟金日成将军同住同吃，还一起包饺子，这是不可信的。革命军司令官怎么能跟老百姓同吃同住？特别是叔叔他是地主子弟，地主是共产党打倒的对象。革命军司令怎么能跟地主的子弟同吃同住？又像老娘们似地亲手包饺子？这不明明是在撒谎吗。这封信显然是金司令的部下逼着叔叔写的。

刘通事对儿子说，你别胡说八道，我多次接触过金司令的部下，他们都是有礼貌，富有人情，年轻有为的人。我看金司令手下的人都是好人，只看那几个部下的言谈举止，也能知道金司令的人格和部队的纪律。既然与革命军结了缘，就索性进山去看看，既要见见金司令，也要亲眼看看你叔叔说的是真还是假。

他来时带来了送给我的礼物：用高级呢绒做的军装、风衣、长筒靴和帽子。在同他交谈中，我看出他在人格和学问上与他的弟弟截然不同。他举止庄重，谈吐爽快，很有风度，是个不寻常的人。

刘通事用朝鲜话问候我在山上受了苦，感谢我们对他弟弟和侄儿的关心。我也感谢他提供了大量的物资，还不顾年迈亲自前来看望我们。

我们为刘通事另搭了一个帐篷，让他在那里见他的弟弟和侄儿。

刘依清对哥哥说："人们说共军是红鬼，那是胡说八道。天下再没有像他们这样好的人了。金司令部队是君子部队。"他极力赞扬革命军，还说他托金司令的福，脑筋开窍了。

刘通事见过弟弟后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见了刘通事，最使我吃惊的是他不仅精通朝语和朝鲜的风俗习惯，而且很熟悉朝鲜的历史和文化。这样，我们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

他说，每当看到做了亡国奴到中国来过苦日子的朝鲜人，就禁不住同情心。他的这些话最使我感动。他热爱朝鲜人，就像我喜欢和热爱中国人一样。

他突然问我说：

"人们管金司令部队叫'共匪'。金司令，您真的是共产党吗？""叫我们'共匪'，那是日本鬼子对我们的诬蔑；说我是共产主义者，这倒是事实。"

"那么，对我这么个一向反共的人，您怎么看待？"

他前来密营见我，也许就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为此，我必须慎重回答。

从抗日武装斗争的初期起，我就同许多反共人士进行过谈

判。于司令是反共的，吴义成最初也是反共的。朝鲜人梁世凤虽是个爱国人士，但一直敌视共产主义者，到了晚年才转向了联共。同这些人谈判，我一直站在主动的地位上，为实现统一战线，对他们解释共产主义，说明联共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但是选择联共还是选择反共，这个权利却属于他们。因此，我在谈判中虽然是主动的，却又不得不焦躁不安地等待他们的回答。

同刘通事的谈话，却不同了。我占着可以谴责他反共行为的地位，他则被置于无可奈何地接受判决的处境。尽管如此，他还是主动前来问我们对他的反共有何看法，这当然是件好事。总之，他是个坦率而大方的人。

据我的经验，反共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认为如果共产主义者得势，自己就会被打倒，所以拼命地进行反共。这是有意识的积极的反共。另一种人是，看到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者的恶行，对共产主义感到幻灭，或者听信帝国主义者的反动宣传，躲避和排斥共产主义。这是盲目的反共。刘通事可以说属于后者。

要想使刘通事从反共转向联共，就要给他坦率地说明我们的立场。

既不能为了换取那点儿援军物资，光说些好听的话；也不能因为他是反共的地主，不问青红皂白地骂他是反动派。重要的是正确地指出他的正面和反面，引导他抛弃反共走向联共爱国的道路。

我对他说：

“你反对共产党，我感到非常遗憾。不过，我们不想惩罚

你。这是因为你反对共产党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不正确的认识，也是因为你虽然反对共产党，但热爱中国和中华民族。我知道你虽然反对共产党，但不愿意做亡国奴，当地主也愿意当有独立国家的中国地主。我很重视这一点。凡是热爱祖国的人都容易转向联共的道路。”

听了我的话，刘通事噙着眼泪，一把握住我的手，说：

“金司令，谢谢您。和龙这个地方虽然人多嘴多，但说我爱国的只有您金司令。有您这个评语，我就能睡安稳觉了。”

他接着说，他过去眼光短浅，心胸狭隘，才反共，现在想联共，却不知该怎么做。

我对他说，联共不是别的，反满抗日，支援革命军，这都是联共；你打从把弟弟和侄儿送到这里来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联共了；凡是真心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都能理解共产主义，终将同共产主义者携起手来。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也是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不论是朝鲜地主还是中国地主，联共抗日就是最大的爱国。

刘通事说，多亏金司令指教，今天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价。

第二天，他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我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不是。

我把吴白龙叫来问，警卫连待他有没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

吴白龙说没有发生过什么别的事情，只是按照刘通事的要求，让他参观了密营，也观看了操练和娱乐会。去看伙房时，他看到高粱米掺野菜的稀粥，就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送了

几十石米，为什么不做干饭，熬粥喝呢？为了省米熬粥喝，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要是因为粮食紧张，让司令官也喝粥，是不合道理的。”看样子，他看到司令官跟部下同吃一锅饭，感触很深。他在军医站听到为伤员准备的仅有的鸦片都给他弟弟抽了，就更加激动。

听了吴白龙的汇报，我决定送刘通事他们三个人回去。

然而，刘通事却要求先让他一个人回去，弟弟和侄儿就再多待几天。他说，他打算再送我们一些物资，为此，需要制造一个像样子的借口。这就是让弟弟和侄儿留在密营，好以此为借口再送些东西给革命军。若这样，日本人知道也能搪塞过去。

刘通事这样主动地造出一个借口，好继续支援我们，这是难能可贵的。受到了真诚的信赖，就千方百计地报答，这是人的本性。

我简单地准备几样东西为刘通事饯行。这时候他说，过去自己对共产主义者一概敌视，把我们革命军当“土匪”看，现在表示谢罪，往后只要是支援革命军的事，不管是出钱还是出物，他一定不惜解囊相助。

当分手的时候，他请我给他写一张证书，等将来八路军解放东北的时候，好拿出来证明他用物资支援过朝鲜人民革命军。我找一块白净的丝绸用汉字写了“刘通事乃优秀爱国人士，曾予抗日联军以物质与精神上的援助”，下署司令官金日成，并盖了章。彭真所看到的证书可能就是这种证书。

当时，满洲的不少中国地主，表面上协助日本人，暗里秘密

支援抗日斗争。因为他们相信，日本鬼子早晚要完蛋，伪满洲国还得归属中国。

凡是援助过人民革命军的中国地主，都要求我们给他留一张证书。

他们管这叫“猪食糠”。我曾给长白县、额穆县和敦化县的地主写过这种证书。

所谓“猪食糠”，是中国话猪吃糠的意思。把这三个字改写成“朱”“食”“康”，读音一样，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朱食康”这三个字是朱德吃康德的意思。当时，人们用朱德和毛泽东的姓管八路军叫朱毛军。康德是日本人炮制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年号。“猪食糠”即“朱食康”是暗示八路军定将解放东北的隐语。

刘通事回去以后，乌口江密营收到了大量的各种援军物资。这是刘通事派卡车送来的。这些物资，对当年我们做过冬准备起了很大作用。

刘通事还送来了枕头大的鸦片，以补偿他弟弟用了我们军医站的备用鸦片。

中秋节前夕，我们送刘通事的弟弟和侄儿回去了。刘依清与我们作别时，掉着眼泪说，回家以后一定把大烟戒掉，好好做人。

送他们回去后，我们也很快离开了乌口江密营。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同他们兄弟取得联系。但是，我一直没有忘记刘通事，相信他会凭着良心过日子。

刘通事有个堂侄儿，名字叫刘振国，他在给我们党史研究所写的信上说，刘通事生前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常常追忆往事。听说，他离开密营后，表明了自己的抗日意志，也替我们做了许多宣传。

刘通事把我在乌口江密营写给他的证书当作传家宝，一直珍藏到去世。他去世后，由他的弟弟保管。我听了，非常感慨。

我们在密营的开诚相见，使我们成了终生难忘的朋友。总之，我们虽然相隔千里，心却是时刻在一起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那些置国家、民族和骨肉于不顾，只图一已私利和享乐的有产者，是不可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但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人的有良心的有产者，不问其国籍、党派和政见，则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意识形态的差别或财产的有无，不能成为评价人的绝对标准。如果说有评价人的最普遍的标准，那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民族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和对人的热爱。珍视人的人就热爱民族，热爱民族的人就热爱祖国，这是一个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如果无视这一真理，那么在做人的工作中就会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过去记述抗日革命斗争历史的某些文章说刘通事是反共的恶霸地主。这个评价是不正确的。只根据家庭出身和经历评价人，轻率地处理其前途问题，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既可能把爱国者当作卖国者，把革命的支持者视为反革命分子；也可能把卖国者看作爱国者，把反革命分子误认为革命的支持者。

旅美侨胞孙元泰曾向金日成同志问过这样的问题：“主席，南朝鲜有很多有产者，祖国统一后，您将如何对待那么多的有产者？”金日成同志作了如下的回答：

只要不是依附外来势力出卖民族的极端反动分子，不管是谁，我们都将同他携起手来。我们的关于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就是集中地阐明了我们的这种立场。

三　激战“讨伐大军”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9年秋到1941年春，以东南三省“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名义，对朝鲜人民革命军进行了空前的“大讨伐”。

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读了当时“大讨伐”的主谋者野副及其手下一些“讨伐”队长败北之谈时，对有关部门的干部说：“爱夸海口的日军居然说出了如此气馁的话，可见当时他们都被吓昏了头。至于我们的同志所受的苦，就更不用说了，确实是一场生与死的拼搏啊。”接着，他详细地回顾了当年敌我间的酣战。

我们搞武装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是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艰难的行军”时期也很艰苦，在日本帝国主义以“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名义，对东南三省进行大规模“讨伐”的时候，也吃了很大的苦头。东南三省，指的是当时的吉林省、通化省和间岛省。每个斗争阶段固然都很艰苦，但这时所经受的艰难困苦，尤其令人难忘。

我们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敌人正准备自1939年秋天起，对我们进行长期的“大讨伐”。

给我们提供这一情报的，是这年6月在乌口江战斗中曾被我们俘虏的“奉天部队”的一个连长。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很多敌军官兵。我们不仅不杀他们，反而发给盘缠放他们走了。对此，他们觉得非常奇怪。

有些俘虏希望加入我军，我们就从他们当中挑选了一些聪明的人，给了他们一项任务：回到敌军去为我军做事。当时，经我们教育后回到伪满部队的军官当中，有一名连长，就是这个连长向我们提供了情报。他通报说：敌人新编了“间岛地区讨伐队”，他的连也属于这个部队。“大讨伐”将从10月初开始。这次作战的规模之大是空前的。革命军如不立即采取相应措施，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失。

由于有了这一情报，我们预先知道了敌人在策划新的大规模“讨伐”行动，因而能利用比较充裕的时间做好应付敌人的准备。

我们对“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发现敌人的阴谋确实非同寻常。

这次“讨伐”是日满军警联合进行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行动。它是由关东军司令梅津和满洲国治安部大臣直接指挥和监督，出动了二十余万日满军警和各种半军事人员进行的一场“大讨伐”。

自我们进行抗日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每年都对我们进行“讨伐”，其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1934年后的围攻战，1936年秋天起在北部东边道的“讨伐”，规模都是很大的。

这次在“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名义下准备的新的“讨伐”，只从它所包括的地区之大，就不难看出是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次“讨伐”的。

1936年开展“北部东边道治安工作”时，以佐佐木为头子的“通化讨伐司令部”的作战地区仅仅限于一个省的范围；而这次“野副讨伐司令部”的作战地区，则包括吉林、通化和间岛三个省与牡丹江省的宁安县，这就等于四个省了。

在《满洲国军》一书中，对“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准备情况作了这样的叙述：

“关东军确定的预算总额为三百万圆，决不允许超过这个限额。开始讨伐的第一天即10月1日，关东军参谋长饭村、满洲国总务长官星野直树、治安部次长薄田美朝和野副少将的代理北部参谋，在关东军司令部举行了会议。北部参谋在说明治安肃正计划时，指着地图介绍了开辟和维修公路、架设通讯线路和建立集团部落等诸项问题，提出了需要三千万圆讨伐经费的要求。

星野直树长官答应要设法解决费用，饭泽主计处长也说一定设法凑足经费，只望三省讨伐成功。这样，才得以促进治安工作最终的彻底的解决。”（《满洲国军》兰星会，第400页）

“野副讨伐司令部”的新作战行动同以前“通化讨伐司令部”的作战行动相比，地区要大三四倍，兵力为十二点五倍，经费是十三倍。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日本军部对这次“讨伐”寄予了多么大的期望。

日满军警头子们并未把这次“讨伐”局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把它同“诱降工作”、“思想工作”和“治本工作”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从广度、深度和手段与方法的多样性上，都远远超过历次“讨伐”的空前大规模的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开始这次“讨伐”时，称它为“圣战”和“圣伐”。他们把“讨伐”称之为“圣伐”，真是可笑之至。

日本人曾多次进行海外侵略战争，几乎都是不宣而战，而且从来不称之为战争，都说成是什么“事变”或“事件”，以图使自己的战争行动合法化。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而这一次，他们却宣称“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新行动为“圣伐”、“圣战”，这倒是很有意思的。这说明，日本军部已经放弃了把同人民革命军的对抗看作是单方面的“讨伐”和“肃正”的旧观点，开始看作是双方进行的一场战争了。

金日成同志还谈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以骇人听闻的总体战的体制对付我们的原因，和他们的作战计划企图达到的目标。

由于在侵华战争和哈勒欣河战斗中接连不断地遭到惨败，日本军部乱成了一团。

他们曾夸下海口，要在三个月内，至多半年内结束侵华战争。可是打了两年，仍没有胜利的希望，日军主力也深深地陷进了战争的泥沼之中。

对日军在中国大陆和哈勒欣河遭到惨败的原因，日军军部的一些人认为，在于军部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事技术装备上的落后；而大多数幕僚和军事专家却认为，主要原因是人民革命军在背后的骚扰战所招致的后方不稳定、补给线堵塞和战争心理的错乱。说实在的，人民革命军的敌后骚扰战，的确使敌人遭受了莫

大的损失。看来，这使日本人清醒了。他们认识到，只要人民革命军在其后方活动，他们就不能顺利进行侵华战争和对苏作战。这意味着敌人改变了对抗日游击队的看法。

由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订出所谓“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作战计划，企图以总体战的体制对付我们，这是他们总结了同人民革命军的作战之后，得出的必然结论。敌人这个“肃正工作”提出的目标，就是要斩草除根，最终消灭人民革命军。

看看野副对其部下的训话，从头到尾全是要完全消灭我人民革命军的狂言妄语。

他说，多年以来，虽然在吉林、间岛和通化三个省连续进行了“讨伐”，但仍未消灭游击队。所以，他奉命身负重任，要策马飞奔白头山，一举全歼敌人，消除匪祸。他命令部下务必全歼人民革命军，不准放过一个。

他这些话是针对我们说的。这说明敌人的主攻目标就是朝鲜人民革命军。

对敌人在总体战体制下进行大规模作战将采取的战略战术，我们特别关注。我们终于发现，根据对我们游击战术的长期研究，日军军部采取了新的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的战术。

我们搜集到一份所谓“讨匪”工作参考资料之后，进一步证实了敌人要以游击战对付游击战的阴险计策。当时，敌人把“讨伐”经验汇编成一本集子，分发给各“讨伐队”，让他们事先做充分的准备。这是他们反游击战的一份军事操典。

日军军部要求其反游击战的特殊部队穿跟我们一样的服装，

训练和一切行动都模仿游击队的样子。这一切清楚地说明，为了消灭朝鲜人民革命军，日军军部进行了多么深入的调查研究，多么煞费苦心地探索新的战术。

我认为同野副的较量，必将是一场十分严酷的激战，要在这场战斗中取胜，就必须研究出一套过去没有使用过的全新的战术。

这就是说，要粉碎几十万敌军的进攻，保持持久的革命高潮，就必须找到能够进行积极而周密作战的妙策。我们所选择的妙策就是大部队回旋战。大部队回旋战，顾名思义，就是用大部队沿着秘密路线，在广大地区进行回旋的长期机动作战。这不是盲目的流动，而是用多种多样的打法边游动边打击敌人。不运用这种机动战，就不可能打败二十万敌军。

“野副讨伐司令部”的“地区讨伐队”和“小地区讨伐队”的讨伐罗网，不仅包括着吉林、间岛和通化三省，而且还包括了牡丹江省的宁安、东宁和穆棱等地。因此，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这个罗网而难以挣脱。

不过，仔细观察这个罗网，发现既有稠密的地方，也有稀疏的地方；既有已布下的地方，也有正在布撒的地方；而且网眼儿的大小也不同。在我们的活动中心间岛省，各个县都部署了“讨伐队”。

我们第一个回旋的方向，定在敦化和额穆以西。这两个地方有许多我们组建的地下组织，群众也已经革命化了，便于我们站住脚。我们用大部队攻打这两个地方，敌人的注意力必然会向那

里集中。这时，我们就迅速回旋到濛江、抚松和长白方面去，再打它个天翻地覆。当敌人闻声直扑这一带的时候，我们就又回过头来绕过间岛省南端返回原地。这就是我的构想，我把这种回旋战的时间，定为一年左右。

我主张以大部队进行回旋战。大部队回旋战的目的不是躲避敌人，而是把敌人诱到于我有利的地方加以消灭。打敌人，就要打歼灭战，彻底消灭敌人，不能让它死灰复燃。而要做到这一步，就必须用大部队打回旋战。

我认为，在大部队回旋战中特别重要的，是严守回旋路线的秘密。

如果路线的秘密泄露了，我们就有可能被敌人的“牛虱战术”咬住尾巴，甚至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而吃大亏。这种回旋战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口粮问题。游击队在固定地区活动，可以预先置备口粮，储存在密营里。而在整整一个冬天以大部队转战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不解决粮食问题，就打不了大部队回旋战。我订好这个作战方案后，没有立即提出来的原因就在这里。

确定了部队的回旋路线之后，我派第七、第八两个团和警卫连到我们将经过的重要地点去预先储备好粮食。同时在安图县北部和桦甸县、敦化县一带也储备了些粮食。

那时候还没有收秋，解决粮食十分困难，又不能去找城里的粮商买粮食。

我对搞粮食的指挥员说，要去买地里的庄稼。当然，要买下

地里的庄稼，就要由我们自己到地里去收割和脱谷。这是很费工夫的，就是出动部队的全部人马，人手也不够。但我们不得不选择这个办法。

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后，在那年10月初，我在安图县两江口召开的军政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在白头山东北部广阔地区进行大部队回旋战的方案。

在两江口及其附近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有一个农民带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儿子，来恳求我收他孩子加入革命军。

在即将进行大部队回旋战，将经受严酷考验的时候，收下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参军，不能不慎重考虑。

我问那个少年，我们日夜不停地行军，有时一天要走一二百里路，你能跟上吗？他指着李五松说，那个大哥能跟上，我也能跟上。

我又问那个农民，你让儿子加入游击队，能放心吗？他说，要是没那么点觉悟，还能把儿子送给游击队吗？俗语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嘛。我指靠将军，放心啦。

这个少年很聪明，他父亲也很不错。我决定收下这个少年。

有些人说我自讨苦吃，大部分指挥员和战士都高兴地说，司令官同志收下这个小鬼入伍，可见这次作战的胜利是已经到手了。他们断定，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司令官是不会自找麻烦，肩起这个担子的。

我把这个小鬼安插在传令兵中，经常带着他。他很聪明，机

智敏捷，进步很快。我去两江口开会时也带着他。开完会我们就往回走，这个归途可不是一帆风顺的。野副的第一期“讨伐”已经开始，形势十分险恶。我让尖兵打头，叫队伍隐秘行动。

我们走到鸡冠砬子附近，突然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个地方的山峰酷似鸡冠子，故名鸡冠砬子。这座山峰恰在我前方左侧，地形有利于敌人打伏击，对我抵御敌人的奇袭十分不利。看到这样的地形，我立即想到，敌人来到了鸡冠砬子，是决不会放过这个有利地形的。他们既然决心以游击战的方式消灭抗日游击队，就一定会在这里打埋伏，等待我们到来。

但是，我们又不能因此改变行军路线，绕远道走。我于是命令队伍由机枪手打头阵，快速通过危险地区。

我们刚走到鸡冠砬子脚下，山顶上就突然响起了刺耳的枪声。敌人开始朝我们沿着一条小径行军的队伍集中射击。

一个外号叫“矮子”的老队员和金正德同志受了致命伤。

我担心那个刚入伍的小鬼，喊他的名字找他。谁想到他正朝着高地的敌人开枪呢。在那么危急的时刻，他却能沉着勇敢地向敌人开枪，的确令人惊叹。他甚至还照顾我，朝我说：“司令官同志，请不要动！”我对他说：“不！应该动，要不断变换着位置射击！”说着，就把他拉到了我身边土堆的后面。敌人的子弹不断地向我们飞来，真是进退两难。我发现离我们约一百米的平地边上有一条小沟，就一面朝那边跑，一面命令：“跟我来！”队员们背着伤员跟我跑去。可是，那里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我们下到河边跑了一阵后，又掉头朝敌人脚下的峭壁跑去。我无暇告诉队员们为什么朝那边跑，只顾带头飞跑过去。我想，队员们一定会莫名其妙的。他们会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不会是只用这十来个人去向敌人冲锋吧。

但是，队员们毫不踌躇地紧跟着我。正如我深信队员们那样，队员们也绝对信赖我。

我们接近了峭壁，敌人的子弹都从我们头顶上掠过。我想，队员们这时候一定领会了我的战术意图。

敌人以为我们朝平地那边逃走了，一个劲儿地朝平地方向射击。过了一会儿，敌人从高地上冲了下来，呼喊着包围了那片平地。我们则乘机登上了另一个高地。从三面包围了平地的敌人，自相厮杀了起来。

鸡冠砬子战斗，可以说是同“野副讨伐队”的初次遭遇战。通过这场战斗，我更清楚地了解到敌人在开始新的行动以前，对我们的游击战术确实作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也更加确信我们选择的大部队回旋战的方案，在战术上是完全正确的。鸡冠砬子战斗，可以说是我们当时面临的军事形势的缩影。

在我到两江口开会的时候，我们的人已经全部完成了粮食的储备工作，缝纫队也照我的指示基本上完成了缝制军服的任务。

大部队回旋战的第一阶段，也叫敦化远征。这个阶段的路线，扼要地说是从花拉子直奔敦化，然后往濛江、抚松方面运动。我们的意图是，从花拉子朝白头山方向行军，中途掉头朝北走，到敦化山区流动，转战中打几场大仗；而后进入濛江县东牌

子或抚松县白石滩的深山老林，驻在密营里解除疲劳，同时进行军政学习，渡过寒冬。

在准备第一阶段的作战时，我把警卫连的一个排和独立营交给了林水山，派他到东牌子去，又把一支小分队派到白石滩去，让他们在那里盖密营，为大部队准备粮食和被服。

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我们就开始了敦化远征。要想了解敦化远征，只要了解一下六棵松战斗和夹信子战斗就行了。这两仗都是在敦化远征期间打的。

为了不暴露大部队的转移路线，远征一开始，我们就直奔二道江上游，叫敌人以为我军在向三长方面转移。

从花拉子走了二三十里路，天就开始麻麻亮了。我们掩平了江边的脚印，走进就近的树林子里休息。吃过早饭，恢复了元气，便开始用一人脚印行军法，继续朝着白头山方向走。到了奶头山附近，突然把行军方向转了180度，掉过身来又踏着封冻的三道白河往北行军。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敌人晕头转向，陷于混乱。

这样突然掉转行军方向的做法，其效果之大，真如打了几场胜仗。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有意传播游击队的风声，暴露游击队的足迹，牵着敌人的鼻子到处转，使敌人狼奔豕突，误入林海雪原，以致冻饿而死。活着的也叫他筋疲力竭，完全丧失战斗力。

我们翻越牡丹岭的时候，因山上的积雪吃了很大的苦头。积雪漫山遍野，山岭上的岩石都变成了冰块儿，滑得寸步难行，行军的速度自然大大减慢了。

我主力部队安然越过牡丹岭，没入敦化的大森林里隐蔽起来。

大部队回旋战一开始就十分艰难，但这是一次气概豪壮、大快人心的开端。开始敦化远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狠狠打击敌人，只是为了维护秘密路线打了一些小仗。尽管如此，敌人的伤亡还是很大的。

金日成同志每当回忆敦化远征的时候，总是谈起在途中召开的反日青年同盟会议。

我们在敦化远征途中，召开了反日青年同盟会议。反日青年同盟，是指根据南湖头会议的决议，从发展的观点出发，改编共青组织后的青年组织。我们召开反日青年同盟会议，是有一定缘由的。敦化有一个地方叫四道荒沟。我从吉林监狱获释后，曾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边调养边恢复被破坏的地下组织。我们翻过牡丹岭后第一个歇脚的地方，就在这个四道荒沟附近。去村庄了解情况的队员，带回了当地地下组织提供的有关朴得范事件的材料。

所谓朴得范事件，就是一个名叫朴得范的人民革命军指挥员，拿革命军的名誉换了后勤物资的事件。因缺少粮食和被服，他的队伍曾一度受了些苦。断了后勤物资，应当去袭击敌人或者发动革命组织来解决，这是人民革命军的传统做法。但是，怕打仗的朴得范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用极卑鄙的方法去解决粮食和被服的困难。其手段之卑劣，简直令人羞于开口。

他对敌人的密探说，他准备率一个师投降，可是有个条件，他的人衣服都破了，粮食也断了，要先要些布和粮食，送到他指定的地点，好让他的人换上衣服，吃饱了饭，然后再带他们去投降。他还说，光凭你一个密探的话靠不住，送粮食和布匹时，还要派几个能保证他们部队安全的代表来。

密探同意了，他回去向他的特别工作班作了汇报。敌人对这个交易很感兴趣。吉林省和敦化县的头子接到这个通报，立即纠集党羽，密谋对策，然后把他们的几个要人作为代表派到了接头地点。

朴得范迎接他们并同他们进行谈判。在谈判中间，他手下的一个指挥员进来报告说约好的物资已经收齐了。他听罢当场就杀掉了敌方代表。后来，他为此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并被调到警卫旅去工作。1940年，他被敌人逮捕，很快就叛变了，假投降变成了真投降。

朴得范叛变后，组织“朴特设部队”，疯狂进行阴谋活动，妄图诱降他过去的战友。

朴得范事件对我们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听到朴得范叛变的消息，我心想他那次假投降的把戏不是偶然的。假投降的把戏，是只有那些有投降思想的人才能想得出来的。朴得范的叛变说明，演假投降把戏的人，总有一天是要真投降的。

我认为更严重的，是有不少人对朴得范的行为大加赞赏，似乎他还立了什么大功。从四道荒沟回来的侦察组的一个人，甚至认为朴得范做了很了不起的大事，对他不仅没有受到应有

的评价，反而受到了严重的处分不理解。他向我汇报居民的反映后，很不以为然地说，四道荒沟的人们指责朴得范玷污了游击队的名誉，他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对的。这个侦察员是反日青年同盟盟员。

反日青年同盟盟员把朴得范的行为看作是值得肯定的事，这是十分危险的。我找负责青年工作的指挥员谈话，他说方面军的不少盟员也有类似的看法。我认为反日青年同盟盟员的思想状况有问题，提出应该召集青年同盟盟员开个会。可是他却说，一到宿营地，大家就都瘫在地上睡着了。

这种现象，在我们的部队里还不曾有过。通常一到宿营地，队员们都是擦枪、补衣、刮脸、打柴，紧张而有节奏地安排生活。这天晚上却完全不同。当然，在远征中他们都很累了。但是，因为累了就不做宿营的准备，就倒头便睡，这怎么行呢？这样下去，怎么能把流动作战坚持到底呢。

这天晚上，我让吴仲洽团长把一个连队的帐篷腾了出来，在那里召开了反日青年同盟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对反日青年同盟盟员中出现的是非不清的思想观点进行了批评，对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注意文明卫生，不爱参加文娱活动等现象也进行了批评，并讨论了克服这些现象的措施。

会上，我再次指出朴得范事件的严重性，特别强调每个队员都要对损害人民革命军威信和名誉的现象时刻保持警惕，进行原则性的斗争，同时要注意搞好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通过这次会议，指挥员也都吸取了教训。不少指挥员认识

到，自己迁就甚至同情队员的懒散行为是错误的。

这个会议，可以说是为攻打六棵松和夹信子进行的一次思想动员。

这个思想动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会后，我们攻打了六棵松，打得非常好，夹信子战斗也打得很漂亮。这两次战斗以后，队员们才明白了司令官突然召开反日青年同盟会议的意图。

工作越艰难、形势越严峻，就越要做好思想工作。我主张思想第一。我是思想至上主义者，视思想重于一切财富。同二十万敌军进行决战，我们是靠什么订出大部队回旋战这样气势磅礴的作战计划并坚决完成的呢？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全军的团结一致。我们有飞机、坦克吗？我们只有人民、游击队员和轻武器，除此而外什么也没有。作了思想动员之后，我们连续打了几仗，效果的确很好。

在远征过程中，曾因林水山的失职不得不改变作战计划。对此，金日成同志作了如下回忆。

在召开反日青年同盟会议的前夕，金正淑和李斗益到司令部来汇报了东牌子密营的情况。开始敦化远征时，我本来打算到东牌子度过最寒冷的一两个月，然后绕过抚松县和长白县，取道国内与和龙，再返回出发地点安图。但是，派到东牌子的林水山根本没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他以形势紧张为由，没有努力执行我们交给他的任务。金正淑和李斗益很着急，代替林水山为完成

任务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他们准备的粮食也只够东牌子的人勉强过冬。

在这种情况下，我断定不能按原定的路线再带大部队到东牌子密营去吃他们的口粮了。

实际上，那时候林水山的思想已经严重变质。他不久就真地叛变投敌了。思想上的变质，并不是在一两天之内发生的。思想的腐败变质和行为的背信弃义，是有它酝酿和变化过程的。林水山开口闭口说为革命献身，实际上在“惠山事件”以后，他的思想就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了。只是由于我们过于信任他，没能及时发现而已。

原定的预备通路抚松县白石滩，虽然地势有利，但离居民区很远。

三十里外才有几个村子，而且也没有几个我们的地下组织。何况粮食也是个问题。虽然有事前派的小分队和吴白龙利用松花江运来了些储藏的粮食，但它的储藏地很远，又是准备以后急需时用的。我派到白石滩的先遣队，也大都是女队员和病弱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队是不能到白石滩去了。简直是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眼看严寒就要到来，原定的通路已经去不得了，准备新的通路又来不及，加上敌人又紧紧地追着我们，可见牡丹岭脚下也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的确是落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

粮食，只要有粮食，别的困难都能顶得住。正当这时候出现了恩人，帮助了我们。老百姓给我们提供了一片没有收割的豆地，让我们渡过了难关。

此后，我们攻打了六棵松和夹信子木材所，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粮食等各种物资。然后，突然转了个180度，改变行军方向，一直南下，开到了白石滩密营。至此，可以说是大部队回旋战的第一阶段。

六棵松战斗和夹信子战斗，是装点大部队回旋战第一阶段的出色战斗。我们从敌人“讨伐队”布下“天罗地网”的和龙至安图一带溜出来藏踪匿迹，已经使敌人大惊失色了；这回又闪电式地连续攻打敦化的好几个敌军主要驻地，这一机动灵活的战术，更使敌人惊恐万状。他们接到六棵松、夹信子遭到袭击，驻军被歼灭的告急电报后，急忙调兵遣将，集中兵力于敦化一带。这时，我们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南下，到达松花江流域了。

第一阶段作战的最大成果，是在六棵松和夹信子木材所吸收了二百多名工人入伍，壮大了我们的队伍。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松花江畔树林子里演出节目，庆祝胜利。工人们观看演出后，自告奋勇地为我们搬运战利品，他们当中的许多青年自愿报名入了伍。一次就吸收这么多青年工人入伍，这在抗日游击队建军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是个大喜事。

我们没有备用的武器和军装发给新入伍的队员，只好先发给他们带有红星的臂章。女队员们连夜赶制臂章的喜人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白石滩密营里进行的军政学习，既是大部队回旋战第一阶段的总结，也是第二阶段的序幕。

我们在白石滩做好准备以后，便进入了第二阶段作战。第二

阶段作战的活动路线，是从白石滩出发，经过荒无人烟的白头山东北部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和四道白河，挺进国内，然后取道和龙再返回安图县。

我们在白石滩进行军政学习时，密营被敌人发现了。粮食工作队装在麻袋里的大豆惹出了事。原来，麻袋破了个洞，大豆一粒一粒地漏出来掉在地上，被密探发现了。

我们接到了情报，敌人正准备对我们发动全面的围攻，便采取了应付敌人的措施：一个连深入敌后，攻打两江口，然后向下崴子方面转移；警卫连的一个排在白石滩后面高地的几个哨所迎击来犯的敌人，然后向露水河方面撤走。我迟迟等到敌人开始攻击前的半个小时，才率领主力部队离开密营向露水河方面转移。要把敌人诱人陷阱，就要造成我们仍在密营里的假象。

我们刚刚撤走，敌人就向密营扑上来了。他们看到静悄悄的密营，以为是块到手的肥肉，就发动了冲锋。我们警卫连的神枪手们一枪不发，坐在那里观看敌人围攻空无一人的密营。

天一亮，敌机出现在密营上空，对着在地上高兴得招手狂叫的自己人，投下了炸弹。闯进营房的敌人听到炸弹的轰隆声，都跑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机枪开火了。

敌人的陆空协同作战，变成人民革命军和日军飞行队的“协同作战”。

当敌人在白石滩陷于混乱的时候，我们从容不迫地向白头山方面转移，在露水河痛打了跟踪的敌人后，渡过二道白河隐匿到

奶头山以东的森林里去了。之后，让攻打花拉子附近木材所后去两江口的连队和留在白石滩的警卫连也汇合到这里来了。我们把侦察组派往茂山三水坪，大概也就是这个时候。

由于敌人对国境警备森严，侦察组一渡过豆满江就遭到了追击，没能完成侦察任务，死里逃生地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大部队挺进国内，将是一个冒险。

我决定暂时推迟进攻国内，先攻打一个大木材所，一方面解决粮食问题，一方面观察驻朝敌军的动向。出于这种目的，攻打了豆满江沿岸的大马鹿沟木材所。果然，朝鲜方面的反应非常迅速，敌人的国境警备十分严密。我接到这个报告，就牵着敌人的鼻子转，打了几天之后，进入了花拉子南边的山林。其后，我们在红旗河同前田部队又打了一仗，就结束了大部队回旋战。

不要把同“野副讨伐队”的激战仅仅看作是与一个地区司令官的战斗，这是同日本军部，也就是同“大日本帝国”的交战。敌人大肆宣扬的“肃正大纲”的治标、思想和治本三大工作，都遭到了失败。一句话，在这次交战中，我们取得了胜利。

日本败亡后，野副退役在九州的一个村庄度过晚年。他在回忆当年时写道：

“金日成部队善于运用伪装战术：将部队分成几个分队活动，各分队都自称是金日成部队，造成这里和那里都有金日成部队的假象。金日成无疑只是一个人，但由于好几个人都使用金日成的名字，很难辨别真的金日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因镇压间岛暴动立了大功，受到上级的赏识，在“野副讨伐队”里担任特殊

工作的长岛，也由于朝鲜人民革命军神出鬼没的战术，饱尝过苦酒。他回忆说：

“我在野副部队担任特殊工作的时候，听说有一支部队叫金日成部队。经了解，这个部队的战术极为巧妙。我们听说哪里出现了金日成部队，当追到那里时，又说金日成部队出现在另一个地方，真是神出鬼没。其实，不是一支部队如此迅速地忽东忽西，变换地点，而是分成几个分队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都自称是金日成部队。”他在回忆同朝鲜人民革命军吃力地进行艰苦的战斗时说：

“抗日联军的高级干部几乎都被杀害、被捕或者投降，唯独金日成幸免于难……战争结束后，回到北朝鲜当了首相。”

四　吴仲洽和第七团

有一年，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阅读长篇小说《严峻的战区》，读到吴仲洽牺牲的场面，悲痛难忍，读不下去，久久地怀念着牺牲已经多年的吴仲洽，整夜未能入眠。

金日成同志每当谈起以光辉的胜利装点了大部队回旋战第一阶段的敦化县六棵松战斗，就回想起吴仲洽的牺牲；每次谈到吴仲洽的英雄生涯，就深情地回忆起在抗日革命年代里以生命保卫了朝鲜革命司令部的第七团，以及他们誓死保卫领袖的精神和他们的斗争业绩。

我们失去吴仲洽是在六棵松战斗中。在那场战斗中还失去了连长崔一贤和机枪排排长姜兴锡。这三个人都是我最爱惜的指挥员，可惜都在同一天同一时刻牺牲了。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许多战友，其中吴仲洽的牺牲，最使我惋惜和痛心。

吴仲洽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声音小影子大。所谓影子大，是说足迹大，业绩大。

我们部队的指挥员中恐怕没有像崔春国、吴仲洽那样声音小的人。

所谓声音小，可以解释为不表现自己，也可以解释为文雅安静。吴仲洽作为军事指挥员，是少有的文静的人；是声音小，做事多的人；是个不表现自己的谦逊而质朴的干部。人们说崔春国是个像新娘一样的人，而吴仲洽比他还娴静。他是个想挑剔也无

从挑剔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他不声不响，可是在执行艰巨任务时则非常果断，是个一旦下定了决心就不怕赴汤蹈火勇往直前的虎将。一般的困难他都不当回事，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要做到底，不完成任务绝不罢休。

他主持正义坚定不移，对非正义的事决不妥协。我想，他比别人的阶级觉悟高，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精神。

有一年由于干旱，吴仲洽家租种的地没有收成。他父亲向地主求情说，今年的收成这样，请开开恩，让我们度过这一年吧。可是那个奸猾刻薄而又残暴的地主不仅不同情，反而骂他是盗贼，举起文明棍就要打。吴仲洽看了忍无可忍，抄起连枷就朝那个地主使劲打过去了。当时吴仲洽不是十四岁就是十五岁，可见他从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

正义感强的人思想觉悟快，投入革命也会早，会成长为奋不顾身地带头进行斗争的优秀战士。

据吴泰熙老人说，吴仲洽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独立军游戏。他小时候住的村子是当年金佐镇骑着青骢马驰骋过的地方，所以，不能不受独立军的影响。他受堂兄吴仲和的影响较大，也从他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他所以很早就投身于革命，是因为他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心强。

回想起来，像吴仲洽那样大胆勇敢的指挥员是少有的。

自古以来，名将修武之道，重视智和仁，同时也重视并且努力培养胆和勇。老虎把崽子从峭壁上滚下去，是为什么呢？为的是培养崽子的胆力。

吴仲洽没上过讲武堂，也没有见过道士，他是在抗日的烈火中培养了革命者应有的胆力和勇气的。

1939年中秋节前夕，在袭击和龙县三道沟附近的金矿时，他在战场上创造了罕见的奇迹。

在指挥那场战斗时，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吴仲洽的前额，但他没有死，继续指挥了战斗，也许是那颗子弹打偏了一点。这是一个奇迹。

就算子弹打偏了，人的薄薄的头盖骨能顶住一颗子弹，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但这是确凿的事实。我也看过他的伤口，传令兵给他缠了绷带。

同志们对他说，你可真碰上了好运气，托了“老天爷”的洪福。他说，日本鬼子的子弹也许能打穿懦夫的额头，可是共产主义者的额头是打不穿的。

他额头上中了子弹仍在指挥战斗时，敌人扔的手榴弹越过墙落到了队员们的脚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仲洽飞快地捡起那颗手榴弹使劲甩过墙去了。

敌人看到他们投的手榴弹又飞过墙来，吓得魂飞魄散四下里逃窜。吴仲洽不放过这个机会，立即发动了冲锋。这不又是一个奇迹吗！

手榴弹是一种近距离杀伤武器，从投掷到爆炸只有两三秒钟。把就要爆炸的手榴弹捡起来，这本身就是个冒险。吴仲洽就是这样一个无所畏惧敢于冒险的人。

通过这两件事，你们也能了解吴仲洽的为人。

吴仲洽是个英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员。作为军事指挥员，他的长处首先是判断情况快，下决心快，组织战斗周密细致。他一旦下定了决心，就毫不踌躇，坚决果断地付诸行动。这是他的长处。他像摔交运动员运用绝招，把身强力壮的对手摔倒那样，无论遇到多大优势的敌人，都能运用巧妙的战术战胜敌人，绝无失误。实际上，他是不亚于崔贤和崔春国的久经考验的战将，只因为他经常和司令部一起行动，所以他的事迹传播得较少而已。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像吴仲洽那样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人，我见到的并不多。他那高度的组织纪律性，首先表现在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和指示上。派他任务时，他总是只有一个回答“是！”从不讲任何条件；无论做什么事，他从不推辞。

他执行我的命令和指示，一分一秒也不耽误。叫他到什么地方去执行什么任务，什么时候到哪个地点接头，他都准确无误地去完成，然后在指定的时间里到指定的地点汇报。如果在执行任务中发生了意外的情况，他就让一个小分队留下来继续执行任务，自己带领基本队伍一定准时回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他就教育和鼓励队员们说，我们一定要准时回去，免得让司令官同志为我们操心。

在部队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吴仲洽团长也是完全按照我的指示去做的模范指挥员。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也像正规军一样把部队的管理搞得井然有序。他指挥的第七团，没有一个穿着裂了口子的鞋或裤子的队员。如果在行军时发现哪个队员的衣服破

了，他就叫那个队员在休息时一定把衣服补好。因为他管理得好，他的部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我偶尔无意间脱口而出的自言自语，他也当作司令官的要求和命令牢记在心，设法解决。

1939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我和吴白龙在乌口江密营散步，随便说了句中秋节快到了……

这话不知什么时候传到吴仲洽的耳朵里去了。对我的要求和意向，他最敏感，比谁都善于领会。所以他也没有忽略我那句话。他心想：司令官为什么说中秋节快到了呢，是不是因为中秋节快到了，怕新队员想家，才考虑着要准备过中秋节？几天后，他为了准备过中秋节所需的物资，跟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大量的粮食和其他食品，里面还有月饼。就是在这年中秋节，我应吴仲洽之邀，给七团的队员和司令部成员讲了月饼的由来。

吴仲洽是连我的枪声都能准确辨别的忠臣。“艰难的行军”时，我们都集体行军，途中有一段分散行动。那时我和吴仲洽约好，来年春天在三水沟会师。当时，朝鲜人把十三道沟叫做三水沟。

1939年3月上旬，我组织了一场袭击三水沟某集团部落的战斗。吴仲洽听到我们的枪声说：“这是司令官同志的枪声，兵力只有一个连队的司令部有可能被暴露，陷入敌人的包围。同志们要誓死保卫司令部！”说罢，就带部队奔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来了。

吴仲洽真是个忠厚淳朴的人。

现在我再讲一个有关他的故事。他原在汪清县元家店从事地下活动，后来参加了游击队。他入伍时汪清游击队缺枪。入伍的人多，要求入伍的人更多，问题是没有枪。因此，没有枪的队员就像在故事片《游击队五兄弟》里看到的那样，挎着大刀，扛着红缨枪。吴仲洽起初也挎着铁匠铺打制的大刀。

汪清游击队总是让那些没有枪的队员站在队伍的最后尾。

吴仲洽每次去放哨都要借人家的枪。可是他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

吴仲洽一连几个月一直挎着大刀，所以同志们一见到他就逗他。

有一天，我正经地问他，仲洽同志，你总是挎着刀跟着人家的后头走，不感到委屈吗？他回答说，有这把刀也就不错了，怎能人人都摊到枪呢？枪嘛，只要打仗，就会有的。

话虽这么说，可是人家都扛着枪，自己却带着刀和手榴弹跟在别人后头，心里该多么不得劲啊。可是他不露声色，十分坦然。

为了给那些只带着红缨枪和大刀的游击队员解决枪支问题，我们组织了一场战斗。要获得枪支，就要打仗，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们袭击了从图们经三岔口到牡丹江的铁路敷设工地。

在这场战斗中，吴仲洽缴获了许多支步枪，还缴获了敌军官的手枪。

缴获的武器授予谁，这要在战斗总结会议上决定。我们制定了对战斗勇敢、遵守纪律的队员，优先授予枪的制度。

这次袭击战的总结会议，我也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吴仲洽也领到了枪。

后来，吴仲洽从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升为团长。可以说，他是革命军指挥员的典范。

要说吴仲洽的长处，除此而外还可以讲出许多。

吴仲洽是个文静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快活，乐观，平易近人，学习热情高。他不说废话，品行端正，能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他安排部队的生活周密细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比别人强。

作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一员的吴仲洽的成长，就是第七团的成长，这样说并不言过其实。

七团的前身是独立团。独立团是从汪清、延吉、和龙等东满各县分别选拔一个连来新编的。

在汪清县，七连被编入了独立团。汪清的七连是从汪清一连分出来的，被编入独立团后成为二连。开始吴仲洽在独立团二连当了青年干事。

独立团于1935年被编为独立一师第二团，南湖头会议后新编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师的时候被编为这个师的第七团。七团是这个新编师的骨干。

吴仲洽、吴白龙、姜曾龙等人，都随同经历了这种变迁的第七团的历史一道成长起来，分别成为团长、连长、排长。

第七团大部分是朝鲜人。我们从汪清时候起就系统地培养吴仲洽，同样，对第七团也集中力量进行指导，比指导别的部队更

深入，把它建设成了新师中战斗力最强的模范团队。首先是选拔优秀的人来配备了排长、政治指导员、连长等全团的指挥干部，对他们有计划地进行教育，把他们从思想政治上和军事技术上切实地武装起来。游击战所需要的各种操典以及宿营法、炊事法、行军法、方位判断法、临时舞台架设法、演出节目单和介绍文的写法等，我们也都教给了他们。

为了把第七团建设成为模范团队，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和师部领导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经常下到团里去对指挥员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及时帮助解决困难问题。通过这样的培养，第七团成为模范团队，成为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骄傲。

我们把许多在七团受到锻炼的同志派到其他部队去当指挥员。魏拯民向我们要军政干部时总是点名要七团的指挥员。在七团受到锻炼的指挥员被派到别的部队后，又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指挥员和模范战斗员。七团确实起到了像“原种场”一样培养军政干部的作用。是李东学还是朴寿万指挥的警卫连，后来也建设成为模范连。这个连就有很多来自七团的人。

革命军里没有专门培养政治军事干部的常设教育机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七团系统地培养干部来不断地输送到其他部队去，满足了对干部的需要，这是我们在抗日革命中取得的又一个好经验。树立样板，推广全国，我们党的这一传统的工作方法，就是渊源于抗日革命斗争中取得的经验的。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军政干部中有很多是第七团培养出来的。吴仲洽、金周贤、李东学、李东杰、吴白龙、金泽环、崔一贤、

吴日男、孙泰春、姜兴锡、姜曾龙等，都是七团培养出来的。七团的连政治指导员中有个外号叫“潮眵包”的人。记得他姓崔，名字记不清了。他的眼圈总像是潮湿的，所以叫他“潮眵包”。他打仗很勇敢，不幸在小汤河战斗中和金山虎一起牺牲了。崔一贤是在组建北鲜(北部朝鲜——译注)反日人民游击队时被内定为队长的人。金泽环连长也是聪明人。

看来，指挥员强悍，士兵也跟着强悍。连长学团长、排长学连长、队员学排长和班长。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学指挥员的为人和行动的。

可以说，第七团的指战员是学吴仲洽，成了钢铁团队的。

其他部队的指挥员和士兵，都非常羡慕吴仲洽的七团。

我们在白头山根据地的时候，第一军的曹国安曾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请求我选一个能干的人给他，希望给一个熟练地使用机枪的人。他要的就是七团的著名排长、机枪手姜曾龙。姜曾龙是朴禄金的爱人。

我问姜曾龙愿不愿意到第一军第二师去。他头一句就说不去。我以为他是不愿意和朴禄金分离才说不去的。可是实际上并不是。他说；跟爱人分离没有什么，就是不愿意离开将军，不愿意离开吴仲洽的第七团。他同吴仲洽有深厚的感情，两人在汪清时就是莫逆之交，从汪清第一连时就一直在同一个连队里形影不离。叫吴白龙到第八团去当机枪手时，他也说不愿意离开吴仲洽的第七团。

从这两件事就可以看出吴仲洽是多么受人爱戴的人。七团的

队员对自己团队的热爱和团结精神也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也常把犯了错误或政治军事业务差的人派到七团去锻炼。

1938年，在临江县新台子附近的一个密营，有一个负责机枪排的人犯了错误。这个人工作能力也差。所以，我们把他暂时派到七团四连去。在派他去的时候，我对他说：一个干部，如果不对手下人的生活负责，就没有资格当干部；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过失会连累许多队员，才能当好干部。你最好到七团去多学习和锻炼。

他到了七团，在吴仲洽的帮助下确实变成了另一个人，后来也恢复了他的职务。

第七团是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队伍。所以，司令部总是把最紧急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七团。七团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主攻力量。

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我总是把战斗力和责任心最强的七团部署在后卫。经常受敌人追击和突然袭击的游击队，后卫是非常重要的。

在行军途中宿营的时候，我们总是在离司令部三百至五百米远的后边留一个战斗力强的队伍作为后卫。司令部和后卫队的距离有时有一二公里远。后卫队和司令部之间，隔一定的距离设步哨或监视人员。

据我们的经验，“讨伐”人民革命军的敌人不大用从前面截击的战法，而多用从后面追击的战法。所以我们才把战斗力强的部队作为后卫队。

1939年春，我们向茂山地区挺进的时候，在青峰宿营地也是派七团作后卫的。七团的队员们夜里连篝火都不能烧，因为烧火就会被敌人发现。尽管这样，他们也没有叫一声苦。

我很早就要求人民军把吴仲洽树为典范。把吴仲洽树为典范，也就是要向吴仲洽学习。

金正日同志早在60年代初就强调人民军要向第七团学习。他从小就知道吴仲洽是什么样的指挥员，第七团是什么样的团队。

干部、党员和人民军军人应该向吴仲洽学习什么，向第七团学习什么呢？

吴仲洽的长处，归纳起来可以提出好几条，但我认为在他的长处中最重要的是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吴仲洽对革命的忠诚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最突出的表现是对自己司令官的忠诚。

吴仲洽首先忠于我们的思想和路线。他一向认为我们关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朝鲜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和路线是正确的，深入学习研究并认真贯彻执行。同时，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都无条件地拥护自己司令官的思想，对背离这一思想的现象绝不留情，坚决斗争。

吴仲洽一向把我的思想、司令官的军事作战方针看作是法律，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命令。对吴仲洽，任何别的思想都沾染不上。对这样的人，别的思想是行不通的。思想纯正的人，落在任何污水里也不会被腐蚀。

团长的思想坚定，第七团全体指战员也都与自己的司令官同呼吸共命运。

吴仲洽对革命的忠诚，还表现为无条件地执行自己司令官的命令、指示的精神，以及对执行命令、指示的高度责任感。只要是司令官的命令、指示，他都准确无误地圆满地去完成。无论命令、指示多么重，他决不讲条件或发牢骚。

他在完成司令官交给的任务后，每次都汇报完成情况，对于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问题和缺点，也毫不隐瞒，都一五一十地摆出来加以总结。

从吴仲洽对待司令官命令、指示的态度中，我们的干部应该学习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完成一项任务后紧接着主动要求承担新任务的作风。他最不喜欢在原地踏步，做完一件事就接着去抓另一件事。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不断革新、不断前进的人。与别的团相比，第七团吃的苦最多。这是同吴仲洽的事业心强分不开的。

吴仲洽是个有特殊气质的军事指挥员，交给他艰巨的任务要比给他轻松的任务时更高兴。

吴仲洽对革命的忠诚、对自己司令官的忠诚，还表现为誓死保卫领袖的精神。他不仅从思想政治上坚决维护自己的司令官，而且甘愿豁出生命保卫自己的司令官。只要是为了司令官的安全，他就带着全团舍生忘死地扑上去，不管多么艰苦的战斗，也绝不推辞。

我在红头山率领李斗洙连队同好几百敌人苦战的时候，正远离司令部执行战斗任务的吴仲洽，担心司令官的安全，闪电般地

奇袭了敌人的宿营地。敌人遭到这一打击，后方就空了，只好仓皇逃跑了。那次我得到了吴仲洽的救援。

在漫江附近作战，我指挥部队撤退时，用自己的身躯保卫了我的也是吴仲洽和七团。在断头山战斗时也一样，司令部撤退时有几百敌人穷追不舍，也是由七团殿后掩护了我们。

吴仲洽对自己司令官的高度忠诚，在“艰难的行军”时表现得最为突出。行军初期，吴仲洽用“之”字战术展开了近半个月殊死的后卫战，保卫了司令部。

我在别的地方也谈过，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在七道沟断定大部队行动对我们不利，便开始了分散活动。那时和我们分手的吴仲洽，自告奋勇地假装成司令部，引诱敌人穿梭于龙岗山脉和长白山脉两个多月之久。因此，第七团吃了很多苦。多亏他们，司令部有一段时间才没有受到敌人的多少搅扰。

在七道沟和我们分手的时候，吴仲洽他们团没带一粒粮食。要解决口粮问题，就不能和居民点离得太远。可是，吴仲洽却把行军路线定为经嘉鱼河、四登房山脊、红头山西侧和双岔头北边到德水沟。这条路是无人居住的白色地区，要说有人家也不过是些棚户。走进那里就会陷入迷宫，很难活着出来。为了引开向我们司令部集中的敌人，吴仲洽故意选了这条路。他们起初以攻打木材所缴获的牛肉和马肉充饥，走进深山之后就弄不到吃的了。

有一天，吴仲洽发现敌人不再追赶他们，便号召队员们说：“敌人也许已经觉察到我们不是司令部。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等于白费力了。一定要折回去把敌人引诱过来。同志们跟我来！”

他举起盒子枪，重新返回千辛万苦走过的几十里路，袭击了敌人的宿营地，终于把敌人引了过去。从此以后，如果敌人不追赶了，他们就返回去搅扰一两次，使敌人像戴上了鼻环的牛犊一样，乖乖地跟上来。

口粮断了，他们就把鬼子兵宰牛吃后扔下的牛皮泡好了分着吃，继续行军。那年过春节，他们吃的是冻马铃薯。可吴仲洽却担心地说："我们在山上还能吃到这样的东西，司令部能吃到什么呢？"

他在行军路上号召饥饿难忍和疲惫无力的队员们说：我们现在虽然受些苦，可要知道，苦尽甘来嘛。你们想想看，我们打垮了日本帝国主义，向解放了的祖国行进的时候把。生为朝鲜人还有比这更有意义、更光荣的事吗！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这一艰苦的行军，就是朝着祖国的解放迈出的步伐。这话是金日成司令官说的。让我们为了保卫司令部，奋勇前进吧！

吴仲洽就是这样的人。他心里有一团烈火。什么烈火呢，就是对革命的热忱。这个热忱的核就是对自己的司令官的忠诚。

我再说一遍，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所有的指战员都首先为司令部的安全着想，这就是第七团突出的优点。把司令官的命令、指示视如生命，最圆满地加以完成；对司令部的意图领会最快，一旦领会了便全力以赴地带头贯彻执行。这就是第七团在生活和斗争中所发挥的战斗作风。

以自己的身躯挡住向我飞来的子弹而牺牲的李权行、在贯彻执行司令部的命令和指示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吴日男、孙泰春和金赫哲，都是从第七团涌现出来的。

吴仲洽、崔一贤、姜兴锡也都是为保卫司令部献出了一生的。他们都不幸在六棵松战斗中牺牲了。正因为这样，我每当想起六棵松，心情就非常沉重。这场战斗打得很漂亮，可是却失去了三位宝贵的指挥员。

那天晚上10点，吴仲洽率领第七团和黄正海的分队，带头冲进了六棵松的敌军兵营。他们是主攻。不知怎么回事，那天我没能对吴仲洽说一声注意身体。当然，即使说了，他也不会爱惜自己的。他是一个越艰苦危险越身先士卒的指挥员。

我派出第七团和黄正海分队后，立刻又出动了第八团。我交给第八团的任务是，到木材所工人群众中去进行政治工作，同时打开敌军仓库缴获粮食和军需品。

吴仲洽带领突破组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过木栅栏，切断了铁丝网，发起了冲锋。七团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占了敌军的炮台和兵营。敌人惊惶失措急忙躲到兵营的秘密地道里去了。吴仲洽立刻命令队员在地道入口放了火。地道入口冒起了烟，里面的敌人再也支持不住了，灰溜溜地往外爬。

我军的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意外。藏在地道的敌人开了枪，打伤了正在指挥搜索的吴仲洽团长。他受的是致命伤。传令兵金铁万也受了伤。由于残余敌军的顽抗，七团得力的指挥员崔一贤和姜兴锡也牺牲了。受了致命伤的吴仲洽没来得及抢救，也饮恨牺牲了。一辈子历经艰难险阻、为革命奋不顾身，像一团烈火一样的人，就这样走了。

抗日武装斗争时期，我常对我们的人强调说，无论在什么战

斗中，最后结束时要特别注意。因为事故往往是在这最后一刻发生的。六棵松战斗中，就是在结束战斗的最后五分钟里失去了三位宝贵的战友。

看来那时候吴仲洽有些疏忽。他看到战局对我们有利，敌人被烟呛得举起手往外爬，就以为胜利在握，过分大意了。

吴仲洽本来是从没有失误过的人。他生活清廉，仗也打得漂亮，警惕性也比别人高。真不知那天他为什么没想到自己脚下会有敌人。当初侦察组对敌军兵营内部的侦察也不够细。要是事先搞清了敌人地道的情况，也就不至于发生那样的不幸了。想起来实在令人遗憾。当受伤的金铁万来到我面前，泣不成声地说吴仲洽牺牲了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当我证实了这是确凿的事实时，我几乎失去了理智，不顾一切地朝敌军兵营跑去，边跑边大声喊：杀害了吴仲洽的家伙在哪里？是谁杀害了吴仲洽？我绝不能饶恕他！

无论有多大的痛苦，我早已习惯于在队员面前克制自己的感情；但是那天，我实在控制不住了。说实在的，吴仲洽是我多么爱护的同志呀！就是现在想起来，也感到悲愤难忍。那天我们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可是，这一切都烦透了。我们的指战员也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这是未曾有过的最大悲痛。

撤退命令一下，同志们抬起战友的遗体离开了六棵松。几百个人流着泪默默地挪动着脚步，没有一点儿声音。

我们在巨大的悲痛中举行了追悼会。我为了致悼词走向前去，可眼泪不住地淌，什么也看不清楚。心中好像是堵塞着东

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在困难面前我从来没有流过泪，可是在悲痛面前，我却比谁流的泪都多。

六棵松战斗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斗。自这次战斗以后，敌人的第二期“讨伐”作战陷于混乱，而我军则创造了大部队回旋战第一阶段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当敌人把兵力集中到白头山东北部豆满江沿岸一带时，我们则到敦化的奥区打了一场大仗，使敌人大惊失色，目瞪口呆。

在六棵松战斗中，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的基干——第七团打得最漂亮。七团是堪称“钢铁部队”的无敌队伍。这支队伍能成为以一当百的劲旅，应该说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员吴仲洽的功劳。因为他是忠臣，又是名将，所以七团才壮大成为战无不胜的劲旅。

我忘不了金赫和车光秀，同样也忘不了吴仲洽。吴仲洽是我的革命战友和同志，同时也是救命恩人。

吴仲洽团队是粉碎敌人不断的挑衅和进攻，有力地保卫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的防弹墙、攻不破的堡垒。

吴仲洽牺牲后，我们对指战员更加爱护和珍惜，经常教育他们在战斗中最大限度地扩大眼界，处事谨慎持重，以防遭受损失。尽管这样，失去了吴仲洽这个损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的。

人们都说，是我把他造就成了优秀的革命者，其实，光这么看是不全面的。

谈吴仲洽同志的时候，有必要深入地考察一下家庭革命化问题。

过去，在包括汪清在内的间岛全境，首屈一指的爱国革命家

庭就是吴泰熙一家。他们一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抗日革命。在这一家人中，做地下工作时或在人民革命军中牺牲的就有二十多人，可见这一家的爱国赤忱是多么强烈了。

我想，吴仲洽能够成为响噹噹的优秀革命者，其主要因素是他从早年起就受到了吴氏一家长辈的良好教育。

吴氏一家的许多年轻人都成长为出色的革命者，其背后凝结着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人生航路的吴泰熙、吴成熙、吴昌熙、吴正熙四兄弟老人的心血。

吴氏一家非常重视子女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搞得好。这是爱国主义教育、反日教育和革命教育的坚实基础。吴氏一家虽然很穷，但为了使子女上学念书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一家有十多个中学毕业生，可是没有一个走升官发财之路，而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这方面，吴仲和起了很大的作用。

吴仲和扎实地进行了家庭革命化的工作。我们结束南满和北满远征到了汪清的时候，吴氏一家的青壮年和妇女都参加了革命组织。

吴仲洽他们家在吴氏一家中生活最苦，所以对革命也最热忱。吴仲洽首先做到了自身革命化，然后带动弟弟和全家都实现了革命化。

吴仲洽他们三兄弟都成为团和营的军政干部，后来都在战斗中阵亡了。

1941年夏，我在罗子沟一带进行小分队活动时，同吴仲洽的父亲吴昌熙和朴吉松的父亲朴德深取得了联系。当时吴氏一家住在罗子沟。

从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这家人背着满背架的柴火走进柴门。他们一家人迁到罗子沟以后，在各方面仍表现得不愧是革命军人的家属。

那时，我通过金一同志以吴昌熙、朴德深老人为中心，吸收罗子沟一带的军属建立了地下组织。

在小分队活动时期，我们挺进到白头山东北部的时候，得到了吴昌熙老人的很大帮助。在这位老人的帮助下，我们渡江到庆源(今赛别尔)地区建立了革命组织。

吴氏一家确实是应当载入史册的革命世家。

我现在还经常想，要是吴仲洽还活着该多好。如果他还活着，我国就会涌现出许许多多的第七团。

现在，金正日同志在领导人民军向吴仲洽学习的运动。这是很好的事情。

过去，我身边有过很多像吴仲洽那样的忠臣。今天，应该培养出大批像吴仲洽那样的忠臣，安排在金正日同志的身边。

金正日同志是朝鲜的未来，是朝鲜革命的命运。要使我们祖国永远欣欣向荣，使我国社会主义永远胜利前进，就要保证金正日同志身体健康，全党、全军就要真诚拥护金正日同志的领导。干部们要拥戴金正日同志为革命的首脑，抱着一定要接代继承并完成在白头山密林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的坚定决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不断取得辉煌成就。要像吴仲洽团队保卫司令部那样，用生命拥护和保卫朝鲜革命的最高司令部—党中央和金正日同志。

五　平安道人

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有数不尽的相逢与别离交织成的感人故事。其中有匆匆见面又匆匆分手的，有久别重逢的，有只有一面之交别后再未见到的，也有约好要会面却因不得已而未能会面，而且一直不知音信，死后才得知其情况，从而使领袖深感遗憾的。

1993年10月，金日成同志在对抗日革命斗争史的研究人员追述大部队回旋战时，讲述了一件有关在六棵松匆匆见过一面的平安道人的故事。他说，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抗日革命篇第七卷中，要另写一节专门叙述关于这个平安道人的故事。他还说，在自己的革命活动历程中，有过许许多多这种奇遇。

我顺便再谈一件在六棵松遇见一个平安道人的故事吧。

吴仲洽追悼会结束以后，我们朝宿营地走的时候，传令兵赶上来对我说，一个陌生人从六棵松一直跟着我们，纠缠着要跟将军见一面。

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凡是有人前来要求见我，我都没有让他们空跑一趟。不管多忙，该见的人我都见。会见来自敌统区和国内的人民群众，这在忙于打游击战的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但是这天晚上，我没有心思会见任何人，觉得烦透了。因为在六棵松战斗中失去了吴仲洽，太悲痛太惋惜了。加上又失去了

崔一贤和姜兴锡，难过得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愿说。吴仲洽的牺牲，等于我失去了一只右臂。说真的，那时我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我对传令兵说，你去告诉那位客人，我今天不见任何人，求他谅解，请他回去。

传令兵十分为难地说，求他谅解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了，可他总说跟金日成将军是老相识，就是一分钟也好，只求见一面问一声好就满足了。

听了传令兵的话，我觉得很奇怪。六棵松不会有认识我的人，这一带是我们头一次来的陌生之地啊。

我跟着传令兵去一看，是一个背着背囊的中年男子。这个自称是我的老相识的人，我却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可是他一见到我，就一把握住我的手说："是我，是'平安道人'！"

他一说"平安道人"，我马上想起他是谁来了。

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带着队伍行军穿越一片树林，走到一处偏僻的山沟，发现了一幢烧毁的房子。在那还冒着余火的房址上，只见一个中年男子背着一个小男孩，十分悲痛地哭泣。

我走过去边安慰边问他出了什么事。

他稍微定了定神说道，几个钟头前，他带着斧头上山砍柴，没想到这时候来了"讨伐队"，烧了他家的房子，还枪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他背着的孩子，是上山去找他，才幸免一死的。

我听了，怒火中烧，实在忍不住了，决心替他报这个深仇大

恨。我问他敌人有多少，走了有多久。他说敌人有四十来个，走了才半个小时左右。

我转身对队员们说，你们看，日本鬼子有多野蛮。无辜的一家人遭了这样的惨祸，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表示要马上去报仇，都要求参加这场复仇战。

我当场挑选了五十来个精悍的队员，编成一个突击队，立即出动追击。这支队伍把正准备宿营的敌人全部消灭掉，很快就回来了。

在离开那座被烧毁的房子时，我掏出五十块钱，对那个中年汉子说：看到你的遭遇，我们很想给你盖一幢房子，可是现在，我们只能给你这点钱；你就带着这点钱，到别的地方去找个活路，等将来国家独立了，我们再见。

那个时候的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足可以买头大黄牛。当时一斗小米才值三毛钱。

那个中年汉子说："我本是平安道人，听说西间岛日子好过，就搬到这儿来了，没想到遭了这样的惨祸。"他接着恳求说："您的大恩，我到九泉之下也不会忘。在分手之前，我很想知道您的尊姓大名。"见他要求十分恳切，我们的人就把我的名字告诉了他。

当他说他是平安道人的时候，我就感到十分亲切，因为平安道人无异于我的同乡。住在满洲的朝鲜人，有不少平安道人。不过，他们大都住在南满，间岛没有多少平安道人。

在西间岛，我有一次住在平安道人的家里。吃饭时主人给

我端来了一碟新糠虾酱。我问他在满洲这个地方哪来的新糠虾酱，他说是他的儿媳妇去了一趟娘家，从娘家带回来的。那天，煮青玉米就新糠虾酱吃，非常可口，别有一番味道。我小时候是生活在西鲜(指朝鲜西部—译注)的，因此特别喜欢新糠虾酱和毛虾酱。

话再说回来，那天我看到一下子失去了三口人的平安道人，对敌人的仇恨陡增，气得无法忍受。虽然送了他一些钱作为糊口之用，但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一想到他郁积在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我真不忍心舍下他走了。我为他犯愁，他没了妻子，只身带着个小男孩，怎么过下去呢!

虽然难过，不愿舍下他，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分手了。

说起来，这个世界真可谓既宽广又狭窄。没想到在敦化这个深山沟里，又见到了那个在不知名的荒山老林中匆匆见过一面的平安道人。

假若没有失去吴仲洽，我也一定会非常高兴的。但因为失去了战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见了令我高兴的人也高兴不起来。我勉强抑制住心中的悲痛，问他怎么来到了六棵松，在这深更半夜要求见我，可有什么事?

平安道人说，他和我们分手以后，带着孩子来到了六棵松，找到了活路，也续了弦，日子还过得下去。他接着说：

“我们父子能活着，全托了将军的福。要不是那五十块钱，我们父子早就成了叫花子，说不定早饿死了。现在我在山里做伐木工，为您储下了一斗白米，从心里盼望着有一天能再见到将

军，还祷告老天爷，祈求老天爷请您到这里来一趟。”

他是个重情义、不忘恩的人。

从他的一斗白米中，我看到了人民群众对我们革命军的热爱，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和情义；它使我更加下定了决心，为着这样的人民，要战胜悲痛，要拿出勇气，为死难烈士报仇雪恨，叫敌人付出千百倍的代价。

那天夜里，我未能同这个平安道人长谈。我们需要赶路，他也说不能久留。当他挥泪告别的时候，我也心情沉重地送了他一程。

此后，直到祖国解放，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说来也巧，刚解放不久，我在新义州又见到了他。那是新义州发生了学生骚乱的时候，可见是1945年11月的事情。

新义州学生事件最初是在东中学里发生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在反动派的唆使下袭击了道党委办公楼。如果不及时平息，事态就会变得更加严重。人们都说只有金日成去才能扭转局面，我就乘飞机去了新义州。

这个学校曾涌现出许多爱国学生，洪东根牧师好像就是这个学校的。解放前，这个学校的学生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很大影响。反动派利用假共产主义者的胡作非为，向他们灌输了反共思想，他们就像火药一样爆发了，干出了袭击道党委办公楼的行动。

我在这个学校操场向新义州市民和学生讲了话。学生们听了我的讲话，才知道他们被反动派利用，干出了蠢事，认识到反对

共产党，对建设新朝鲜和民族团结，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来，他们再没有干这种蠢事。

当我讲完话，准备回住处的时候，这个在六棵松分手的平安道人突然来找我。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不期而遇。他说他是来参加群众大会的。我们就在大庭广众面前，像老朋友一样高兴地拥抱了。我向随行干部们介绍说，他是我在六棵松作战时见过的人，说明了跟他认识的经过。

人做好事，就能交上好朋友；好朋友是终会重逢的。过去在老年人的谈话里就有“三益友”和“三损友”的说法。所谓“三益友”，指的是结识了就有三种益处的朋友。这种人是正直、可信、见识广的人，人们称之为“三益友”，同这种人交朋友有好处。所谓“三损友”，指的是结识了就会有三种损失的朋友。这种人是心胸狭隘、心善却无主见、说空话而不实在的人，同这种人就不该交朋友。诚然，这是旧时人们的说法，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我觉得，这话把交了朋友有益的人和有害的人区分得还是比较正确的。

把一个在行军路上匆匆见过一面的人，套在这个“三益友”或“三损友”的范畴里谈论，会不会说有些过分，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位平安道人显然是好人，是可信赖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只会给人以好处，不会对人有害。说他是正直可信的人，只看他听说我们来到了六棵松，就背着一斗白米来找我们这件事，就完全可以断定。他见识有多广，就不得而知了。住在深山沟里的人，

即便见识广，还能广到什么程度呢。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他无疑是一个属于“三益友”的好朋友。重情义的人，即便是一瞬间的小恩情也绝不忘怀的人，以情报情、以德报德的人，都是好人。

我对这个平安道人说，现在国家解放了，可以自由自在地见面了，你就把我当做老朋友，随时来找我好了。说来也真怪，这次又是匆匆见了一面，不得不又匆匆分手了。一方面我很忙，另一方面他也不肯多占我的时间。我跟他相逢三次，而每次都是在不寻常的情况下匆匆见面又匆匆分手的，因此每次都没顾得上问他的姓名和家乡在平安道什么地方。

1945年年底，是人人都为获得了解放而兴高采烈、飘然自得的时候，也是人们最紧张最繁忙的时候。我也为建国事业忙得不能分身，同这位久别重逢的有着奇缘的平安道人也未能好好畅谈。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遗憾。

遭到敌人的“讨伐”，他失去了妻儿和家园失声痛哭时，背在他身上的那个男孩如果现在还活着，可能已过花甲之年了。如果当初问过他的名字该多好！

我不知道这位平安道人在新义州见过一面之后，为什么再也没有来找我。战争时期，由于美军的狂轰滥炸，新义州市民死伤惨重，他或许在那时候丢了性命也未可知。

提供关于六棵松战斗的回忆资料的人，现在有多少人？他们当中有没有像那个平安道人的？没能在战前再见到他，太可惜了。

不知他活到了什么时候，可是我相信他在世时一定为国家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方才也说过，会见来访的人，就和深入人民群众一样，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我活到八十多岁，见过很多人。一个个地回忆我年轻时相识的人，心中描绘他们一个个的音容笑貌，的确是令人心情愉快的。

我至今仍感到惋惜不已的是，未能全部见到所有念念不忘的人。尤其是为能见到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候给我以帮助和支持的恩人，甚至不知他们的生死，这是最使我揪心的。

特别是想起那些本来约好要会面却未能会面的人时，心里就禁不住火辣辣地作痛。其中有一个叫金治范的农民。他是解放前就在汉城附近以种地为生的。1950年8月，他作为由汉城和京畿道的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人民参观团的一员来到了平壤。在八一五解放五周年的那天，我在内阁大楼接见了这个一百几十人参观团的全体成员。

可是，在同他们谈话时了解到，有一个团员在敌机轰炸时失散，至今没有到达。这个人就是那位叫金治范的农民。

我问参观团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回答说，从1943年起，他就和在汉城地区活动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员有联系，是个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过革命军政治工作员的爱国者。解放后，他让全家人都参加了救国斗争，他的儿子在反对李承晚伪政府的斗争中被捕，被判处了死刑。

听了这些介绍，我想见他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参观团的人们也都为他未能受到我的接见而深感惋惜。

我有意识地一再拖延时间，等待着他的到来。但他始终没有来。

那么，那位农民到哪里去了呢？后来了解到，他和大家失散以后，到处跑来跑去找队伍。他跑到一所被炸塌的幼儿园，发现里面还有受伤的小孩，就立刻抱起来送到了医院，结果就错过了时间。听了这个经过，我更想见他，决定不管多忙也要见他一面。一想到他因未能见到我而难过的样子，我连觉都睡不着了。

听说参观团第二天要去访问万景台，我便决定抽时间专程去一趟，同我祖父一道会见那位从南朝鲜来的农民。我心想，我的祖父和那位金治范都是农民，两人见面，一定会很谈得来的。

第二天早晨，我把一切工作都搁在一边，带着准备送给那位农民的礼物到了万景台，同祖父一道坐在旧居里等参观团来。可是左等右等，一直到超过了约定的时间，也不见他来。我只好托付我的祖父，请他代我会见那位从南方来的农民，然后就回来了。

他之所以未能按时到，是因为参观团走到八洞桥时遇到了敌人的空袭。真是事不凑巧。

我的祖父照我的托付，见了那位农民，转交了我送他的礼物。

那位农民回到汉城以后，积极开展了支援前线的工作。他们全家人出动，给前线运送粮食弹药，护理人民军伤病员，都做得很好。

那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他参加参观团来平壤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要是现在还活着，恐怕已经是一百多岁了。

那时因为我有急事未能见到他，真是太遗憾了，至今还觉得心里好像坠着一块石头似地难受。幸亏我祖父替我见了他，不然，这事就成为千古之恨了。

“做好事者交好朋友”，这是一句很好的格言。要交上好朋友，就要多做好事。不为国家、集体、同志和邻人做好事的人，是不会有好朋友的。

那位平安道人，是我在为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的过程中结识的朋友。我把他看作我的挚友。他背着孩子，站在被烧毁的房址上悲泣的样子；他背着一袋白米赶来六棵松找我们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六 “用武装维护苏联！”

地球上第一个建立了为工人和农民服务的人民政权，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苏联，成了向往社会主义和社会进步的人类所憧憬的理想社会。

过去，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为了支持和保卫这一理想社会，曾提供了无私的支援。绘有锤子和镰刀的苏联红旗，凝聚着英雄的苏联人民的鲜血，也凝聚着世界各国国际主义战士献出的热血。

每当苏联受到军事威胁的时候，朝鲜人民革命军指战员都高呼着“用武装维护苏联”的口号，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在粉碎日军对苏联进攻的战斗中，有不少指战员献出了生命。

对用武装维护苏联的那个年代，金日成同志曾作过如下的追述。

对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共产主义者必须有正确的认识。过去，有的人说，共产主义者关心民族革命，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则相抵触的；也有人说，朝鲜的爱国者在争得祖国独立以前，谈论苏联革命或世界革命，是背叛民族的行为。由于对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存在着左右倾的错误认识，在我国革命运动中曾一度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对立。

在抗日武装斗争时期，当我们提出“用武装维护苏联”这一口号的时候，有些人就不愿意接受。他们说，这会给民族主义者提供诽谤共产主义者的话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大

肆宣传，叫我们不要做“苏联的牺牲品”，不要做“斯大林的供品”。

当我们说要用鲜血支援苏联的时候，不了解国际主义实质的人甚至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牺牲。

我们在进行艰苦的民族革命的同时，还高呼“用武装维护苏联”的口号，以鲜血支援苏联人民的斗争，这是当时形势的要求。当时，苏联正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者用武装维护苏联，这从革命利益的角度上看是必要的，从道德情义的角度看也是正确的。因此，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就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对苏联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拥护。

支持和拥护苏联的斗争，不仅在30年代，早在20年代就已经开展起来了。

当初，洪范图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不排斥共产主义运动。他是以民族运动为起点开始进行爱国活动的，但并没有囿于这个圈子，也没有把民族运动绝对化。

三一人民起义以后，朝鲜的不少独立运动者到苏俄去进行武装活动。他们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加入了红军和远东游击队，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洒下了大量的鲜血。在这个过程中，洪范图立了不少战功，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2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也支援白匪，对苏俄远东地区不断进行武装干涉。当时，苏俄远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要求在滨海省的洪范图给他们提供援助。独立军的一些上层人物表示异议说，

朝鲜人自己都自顾不暇，还去为别人流血，真是庸人自扰。但是，洪范图说，凡是打日本鬼子的军队都是我们一边的人，毅然以鲜血支援了红军。

在洪范图参与的战斗中，最有名的是伊曼战斗。伊曼是乌苏里江边的一个地方。在伊曼，独立军部队打了个漂亮仗。从此以后，日本军队和白匪军队只要一听到用朝鲜话喊口令，就吓得仓皇逃窜。

苏联人民为了纪念在伊曼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很早以前就为他们立了一座纪念碑。只从这个事实我们就能了解到，朝鲜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共同斗争中结成的友谊有多么久远的历史。

洪范图对自己的部下说：“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者的国家。因此，我们要帮助他们，也要得到他们的帮助；现在他们孤立无援，该有多少困难啊，我们应当好好帮助他们。”同那些卖弄学问的人相比，他的气度多么恢宏！

只要看看在苏满边境一带同红军对峙的关东军的活动，就可以看出帝国主义为了扼杀苏联，进行了多么疯狂的挑衅。仅在1932年到1939年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广为人知的哈桑湖和哈勒欣河事件等大小边境冲突，就近一千起之多，这意味着每隔几天就挑起一次武装冲突。在苏满边境几乎天天枪声不断，硝烟弥漫。

回顾历史，苏日两国的敌对是根深蒂固的。

众所周知，1904～1905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夺取了俄国的莫大利权和广大地盘。

十月革命后，在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行动。他们出兵西伯利亚，露骨地进行武装干涉，大力支援白党。

在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中，最野蛮最残忍毒辣的是日本军队。他们把滨海省一带变成了一片血泊。把被他们逮捕的游击队队长罗兹投进机车锅炉里活活烧死，就是那时犯下的滔天大罪。联合出兵干涉的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军队，都抵不住红军的反击被迫撤退，唯独日军一意孤行，不断增兵，继续窜扰。自从用武力制服了清朝政府和沙俄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没有日本征服不了的国家，没有日军战胜不了的劲敌，因此，一有什么重大的国际纠纷，它都要插一手，捞一把。

苏日对立，可以说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更加白热化了。日本挑起了七七事变，苏联开始支援中国。从此，苏日关系就进一步恶化了。1937年8月，苏联同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撤销了苏联驻日本管辖区中的部分领事馆，也要求日本撤销在苏联的部分日本领事馆。苏日关系就这样越来越恶化。1938年1月，日本当局扣留因事故被迫降落在满洲的苏联飞机，更使苏日关系极度紧张。当时谁都不难看出，苏日间的对立很容易发展成为局部战争或全面战争。

1936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其“五相会议”上把侵略苏联宣布为国策，制订了发动侵苏战争的具体计划，决定增强驻满洲和朝鲜的兵力，企图开战初期就一举消灭远东的苏联军队。希

特勒德国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订出了所谓“巴巴洛萨”的侵苏战争计划，而日本军部制订的所谓“乙”的侵苏作战计划比这更早。在侵苏方面，日本走在了德国的前面。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在“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中说：在国界不清楚的地段，驻地司令官可任意确定国界，如果发生冲突，就不问兵力多寡、国界如何，务必取胜。由于日本军队无理地频繁挑起边境冲突，使苏联面临着随时被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

日军对苏联的这种强盗式的挑衅，使我们义愤填膺。对于每天都同关东军浴血奋战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用武装维护苏联是极为自然的同志爱的表现。

对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我们来说，建立了工农政权的苏联是名副其实的理想社会。地球上有一个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寄生虫的社会，这一现实本身就是令人惊喜的。所以，我们决心不惜流血牺牲去支持和保卫苏联。

日本帝国主义就像挑拨朝中人民关系那样，对朝苏两国人民也不断推行挑拨离间的政策。有一个时期，他们以珲春亲日的朝鲜青年为主组编了一个国境监视中队，部署在苏满边境，叫他们去窜扰苏联，还演了一出以满洲国军政部大臣的名义给他们发赏金的闹剧。

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散布谣言，说他们在间岛的朝鲜人中训练了许多间谍派到了苏联，以使苏联人疏远和仇视朝鲜人。

我们在小汪清游击区的时候，珲春团的同志们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他们团和苏联国境警备队的关系变得很不

好。有个连长不知道苏联人对朝鲜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想同过去一样去同他们接触，险些被扣留。

1938年夏，还有什么苏联远东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高级将领经过珲春流亡日本的风闻。

30年代中期，苏联采取措施，把居住在远东的朝鲜人集体迁移到中亚地区去。苏联人解释说，把朝鲜族集体迁到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去，是为保卫国家不得不采取的措施。但是，朝鲜人是很不情愿的。

听到这一消息，我也痛切地感到身为亡国奴的悲哀。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顾全大局，高举维护苏联的旗帜，不断进行战斗。我们在苏满边境进行的所有战斗，都是明知对我们不利，为了支援苏联仍主动进行的。那时候，我们和苏联并没有什么军事合作条约，而且苏联也没有像对洪范图那样要求我们给予支援。我们完全是从对苏联的同志友谊和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同仇敌忾出发，主动地断然进行军事行动的。

我们的指战员拥护和支援苏联的强烈意志和热情，从1934年冬一架苏联飞机在训练中因狂风迫降在满洲虎林地区时，抢救飞行员的战斗中就可以看出来。

在抢救苏联飞行员的战斗中，起了主要作用的是朴光鲜。当时，朴光鲜正在距虎林有几十里地远的叫于洋部队的中国人反日部队里，以反日人民游击队联络站工作员的身分在那里做工作。苏联飞机迫降在乌苏里江畔的那天，恰巧是他让五十多名健壮的朝鲜青年加入于洋部队的很有意义的日子。朴光鲜看到飞机迫

降，就跑到联络站号召大家去营救苏联飞行员。这时，日本鬼子为了生俘苏联飞行员，也蜂拥而来。我们为数不多的游击队员同装备着机枪和小口径炮的一百多名敌人展开了激战。出去攻打敌军运输队的于洋部队，也加入了这场战斗。

然而，令人焦急的是苏联飞行员分不清敌我，他站在飞机旁边手足无措。朴光鲜用朝鲜话大声叫他放心过来，可他反而把游击队当作敌人，举起手枪就打。这时候，有一个朝鲜人帮助了朴光鲜。这个人是插到于洋部队做反日部队工作的。他用流利的俄语朝飞行员喊："我们是革命军，快过来。"

飞行员这才放下心，向我军爬了过来，终于得救了。

为了保护苏联飞行员，使他早日康复，游击队员们诚心诚意地做了很大努力。他们自己连玉米粥都喝不上，却为了苏联飞行员去打敌人的运输队，缴来面粉给他做面包吃，打来野猪给他吃；大冷天还到乌苏里江去刨开冰窟窿，打鱼给他做鲜鱼汤。这一切，实在是非常感人的。

受了严重震伤，险些被俘的苏联飞行员，在我们游击队员的精心护理下，恢复了健康。最后由我们游击队员护送，安全回国去了。

这件事，在人民革命军中作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范例，广泛传扬开了。

1938年夏天，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了哈桑湖事件。哈桑湖事件又称张鼓峰事件，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边境冲突中规模最大、最无耻的事件之一。

张鼓峰是当时雄基郡四会里对岸苏联的一个小高地，苏联人称它为无名高地。高地附近有个湖叫哈桑湖。所谓哈桑湖事件或张鼓峰事件，都是从这些地名来的。

起初，日本鬼子提出哈桑湖是他们的领地，后来看到苏联拒不承认，就向张鼓峰的苏联边防哨所发起了进攻。他们的野心是占领张鼓峰以后，再增派兵力，把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南的滨海省地区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日军占领苏联边防哨所后，便向这一地区增派了以罗南十九师团为基干的大量兵力。对此，苏联立即出动大军，全部赶走了侵犯祖国疆土的日本侵略者，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惩罚。

在发生哈桑湖事件的时候，我们正在临江一带进行活动，便从背后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日本军部每每对苏联或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都对很敲了他们后脑勺的人民革命军大伤脑筋。日本统治的不治之症——抗日游击队的存在，是日本政界和军部最头痛、最苦恼的事情。

我们在临江县召开军政干部会议时，曾提出了开展果敢的敌后骚扰战来维护苏联的方针。人民革命军所有指战员都表示积极支持，并为贯彻这一方针进行了斗争。人民群众也积极支持革命军的这一斗争。

当朝鲜人民革命军为粉碎日本对苏联的挑衅积极作战的时候，国内的爱国人民也积极开展了抗议日本侵犯苏联的斗争。

下述资料证实了这一事实。

“据朝鲜总督府警务局发行的《最近朝鲜治安状况》登载的资料，8月2日晚，清津码头的一百五十多名工人举行罢工，抗议日本侵犯哈桑湖。参加罢工的码头工人中有很多人投奔了游击队。”（《朝鲜人民争取独立与民主的斗争》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哈桑湖事件后，苏日双方签订了停火协定。在处理这一事件上，苏联对日本的态度十分强硬，这使日本军部的好战分子大为震悚。苏联已不是俄日战争时那个无能的俄罗斯，而是实力强大、不容轻视的大国。日本帝国主义者不能不用新的眼光看待苏联，对他们顽固推行的侵苏计划不能不慎重考虑了。但是，他们并未放弃侵苏野心。为了再试探一下苏联对日本的强硬政策，他们在满蒙边境一带又准备了新的军事挑衅。世称诺蒙坎事件的哈勒欣河事件，就是这样发生的。哈勒欣河是苏满边境附近蒙古的一条河名，诺蒙坎是蒙语和平的意思。

日本发动哈勒欣河事件的目的，在于占领哈勒欣河以东的蒙古领土，在此构筑防御阵地来保护他们准备铺设的第二条铁路，进而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割据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领土。

为此，他们企图再次试探苏联对待日本军事侵略的态度，摸清苏联的对日战略和军事力量。因为在当时，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具体情报基本上没有被公开，关于苏联的许多问题还都是未知数。

而就在这个时期，苏联军部的不少高级军事指挥官从第一线上被除掉，这引起了日本的关注。他们急切地想探悉，苏联军部的这些变化对苏联的军事力量有多大影响。

众所周知，当时日本政界和军部内有两派：主张北进的一派和主张南下的一派，他们就先打苏联还是先南下这一战略问题，长期激烈地争论不休。

在哈勒欣河的军事挑衅，可以说是日本试探北进可能性的一次试验战争。

据说，哈勒欣河一带都是辽阔无边的沙丘和草原。哈勒欣河事件，是日本人捏造事实，借口蒙古边防队员侵犯了国境而蓄意挑起的。当时还有一种说法，说引起这场局部战争的直接原因，是在哈勒欣河草原上吃草的羊群。牛羊这些牲畜，岂知什么国境和哪里禁止通行？然而日本人却唆使伪满洲国警察借口蒙古的羊群侵犯了国境，把蒙古人逮捕起来进行搜身检查。日本人便抓住了这个良机，挑起了哈勒欣河事件。

早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就印行了有利于自己的伪造地图，把伪满洲国的国境线划到蒙古境内二十多公里的地方。

在这一事件中担任主攻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之一小松原，曾任过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武官。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进行哈勒欣河事件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挑衅，是蓄谋已久的。

小松原因为在反苏阴谋中露了一手，一跃而升为担负着对苏作战第一线的驻海拉尔师团的师团长。起初，他率领师团深入蒙古境内，占领哈勒欣河以西的广大领土，把它建成了日军的桥头堡。当时那里没有多少蒙古军队，苏军也驻在离这里一百公里远的地方。小松原正是利用了这一弱点。

不久，苏蒙军队联合起来，击溃了小松原师团等敌人的大部队。

日本调动本土的兵力，组成一支大集团军，发动了新的攻势。

苏联把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朱可夫派到了哈勒欣河前线。朱可夫出动坦克和空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消灭了数量上占优势的日军。到9月中旬，苏蒙军队胜利结束了哈勒欣河的局部战争。

当苏蒙联军在哈勒欣河艰苦作战的时候，为了用武装维护苏联，我们向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下达了新的命令，要他们开展敌后骚扰战。根据这一命令，朝鲜人民革命军各部在这年夏天连续进行了无数次战斗，为制止日本对苏联的进攻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典型的战斗，有1939年8月进行的大沙河与大酱缸战斗。这是一次大仗，是在敌人为了向哈勒欣河投入新的第六军，忙于调动兵力、调运军需物资的时候进行的。

仗整整打了两天，一共消灭了五百多名敌人。在这场战斗中，金振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了冲锋道路。

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也有许多人民军战士学习金振的榜样，用身体堵住了敌人的枪眼。

金振是我们进行第二次北满远征时，在宁安县八道河子入伍的。我们走到八道河子村庄时，吴振宇领来了一个打长工的青年，他就是金振。因为他老缠着我们要参军，我们才吸收了他。

对金振，吴振宇最熟悉，吴振宇就是他的排长。

金振只念过几天私塾，参军以后才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学了文化。有一段时间是我带他，直接教他识字的。他是个淳朴的青年，他为我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惜壮烈牺牲了。

像金振这样的人，应当向后代广泛介绍和宣传。

我认为，在支援苏联的哈勒欣河战斗的战场上，涌现出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英雄，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在支援哈勒欣河战斗的敌后骚扰战中牺牲的女队员许成淑，也是不可忘记的同志。许成淑在年纪还不大的时候，就和当“自卫团”团长的父亲断绝了关系，独自投到游击区来加入了革命军。她在家时，曾为父亲当“自卫团”团长而深感痛苦。她每天几次三番地劝说父亲摘掉“自卫团”团长的帽子，可她的父亲很顽固，只把女儿的话当作耳旁风，根本不听。她看自己说服不了父亲，便毅然离家投奔三道湾游击区去了。那是1933年，当时她才十六七岁。许成淑的这些情况，都是几年以后才听人说的。

不管原委如何，我认为许成淑敌视父亲，同父亲断绝关系，是值得考虑的。

因此，在就组建女兵连队问题同许成淑谈话的时候，我轻微地责备她说：你应该改变对你父亲的态度。你父亲当“自卫团”团长，你应该耐心地说服和帮助他，要他不要倒行逆施，而不应该把父亲当仇人看待。她听了这话，就摇着手表示，父亲的事儿，千万别再提了。

我对她说：就是你父亲做了亲日分子，你也不应采取这种态度；先不要怪他不好，要想方设法争取你父亲转到革命一边来。可你不由分说就断绝了关系，把父亲推到敌人一边去，这对吗？连自己的父亲都改造不了的人，革命又能干得多好呢？我们不久

就要组建一个女兵连队，如果你不改变对你父亲的态度，我们就不吸收你参加这个连队。

许成淑哭丧着脸央求说，过去对父亲不好，往后一定找机会好好说服父亲，只求允许她参加女兵连队。

后来，她参加了女兵连队，作战很勇敢。因为她能征善战，战友们都称呼她“许将军”或“女将军”。

打完间三峰战斗的那天晚上，我对崔贤说，要给许成淑一点时间，让她回家去看看。我是想，给她一个父女重逢的机会，好让他们改善父女关系。崔贤也同意，答应部队一到明月沟附近，就一定让许成淑回家去看看父亲。

然而，许成淑再也没有见到她的父亲。正当她整理行装准备回家的时候，她的部队也准备着支援苏联哈勒欣河激战的大沙河与大酱缸战斗。于是，许成淑取消了回家的计划。她说，在用武装维护苏联的大战前夕，怎么能因私事回家去呢，打完仗再去也不迟。

在大沙河与大酱缸战斗打响的那天，许成淑在岗哨上突然与敌军卡车队遭遇。那天站岗的本不是她，是部队中一个年纪最大的老战士。许成淑是吃过饭后为了替老战士帮点儿忙，才赶到哨所去的。恰在这时敌军分乘好几辆卡车朝哨所冲了过来。许成淑立即叫老战士快回去向指挥部报告情况，自己则单独迎击敌人。她发出枪声，主动地暴露了自己。她想，即使暴露自己，也一定要阻止敌人的进攻，哪怕只阻止几秒钟也好。

敌人的火力自然集中地指向了她。她身上好几处中弹，仍继

续阻击敌人，直到投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才合上了眼睛。由于她的英勇果断，部队才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及时投入了战斗。

许成淑牺牲的时候，不是二十二岁就是二十三岁，正是心中充满着美好理想的芳年！她把自己一切美好理想，全都献给了支援苏联哈勒欣河激战的战斗。她是一朵艳丽的国际主义的鲜花。

全东奎团长和梁衡宇团政委，也在大沙河与大酱缸战斗中阵亡。他们都是珲春人，都是前途无量的青年。他们都具有高尚的品质，素质很高，是处处以身作则的好干部。指战员们都非常爱戴他们，尊敬他们。

梁衡宇是珲春游击队成立初期就参加革命的。在大沙河与大酱缸战斗中，他的部队接受的任务是先攻打大沙河，而后占领小沙河高地，牵制反扑的敌人。可是，大沙河战斗超过了预定的时间，因而未能占领小沙河高地，被敌人抢先占了这个高地。能否占领小沙河高地，将决定大沙河与大酱缸战斗的胜败。就在这关键时刻，梁衡宇提起机枪带头发起了冲锋。队员们紧跟着他冲上了高地。就在他们快要占领高地的时候，梁衡宇腹部受了重伤。他左手按住伤口，右手轮着机枪喊，日本鬼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又在侵略苏联。要全部消灭敌人，用鲜血维护苏联！队员们在他的鼓舞下，犹如汹涌的怒涛，一鼓作气攻占了高地。

从珲春时候就和梁衡宇并肩战斗、共同成长的全东奎团长，也在全歼敌人之后壮烈牺牲了。

在大沙河与大酱缸战斗中牺牲的游击队员，都是忠于革命事业的国际主义战士。

腰岔战斗也是人民革命军不惜流血牺牲，为支援苏联而组织进行的战斗。新任团长李龙云指挥了这一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消灭了好几百个敌人。但是，李龙云的胸部被打穿了，受了重伤。后来，他治好了枪伤，在小哈尔巴岭会议后到苏满边境地区一面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一面进行小分队活动，不久就在那里牺牲了。他所进行的小分队活动，也是带有国际主义性质的。

在哈勒欣河事件发生时，人民革命军进行的和龙县三道沟金矿警察队袭击战、安图县富尔河袭击战和汪清县百草沟袭击战等，为支援苏联而进行的敌后骚扰战，是不胜枚举的。

敌人在所有通往苏满边境的公路和铁路上，把两旁一二百米以内的树木全都砍光了。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对人民革命军的敌后骚扰战，敌人是多么害怕，多么伤脑筋。然而，敌人的这类把戏也未能防止人民革命军的伏击。由于人民革命军大胆无畏的活动，在通往苏满边境的铁路线上，军用列车被炸翻和脱轨的事接连不断。

人民革命军不断地从背后打击敌人，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而且还牵制了敌人，把敌人拴在游击队的活动地区，使其无法充分调动人力去对苏联进行军事挑衅。在挑起哈桑湖事件时，敌人为对付我们而投入间岛地区的兵力就有两个旅团。在挑起哈勒欣河事件时，敌人投入的兵力比这还要多。

如上所述，我们高举“用武装维护苏联”的旗帜所进行的敌后骚扰战，对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苏阴谋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散兵线向前跃进的时候，整个队伍掩护先头部队，是军事

学上最起码的要求。从共产主义者的角度看，地球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是这个散兵线上带头跃进的先锋战士。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就是为了掩护苏联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锋战士，才从背后打击关东军的。

为拥护和支援已经胜利的革命，保卫并巩固其胜利果实而竭尽全力，是共产主义者所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也是应尽的道德情义。只有积极支援先行的革命，后进的革命才能在其支援下胜利前进。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者的国际团结，应当是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和互相补充的关系。

哈勒欣河战斗以关东军的惨败告终。五万多人的死伤、被俘和下落不明，这是玩火的战争狂人理当付出的代价。据说，丧失了全部有生力量的日军指挥官，有的自己烧毁军旗后自尽，有的在上司的逼迫下自杀。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参谋长、作战科长和作战参谋等关东军的首脑人物，在签订停战协定以前被全部撤职。

在哈勒欣河战场上吃了败仗后，日本的对苏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

从那时起，日本对苏联的强硬政策改为暂时的“柔和政策”。

有些人或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共产主义者用鲜血支援和维护苏联是对的吗？如今，苏联的社会主义已经崩溃，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这一现实是否意味着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过去为维护苏联而给予的国际主义援助是徒劳的？

一句话，这是个不容置疑的问题。在我国人民当中，不会有人提出这种问题来论是论非，这是只有放弃了社会主义信念的人才会提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苏联的国际支援。我们过去为苏联的革命斗争提供的支援，不会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变成徒劳的。为正义而尽的情义和努力，决不会是白费的。

我们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崩溃，只是一时的现象。社会主义是人类的理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因此很明显，社会主义的复活是必然的。社会主义不是非正义，而是正义的事业。既然社会主义是正义的，那么，对其第一个体现者——苏联提供支援，也是正义而神圣的，决不是徒劳的。

过去苏联人民处于困难的时候，我们手持武器以鲜血支援了他们，是光明磊落的，我们至今仍为之感到骄傲。

如今，苏联的国号已不存在，最初建立苏维埃国家时的老革命家也都不在了。在今天的俄罗斯大地上，当年直接参加过哈勒欣河激战的老兵也可能不多了。尤其是，能够回忆起当年我们为支援苏联而进行敌后骚扰战的往事的人，可能几乎都不在了。

尽管没有人回顾这些往事，我们付出心血和生命精心营造的国际主义花园，是不会化为乌有的。

过去，我们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主动地手持武器积极支援了苏联。这既是为了苏联，也是为了我们自己。苏联人民以国际主义的支援回答了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

现在，搞民族利己主义的国家很多。看来，不管别人怎么样，只求自己过好日子的思想，在支配着许多人的头脑。我既反对个人利己主义，也反对民族利己主义。只求自己享乐的生活，那怎么能算真正的人的生活！我认为，在人的乐趣中，再没有比助人为乐更大的乐趣了。

七　“前田讨伐队”的下场

1940年3月的红旗河战斗，可以说辉煌地装点了大部队回旋战的最后阶段。

敌人大肆叫嚷什么要进行“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来消灭革命军，但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整整一个“讨伐”中队被歼灭。敌人为之惊愕，十分狼狈。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日本侵华战争进入长期的僵持状态；由于哈桑湖事件和哈勒欣河事件，苏日关系极度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来越扩大。

在这种时候，关东军的头子们叫嚷要最终地扑灭中国东北的抗日运动，开始大搞其“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

我们不断地打击敌人，每打过一仗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销声匿迹，敌人无法找到我们的行踪，在敦化和抚松的深山老林里狼奔豕突了整整一个冬天。但就在这时，敌人以为都已冻死了的朝鲜人民革命军主力部队突然出现在安图、和龙县境，在红旗河全歼了他们的“前田讨伐队”，敌人该是多么惊骇，丧魂落魄啊！

红旗河战斗，同普天堡战斗、间三峰战斗、东宁县城战斗、抚松县城战斗这些大规模的战斗一样，是我们进行的一次难忘的大战。所以，我还记着前田这个人。

前田只不过是和龙县“警察讨伐队”的一个中队长，根本不

是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对手。但他是跟抚松的汪队长和安图的李道善一样穷凶极恶的“讨伐队长”。他曾扬言要消灭朝鲜革命的司令部，十分猖狂骄横，可是落到了被我击毙的下场。因而，他虽是个下级军官，却成了个臭名昭著的人。

那时候，我们按照大部队回旋战的计划，一面按部就班地学习和休息，一面连续不断地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

红旗河战斗前一个月，我们正在白石滩密营进行军政学习的时候，敌人突然来犯。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予以反击，然后迅速转移到了安图方面，大部队回旋战的第二阶段从此开始了。

第二阶段一开始就碰到了困难。在东牌子密营的林水山没有执行司令部交给的任务，这样就不可能利用原定的秘密通路，只好利用不在计划内的另一条通路。这条通路就是没有人烟的白头山东北部白色地区。日本军队虽有很多能干的测绘专家，但他们不敢进入这一地区进行测绘，只好在地图上把这一地区涂上白色。所以把白头山东北部的一些地区叫做白色地区。

我们离开白石滩时制定的路线是：经过白色地区开到茂山、三长去再发出一次枪声，然后经过和龙县再回到安图县中心地区来。这就是大部队回旋战第二阶段的计划。

我们在露水河打了一仗，然后跨过头道白河、二道白河、三道白河，直奔安图县南端。

我们经过白色地区，的确经历了严重的困难。那时候，没腰深的积雪，凛冽的寒风都是我们的敌人，让人难以忍受。最困难的是常常迷失方向，找不到路。万物都披上了银装，既不能分辨

方向，也不能标上记号。走到大马鹿沟附近，粮食也断了，衣服和鞋袜也都破了。于是攻打大马鹿沟，缴获战利品解决了物资问题。从前，大马鹿沟的鹿群常来往于豆满江两岸，夏天到我国境内来吃草，冬天再回到大马鹿沟去吃狗尾草。

敌“讨伐队”的据点大马鹿沟里，还有山林警察中队的部队。大马鹿沟是国境上的“讨伐”据点。日寇在这一地区设有山林采伐公司和作业场，掠夺了大量的军用木材。

战斗打响以前，我们派侦察小组到大马鹿沟进行了侦察。他们回来报告敌情以后，像出了什么大事似地说，他们看到了一些怪人，眼睛灰溜溜，个子高高的，鼻子有尺把长，手背上毛茸茸的，不知道是些什么种族。我又派一个队员去了解了一下，才弄清他们都是在木材所当汽车司机的白俄。哈尔滨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白俄。1930年夏天我到哈尔滨去，也看到了很多白俄。

我们趁敌人主力出征的空，以急行急袭的战术，一举攻占了大马鹿沟。那些当司机的白俄一见到我们，就拿出金戒指要送。看来他们以为我们是土匪。我们的队员都不要，都退还给了他们。他们都不解地歪歪头，好像是说，天下还有不爱钱的怪人。这就是他们的观点。

攻占大马鹿沟缴获了大量的面粉，一袋一袋地分给了当地群众。战利品很多，每个队员背了一大包还有剩余的，几十名伐木工人主动帮助我们运这些东西。

我想说服那些白俄用汽车送我们一段路程，可是他们不愿意。我再叫一个会讲俄国话的人去说服他们，那些白俄这才答应

帮我们送一程。那时候我直接同那几个白俄交谈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不住在自己的祖国，到中国来过日子？他们说，共产党不欢迎像他们那样地主、资本家出身的人。还说，他们的父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罪的，但他们本身却是没有什么罪的。我再问他们，要是把你们送到苏联去的话，你们愿意同共产主义者一起搞社会主义建设吗？他们都说愿意。

帮我们背着战利品来的人当中还有一个日本工人。听说他回去后替我们做了很好的宣传。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讲给别人听。他说，我见到了革命军，他们都是好人，都跟我们工人站在一边。他们明明知道我是日本人，可是待我毫无两样。还告诉我日本工人和朝鲜工人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听说他后来被木材所监工发觉，赶到别处去了。

我们奇袭大马鹿沟，惊动了安图与和龙一带的敌人。他们立即进入超紧急警戒状态，处心积虑要消灭我们的主力部队。打前锋的就是和龙县“警察讨伐队”队长、县警务科长宇波和前田。

这个“警察讨伐队”，是1939年5月我们结束茂山地区战斗，在豆满江沿岸连续不断地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时候，和龙县警察当局为牵制并消灭我们，纠合包括前田中队在内的四个中队和铁道警备队两个中队紧急组建的。这个“讨伐队”，在间岛地区“讨伐”队长的指挥下，对游击队进行了疯狂的“讨伐”。他们原以为我们仍在遥远的北方，没想到我们突然出现在和龙、安图县境袭击了大马鹿沟。为此，他们老羞成怒，集中全部兵力开始追击我们。

后来才知道，前田对我们进行“讨伐”比谁都疯狂，动辄夸口说，金日成部队由他包下来消灭掉。

“野副讨伐司令部”为缉拿我悬赏金竟多达一万元。据说悬赏金还有比这更多的资料。

伪满洲国治安当局制定的“警察奖”，普通奖金为十元，以治安部大臣的名义发的最高奖金为二百元。可见这一万元的赏金有多么大了。

听说，前田在朝鲜当过下级警官，到满洲以后在首都警察厅下边的警备司令部和靠近朝鲜国境的几个地方当过警察署长；在间岛一带的“治安肃正工作”中立了“大功”，受到了治安部大臣的奖赏。

前田听说我们袭击了大马鹿沟，大动肝火，扬言要完全消灭游击队，还写了血书，举行了“讨伐出征仪式”。日满军警联合“讨伐队”全部出动，包围白头山麓的大森林，布下了“连蚂蚁都逃不出来的天罗地网”。

当时，我预料到“讨伐队”必定穷追不舍，便制定了巧妙地甩掉敌人的战术。首先让一个小分队和四十多名帮我们背运战利品的人，分好几批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回大马鹿沟去，到处留下脚印。

敌人惊呼他们被这些人的脚印所迷惑，失掉了好不容易追寻到的游击队踪迹。他们恶狠狠地说，这回决不让游击队跑掉，金日成神出鬼没的本事再大，还能钻到地里去吗？只要搜遍了白头山，就一定能抓到共军司令部。于是他们每天都在山上搜来搜去。

我们甩掉敌人之后，到花拉子密营去从容不迫地进行了主力部队的军政学习，也进行了休整。在这里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们继续向茂山方面进发。分散在花拉子一带寻找我们踪迹的敌人，这时才刺探到我们的去向，开始了追击。

在路上，我们碰见了一些被“讨伐队”征去当民夫的农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有一千名左右的敌人在尾追我们。那时虽已到三月，但积雪齐腰深，敌我双方都很难行走。可是，敌人的行军速度还是比我们快。因为他们是顺着我们在前面踏破积雪开出的路追来的。

这时候，队伍里发生了伤寒病。患伤寒病的，起初只有一两个人，后来逐渐增加到了十五六个人。真是火上浇油，越发困难了。

我问林春秋打算怎么治这个伤寒病。林春秋是游击队的政工干部，但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说要用鸦片治。我同意了。叫他不管是用鸦片还是用什么别的，一定要把病治好。

患者服用鸦片渡过了险关。可是体力还没有恢复到可以行军的程度。本应该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边，可是因为出现了病人，行军速度自然减慢。敌我之间的距离缩小到只有十至十五里了。

红旗河上游的大马鹿沟河有几条小支流。我们走到其中一条支流时，天开始黑下来。这里有木材所工人住过的破房子。我先派了岗哨，然后让队员们到屋里去睡觉。队员们不充分休息，就不能打仗。他们都知道敌人在紧紧地追我们，看到我命令停止行军就地宿营，都显得有些不安。但是看到我先躺了下来，也就放心了。

我决定在红旗河山沟里消灭“前田讨伐队”。

我之所以选择红旗河山沟做埋伏地点，是因为估计到这里是敌人返回本部的必经之地。而且，这里的地形非常有利于伏击敌人。就像和龙县警务科长后来说的那样，这个地方的确是只要遭到伏击就“根本无法运用战术的不利之地”。

吴白龙一听到我选择红旗河山沟做埋伏地点就说：“将军，敌人熟知我们的战术，会自投这个陷阱吗？”这话有道理。敌人最怕我们的诱敌伏击战术。他们把这一战术叫做“罗网战法”，还绞尽脑汁研究了对付这一战术的策略。“千万不要落入金日成的罗网”，这话成了当时敌人常念叨的警句。可见敌人对我们的诱敌伏击战术是多么害怕了。凡是会有游击队埋伏的地点，敌人都尽可能远远地避开。吴白龙是想到这一点才那么说的。

我推测，敌人可能以为我们看到他们对罗网战术十分警惕，不会再使用这种战术了。根据这一推想，我决定在红旗河山沟设下埋伏，痛打尾追而来的“讨伐队”。换句话说，我决定再使用敌人以为我们不会再用的战术。

第二天，我们开始行军。沿着山脊朝小马鹿沟方面走了一段，就进入了峡谷。峡谷两旁的山势非常奇特。朝上游看，右边有三个山峰，恰似三兄弟并排而立，是再好不过的埋伏阵地。左边也有一个山峰，下边有一小片树林，也是于我们有利的地形地物。

我召集指挥员们简要地做了战斗部署：峡谷右边的三个山峰上布置机枪排和警卫连，左边山峰的周围布置第七、第八两个

团；并命令各队都朝下游走去，故意留下脚印，走到一定距离再走回来；回来路上的脚印要全部掩平，然后各到指定位置埋伏下来。诱敌小队则一直走到沟口，留下脚印，执行打援任务；以孙泰春为负责人的一个小组占据峡谷第一个高地的北面，切断敌人的退路。

这天，在红旗河峡谷，我们按计划打了埋伏。因为天气突然暖和起来，向阳坡上的雪都化了，山路变得十分泥泞。

过了中午，太阳西斜的时候，敌人才出现。用望远镜一看，是打头的侦察队。敌人派侦察队，一般只派一两个人，而这次却有十来个人，是一支够大的侦察队。可见集结在花拉子的“讨伐队”全部出动了。侦察兵后面又出现了尖兵。当尖兵走过最后一座高地的时候，一个腰挎军刀的军官走进了峡谷。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前田。他的先头部队已经深深地走进了我们的埋伏圈。这时，前田停住脚步，仔细察看着雪地上的脚印和奇特的地形。

我在思量他会不会把侦察队派到峡谷上头去，会不会把部队撤回去。而这个前田因为在丛山峻岭东奔西走，白白地跑了十多天，已经疲惫不堪，在这需要冷静思考慎重判断的关键时刻，好像放松了警惕。他手下的军官看到他站在一棵独立的树下，就都向他聚拢。他拄着军刀向他们作了什么指示。这时，他们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进入了伏击圈。

我不放过这绝好的时机，立即发出射击信号。

在我军的第一次打击下，敌人就倒下了半数以上。遭到来自峡谷两边的突然夹击，前田急忙命令行军队伍就地散开，并命令

主力攻占北面高地。这时，埋伏在西面灌木林中的我军从侧翼猛烈射击，使敌人没能得逞。前田看情况不利，似乎下定了决一死战的决心，发出了突击命令，并抽出军刀站到队前直扑过来。他受了重伤，却仍在指挥战斗，直到断了最后一口气。

残余的敌人继续顽抗。他们虽然伤亡惨重，却不肯放下武器。除了缴枪投降的三十来个敌人，其余全部被消灭，死伤约一百四十多人。

在红旗河战斗中，我们的指战员打得很漂亮。继在六棵松战斗中牺牲的吴仲洽当了团长的吴白龙打得特别好，金一也出色地完成了突击队长的任务。

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一看，战利品多得惊人。其中还有无线电收发报机，光子弹就有好几万发。那时我们的枪支绰绰有余，这次又缴获了大量的枪支，简直很难处理。我们从缴获的武器中拨出一部分，发给队员换掉了旧武器，其余的就用油纸包起来埋在地里或藏在空心的枯树洞里，以备大事变到来时起出来用。

整理完战利品的时候，伪满军的“奉天部队”在不太远的地方，升起篝火胆战心惊地观望着我们。他们不敢跟我们对打，只是装模作样地瞎放空炮。我叫吴白龙把缴获的机枪全部架起来，朝他们打过去吓唬他们，也顺便检查一下武器的性能。

那天晚上，吴白龙问我，“奉天部队”在偷偷地跟踪我们，要不要回头狠狠地揍他们一顿？我说，先别管它，不必连观战的人都干掉，留着他们比消灭掉要好得多。他们回去会把前田部队被全歼的消息传扬开去，岂不更好？

这天打扫战场的时候，我看到从一个被打死的日本军官的衣袋里发现的遗书，才知道前田曾叫部下写遗书的事。用绸缎包的那份遗书，写得十分悲壮。据俘虏兵说，前田在出征前集合部下训话。他说，他的中队作为地区“讨伐队’的一员，要同金日成部队作战。要打败金日成部队，就要培养大和魂，要有为天皇捐躯的决心。他接着叫部下都写了遗书，甚至还给自己做了个死后用的骨灰盒。

听了这些话，我才明白前田是个什么货色：他虽然不过是个低下的“讨伐中队长”，却是一个国粹主义的极为凶残的鹰犬。

我认为，把前田驯养成为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和疯狂的反共分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国粹主义思想。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全体国民驯养成为彻头彻尾的国粹主义信奉者，从来就是不择手段的。凡是国粹主义，都披着爱国主义的外衣。所以，思想上尚未觉醒的人，很容易被国粹主义的毒素腐蚀。

我过去就说过，日本军国主义给他们的青少年灌输只有吞噬了满洲才能过好日子的侵略思想。在人们每天吃的糕饼等食品上也刻上了鼓吹向海外扩张的富有刺激性的字样。这是叫人们吃糕饼也要想到吞噬别国的领土。如果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行宣传，人们的头脑是不能不受毒害的。有些人以为资产阶级没有什么思想，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共产主义者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同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信奉他们思想的鹰犬。革命军的部分指挥员，有一度在抨击日军灌输皇道精神时只片面地揭露它

的欺骗性和荒谬性，结果出现了把日本兵只当持枪的木石看的偏向。这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我们强调我军在政治思想上的优越性，是说明我们的思想比敌人的思想优越，而不是说敌人就没有他们自己的思想，也不是说因为敌人没有正确的思想就可以轻视他们。我们告诫政工干部说，不要只强调敌人在思想上的脆弱性，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敌人虽然是脆弱的，但他们也在灌输他们的思想，用恶毒的反共毒素驯养他们自己的士兵。

通过红旗河战斗，敌人尝尽了苦头。他们得到的教训是，无论怎样追打朝鲜人民革命军，也得不到任何东西，反而会落到“前田讨伐队”那样的可耻下场，世上任何力量都打不过朝鲜人民革命军。

通过红旗河战斗，我们向全世界宣告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依然健在，而且在继续乘胜前进，在任何严峻的艰难困苦面前，都决不会屈服，决不会死灭。

红旗河战斗，对国内人民产生了极好的影响。红旗河离朝鲜很近，前田部队被革命军全歼的消息很快飞过豆满江传遍了全朝鲜。曾经提心吊胆地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担忧的人民群众，从这个喜讯中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从此以后，不管敌人怎么声嘶力竭地叫嚷革命军全垮了，再也没有人相信了。

红旗河战斗以后，有关朝鲜人民革命军威力的传闻，越来越广泛地流传在人民群众中。人民群众增强了对朝鲜人民革命军的绝对信赖，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于朝鲜人民革命军，这是很有

意义的事情。所有这一切，在解放祖国的大事变即将到来的时刻，鼓舞着朝鲜所有的反日爱国力量满怀信心地推动全民抗战。这是我们通过红旗河战斗取得的最大收获。

与此相反，对一直大肆宣扬只要消灭了金日成部队，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将告终的日满军警来说，“前田讨伐队”的全军覆没是犹如晴天霹雳的不幸和悲惨的失败。

和龙县警察当局为前田部队的覆灭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发出悲鸣说，除了怪上帝没有恩赐天命再也无话可说了。他们还不得不老实地承认，在朝鲜人民革命军灵活的战术面前，前田部队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前田部队的覆灭，意味着日满军警首脑全力以赴的“东南部治安肃正特别工作”的彻底破产。

日本战败后，前田的顶头上司、和龙县警务科长宇波，回到日本写下了他的回忆，摘录其中几段如下：

“……我作为间岛省的满洲国警察，参加讨伐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抗日部队，是从1938年到1941年。……

“在很难收集情报的情况下得到的比较正确的情报指出，

‘金日成将军毕业于吉林市的学校，极为优秀，政治判断力、组织领导能力出众，享有很高的威望。’

……

“金日成将军的卓越的领导能力，在抗日游击斗争中有了充分的发挥。特别是他的巧妙的诱敌战和埋伏战，使我们多次吃了大亏。……“1940年3月11日，位于红旗河峡谷的大马鹿沟遭到了金日成部队的袭击。大马鹿沟是山林警

察中队队部所在的讨伐队据点。队部被打，汽车修理所被烧，武器、弹药、粮食和被服被劫。

“布上地区讨伐队队长命令警察讨伐大队协同日本军大场、赤掘部队，追歼金日成部队。

“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前田武市中队。3月25日，前田中队在大马鹿沟附近与金日成部队遭遇，展开大激战。结果是前田中队长以下全军覆没。原因是中了埋伏战。前田中队的全军覆没给了讨伐队以很大的冲击。

“金日成部队精通地理，战术巧妙，我军在密林里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没有成功。……

“当时，金日成游击队士气高昂，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是金日成将军领导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不会有任何妥协’，‘讨伐队是给我们输送武器、粮食和被服的最值得欢迎的客人。’

“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欣欣向荣，不断发展。

“我根据亲身体验深信，在卓越领导人的领导下前进的朝鲜人民必将实现祖国的统一。”

伟大领袖此后在回忆红旗河战斗时曾强说，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必须提高警惕。下面摘录他讲话的一部分：

日本的统治阶层说，他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所谓称霸世界的梦想中醒过来了。如果这是事实，那对日本也是好事，对邻邦人民也是个大幸。

但是，目前日本统治阶层的所作所为，不能不令人怀疑他们

是不是仍在做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称霸世界的美梦。日本的不少反动势力至今仍不承认他们侵略和掠夺朝鲜人民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罪行和夺去了千百万人性命的罪行，也不进行赔偿。甚至还不真诚地承认他们把二十多万妇女抓去当性奴隶，待之如牛马的野蛮暴行。他们反而以经济为资本，妄想做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在欧洲国家，新法西斯分子在蠢动，这也是不吉利的事情。

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必须提高警惕。

注　　释

［1］《钟声》：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内周报，于1937年12月在濛江县马塘沟密营创刊。

［2］《曙光》：朝鲜人民革命军队内机关报，于1937年5月在抚松县东岗创刊，初为政治周报，后改为杂志。

［3］“白山武士团”：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大舅康晋锡先生以朝鲜平安道的独立运动者为骨干组织的武装团。（见本书第一卷中文版第57页）

［4］洪钟宇：从1919年起在日寇宪兵机关服务，对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父亲，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者金亨稷先生等朝鲜独立运动者的工作给予很大的帮助。（见本书第一卷中文版第61～66页）

［5］“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1926年10月17日在桦甸建立的我国第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是与民族主

义者和先前共产主义者的派系截然不同的新型革命组织。它提出的当前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最终目的是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它的建立，是建设朝鲜劳动党的出发点，从此形成了朝鲜劳动党的根子。（见本书第一卷中文版第152～156页）

［6］ 大院君：李氏王朝第26代王高宗之父李正应，曾在1863～1873年间执政。李朝时期称旁系人继王位的国王的生父为大院君。

［7］ 华成义塾：朝鲜民族主义者以培养独立军指挥员为目的于1925年初建立的二年制军事政治学校。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1926年6月入学。金日成同志对华成义塾的民族主义思想教育和陈旧的军事训练感到幻灭，为了在更广大的政治舞台上积极开展共产主义运动，于1926年12月辍学。在校期间建立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8］ 《沈清传》：以孝敬父母为主题思想的小说，于18世纪初根据口传文学创作。主人公沈清的母亲早逝，她为盲父尽孝，使其重见光明。

［9］ 建设同志社：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于1930年7月3日在卡伦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它在组织和扩大党的基层组织方面起到了母体的作用。（见本书第二卷中文版第49～59页）